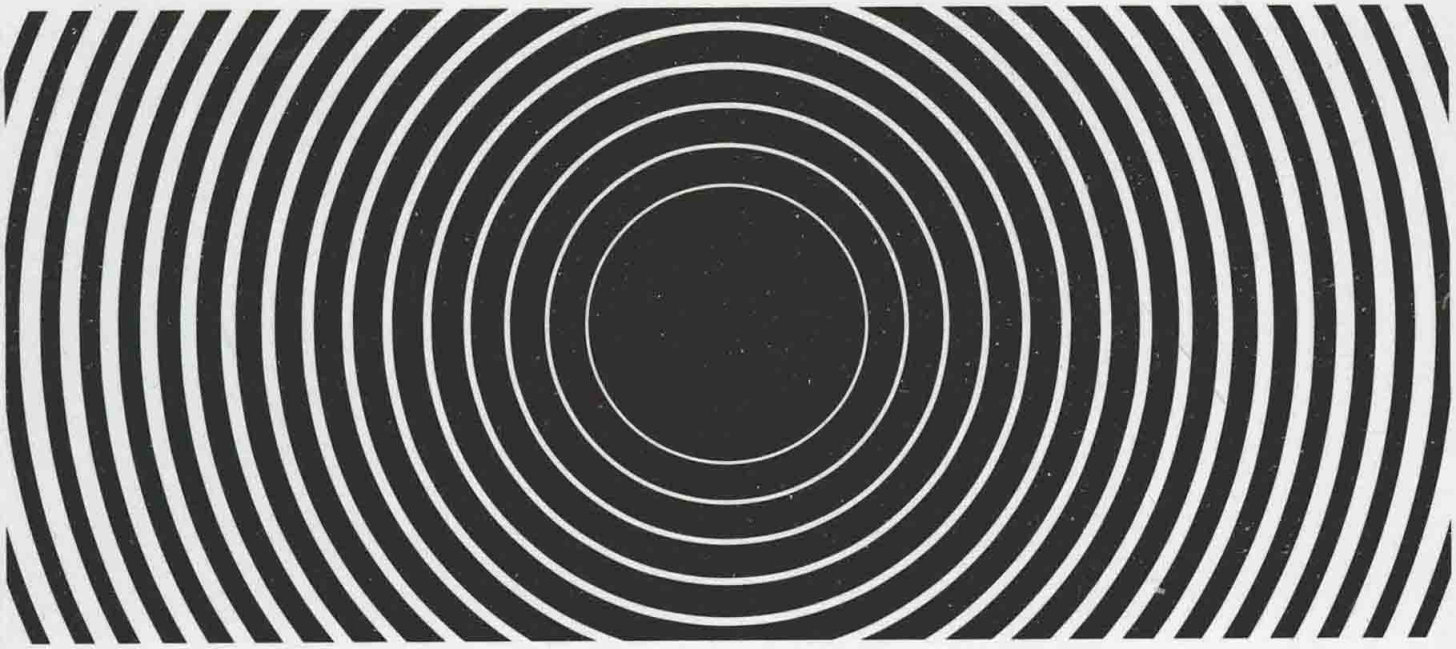
《纽约时报》年度推荐图书 | 《经济学人》《卫报》联合推荐

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

【白俄罗斯】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著
张行舟 闾佳 译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布鲁斯·斯特林 BRUCE STERLING
赛博朋克的定义者、《差分机》作者

他的新书就像砂纸，用来打磨那些“互联网权威人士”的作品。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NASSIM NICHOLAS TALEB
《黑天鹅》作者

一个清晰可辨的理性之声，对当下嗜新狂病症（neomania）的批判性思考。

卫报 THE GUARDIAN

莫罗佐夫已然成了技术乌托邦主义的批评者中眼光最毒、最富讽刺精神的一位。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

读这本书，就好像你在一个宴会上迟到，却发现一个博学的客人正在滔滔不绝。莫罗佐夫在和你从未谋面的人争论、引用你从未读过的书、援引海量信息源，以至于你会在桌布下偷偷用iPhone搜索查询。他把矛头指向权威人士、硅谷，甚至任何使用帕洛阿尔托邮政编码的人，还有那些在TED大会上颁布的金科玉律。

策　　划：胡 南
责　　编：刘声峰
封面设计：玛丽设计事务所

建议上架：互联网 文化

ISBN 978-7-121-22777-6

9 787121 227776 >

定价：68.00 元

技术至死

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

the folly of 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

[白俄罗斯]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著

张行舟 闾佳 译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Copyright© 2013 by Evgeny Morozov.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版授予电子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65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白俄）莫罗佐夫（Morozov,E.）著；张行舟，闾佳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6

书名原文：To save everything,click here:the folly of 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

ISBN 978-7-121-22777-6

Ⅰ. ①技… Ⅱ. ①莫… ②张… ③闾… Ⅲ. ①计算机应用 - 影响 - 社会生活 Ⅳ. ① G301 ② TP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3497号

书　　名：**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作　　者：[白俄罗斯]叶夫根尼 · 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著　张行舟　闾佳　译

策划编辑：胡　南

责任编辑：刘声峰

文字编辑：王天一

印　　刷：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25　字数：350千字

印　　次：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8.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中文版作者序

《技术至死》英文版面世于2013年3月，几个月之后，爱德华·斯诺登就捅出了美国国家安全局暗中进行的网络间谍行为。此事引发的喧嚣让我进一步相信，我在书中提出的两点主要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首先，光是用心良苦（也就是我所谓的“解决方案主义”）还不够：硅谷的公司或许希望，在他们天真的乌托邦式梦幻世界里，他们要为中东地区带去和平，要帮助千百万贫苦人民摆脱贫困，但这很难说得上是事情的全貌。他们所有拯救世界的人道主义努力，都有一个秘而不宣、不愿在公众面前承认的阴暗面——直到斯诺登把它捅了出来。一如我们所知，能用来解决各种各样问题的数字基础设施，对推动美国国家安全议程同样极端有用——所以，那些天真地信任自己美国通信服务商的外国公民，偶尔就会被监控一下。

其次，斯诺登捅出消息之后，来自民间社会的胆怯反应让我相信，我们陷入了一种怪诞的数字形而上学（我在书中称为“互联网中心主义”），妨碍

了我们思考政治、自由和自主权的能力。大多数社会运动不根据背景去开发、应用相应的知识框架，去理解诸如“大数据”等问题（毫无疑问，大数据会影响到我们的政体组织方式），而是倾向于拥抱数字化的语言，追求“互联网自由”一类虚幻的目标——所谓的“互联网自由”，是个非常模糊、不明确的项目，毫不出奇，每一个追求它的社会运动都以惨败告终。（这似乎正是德国海盗党的命运——我在书中讨论过他们的可怜案例。）

倘若我们不从阐释每一种技术发展的数字心态里挣脱出来，不逐一追问它们到底对互联网做了些什么（以及没做什么），我们是没办法解决对大型中心化通信和网络服务的依赖问题的。本书争议性最大的一个观点——也即那么多好心倡导者热心捍卫的“互联网”，根本就不存在——我自己是完全坚持的。现代世界很复杂，从搜索引擎到社交网络、点对点网络，再到维基百科等网站，每一种技术都发挥着作用。但我们不该以为它们都有着相同的起源，有了这一起源，它们就存在有理。比方说，像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恐怕应该更多地感谢学术型的数据科学，依靠它，谷歌才开发出了PageRank算法，而不是去感谢使它能够生效的网络。

我在书中确认的许多发展趋势（将越来越多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交托给算法，自我跟踪和量化自我的思想越来越多地侵入各行各业的生活，追求政府公开透明和政府问责制的人之间出现越来越大的政策差距），眼下已愈演愈烈。与此同时，硅谷对公共生活的垄断（至少在美国，但世界其他地区也可能存在），也越发严重。我们继承了它的语言，以及伴随而来的，它最喜欢的解决问题的工具。难怪如今的白宫这么热衷于举办“公民黑客马拉松”了。

我最担心的一点是，面对我们共同的问题，以前我们采用公众化公民审议的方式解决，而今却要以私有化的个人主义技术官僚方式取而代之。最能看出这种趋势的地方是，每当我们发现什么问题有害时，就立刻拿出各种各

样的应用程序去打补丁。只要在手机上安装了合适的软件，我们就能对抗肥胖症、气候变化，甚至无处不在的分心。这很好——但我们这么做，会不会忘了还有其他更有效、更具雄心、更集体的方式可以参与政治，解决问题呢？既然我们开发软件就能让用户做出正确的行为（哪管用户感觉如何），我们还会投身痛苦的制度改革，削弱一部分人的权力，将之重新分配给长久以来呼声饱受压抑的人吗？

这就是我在书里提出的主要观点：硅谷及世界各地的诸多仿效者对我们的一些问题拿出了亮光闪闪、超级性感的技术解决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办法就是最好的。事实上，它们反而有可能是最糟糕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们把解决问题的担子都放在了公民身上，却不管系统本身年久失修，解决问题的制度发育不良。这显然是我们需要避免的状况。

常言道：光是用心良苦还不够。或许可以再改改：用心良苦，加上强有力的技术，就是通往灾难的门票——只要我们不加思考地使用技术解决方案，就因为它让我们显得时髦，或是以麻烦最少的方式帮我们解决了问题。但这种怕麻烦、躲麻烦的心态，迟早会叫我们吃大亏的。这一点，就是本书的中心思想。

2013年12月17日

叶夫根尼·莫罗佐夫

波士顿

引言

“在一个先进技术的时代，效率低下是对圣灵的犯罪。”
——奥尔德斯·赫胥黎
（Aldous Huxley）

“复杂，在合适的人手里是可以解决的。”
——杰夫·贾维斯[1]
（Jeff Jarvis）

硅谷有诸多罪过，但缺乏雄心不在其列。听听它嗓门最大的传道者，你会相信，硅谷所做的一切就是解决别的什么人制造的问题，或许是华尔街贪婪的银行家，又或许是华盛顿无所事事的政客。

“技术已不再仅仅涵盖硬件和软件。实际上它已深入到庞大数据的挖掘和利用，从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2011年，谷歌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对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学生听众如是说。Facebook的老板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对此表示同意，他认为自己公司的使命是“让世界更开放，联系更密切”。“我们早上可不是带着以赚钱为第一要务的想法睁开眼的，”说这番话之后不过几个月，他的公司股票暴跌，于是除了它的铁杆粉

1 纽约城市大学新闻学教授，网络上人气最高、名气最大的媒介博客之一Buzzmachine.com的博主，伦敦《卫报》新媒体专栏特约撰稿人，多次入选“世界媒体领袖100强”。著有全球数字领域权威著作《Google将带来什么？》（*What Would Google Do?*）。

丝外，所有人都相信Facebook与赚钱老早就分道扬镳了。可这下子扎克伯格先生靠什么来起床呢？就像他对2008年西南偏南音乐节的观众说的那样，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宏愿。“这个世界有许多真正的问题亟待解决，作为一家企业，我们要做的，就是构建一个基础结构，一部分问题能够借此得到解决。”扎克伯格这样宣称。

过去几年，硅谷最喜欢的口号悄悄地从“不创新，毋宁死！”换成了“不改良，毋宁死！”在世事的宏大格局中，什么得到了改善并不太重要；有能力做出改变，使人类的行为方式更加负责任和可持续，实现效率的最大化，那才是最要紧的。即便在TED大会（姑且称之为颓废派文人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呆瓜们看来都似乎过于宏大的青涩想法，却也毫无压力地跻身于硅谷的商业计划书中。“更健康，更幸福，更有效率”，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Radiohead一首流行歌曲里淡淡忧伤的调调，如今在许多顶尖数字化企业的公司总部倒是更容易受到举牌欢迎。技术能把我们变得更好——技术也会把我们变得更好。或者，像极客们说的那样，只要有足够多的应用程序，人类所有的bug（程序漏洞，这里指瑕疵缺陷）都将是微不足道的。

当然了，加利福尼亚从来不缺乐观精神，也不缺夸夸其谈。而创新打开的机会之门，甚至让最固执、最脚踏实地的风险资本家都忍不住伸手掏钱包。毕竟，靠拯救世界而致富，这样的运气是随便什么时候都有的吗？在一家富有人道精神的机构（没有官僚作风，没有忙碌的旅行，薪资反而更加优厚）工作的那种快感，是随便哪里都找得到的吗？

这场改良的狂欢派对会怎样结束呢？它真的能做成什么吗？要找到答案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些萌芽中的改良成果推向盖棺定论。假设硅谷有一位专属未来学家，她对不久的将来（比如2020年前后）有什么美好愿景呢？这本身就很好猜测。它大概会是这个样子：人类，在强大的自追踪设备的帮助

下，最终战胜了肥胖症、失眠症和全球变暖问题，因为大家都吃得更少，睡得更好，排放也更合理。人类记忆不可靠的弱点也得到克服，因为正是这些追踪设备记录并存储着我们的一切。汽车钥匙，面孔长相，逸闻趣事：我们再也忘不掉了。不要再为你小时候狼吞虎咽过的玛德琳小蛋糕心生普鲁斯特式的怀旧情绪了！[2]因为那一刻肯定已经存到你的智能手机上了——不，更有可能的是，存在你记录一切的智能眼镜里。白日梦可以休矣，直接回放它就好。与此同时，你完全可以相信，Siri，苹果公司最可靠的语音助手，肯定会告诉你最不想面对的真相：这类蛋糕会使你的血糖水平急剧升高，应竭力避免。对不起了，普鲁斯特！

最后，在选民广泛而持续的注视下，政治摆脱了龌龊的腐败、幕后交易和低效率的政治交易。政党崩溃，取而代之的是Groupon[3]式的政治运动，用户在此偶然相聚，对与他们的生活间接或直接相关的问题高谈阔论，然后很快闪人。由于政客说的每个字——不，发出的每个声音，都为后世子孙记录存储下来，伪善变得过时了。随着有关政客的财富数据——他们的日程表、午餐菜单和差旅费——都被发到网上供大家查阅，各种派别的说客们也绝迹了。

而随着数字媒体让参与更加容易，越来越多的市民独自打保龄球，却一起写博客。最后甚至过去那些从来都懒得投票的人也得到了适当的激励，当然，是作为在线游戏的一部分，他们在那儿为拯救人类而挣点数。就这样，他们争先恐后地跑到投票站用手机签到。谢天谢地，前往投票站也不再是件难事儿，自动驾驶汽车早就发明出来了，就是为了方便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

2 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提到玛德琳蛋糕。主人公的妈妈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为他端了一杯热茶和玛德琳蛋糕，两者混合的味道掀起了他一连串的童年追忆，这段情节描写充满了怀旧情绪。

3 一个美国团购网站，是电子商务、web2.0、互联网广告以及线下模式的结合体，是美国近半年来比较流行的新模式之一。

一个地方。街道清洁光亮，而保持这种状况也是这个精心制作的在线游戏的一部分。要同胞乡亲承担公民责任和义务的吁求几乎销声匿迹——干嘛不呢，既然靠着人们对挣点数、徽章和虚拟货币的渴望，能如此有效地打动他们？

犯罪将成为遥远的记忆，而法院却变得人员过剩，没多少事儿可干。墙、马路、门、登录屏幕这些实体环境和虚拟环境都变“聪明”了。换句话说，它们整合了自追踪设备和社交网络服务所生成的海量数据，如此一来，只需对用户进行分析，它们就可以预测并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既然用户甚至都没有机会实施犯罪，那么监狱也就不再需要了。真乃人道之胜利，硅谷之恩惠。

于是乎便有了新“创意市场”的欣欣向荣。最后“市场”这个词也不再像是用词不当；文化机构则对供需法则表现出从未有过的高效率和灵敏反应。报纸不再刊载读者不感兴趣的文章；自追踪与社交网络数据的激增一道，确保大家能读到高度定制化（到单词级别！）的报纸，后者能制造最高的点击率。没有无人点击的故事，也没有不上推特的头条新闻；打开浏览器，点击链接载入页面，只需短短几秒钟，定制化的个人文章就生成了。

书籍的出版量大幅增长，其中大多数是自出版，而效率也堪称完美。许多书甚至许诺提供多个可选结局，基于读者眼球跟踪活动对其情绪做出判断——实时的哦！好莱坞继续活得很滋润。由于大家都戴上了智能眼镜，一部影片就可以有无限多的可选结局，这取决于观看者在观影中某个特定时刻的情绪。职业评论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先是“众人”，继而是算法，最终是定制化算法综述——这是让影片与定制的可选结局相匹配的唯一方法。甚至连最前卫的文化出版物，也使用算法来为其他算法创作的歌曲撰写评论。然而并非一切都变了样：就拿今天来说吧，系统仍然需要靠不完美的人类来制造点击量，好以此来从广告商处吸金。

这段简短的素描式的文字并非摘自加里·施特恩斯坦[4]（Gary Shteyngart）的最新小说。它也不是反乌托邦式的科幻小说。事实上，此时此刻，硅谷的什么人很有可能就在向投资人推销上述技术中的一种。有些可能已经造出来了。它不是反乌托邦，许多极聪明的人——不管他在不在硅谷，觉得这种无缝未来令人心动且不可避免，他们的备忘录和商业计划书将证明这一点。

而我呢，觉得这样的未来真是太恐怖了，但也许是出于你想不到的原因。太多时候，像我这样的数字异端，都深陷于给最初的乌托邦方案的可行性挑错的泥潭中。出版效率真的可以达到完美吗？所有环境都能变聪明吗？人们真的只是因为玩游戏才愿意出来投票的吗？对上述方案的效力进行这种拷问殊为紧要，我在本书中对其中许多问题多有思考。但我也认为，我们这些所谓的异端，也需要从硅谷创新者的话语中来感受他们，对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多一点信心。毕竟就是这些人计划扫描世上所有的书籍，还有到小行星采矿。十年前，这两个主意好像都十分疯狂，而今天，只有一个还可以这么说。

或许我们应当认真考虑，硅谷真有办法实现它的一些最疯狂的计划，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也许它无法靠推特颠覆北朝鲜政权，但它仍然可以做很多事。到了这儿，讨论就应当转向一个不同的语域：与其说对创新者方法的效力进行嘲笑，我们更需要对其目标的适当性提出质疑。我的上一本书《网络错觉》（*The Net Delusion*）指出威权政体具有惊人的弹性，它们已找到自己的方式来从数字技术中获利。尽管我曾经（而且仍然）对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宣传“互联网自由”心怀不满，但我的大多数批评只针对“互联网自由议程”的方法，而非目的，假设其目的必定能带来更好的言论自由氛围和对人权更加尊重。在本书中，我对此不抱奢望，硅谷为“解决问题”所做的最新探索，

4 俄裔美国作家，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写作课程。2003 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俄罗斯社交新手册》，受到评论界广泛好评，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2006 年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荒谬斯坦》。

我对其手段和目的都表示怀疑。我在此认为，硅谷永恒改良的承诺削弱了我们提出这种质疑的能力。今天谁会疯到对种种美德提出质疑，比如，消灭政治伪善？又或者，提供更多信息（自追踪的直接结果）以帮助决策？寻找新的激励机制来使人们对拯救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或参与政治产生兴趣？减少犯罪？质疑这种干预行为的适当性，似乎在质疑启蒙运动本身。

但我觉得，这种质疑是必要的。因此，本书的前提是：硅谷力图通过提高效率、透明度、确定性和完美性，消除其邪恶的双生子，如阻力、不透明、模糊性和瑕疵，把我们都装进数字约束衣。而这终将证明是代价高昂的。出于稍后本书所要阐释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一高昂成本尚未进入公众视野，而且仍将如此，假如盲目追求硅谷伊甸园的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探究，我们为何对“互联网”这个惑人标签下的各种技术如此痴迷。因此，本书试图将这个大家翘首期盼的天堂的真实成本纳入考虑，并将阐述为什么它们一直以来都如此难以核算。

不完美，模糊，不透明，加上出错、犯错、做错事的可能：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类自由的构成要素，一心铲除它们，也就铲除了自由。如果我们没有力量和勇气摆脱硅谷心态（后者大大激发了当前技术完美主义的追求），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毫无价值的政治活动中，人们丧失了道德推理的基本能力，毫无生气的（如果不是垂死的）文化机构拒绝冒险，只在乎自己的财务底线，最可怕的是，我们可能置身于一个严密控制的社会环境中，这不仅会使异议不复存在，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本书的结构如下所述。接下来的两章给出一个大纲，批判了两种主流思想——我称之为“解决方案主义”和“互联网中心主义”，它们都支持硅谷宏大的改良实验。在随后的七个章节里，我对这两种思想如何在特定实践环境或改革环境中相互影响进行了探索：提高透明度，改革政治系统，提高文

化产业效率，依靠智能环境和数据减少犯罪，借助于自追踪和生活记录来量化我们周遭的世界，最终，把游戏激励机制——或称游戏化——引入公民领域。最后一章对如何超越解决方案主义和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极限，设计并采用满足人类和公民需求的技术，进行了更具前瞻性的展望。

既如此，为什么又要反对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呢？好吧，我认为不是所有可修补的东西都应当被修补——即使最新技术让这种修补更容易，更便宜，更难以抗拒。有时不完美也挺不错的，有时它比完美更好。最让我担心的是，如今正是各种唾手可得的廉价的数字化修补在告知我们什么需要修补。道理很简单：我们修补得越多，碰到的问题也越多。相反，与我们的计算机系统颇为类似，在我们的政治、个人与公共生活中，不是所有的漏洞都是漏洞，有些“漏洞”反而是特色。无知可能很危险，而无所不知可能同样如此：有些大学坚持采用不考虑学生支付能力的录取流程，这是有原因的。举棋不定可能有反作用，而深信不疑也可能会这样：如果你所有的朋友都真的告诉你他们在想什么，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和他们说话。效率可能有用，而无效率也可以如此：如果一切都很有效率，那谁又愿意费心去搞什么创新呢？

因此，本书的终极目标，是揭开构成解决方案主义思维定式的态度、倾向和冲动之上的盖子，阐明它们如何在具体项目中证明它们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揭示这些态度、倾向和冲动为什么能够而且应当被抵制、规避和摒弃，以及该怎么做。因为只有摒弃解决方案主义——也就是说，超越它强加于我们想象力之上的限制，对抗它的价值体系，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说，不亲身经历人类生存状况的纷乱复杂，不对传统习俗的大千世界进行诠释，即使实现技术的完美，也可能会物有不值。

目录

中文版作者序 vii

引言 xi

01 贪得无厌的解决方案主义 001

02 互联网什么也没告诉我们（因为它压根儿不存在）019

03 开放之痛 069

04 欲毁掉政治，修补它 107

05 算法“守门人”的危险 149

06 更少犯罪，更多惩戒 191

07 高尔顿的苹果手机 239

08 超人条件 283

09 智能的工具，愚蠢的人类 335

后记 371

译后记 379

01 贪得无厌的解决方案主义

"未来人们用更少的时间就能让技术运转起来……因为那将是无缝连接的。它就是会在那儿。'网络'将席卷一切，却又好像不存在，就像电…… 如果我们把握好这一点，我想我们就能解决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埃里克·施密特

"'解决方案主义'把问题（诠释）为存在解决办法的谜题，而不是可以答复的问题。"
——吉勒·巴盖特[1]（Gilles Paquet）

"'我们明天能造出什么来？'这个高于一切的问题使我们看不到真正的问题，即今天的我们对昨天的创造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吉保罗·多里希[2]（Paul Dourish）
和斯科特·梅恩沃林[3]
（Scott D. Mainwaring）

你偷看过朋友的垃圾桶吗？我干过这事儿。即便从未发现过什么值得报告的东西（不是报告克格勃[4]），我也总是对自己不知餍足的好奇心感到羞愧。垃圾，就像你的性生活或暂时的饮食失调一样，是最典型的私人事务，对此说得越少越好。尽管马克·扎克伯格坚称一切活动在社会化的方式下会做得更好，而丢垃圾似乎永远都是个例外——这是个人反抗扎克伯格社交暴政的攻不可破的堡垒。

唉，就这么个例外也不复存在了：垃圾箱摄像头（BinCam），来自英国和德国研究人员的一个新项目，正寻求通过把我们的垃圾箱变得更聪明还

1 加拿大经济学家，2003-2005 年曾任加拿大皇家学会主席。现为渥太华大学管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和治理中心高级研究员。

2 现任加州大学 Irvine 分校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教授，在计算机科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成就卓著。

3 英特尔实验室"互动与体验研究部"（IXR）高级研究科学家，共同领导着加州大学 Irvine 分校英特尔社会计算科技中心。

4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 1954 年 3 月 13 日至 1991 年 11 月 6 日期间前苏联的情报机构。

有——猜猜看——更社会化，来实现我们垃圾处理方式的现代化。它是这么工作的：垃圾箱的内盖装有一个微型智能手机，每当有人关上它时它就拍张照片，当然，这都是为了给你刚刚到底丢了什么来个呈堂证供。紧接着一群通过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5]（Amazon Mechanical Turk）系统招来的薪水微薄的人会对每张照片进行评估。照片中的物品总共有多少？有多少是可回收利用的？有多少食品？当这一数据添加到照片后，它就被上传至垃圾箱主人的Facebook账号，而且还能被共享给其他用户。垃圾箱摄像头的发明者希望，一旦这种聪明垃圾箱走进千家万户，就可以用Facebook来把倒垃圾变成像游戏一样的精彩比赛。每个垃圾箱每周算一次积分，当垃圾箱里的食物垃圾和可循环材料减少时，这户家庭就会赚到金条和树叶。谁赚到最多的金条和树叶，谁就赢了。任务完成，地球得救了！

伴随着垃圾箱摄像头的出现，研究人员还同时发表了学术论文。他们提出的方案无疑出自善意，论文里对此也从未提出任何道德上的疑虑。我们应当让一组公民在另一组公民的监视下做正确的事吗？我们应当把游戏激励机制引入一个此前诉诸职责和义务来发挥作用的过程吗？一个人在环保行为上的“善”能用树叶和金条来精确量化吗？它的量化应该与其他日常活动分开吗？如果你不开车是不是就可以不对垃圾做循环分拣呢？对一个人的垃圾箱进行更大规模的公众监督，会不会导致生态警戒主义的蔓延呢？假如参与者的Facebook好友不再看着了，他们会不会就不再做正确的事呢？

问题啊问题。垃圾箱看起来似乎是最普通的人工制品，却充满了哲学难题和困境。它隐藏在复杂人类实践的世界中，在那里，即便是对表面上无关紧要的行为进行微小调整，也可能导致我们行为的深刻变化。对我们的行为

5 一种众包网络集市，能使程序员借助人类智能来执行目前计算机尚不足以胜任的任务。

进行局部优化（比如在游戏和不断强化的同伴监督的帮助下让人们对垃圾进行循环利用），其结果很可能是以全局性的次优化行为而告终。换句话说，一旦在简单环境下的最佳激励机制消失了，在别的环境下我们可能也不打算再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了。一个局部问题可能解决了——却引起了一些我们眼下尚无法认清的全球问题。

像垃圾箱摄像头这样的项目在15年前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垃圾箱没有传感器能拍照片并且把它们上传到Facebook这样的网站；而现在，微型智能手机就能以低廉的价格做到这一切。亚马逊并没有一支闲得无聊、拿上每小时几便士的薪水就愿意做任何工作的自由职业大军。（而一旦图像识别软件越来越好，就连这些人类自由职业者也可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朋友绝无可能看到我们垃圾箱里的东西。15年前，即便是我们的个人网站从所有熟人（用极客的话说，我们的整个“社交图谱”）那里获得的关注，也无法跟今天我们的垃圾箱从Facebook好友那里得到的关注度相匹敌。既然我们都在用同一个平台——Facebook，那么借助社交游戏和竞赛来掌控我们的行为也就成为可能，我们再也不必按自己的步调用自己独有的工具来拯救环境了。标准化就是力量！

今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通过智能传感器驱动技术来达成；我们的亲朋好友可以在任何地方关注我们，从而可能产生新型激励机制。这两大创新将深刻地改变社会工程师、决策者和许多其他社会改革家的工作。大家都渴望开发这些新技术的力量，不管靠单干还是靠团队组合，最终解决特定问题，不管是肥胖症、气候变化还是交通堵塞。由于复杂传感器的发明，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能基于面部亮度的细微变化追踪并显示人的脉搏的智能镜子；而很快我们就会有能接入“社交图谱”的镜子，一旦我们看起来比大多数Facebook好友都要胖，它就会督促我们减肥。

或者想想看由英国设计师兼活动家克里斯·亚当斯（Chris Adams）提出的茶壶设计原型。这种茶壶带有一颗能发绿光（茶煮好了）或红光（可能还得等等）的小珠子。是什么在决定其色彩变化呢？是这样，通过一些很容易找到的开源软硬件，这个珠子联上一个叫做“我能打开它吗？”的网站（http://www.caniturniton.com），该网站每一分钟左右就查询英国国家电网总用电量的统计数据。如果网站返回的频率数字高于50赫兹的基线，珠子就发绿光，更低呢，就发红光。这么做的目的是提供额外信息，以便负责任地使用茶壶。但很容易就能想到，这样的逻辑可以延伸到很远很远，比如垃圾箱摄像头设计。举个例子，为什么不对人们不在用电高峰期使用茶壶的行为给予兼容Facebook的虚拟点数奖励呢？或者为什么不对那些无视茶壶过度使用警告的人进行惩罚呢，比如把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在其Facebook朋友圈里公之于众？社会工程师手上可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选项。

如今，无需连接社交网络或数据仓库，单靠传感器就能干不少事了。比如说，老年人可能会喜欢智能地毯和智能闹铃，一有人跌倒它们就能立刻侦测到并通知其他人。甚至垃圾箱的智能化也可以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于是，一家起了个迷人名字（“BigBelly太阳能”）的创业公司就希望通过生产太阳能垃圾箱来引领垃圾收集行业的革命。借助内置传感器，太阳能垃圾箱能报告垃圾管理员它们的当前容量，预测什么时候需要倒空。反过来这又可以优化垃圾收集路线，节约燃料。费城从2009年起就在试验这种垃圾箱，结果其中心区的垃圾收集出动次数从每周17次减少到每周2.5次，员工数量从33人减少到区区17人，一年就节约了90万美元。

同样，波士顿的市政官员一直在测试“Street Bump”，一个依靠加速传感器（如今许多智能手机都标配这一运动探测装置）起作用的精妙应用，用以标出波士顿路面上的坑洞。司机只需打开应用开车上路就可以了，智能手机

将会做剩下的事，一有必要它就会与中央服务器进行通信。凭借一系列算法，这个应用知道如何识别和忽略下水道井盖和减速带，而只是专心致志地标出坑洞。一旦有至少三名司机报告说在同一地点发生颠簸，这个颠簸地点就被识别为坑洞。同样，Google依靠启用了GPS定位系统的安卓手机来生成交通状况的实时信息：只要你启用它的地图并且报告了所在位置，Google就能知道你在哪儿，车开得有多快。这样它就能对路况怎样猜得八九不离十，并且把这条信息反馈到Google地图，好让大家都看得到。如今看起来，光是外出时随身携带手机，恐怕就算得上良好的公民行为了。

改良的意愿——无所不包！

智能技术和我们的全部社会关系（更不必说像实时电力消费总量这样的统计资料了）现在都能“嵌入”到我们的每一个日常活动中，从丢垃圾到煮茶无所不包。这似乎值得赞美而不应该深究。同样的，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站让我们可以试验10年前都不可能做到的干预方式，这似乎也真是一个积极进展。所以如果说硅谷充斥着对几乎是阳光下的一切进行改良的方案：政治、公民、出版、烹饪，这一点也不奇怪。

唉，有太多时候，这无休止的改良探索——加拿大人类学家塔尼亚·穆雷·李（Tania Murray Li）在一个非常不同的语境中称之为“改良的意愿”——是短视的，不过是敷衍地表现出对追求改良的活动有兴趣。把所有复杂的社会情况重做表现，让它显得像是有明确可计算解决方案、定义明确的问题，或是透明显见又容易优化的过程（但愿有好算法！），这种探索很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最终甚至造成比它寻求解决的问题更大的破坏。

我把认可并支持这种强烈愿望的思想称为“解决方案主义”。这个词借

用自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带有毫不掩饰的轻蔑，意指痴迷于为极端复杂、易变和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花哨、宏大而又目光狭隘的解决方案，正是这类东西让TED大会的观众神魂颠倒。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这类问题根本无须采用“解决方案主义者”那种以一概全的定义方式，因此有争议的地方不在于他们提交的解决方案，而是他们对问题本身的定义。设计理论家迈克尔·杜宾斯[6]（Michael Dobbins）说得好：解决方案主义是假设而非调查其试图解决的问题，“在尚未充分提出问题之前就匆忙寻找答案”。问题如何构成与问题如何解决，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

因此，解决方案主义不只是对“在手拿锤子的人眼里，一切都像是钉子”这句话的新奇提法，也不只是重提“技术修补”不适用于“棘手问题”的论调（在《网络错觉》一书中我对这个主题有过详细论述）。这不光是因为许多问题与快捷的解决方案主义工具包不合拍，还因为解决方案主义所假设的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本质进行更深入调查就能看出，刚刚获得权力的极客与解决方案主义者群起反对的低效率、不确定性和不透明性（不管在政治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怎么讲都不成其为问题。恰恰相反，这些恶疾往往穿着伪装的美德。凭借技术创新，当代的解决方案主义者很容易就能找到办法消除它们，但这丝毫无损其道德性。

以反改良主义者的立场来看，对解决方案主义进行批判似乎是保守派的特权。而事实上贯穿本书的反解决方案主义嘲讽，也都符合对社会变化的极端保守主义反应的三分法，社会理论家阿尔伯特·赫希曼[7]（Albert Hirschman）对此有精彩论述。在其颇具影响的《反动修辞学》（*Rhetoric of*

6 有30年从业经历的城市规划者、设计师、建筑师，现任佐治亚理工学院建筑学院教授，2009年出版《城市设计与人》（*Urban Design and People*）一书。

7 知名经济学家与思想家，早期专长于发展经济学，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曾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社会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杰出研究员，代表著作有《经济发展战略》、《反动修辞学》等。

Reaction）一书中，赫希曼认为一切渐进式改革通常都会招致保守主义者的批评，这种批评以下面三种基调的任意一种为基础：悖谬论（干预只会使手头的问题变得更糟）、无用论（干预不会有任何结果）、危害论（干预可能会损害一些以前辛苦得来的成就）。

尽管我在下面几页会动用所有这三种批评武器，但我的总体设计确实不同于赫希曼所研究的保守性对抗。我既不提倡无所作为，也不否认解决方案主义者解决的许多（尽管不是全部）问题——从气候变化到肥胖症再到政治体系内的信用程度降低——都很重要，都需要立刻采取行动（当然，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构成的，那是另一个问题，每个问题都有不止一种描述方式）。但这些问题迫在眉睫地需要解决，并不自动意味着时下盛行的高效、清洁、崭新的全套技术方案一定是合理的。我首选的解决方案，或者不如说作出的反应，是大不相同的。

而我对解决方案主义的批判，和一些对早期许多过于束缚人类的活动的批判有几分相似，这也并非巧合。今天的束缚可能会穿上数字化的外衣，但它绝非第一个，也不是最严厉的一个。早在“解决方案主义”这个词还没出现的时候，许多著名思想家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缺点，只不过在措辞和背景上有所不同。尤其是当我想到伊凡·伊里奇[8]（Ivan Illich）对职业学校和医学领域的高效而去人性化体系的抗议，简·雅各布斯[9]（Jane Jacobs）对傲慢的城市规划者的抨击，迈克尔·奥克肖特[10]（Michael Oakeshott）对

8 一位集神学、哲学、社会学及历史学多种角色于一身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教育思想家。在 1970 年出版的《非学校化的社会》一书中，他对传统学校教育理念进行了批判，提出了“非学校化”的主张。

9 过去半个世纪中对美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发展影响最大的人士之一，出版于 1961 年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震撼了当时的美国规划界，而现在，人们也已习惯把该书的出版视作美国城市规划转向的重要标志。很多人甚至认为正是这本书终结了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政府以铲除贫民窟和兴建高速路为特征的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

10 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20 世纪最重要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奥克肖特是一位怀疑论者，其思想融英国观念论与休谟的怀疑论于一炉，对伯克等人所建立的英国传统保守主义思想从哲学上做了系统阐述。1962 年出版《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和其他论文》一书，对理性主义进行批判。

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理性主义的抗拒，汉斯·约纳斯[11]（Hans Jonas）对控制论隔靴搔痒的不耐烦，以及近来詹姆斯·斯科特[12]（James Scott）对他所谓政府强加于国民的“可辨识性”的担忧。有人可能还要给这个名单加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3]（Friedrich Hayek）与核心决策者固有的知识缺失之间的对立。

在政治信仰上，这些思想家的血统毫无相同之处。伊凡·伊里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简·雅各布斯，还有迈克尔·奥克肖特，他们要是一块儿赴晚宴肯定会吵得不可开交。然而抛开政见不谈，这些富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都极不喜欢解决方案主义者的做派，不管是雅各布斯批评的城市规划者还是伊里奇批评的职业教育者，他们不光对人类天性基本一无所知，也几乎搞不懂由这种天性造就并赖以蓬勃发展的复杂实践环境。看起来，解决方案主义者似乎从没脚踏实地地生活过，他们所知的一切都来自书本，而且，这些书还不是小说，而是冰箱、吸尘器和洗衣机的说明书。

20世纪60年代以尖锐犀利地抨击技术乌托邦主义而著称的保守派哲学家托马斯·莫尔纳[14]（Thomas Molnar），也应当在反解决方案主义的万神殿里占据一席之地。“当乌托邦作家就工作、健康、闲暇、预期寿命、战争、犯罪、文化、管理、财政、司法裁判等纸上谈兵时，他们的话仿佛是从毫无真实生活概念的机器人嘴里发出。读者会有种身处抽象梦境的不舒服感觉，周

11 犹太裔德国哲学家，师从海德格尔等著名教授。最著名的代表作《责任命令》（*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12 政治学家，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席教授。代表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弱者的武器》（*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等。

13 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哈耶克被公认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在法学、系统思维、思想史、认知科学领域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

14 天主教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

围是无生命的物体。他模模糊糊地努力分辨出了它们，可再仔细一看，发现它们在形状、颜色、体积和声音上与任何我们所熟知的事物完全不相符。”他的这番话真可谓一针见血。如今的抽象梦境比比皆是，在帕洛阿尔托[15]能发挥作用，就想当然地认为搬到槟城[16]也照样。

不是说所有的解决方案都不可能成功，而是解决方案主义者在解决“问题”时对“问题”的曲解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于是乎，到问题“解决”的时候，它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回事。每个人都忙着庆祝胜利，却没人想得起来最初的解决方案想要实现什么目标。

对新技术颠覆教育的潜力大肆鼓噪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尤其是今天好几家创业公司为数十万计的学生提供的在线课程，这些学生彼此批改作业，与导师从未谋面。数字技术对有些问题来说可能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这些问题中不包括教育，如果我们说到教育时指的是培养对任何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在线资源可能会帮助学生习得大量新信息（或者加引号的“信息”，如果他们不对自己在维基百科上学到的东西进行多方查证的话），而这种填鸭式的信息与大学渴望传授给学生的东西相去甚远。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帕梅拉·耶罗尼米（Pamela Hieronymi）写过一篇重要论文，剖析了在线学习的神话。文章指出，“教育不是信息或想法的传递。教育是利用信息和想法所需要接受的训练。随着信息挣脱书店和图书馆的束缚，潮水般涌向计算机和移动设备，这种训练就愈加重要，而不是相反。”当然，有很多工具能提高人们的数字素养，但这些工具的作用也就到此为止了，它们可能会帮你发现错误的信息，却无法把你的思想组织成条理清

15 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一座城市，号称硅谷的中心，著名的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都位于此地。
16 马来西亚滨海城市。

楚的观点。

威廉姆斯学院校长亚当·佛克（Adam Falk）对高等教育中的解决方案主义更是当头一棒。他认为，假装解决方案主义兜售的玩意儿跟大学的精神和目标相符，这是错误的。佛克指出，根据威廉姆斯学院所做的研究，学生大学学业成功的最佳预报器不是他们的专业或GPA成绩，而是他们与教授们面对面个人接触的时间总量。根据佛克的说法，随机分配五名教员给作业打分（至少该领域备受赞誉的一家新创企业Coursera[17]是这么做的）的做法，“在教育上，并不等同于得到了一位训练有素的教授给予周到详尽的回应。”佛克坚信，假装前者等于后者，“不啻于否认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剥夺其真实的价值。”

因此待议的全套技术解决方案里根植的教育理念，与至少仍备受一些大学推崇的历史悠久的教育理念之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不匹配。当然，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这两种理念可以共存共荣。然而，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管理者一如既往地特别有成本意识，每花一美元培养出最多毕业生的方法更有可能胜出，尽管这么做可能缺乏知识眼界。这就是解决方案主义存在的一处隐患：它所兜售的快速修补不可能存在于政治真空之中。它们承诺立刻拿出便宜得多的结果，从而很容易削弱对更有抱负、更能推动知识发展、但要求也更苛刻的改革计划的支持。

疯子与厨子

当我们离开课堂来到厨房，解决方案主义的局限性更是暴露无遗。政治

17 由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吴恩达和达芙妮·科勒联合创建的一个营利性教育科技公司，与多家大学合作，给大众带来一些在线免费课堂。

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尽管身为保守主义者，却特别喜欢强调，烹饪与政治和科学一样，是一套非常复杂的（往往又是无形的）常规惯例，它指导我们如何准备我们的饭菜。“一个菜鸟，几种食材，外加一本烹饪书，我们以为这就构成了自动（又具体的）烹饪活动的要素。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他在1951年的论文《政治教育》中这样写道。相反，在奥克肖特看来，烹饪书“无非是某人关于如何做饭的抽象知识，它是做饭这个活动的孩子，而不是它的父母。”他在另一篇论文里写道，“厨子并不是第一个想到馅饼这个念头并尝试去做的人，他是个精于厨艺的人，他的事业和成就都来源于这项技能。”

奥克肖特并不太担心我们的烹饪习惯会随着烹饪资料的激增而遭到破坏。只有受过丰富的烹饪传统熏陶，才有可能解读这些资料，所以细读此类书籍甚至可以增强人们对厨房文化的鉴赏能力。或者像他自己说的，“书只和那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而知道如何解读它的人说话。”他并不反对打开书，而是对那些认为书（而不是创造它的传统）在这里扮演主角的人持有异议。无论书中包含什么规则、秘诀和算法，它们都只有在烹饪传统下解读和运用时才有意义。

在奥克肖特看来，烹饪书就是那种传统的终点（或输出）而非起点（或输入）。这个观点，反对的是拒绝承认惯例与传统重要性的理性主义者，而不是展示烹饪书。这是奥克肖特的思想里极为昂扬乐观的一刻。不过，考虑到烹饪书早就被各种复杂的小器具所取代[就连一辈子追求完美厨房的建筑解决方案主义者巴克敏斯特·富勒[18]（Buckminster Fuller），看到这些小器具也要嫉妒万分]，不知道奥克肖特会不会修正自己的判断。

与此相悖的是，随着技术变得更聪明，（奥克肖特认为使厨子与惯例传统产生关联的）解释空间开始缩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似乎可以说，新的更聪

18 美国哲学家、建筑师和发明家。

明的技术最终将有可能为传统以外的烹饪书教学指导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它们的帮助下做饭几乎不需要什么知识。今天的技术不再是不会说话的被动工具。它们中的一些拥有精密的微型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可以“明白”（如果用这个词合适的话）厨房里的状况，并且尝试将我们——它们的主人，引导向正确的方向。简单说这就是所谓现代性：我们可能有更好的食物，却没了做饭的那种乐趣。

英国杂志《新科学人》最近报道了几个这样的解决方案主义项目。认识一下雷金娜（Jinna Lei），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她建立了一套系统，用安装在厨房里的几个视频摄像头跟踪记录厨师的活动。这些摄像头相当聪明，它们能识别所见物体的大小和形状，能区分比如苹果和保龄球。借助于这种贴心监视，配方一有偏差厨师就能马上得到提醒。每个对象都有与之关联的一些活动（通常你不会去煮勺子或炒芝麻菜），系统要做的就是观察当前活动与目标对象是否相配。雷告诉《新科学人》：“举个例子，如果系统发现糖倒进了盛有鸡蛋的碗里，而菜谱是不加糖的，它就会记录这次偏差。”

为了提高观察精度，雷还考虑加一台特殊热成像仪，它能通过体表温度识别用户的手。她的追求就是把现代厨房变成一座现代泰勒主义的殿堂，跟踪、分析和优化每一件任务。解决方案主义者讨厌犯错而热衷于算法。而好的厨艺来自失败和试验，配方的偏差成就烹饪创新并推动美食业，这些好的想法被当成怪诞落伍的观念丢在一边。对许多这样用心良苦的创新者来说，他们寻求改善的惯常做法出自什么背景不重要，只要提高效率就行。于是在他们的想象中，厨师不是独立自主的艺术大师或有天赋的能工巧匠，而是成了束手束脚的机器人，在操作系统的指令下不敢越雷池一步。

《新科学人》里提到的另一个项目对厨师的身份做了进一步的贬低。日本京都产业大学的一群计算机科学家正试图使厨房逻辑与“增强现实”（这是个

花哨术语，指的是日常环境里充满智能技术）逻辑相匹配。（想想能用智能手机扫描解锁更多信息的“快速响应条码”，或即将出现的Google眼镜，后者使用数据流技术来增强你的视野。）为此日本研究人员把摄像头和投影仪安装到厨房的天花板上，这样他们就能刚好把指令以箭头、几何图形和聊天泡泡的方式投射到烹调原料上。因此，如果你打算剖鱼，系统会投射一把虚拟菜刀，对应该从鱼的哪个部位下刀给出精确标记。厨房台面上还有一个真正的小机器人。凭借摄像头它能感知到你已经停止接触食材，于是就会询问你是否打算进入菜谱的下一个步骤。

那么，这样一个现实究竟“增强”了什么呢？技术上可能是增强了，智商上似乎倒是削弱了。充其量我们将面对“既增强又削弱了的现实”。一些极客顽固地拒绝承认，挑战与障碍（可能包括一开始对正确的剖鱼方式的无知）提高而非削弱了人类的生存水平。让做饭更简单不一定会“增强”它，而是恰恰相反。使它完全受制于蹩脚的效率逻辑，等于是剥夺人们在这项活动中的掌控能力，这将使人类繁荣难以为继，乃至剥夺了人生活的意义。为此，更好的解决方案不是去降低做饭要求，而是让做饭的程序少一点僵化，或许再多一些挑战性。

这绝非自命不凡地为神圣的烹饪传统进行辩白。在一个只有一小撮人掌握这门行当的世界里，单冲着人人都能获得这门技术的卖点，这种“增强”厨房或许就会大受欢迎。然而这不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在Google上找到关于如何烹饪最可口菜肴的详细菜谱和教学视频，前所未有地容易。我们真的需要让机器人（更别说我们脑袋上方的监控摄像头了）来做填料火鸡或烤羊肉吗？

再说了，这样的进步会朝什么方向去其实也没那么难预测：一旦进了我们的厨房，这些数据收集设备就再也不会出去了，并会发展出新的、据说超乎预期的功能。首先我们会在厨房里安装摄像头以便接受更好的指导，接着

食品与消费类电器公司会告诉我们，它们希望我们留着这些摄像头以便完善其产品，最后我们会发现，现在我们所有的烹饪数据都驻留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台服务器里，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对我们消耗了多少饱和脂肪进行分析，相应地调整我们的保费。智能技术支持下的烹饪就像一匹特洛伊木马，为更为险恶的项目打开了方便之门。

这绝不是说技术不能增加烹饪带给我们的乐趣，这不单是从让食物更美味健康来说的。其实只需要一些想象力，不必借助传统解决方案主义者对效率和完美的迷恋，技术就可以让烹饪过程更富有挑战性，开辟新的试验空间，带来打破常规的新途径。把《新科学人》里提到的乏味烹饪场景跟分子美食运动所信奉的花哨玩意儿比较一下吧。从低温热浸入式烹饪循环器到可食用纸的打印机，从做龙须面和鱼子酱的注射器到通过金属锅发送电磁波的电磁炉，所有这些玩意儿都让烹饪变得更加困难，更加刺激。这能让任何一个有追求的厨师对烹饪艺术充满热情，远非监控摄像头或指令投射机器人可比。

有时候，我们想要的就是严格遵循食谱，做出预料之中的美味菜肴。但这种标准化也可能把我们的厨房变得像麦当劳连锁店一样乏味。为创新而创新是没什么品位的。要让技术真的“增强现实”，设计师和工程师应当更好地理解构成现实的复杂环境。

正如分子美食这个例子所表明的，拒绝解决方案主义，并非拒绝技术，它也不是要放弃改善我们周围世界的所有希望。技术可以，也应当成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拒绝解决方案主义，就是要超越狭隘的理性主义成见，后者把每一个效率缺失的例子（比如厨房缺乏完善全面的指导）都转换成需要克服的障碍。在思考技术在人类繁荣之路上所扮演的角色时，存在其他更有成效、更有人道精神和更值得信赖的方式，但除非把解决方案主义者对人类生存状态过分简单化的描述变得更复杂，他们是理解不了这一切的。

巴斯德与 Zynga[19]

我是头一个意识到解决方案主义提出的这些问题毫无新意的人。正如我已经指出，一代又一代早期思想家都曾探讨过许多与此相关的毛病和症状。而我觉得我们正经历着一轮非常特别的现代版解决方案主义的复苏。今天最有激情的解决方案主义者不在市政厅和政府部门。相反，他们在硅谷，一心想弄明白他们从“互联网”学到的课程，然后在各种修补人性缺陷的公民倡议和计划中把它们付诸实践。然而再没有什么比有关“生命、宇宙以及一切”（借用道格拉斯·亚当斯[20]令人难忘的隽语）的宏大课程更有欺骗性和更具启蒙意义了。

为什么要给“互联网”加双引号？在我第一本书《网络错觉》的后记里，我对这个曾经被忽略的要点给出了我的解释：我们通常称为“互联网”的物理基础结构与处在公众舆论中心的传说中的“互联网”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据说正是后者搞垮了突尼斯和埃及政府。这个网中网的基础结构和设计在这些神话的缔造中确实扮演了一定角色，比如“互联网”拒绝审查制度的观念来自其“包交换”（packet-switching）通信机制所独有的气质。而作为公众舆论祸根的“互联网”还有许多其他的故事传奇，不管是创新、监管，还是资本主义，而它们与基础结构本身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21]（Bruno Latour）对路易·巴斯德[22]（Louis Pasteur）闻名于世的科学成就颇有著述。他对真实历史人物巴斯德和神如上

19 一家社交游戏服务提供商。

20 英国广播剧作家、音乐家，以《银河系漫游指南》系列作品闻名。这部作品以广播剧起家，后来发展成包括五本书的“三部曲”，拍成电视连续剧。

21 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人物，也是法国新社会学派的名家，他所倡导的实验室人类学研究方法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已经在社会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3 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

帝的“巴斯德”作了区分。后者已然象征着其他科学家乃至整个社会运动的成果，比如卫生学家，出于讲求实效的原因，就张开双臂拥抱巴斯德。然而任何对这段时期历史著作感兴趣的人，都不可能仅仅把“巴斯德”这个名字当作一个毫无疑问的客观术语。它需要被拆开，以便对其各个部分进行独立研究。这些各不相同的部分（包括真实的路易·巴斯德）是怎么变成我们在课本里所见到的法国国民英雄“巴斯德”的，这后面的故事，至少在拉图尔的视野看来，正是科学史应当致力于揭开的。

此刻我并不打算开始撰写历史。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其实是想说明“互联网”这一概念的偶然性和流动性，试图探索“互联网”究竟是如何具有了如今它所具有的这些含义。在本书中，我对这个故事的兴趣局限在一个更为狭小的部分；也就是说，我要探索“互联网”为何既是许多当代解决方案主义倡议的推动力，同时又是阻止我们看到其缺点的晃眼的闪光烟雾弹。

换句话说，我感兴趣的是“互联网”为何如此躁动，又如此令人困惑。我想弄明白为什么苹果iTunes和维基百科（“互联网”神话般的核心组件）成了未来政治学的思考模式。Zynga和Facebook怎样成为公民参与的参考模式？而Yelp[23]和亚马逊的评论如何成了批判主义的参照模式？Google怎样成为思考商业与社会创新的榜样（就好像它真有什么清晰的理念似的），让名字叫做《Google打算干什么？》的书籍都能成为畅销书？

“互联网”的来临推动和支持了我在本书中所描述的许多解决方案主义态度。“互联网”使解决方案主义者大大拓展了其干预范围，在更大规模上进行试验。它还催生了一整套我称之为“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新信仰，它的领袖坚信我们正经历着无与伦比的革命时期，从前的真理不再适用，一切都在

23 美国最大点评网站。

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修补”的需求空前高涨。简言之，“互联网”为解决方案主义者输送了充足的弹药，升级了他们对低效率、不确定性和无序性发起的战争，并为此给出了新的理由。但它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组假设，既包括关于世界如何运转以及应当如何运转的，也包括关于它如何说话以及应当如何说话的。这会以一种断然的互联网中心主义态度，重塑许多问题和讨论。互联网中心主义与“互联网”的关系非常像科学主义与科学的关系：其认识论绝不容忍任何反对观点，而所有新近历史讲的几乎都是“互联网”伟大精神如何自我崛起的传奇故事。

因此，本书尝试将我们的技术辩论从关于“互联网”的许多不健康不正确的假设里解放出来。在这一点上，其规范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继拉图尔和托马斯·库恩[24]（Thomas Kuhn）之后，许多科学史学家也已开始接受，尽管以大写字母S打头的“科学”比“互联网”更有故事，对此不妨心平气和。只要有科学家认为存在大写字母S的“科学”，它们就值得研究，而不管实际上科学史学家们自己是否认同这种观念。

这个办法既简洁又稳妥，但我发现，在思考“互联网”以及它给公共话语、为改革项目分配优先度方面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时，它又很难推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指出解决方案主义的种种局限，却不同时指出我所谓“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局限，这是没什么好处的；没有后者，前者连一半效果都达不到。所以在我们可以着手讨论在政治或犯罪预防等领域的解决方案主义的缺点前，有必要更好地领会互联网中心主义给知识界带来的毁灭性影响，这是我们下一章将要面对的任务。如果能还原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本来面目，那么揭穿解决方案主义的真面目也就没有那么难了。

24 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代表作为《哥白尼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构》。

02 互联网什么也没告诉我们（因为它压根儿不存在）

“如果我无法为一种思想找到先例，我立刻就会怀疑它是个蠢念头。”
——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

“是谁让 Blockbuster[1] 倒闭的？互联网。是谁让《看电影》[2]（At the Movies）停播的？互联网。是谁踩过我的草坪，毁了我的牵牛花？还是互联网。”
——埃里克·斯奈德（Eric Snider），电影博客。

如今“互联网”可能意味着任何事情。“互联网自由的下一个战场可能是3D打印，”2012年8月，流行技术博客TechCrunch的头条新闻这样宣告。考虑到“互联网”概念如此模糊，像“互联网自由”这样的衍生概念又是如此包罗万象，缺乏任何实际意义，以至于它们可以轻松涵盖3D打印机监管、网络中立的棘手问题，还有阿塞拜疆持不同政见者的博客权利等。我们不再辩论个别技术的价值，构思相称的政策与监管机制，而是沉湎于“互联网”这样试图回避任何严肃实证辩论的万金油术语。

今天，“互联网”经常被用来阻挠批判性思维，排除极客以外的人参与讨论。看看一个著名的技术博客在主张议会不应当对人脸识别技术进行监管时

1 英国一家DVD租赁公司。

2 ABC经典电影评论节目，由好莱坞第一影评人罗杰·艾伯特和吉恩·西斯科尔于1975年联合创办，以评论和回顾好莱坞电影为主。2011年底停播。

是怎么说的吧："太多太多的美国立法者还没有跳过认为互联网就是一堆管道的思维阶段；我们真的指望这些家伙来告诉Facebook或其他任何社交媒体企业怎么做生意吗？"你懂的，这一切都那么复杂，比健康护理和气候变化复杂多了，应该只允许极客们来鼓捣这神奇的管道。"互联网"是神圣的，神圣到民主代议制已经驾驭不了它了。人脸识别技术是独立于"互联网"而发展的，它可以上溯到20世纪60年代许多国防机构资助的研究，但进入了这个语境，就几乎没了意义。一旦成了"互联网"的一部分，任何技术都失去了它的历史和思维自主性。它完全成了"互联网"传奇故事的一部分，不管后现代主义者如何预言了元叙事[3]的死亡，这个作为元叙事的传奇故事还活得好好的。今天几乎每个故事都必定有一个"互联网"视角，我们的互联网传道者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奇闻轶事变成互联网高歌猛进的童话故事，而这只是他们的"网络辉格党"历史理论的极小篇章。"互联网"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它毫不费力填满了每一个头脑，每一个钱包，每一个保险柜，甚至每一个最醒目的叙事空白。

不管什么时候听到别人告诉你，"互联网不是这么回事"（技术博客就惯于对那些喜欢读他们涂鸦之作的人这么说），你都应当明白，你的对话者事实上认为你的观点是保守的和反现代的。然而极客们号称烂熟于胸的那本缺失的"互联网"手册（解释这一大堆管道究竟如何运转的那本）又在哪里？为什么他们这么不愿意承认，"互联网"这庞然大物的各个零件是怎样开动和相互配合的，或许并没有什么必然规律？Google就真的不能换种运作方式吗？当然，极客们确实默默地承认了"互联网"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这就是为

3 由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1979年提出的批判理论术语。主要指对历史的意义、经历和知识的宏大叙述。元叙事在各种话语中占有一种优先和特权的地位，即成为所谓的权威话语。后现代主义却是以怀疑大叙事为特征的。

什么他们要一致反对“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OPA）。真讽刺啊，正是后者扬言要彻底改变“互联网的运转方式”。所以，“在互联网上”没有什么干预会奏效，除了那些会奏效的。SOPA是一项很糟糕的立法，但有点奇怪的是，极客们可以一边声称互联网是永恒不变的，一边又在幕后竭尽全力维持它的这种状态。他们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种他们不愿多提的常见现代失调症。

“互联网”还是一种手段，它把辩论从更加明确具体的问题上引开，使其从本质上陷入晦涩而又徒劳无益的麦克卢汉主义中，而后者试图为世上的每一种媒介找到某种并不存在的内在真相。看看当今最直言不讳的互联网怀疑论者尼古拉斯·卡尔[4]（Nicholas Carr）是如何论述数字技术对我们的深度思考能力和专注力造成影响的。在畅销书《浅薄》（*The Shallows*）中，卡尔担心“互联网”正在使他大脑需求的满足方式“网络化”，得到的满足越多，它却变得越饥渴。他抱怨说“网络……带来了一套快速传递响应与奖励的系统……它鼓励身心活动的重复。”书里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抱怨。在卡尔看来，大脑百分之百是可塑造的，而“互联网”则百分之百是不变的。

卡尔所描述的这个“网络”究竟是否存在呢？把像Instapaper（用户可以保存网页以便以后在无广告无打扰的环境下阅读）这样的网站和比如说Twitter扯到一起有多大意义呢？ Facebook一定要不断提醒我们检查新链接吗？ Twitter是应该对我们发送我们从未打开过的链接的行为予以奖赏呢？还是惩罚我们？或者什么也不做，就像现在这样？其中有许多开放式问题，技术公司解决它们所采用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我们——它们的用户，来告诉他们（当然，前提是我们自己能齐心协力）。可能会有一些业务障碍使我们

4 美国作家，专注于科技、商业以及文化方面。代表作《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

所使用的数字服务不太经得起讨论，但这正是人们必须探究政治经济学领域而非神经科学领域的地方，即使后者更加时尚。然而卡尔拒绝放弃“网络”这个概念，认为它有自己的预定目标和内在特征。他没有对设计、政治经济学和信息学的相互作用进行探究，而是不断告诉我们，“网络”实在是，好吧，太烂了。除非我们不再认为外面真的存在“网络”这东西，否则这种情况不会有丝毫好转。不解释清楚“网络”这样的术语，我们又怎样解释由数字工具推动的逻辑和实践的多样性呢？“网络”这个术语，应当出现在有关数字技术的书籍的最后一页，光靠它自己，是解释不了它的。

与他之前的马歇尔·麦克卢汉一样，卡尔打算对不同媒介进行打分、排名和比较，为它们设计某种准科学的排序等级（麦克卢汉走得更远，他为每种他所“研究”的媒介计算感觉比率）。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方式忽略了每种媒介所促成的真实实践多样性。人们可能因为广告过多而讨厌电视，但另一方面，一套由公众出资支持的广播系统又可能根本不需要广告。电视节目不见得非得被广告打断。视频游戏可能使我们变得更暴力。但是，又一次说但是，它们可以有那么多方式来做那么多别的事情，只把它们与一种功能挂钩似乎不公平。《纽约时报》与Sun公司[5]就几乎没有什么共通之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和拉什·林堡[6]（Rush Limbaugh）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Google让信息永久有效，或者Facebook竭力推荐不需要的产品，不对其呈现给用户的链接进行数量限制，比如一天10个，这些都不是必然的。这些不是“网络”的“内在”属性，这些公司选择这么做，也许是出于商业原因，

5 美国太阳微系统公司，也译为升阳公司。

6 美国著名电台脱口秀名嘴，所主持的每天三小时的节目是全美听众最多的广播脱口秀。

或者纯粹是出于傲慢和自信，而它们本来也可以很容易做出别的选择。事实上所有这些公司似乎每个星期都在增加或减少至少一种功能。如果有的话，这就是最好的证据，让我们不把它们的平台仅仅当作“网络”与我们的某种对话方式。如果“网络”与我们对话时它确实发得出声音，那也肯定是精神分裂的声音。

鉴于卡尔麦克卢汉式的媒介中心主义，他在对抗他所确定的“数字走神”（digital distraction）时没什么话可说就不足为奇了。他的“网络”恒定观念阻止了他找出破坏性更小的结构性改革（卡尔对《纽约观察家》说：“我的兴趣是描述现状，而不是开处方。”）。在卡尔的世界里，我们用户只能给自己装备能切断互联网连接的软件。要不我们可以全都搬到科罗拉多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卡尔自己写书时就是这么做的。对“网络”本身修修补补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它的逻辑不可逆转，它只能（偶尔地）被一些小计谋骗过。

提防互联网秉性

碰巧的是，互联网怀疑论者和乐观派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两者都有赖于某种可靠的“互联网”概念来提出他们的论点。把这个概念及其对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内在优势过于简单化的假设一起拿掉，专家们一下子就被迫要面对复杂的实证问题，要调查算法的政治信仰，要埋头研究人脸识别技术的历史掌故，要弄明白像“深度数据包检测”这种技术的工作原理。只要互联网中心主义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的技术辩论就永远是死气沉沉、寡淡如水和徒劳无益的：不管TED为此做过多少次专门演讲，Kindle单行本[7]为此下

7 指 Kindle singles，亚马逊推出的单行本电子书。特点在于篇幅上比杂志报道长，但比传统书籍短。

了多少筹码，“互联网”都不会告诉我们，究竟我们是否需要定期对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巨头进行公开审计。当然，专家们可能会说，这种审计是“对互联网开放性发动的一场战争”，然而这正是我们应当回避的那种话，因为其诉求对象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实体。

既然如此，对后“互联网”生活的想象经常陷入绝望，成了一张通向置身事外、愤世嫉俗或神经错乱的单程票，也就不奇怪了。“互联网”似乎是为善而来，其最终目的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而“网络”，就像其首席理论家劳伦斯·莱斯格[8]（Lawrence Lessig）在《新共和》周刊里向我们保证的那样，“永远不会消失”。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再也不记得Google、Facebook和维基百科之前的世界了，也是因为之前那个世界的大部头，要么消失不见了，要么就像印刷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一样，正走在破产的路上。有人可能会怀念那个翻阅又重又枯燥的大部头书卷的时光，但总的来说，人类似乎已经把赌注压在了更年轻、更精瘦也更有效率的下一代身上。

然而，我们无法集体想象没有互联网的日子，这多少还是有些奇怪的。它不再被当作某种偶然现象，某种很快就会消失的东西，它看似恒久不变，这或许有点本体论　　互联网就是这样，永远都会这样。套用弗雷德里克·杰姆逊[9]（Frederic Jameson）论述资本主义的话，想象世界本身会如何终结，比想象“互联网”的终结要容易得多。

当然，也有人宣称他们仍能想象一两个星期没有“互联网”和它那些东

8　美国学者和政治活动家，被评为美国科学界50位风云人物之一。他是知识共享组织（Creative Commons）的创始人之一，现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及该校Edmond J. Safra伦理研究中心主任。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再混合（Remix）》(2008)，《代码2.0: 网络空间中的法律(Code v2)》(2007)，《自由文化（Free Culture）》(2004)，《思想的未来（The Future of Ideas）》（2001）以及《代码：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1999）。

9　当代美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在美国批评家中是论述被引用最多的人。他的著述主题广泛，从历史理论、解释学、文学批评、文化政治到通俗小说、电影、视像艺术、音乐和建筑学等都有所涉及。

西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种“离线”经历又深受“在线”经历的影响，我们以两者之间的分歧为镜头来看技术，这也是个事出偶然的历史真实，而不是注定如此的自然真实。我们思考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这样的活动时，完全可以不去想这两个看似不同的世界有什么分裂。然而，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一分歧，从“互联网”撤离，也不同于设想一个迥异的世界：在那个世界，我们不需要撤离，因为那儿已经不存在撤离这个令人垂涎的目标。我们的创造力，已经没法理解一个没有“互联网”、故此也就不需要撤离的世界了。

更奇怪的是，我们最聪明的技术专家，每天一早从浴室镜子里就基本上看到未来的那些家伙，在这件事上同样感到无奈。这些技术高手崇拜具有创造性破坏能力的神，在创新的圣坛上祈祷，看着大小企业来来去去而不流一滴眼泪。他们可能会把整个周末花在小行星采矿和漫步其他行星上面，而即便是他们也无法想象“互联网”会怎样消亡，更别说想到接替它的会是什么。他们的预测模型能预测和模拟全球豪猪起义[10]发生的概率（或许还有结果），但简单勾勒一个没有电缆、交换机和统一资源定位符（URL）的世界，仍然超出了他们的计算能力。

世界一直是这样的吗？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能想得到电报或蒸汽机之后的生活吗？马可尼[11]和他的忠实信徒们能想象无线电之后的生活吗？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美国人能想象电视之后的生活吗？法国人能想象Minitel[12]之后的

10 指豪猪自由节（Porcupine Freedom Festival），简称PorcFest，是自由州项目（Free State Project）最重要的年度夏季聚会，地点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白山国家森林。

11 意大利工程师，专门从事无线电设备的研制和改进，190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2 法国电信1983年推出的一项服务，通过它用户可以在线购票、查看股价、收发邮件、查找信息、进行财务结算、购买日用品和聊天等。

生活吗？那些时代的科幻和乌托邦文学确实包含了许多这种努力的明证。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这种类比是有瑕疵的，甚至有欠公允。举个例子，无线电和电视还都在我们身边，直到2012年6月法国人才终于拔掉了Minitel的插头。

再者，无线电，电视，甚至还有电报（干嘛是电子邮件而不是更好的电报？），在互联网上重新发明了自己。然而这只是增加了我们调查的混乱，因为既然大多数其他技术都以“互联网”为媒介，那就更难想象这一切会怎样被别的东西所取代了。如果“互联网”离去了，看上去我们的整个技术装备（我们的科技博物馆和历史教科书里展示的所有人工制品）似乎都会随之而去。

但或许，我们无法想象后“互联网”的生活是因为我们认为“互联网”哪儿也不会去。如果公众讨论是风向标，“互联网”的终极目的（它对终极技术与终极网络的信仰）已经得到广泛接受。这是硅谷版本的历史的终结：正如弗朗西斯·福山[13]（Francis Fukuyama）在其颇具争议性的阐述中所说，由资本主义驱动的自由民主仍然是城里唯一的游戏，由资本主义驱动的“互联网”也是如此。从逻辑上讲，它是神赐予我们的宝贵礼物，人类绝不应该抛弃它或把它搞得一团糟。因此，尽管“互联网”可能会颠覆一切，它自身绝不会被颠覆。它就待在这儿哪儿也不去，而我们最好惟其马首是瞻，发现它的真性情，把它的特征当作金科玉律，汲取它的经验教训，相应地重新翻修我们的世界。如果这听上去像一个宗教，那是因为它本来就是。

比如说，Google的埃里克·施密特说，“立法者应当顺互联网本性而

13 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舒华兹讲座、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著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他的第一本著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让他一举成名。

为，而不是逆势而动”，当数字政治学的著名评论家丽贝卡·麦金农[14]（Rebecca MacKinnon）指出，“如若没有重大升级，我们的政治体系将继续推出与互联网不兼容的法规”，就正突显了“互联网”这一概念。广受欢迎的技术博客兼作家杰夫·贾维斯讨论德国人对隐私的复杂感受，他谈道，“想到自身传统将要陷入与互联网文化的根本冲突，德国人对未来便产生了某种难以自拔的恐惧。”他援引的也正是这个“互联网”概念。

这些思想家都认为“互联网”一成不变、意义重大而具有启蒙性，强大而不可战胜。就像贾维斯说的，“这就是未来”。著名技术投资者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以一种类似口吻写道，“Web2.0意味着以网络喜欢的方式来使用网络。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趋势’，不过是从二战期间实行而后又崩溃的模式中浮现出来的网络本性。”因此，他认为“互联网”有其内在本性、逻辑和目的，这一本性正迅速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只能站在后面观望。“互联网”会照顾好自己，还有我们。如果你的隐私在这一过程中消失不见了，这也不过是互联网大神一直想要的。

关于“互联网”这个准宗教情绪再举最后一个例子或许就够了。戴维·波斯特（David Post）最早开始倡导“互联网代表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类历史阶段”的观点。他认为法律规则对“互联网”的推动，可能与自然法则对“互联网”的推动一样坚实有力。莱斯格曾通过推理认为，互联网毫无本性或目的可言，我们应当设法避免某种“现实存在主义”心态，相信“互联网”永远和现在一样自由。波斯特没有采纳这种观点，而是把“互联网”看作某种超自然的和独立自主的东西。（令人好奇的是，莱斯格这个观点与他在《新共和》周刊发表的关于网络“永不消失”的观点正好相反，但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莱

14 新媒体专家，曾任CNN调查记者和北京办事处主任，现任香港大学新闻学系助理教授。

斯格作为学者的那个自我明白，“互联网”里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但他作为活动家的自我同样明白，主张它就待在这里，更容易让他得到支持）。这是波斯特原文所写的：

> 有大自然的法则……有成长、规模和组织的法则，有各种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网站访问量、互联网连接、城市人口以及词频都遵循相同模式，为什么这个全球网络采用端到端设计和分布式路由，尽管我们可能并不太明白……这些法则。它们很重要……只要我们喜欢，我们大可以向万有引力定律挥动拳头，但如果我们在修桥时不多加小心，它们全都要倒掉……并不像莱斯格所想的那样，一直在寻找它们并设法理解其运行机制的，并不是“现实存在主义”。

换句话说，埃里克·施密特所谓“互联网本性”是真实的（据我们所知就像万有引力一样真实），我们应当依靠窥探“互联网”的灵魂深处来寻找它。“互联网”遵循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坚固和自然的法则而发展，这样的状态我们如何才能达到？一个严肃的法律学者居然这么写，却完全不担心有谁怀疑他患上了轻微妄想症——这表明，对“互联网”不加批判的讨论已经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

“互联网”的伪启蒙主义

“互联网”有什么消息要通知人类吗？它有什么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需要当心、并可能整合到我们的制度当中的吗？它是否能帮我们重拾早已遗忘的人性真相？不只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还包括互联网战争中的普通士兵，

参加“匿名者组织”[15]（Anonymous）并在选举中为“海盗党”代表投票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正是这种把“互联网”看作智慧与政策建议源泉的倾向，把它从一堆相当无趣的电缆和网络路由器变成了一种富有魅力而令人兴奋的意识形态——或许是今天的超人思想。

科技作家史蒂芬·约翰逊（Steven Johnson）在《完美未来》（*Future Perfect*）一书中对这一思想做了最漂亮的总结。在约翰逊看来，“互联网”远不只是一个发送Skype消息或为猫猫照片加上貌似滑稽字幕的廉价工具。相反，它是社会本身应如何重组的一个知识模板。它并非“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问题的思考方式”。因此，约翰逊写道，“人们可以直接用互联网改善自己的生活，还可以学习互联网的组织方式，应用这些原则来改善城市政府的工作方式，或者学校体系对学生的教学方式。”不出意料，他认为从政治意义上来说，互联网历史中的重大进展堪比法国大革命或者柏林墙的倒掉。因此，“创建阿帕网和TCP/IP协议……也应当被视为政治哲学史的一个里程碑。”为了霍布斯和罗尔斯[16]，现在我们必须把阿帕网和TCP/IP协议补充进来。

为什么？因为约翰逊认为，像维基百科和Kickstarter（一个为有抱负的艺术家和极客服务的流行融资平台）这样的网站比较靠谱，因为它们植入了“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贯穿并掌控着它的物理网络。当然，它也是精神胜利法——“互联网”所触及的一切自然都变得更好，更聪明，更漂亮。“与互联网的产生非常相似，缓慢而稳步地，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主宰网络设计的核心原则可以被用于解决各种不同问题，街区、艺术家、制药公司、父母、学校都会面对的问题，”约翰逊写道。

15 匿名者是一个国际性黑客组织，起源于2003年网络信息论坛4chan，核心观点是呼吁“互联网自由”。

16 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哈佛大学教授，写过《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万民法》等名著，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

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单举一个例子，约翰逊认为像Kickstarter这样的网站是一种比国家艺术基金会（NEA）更好的艺术资助模式。事实上他认为Kickstarter取代NEA只是时间问题。“鉴于其成长率，Kickstarter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能在对创意艺术的支持上与NEA相匹敌。新的问题是它是否能发展到10倍于NEA的规模。”在书里的另外一处，约翰逊说他并不是想抛弃NEA，而只是想让它的工作方式更像Kickstarter。然而他论点里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他没讲清楚为什么NEA应当变得像Kickstarter一样，后者的模式更胜一筹的关键是什么？或许约翰逊完全没必要这么做，因为他的读者能够读懂这个论点背后的意思——Kickstarter的方法就是更好，因为它来自“互联网”。

这个奇怪又短视的主张专注于平台机制，而不是像NEA这样的机构的实际工作内容。Kickstarter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发起者（可以是打算创建一个很酷的应用或新玩意儿的创业公司，或者打算制作一段音乐视频的艺术家），在网站上发布其融资请求；一旦有足够的人参与捐助，发起者就得到这笔钱来启动项目。许多项目达不到融资目标，也就得不到钱。那些融到资的也经常不能实现预期目标（Kickstarter最有名的失败毕业生是Diaspora，一家命运多舛的创业公司，它打算挑战Facebook，给用户提供更好的隐私保护。该项目发起于2010年4月，2012年8月失败，其中一名联合创始人自杀）。有些项目倒是实现了，但大多数都受到“病毒式传播能力”的左右，如果在线民众认为他们的方案有吸引力，钱就源源不断地涌来了，往往比最初所要求的还要多。

可见，这是一种与NEA自上而下的等级制模式截然不同的模式。后者由一小撮对艺术一知半解的官僚主义者全权决定资助什么项目。而Kickstarter为一些项目提供了一个更有效的融资平台（既躲开官僚主义者又增加参与性）来更有效地筹集更多资金。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会产生更好、更具创

新性的艺术，或者会资助在我们的猫猫视频时代里可能显得过时无用的艺术。Kickstarter这类网站往往比较青睐平民项目，总体而言这对艺术可能有好处，也可能没有好处。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他政府和准政府机构：如果国家民主基金会像Kickstarter一样运作，它将不得不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资助像“Kony 2012”[17]这种在网上疯狂传播的项目上，而全盘考虑的话，这对民主促进和美国对外政策整体而言可能只具有次级重要性。

另外，这个新系统是否会促进公平和公正一点也不清楚。与大多数互联网啦啦队长所想的相反，病毒式传播几乎从来都不是自我产生和自我维持的。弥母[18]生而自由，却处处受到束缚，来自公关公司和个人自由职业艺术家的束缚。两者都完美地适应了这个新的数字化的世界，并且凭借对社交媒体经济学的有效掌控，找到了对病毒式传播实现逆向工程的能力。他们知道怎样向博客提供合适的东西，以便在重要的（即便略为小众）的平台上散布消息，考虑到有那么多专业媒体如今都在访问Gawker和《赫芬顿邮报》的网站，他们的触角远远地伸到了社交媒体之外。

因此，尽管Kickstarter可能给我们某种错觉，以为它是比NEA更有效率的一类艺术投资，但如果忽视了“我们所得到的艺术会截然不同”这一事实（这比平台效率更重要），那就太天真太短视了。

何以如此？丹麦学者Inge Ejbye Sørensen研究了众筹模式对英国纪录片制作的影响。英国人在这方面一直独领风骚，它的大多数纪录片都由其四大主要广播电台（BBC、ITV、第四频道、第五频道）出品并全额投资，它们为制

17 一部由Invisible Children Inc拍摄的记录片，于2012年3月5号发布在YouTube上。这部纪录片的目的是使国际刑事法院逃犯、乌干达反政府武装头目约瑟夫·科尼被世人熟知，并力争在2012年12月之前将他逮捕。

18 弥母，又译模因，指文化基因。这个词是1976年由理查·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所创造的。目前比较公认的定义是“一个想法、行为或风格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文化传播过程。”因此也可以说，弥母即指文化基因。

片人制定游戏规则。在这种背景下，众筹和Kickstarter似乎是自由的，甚至是革命性的。

但是，正如Sørensen所指出，这场革命有几个从轻情节。首先，Kickstarter可能创作了许多新的纪录片，但可能它们是非常特别的一种（这番话同样适用于该领域的其他网站，比如indiegogo.com，crowdfunder.com.uk，还有pledgie.com）。它们可能是由政治运动和社会问题推动的影片，沿袭了《超大号的我》或《难以忽视的真相》的传统。它们的导演寻找社会变化，深入接触与纪录片拥有共同激进主义议程的在线公众。一部探究一战原因的纪录片，收到的在线投资大概会少于（如果有的话）一部探讨气候变化原因的纪录片。第二，有些影片有巨大的启动成本（想想戏剧纪录片或历史电影），或有可能陷入难以估量和核算的巨大法律风险。比如你在拍一部有关石油行业秘密调查的影片。如果你有BBC的律师为你撑腰，你恐怕愿意承担比众筹模式下更多的风险。但如果Kickstarter是你选择的平台，你或许面对棘手的法律问题会完全放弃冒险。

这些论点都说明，把敏捷、众人出力的Kickstarter视为BBC（若在美国，就是NEA）这种庞大机构的替代品（而非补充！），是很危险的。这可能与戴维·卡梅伦[19]（David Cameron）“大社会”的风格相当契合，个人承担了原来公共机构扮演的角色，但若是把这两种内容制作方式看作是殊途同归，那就大错特错了。有些内容是根本不可能通过众筹模式融资的。

然而，约翰逊并不想表明在艺术背景上改造NEA的立场。在他看来，Kickstarter更好，因为它更有互联网风格，更有参与性。这些东西可能与艺术投资没什么关系，但这似乎对他没什么影响。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互联网中心主义：“互联网”的公认价值，不管是开放性还是参与性，成了评估人类活动

19 英国现任首相。

各个领域最重要的准绳，而不管其自身目标和标准是什么。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给互联网价值下定义是出了名地棘手。拿互联网专家杰夫·贾维斯来说，他在其第一本书《Google要做什么？》中主张，其他机构（营利的、非营利的）应当复制Google的商业哲学。他的推理是这样的："互联网"是开放、公开和协作的。Google也是如此，它成功了。因此其价值就是开放性、公开性和协作性。这些也是互联网价值，它们带来利润和效率。所以贾维斯继续推断，"互联网"告诉我们一些有关Google的非常重要的信息，Google又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互联网"的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逻辑是如此自圆其说，像他这样的专家是绝不会错的。

但正像最近几年所显示的样子，驱动Google的既不是开放性意识也不是公开性意识，在这一点上它似乎只在意市场竞争。当它觉得遥遥领先于Facebook和苹果时，它创建开放式平台，创办非营利但有用的服务。但那样的日子已经远去。它已经关闭了许多曾被贾维斯大加推崇的平台，变得越来越谨慎，如今更是对一些服务收费，而把其他的一股脑统统淘汰。2010年它几乎放弃了名义上对开放性的支持，转而与Verizon达成一项关于移动网络流量监管的交易。有很长一段时间Google的确没有插足内容业务，而是把自己定位于其他内容信息入口的平台，但今天它旗下拥有餐馆指南Zagat和旅游指南Frommer's，很乐意在搜索结果中提供自己的内容。与贾维斯出版那本书的时候相比，如今Google不像一个互联网公司了吗？有没有可能实际上它根本没什么真正可传授的"互联网"经验，或者这种经验总是转瞬即逝，瞬息万变？

再比如说维基百科——解决方案主义者最津津乐道的重塑世界的模板。《维基经济学》和《维基政府》这类书就是该网站在解决方案主义者的幻想世界里所扮演角色的明证。把维基百科当作一个模式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没

有人（即便是他的创始人吉米·威尔斯）真正明白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想当然地以为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改变生活的经验教训，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至少是有些自负的。最糟糕的是，维基百科本身受制于许多荒诞故事，结果可能导致受维基百科启发的解决方案曲解其精神灵魂。

“相对而言，维基百科的管理团队小得几乎难以察觉，”技术专家凯文·凯利这样宣称，同时他还坦白说，“大部分我曾深信不疑的对人性和知识本质的信仰都被维基百科给颠覆了。”但是在维基百科以前凯利究竟信仰什么？凯利说“我对信息结构的所有知识都让我相信，如果不花费大量精力和智力精心设计转化的过程，知识不会自发地从数据中涌现出来。”多么在情在理啊！就是今天也不能不信。其实吧，维基百科有一个巨大的（一点不小）管理机构，其管辖权涵盖到最隐晦的问题（想想WP:MOSMAC就行了，它为维基百科的文章应当如何讨论“马其顿共和国和希腊的马其顿省”做出规定）。2006年的一项估算认为，关于维基百科的管理和编辑策略（其管理团队的实质内容）的讨论占据了整个网站至少四分之一的内容。它的管理团队绝对不小。在真正领会之前就匆忙应用维基百科的经验必然是后患无穷。凯利他们对此浑然不觉，只能说明他们在用错误的方式观察它。可靠的技术分析（这可不欠互联网中心主义什么人情）的任务，就是让看似无形的变得有形。

对维基百科的最佳解释，是它自己的圈内人喜欢说的：维基百科的运转靠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真是句了不起的台词，除了好笑，它还表明，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理论来理解维基百科。或许我们甚至不该有此奢望，因为这些理论必然会大肆粉饰让它运转起来的惯例和媒介的华丽世界。放低身段，承认我们认知的局限性没有什么错。显然，某个东西与“互联网运作机制”的宏大理论不相符并不会使它变得没用，维基百科的例子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鉴于我们对维基百科的了解是如此之少，在面对十万火急的问题时指望

我们像变魔术一样“掏出一本维基百科”，那简直是幼稚得可怕。

如果互联网理论家是大骗子

互联网中心主义也早已渗透到管理思维中。当代最有吸引力的互联网监管理论之一，由哈佛大学的乔纳森·奇特林[20]（Jonathan Zittrain）提出，它是围绕着原生性思想而展开的。它开始的前提是假定平台开放性是“互联网”引爆如此多的创新的主要原因。在“互联网”里，没有人在开启一个新服务时必须征得别人的同意。Google无需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协商就可以创建一个搜索引擎。维基百科无需跟微软或美国在线之类的公司协商就可以创建一个百科全书。Skype无需与AT&T协商就可以创建令人叹为观止的软件。

作为对过去20年所发生事情的解释，奇特林的思想是一个非常简洁甚至简约的理论。然而原生性还是对未来的行事原则做了规定：该观点认为，如果我们希望这一波伟大的创新继续下去，就应当保持（甚至主动捍卫）“互联网”的开放性。任何将中介机构引入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发展（比如最近风靡一时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app应用），都要仔细审查，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给予抵制，因为新中介都很贪婪，不太可能把“互联网”的最佳利益放在心上。在我的书里，技术变化与创新优秀理论的标志，是它是否能预料（或者至少预先考虑到）当前技术会怎样被颠覆。预料到创新理论家至少会对最后结果做好准备似乎没什么了不起的，无论此刻他们所推崇的技术是什么，它都会被当初把它推向前台的同一股颠覆性力量毁灭。换句话说，如果我们

20 牛津大学互联网治理与管制牛津互联网学院（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负责人，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及社会研究中心的共同创始人并任第一任主任（1995 - 2000）。著有《互联网的未来》一书。

穿越回历史，试图用我们现在的“互联网”知识为监管电话产业草拟更好的规则，我们或许会把重点更多地放在电话不会一成不变这个情况上。这同样适用于电报、无线电甚至电视。如果他们有第二次机会，这里边每个行业的称职创新理论家都会花更多时间来试图预见到他们的调查对象（不管是电报、无线电还是电视）的死亡，而不会为了让它们永世长存而拟定统一的标准和条件。如果人们认为创新应当是一个独立平台，有效监管的最终目标是在所有平台上（包括意料之外的未来平台）将其最大化，那么，制定标准无论如何都该是后一步才做的事。

但是原生性理论并没有困扰于“互联网将如何灭亡”这个棘手问题，一点也没有，因为在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支配下，奇特林极其希望“互联网”是永恒的。他的理论是为“互联网”如何能与世长存而开的药方。当然，这从来没有直接表达出来，因为奇特林认为（想法很对哦）他的极客读者有着和他一样的让其崇拜对象永生不灭的共同愿望。然而，我们不应当把我们对“互联网”的迷恋误以为是真正的创新理论。任何经得起推敲的理论，不是把“互联网”当作上天送给我们这个文明的永久礼物，而是要找到一个办法对许多不同平台和技术的创新潜力进行比较，包括那些最终可能会取代“互联网”的平台和技术。

当然，对app应用的兴起给数字化的“生命形态”带来的挑战，可能还有其他强烈的社会、政治甚至美学上的忧虑。然而，因为苹果（奇特林的罪人之一）于“互联网”无益就声称它于创新无益，不啻于断言因为“互联网”无益于电话所以它就无益于创新。好吧，它可能曾经对电话不利，但什么时候对电话的保护成了崇高的社会目标？这种目的论互联网中心主义不该在我们的监管思想里有一席之地。但是，哎呀，对“互联网”的保护似乎已成了它本身的一个目标，这甚至对我们思考取代它的会是什么以及我们的互联网崇

拜会怎样阻止某些东西的出现的能力造成极大的伤害。为后互联网时代变幻莫测的未来选择“互联网”，等于是默认要么“互联网”已经满足了我们的一切秘密计划、渴望和欲望（也即是说它的确是硅谷自己的“历史结局”），要么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创新还能引爆别的什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奇特林的原生性理论尽管对苹果这样的守门人颇多微词，它自己也是一个守门人。尽管原生性为有益、可靠而又可预测的创新开了绿灯，它们承诺呆在“互联网”范围内并保持其原样，它却不喜欢或许甚至会阻止那种不守规矩的颠覆性创新，后者起初可能是在“互联网”范围内，但是最终会超越、取代甚至可能消灭它。奇特林试图把他所认为的变成大家普遍接受的“互联网”经营方针，把它作为客观、永恒和毫无争议的基本原理，创新理论本身从此可以在此基础上运行。因此，如果说，开放性应该是“互联网”的定义特征，那么，如今它已摇身一变成了未来创新的客观基准。积极扩张到其他领域是互联网中心主义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打入整个理论和领域，把自己的价值——开放性、透明性、颠覆性——施加到它所触及到的一切。然而，如果我们撇开“互联网”的福祉不谈，毫无迹象表明，苹果开办自己的app商店或控制自己的小玩意儿这种亲身实践的方式对创新不利。它的方式可能不“开放”，它可能甚至不是“互联网兼容”的。但是只有在“互联网自身”的幸福是一切的关键、是所谓至善的世界里，这些标准才有意义。实际上这甚至可能正是乔纳森·奇特林和许多其他极客所向往的世界。意识形态的确有一种让其他世界观显得毫不相干或不可接受的倾向。然而，事实上，控制与集中化并非与创新天然对立，如果我们承认的确如此，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本身就有可怪罪的地方。

伍迪·艾伦（Woody Allen）曾写过一篇名为“当印象派画家成了牙医”的有趣讽刺文章，采用了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写给他弟弟的书

信形式来表现："西奥，索尔·史威莫太太要起诉我，因为我凭感觉给她做的牙桥不合她那张滑稽的嘴！……她说她不能咀嚼了！我管她能不能咀嚼！"互联网理论的世界还在等着它的伍迪·艾伦，但是一部类似的讽刺作品还是相当有用的，如果顺着"如果互联网理论家当上了夜总会门口的保镖"接着往下写的话。如果乔纳森·奇特林的互联网理论有什么意义的话，他开的夜总会会像是开放性的绿洲，谁管光顾的顾客是醉醺醺的还是带着毒品和武器的呢？这种开放性会让夜总会里的每个人都很开心。真是个令人愉快的理论，但是真正的夜总会可不待见这套激进的开放性理论。原因很简单：它毁了泡吧的体验。互联网理论家或许要反驳：如果夜总会有如此妙不可言的开放性气氛，我们干嘛要在乎什么泡吧体验？好吧，祝他们好运。

奇特林的思想，对一种在互联网辩论中日益普遍存在的更广泛悖论做了写照。技术博客的读者，或者技术会议的参与者，很少有人从没听说过这种告诫的：有某种黑暗邪恶势力——好莱坞、国家安全局、苹果——即将"毁掉互联网"。技术专家和极客这群人花了最多的时间在"互联网"及其未来上卖弄哲学，他们不断提醒我们"互联网"不牢靠，可能会崩溃。他们偶尔也会说，就算所有的乐趣和便利都没了，世界也会照常转动，似乎没有人知道一旦"互联网"真的毁掉了等着我们的是什么。但它终将毁灭，除非发生了某种极端变化使它的现状得以维持。因此最大的讽刺莫过于，前一天，他们告诉我们，"互联网"会待在这里，我们应当改造制度来适应它的需求，后一天，他们就告诉我们，它太脆弱了，几乎任何人任何事都能给它致命一击。

这种悖论很容易被当作极客的逻辑矛盾而不予理会。或者，在莱斯格这个例子里，它可能只是一种修辞技巧，一条支撑某种重要激进主义事业（比如说，版权改革、网络中立，或者反对监管和审查）的妙计，与此同时，它

又推动我们看上去过时的政治和立法机构进行技术和创新实验。这样一种解释当然看起来就言之有理了。但是同样可以相信，我们对“互联网”和它所谓的本性已经全然迷惑了，我们对它结局的判断大错特错了，正是“互联网”的观念使我们对世界的思考陷入枯竭，我们拜错了神，信错了思想。那么，它到底是什么？

关于新纪元和新纪元主义

在研究互联网中心主义对解决方案主义的侵蚀性影响以前，有必要对其起源说上几句。就算是它的主要支持者（要么太年轻，要么书读得不多）恐怕也没注意到，互联网中心主义尽管号称是当今时代的真正革命，有着非凡本质，却与一些有关技术、信息、创新和数字化的早期崇拜重叠并从中汲取养料。很多论述信息时代和后工业时代必然来临、论述自动化的价值与危险、论述控制论和人工智能转化潜力的书，都为现在的讨论提供了背景，帮助我们做好心智准备。把互联网优越论说成是独一无二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错误，因为这绝对不可能。

技术健忘症和对历史（尤其是技术健忘症的历史）完全漠不关心仍然是当代互联网讨论的典型特征。正如英国技术史学家大卫·艾杰顿[21]（David Edgerton）所指出，“当我们想出信息技术时，我们就忘了邮政系统、电报、电话、无线电和电视。当我们赞美在线购物时，邮购目录又消失了。说到遗传工程学及其好坏，就以为从来就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能改变动植物，增加粮食供应。”只有勇敢乐观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人才会断定，随着“互联网”渐

21 伦敦皇家学院教授，该校“科学、技术及医学历史研究中心”的创办者、主任。著有《历史的震撼》一书。

渐支配和压倒这些早期辩论，我们对历史细节的尊重会不可思议地有所增加。说句老实话，技术讨论的“互联网时代”只会加剧这种健忘。

当然，如果人们的历史知识减少到推文长度的克里夫小册子，自然会觉得洋洋得意和无与伦比，相信自己正生活在真正非凡的时代。我将这称为“新纪元主义”知识性谬见。这并非互联网乐观主义者的独占领域，悲观主义者也喜欢新纪元主义。毕竟，只有把他们的批判看成前无来者，这些批判才显得关系重大。因此，一个自称是互联网悲观主义者的人，比如安德鲁·基恩[22]（Andrew Keen），不必费心拿出大量证据，就敢赤裸裸地宣告，社交媒体的发展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令人纠结的文化转型”。基恩以为，今日转型的规模空前，此乃不言而喻的事情——这是新纪元主义假设的一个典型特征。

新纪元主义假定我们正在经历革命时代，支持进行原本有可能招致大量怀疑和批评的激进社会干预。但是在真正的革命时代，怎么都行。干嘛不在政治上仍然采用维基百科的模式呢？所有关于革命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聪明办法，把平时很少有人会接受的激进议程变得合法化。新纪元主义令人窒息的影响力引起消极情绪，限制了我们对变化的反应，因为渐渐展开的趋势让人感觉如此巨大和不可避免，一切抵抗似乎都是徒劳的。这使我们看不到“革命”趋势平淡无奇而又极其短暂的特性。

毕竟，相比静观变化，看它是否无非秩序与量级的变化、而非完全颠覆现有常规准则，索性宣告新一场数字革命降临（并设计必要的时髦术语），还容易得多。但欺骗不会到此为止，因为新的术语（之所以会出现新术语，是

22 英裔美国创业家、作家，和杰伦·拉尼尔、尼古拉斯·卡尔都认为现在的互联网文化和 Web2.0 趋势降低了文化的价值。著有《数字晕眩》等书，对互联网引发的各类经济、社会、道德、法律等问题进行反思。

因为我们显然正处于新时代的边缘）会反馈进系统，充当新时代确已降临的证据。这种循环互证很愚蠢（“互联网”凭借X因子而被证明具有革命性，X因子依靠“互联网”而被证明具有革命性），但在一个发生着深奥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却被被当作了深邃的洞见。

以看似新奇的术语比如“众包”为例，据说这是互联网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这一思想给我们带来了启蒙主义知识的伟大源泉——维基百科。“众包”肯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术语，要是把它所开启的实践说成是“数字分布式血汗工厂劳动”（要描述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这种外包悬赏平台，这个说法似乎更准确），恐怕达不到现在一半的效果。

但是实际上这种委婉用语来自某种妥协权衡。它们并不总能捕捉到它们意欲描述的过程的历史复杂性。1714年英国人不也曾求助于“众包”来解决“经度问题”，征求更好的海上航行方案吗？1849年史密森尼学会[23]（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不也求助于有超过600名志愿观察者（分布于加拿大、墨西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网络来提交月度气候报告（1861年出版了两卷本气候数据汇编的第一卷）吗？1936年，丰田公司不也为重新设计公司商标而搞了一场竞赛，竟收到2.7万条答复么？Zagat不也是借助某种形式的“众包”，早在Yelp让在线评价流行起来以前就形成了自己的酒店评价吗？没错，今天做这些事情要容易和便宜得多，但这并非一场聚合知识的革命——如果我们认为“革命”这个词真的还有什么意义的话。

可惜，这一信息已经被我们的互联网权威们遗忘了，他们认为“互联网”极大改变了知识的创造方式，哦不，它甚至改变了知识的内涵。反正哈佛伯

23 美国一系列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集合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与美术馆联合会，拥有全球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博物馆群落。

克曼中心[24]的戴维·温伯格[25]（David Weinberger）在他的近期新书《大而不知》（*Too Big to Know*）里是这么说的。和埃里克·施密特一样，温伯格看到了“互联网”的本性，从此就再也不回顾过去了。“知识正呈现出网络即互联网的形态”，他这样宣告，热情溢于言表。“如今知识不只存在于图书馆和博物馆、学术期刊里。它也不只存在于个人的头脑里。我们的头脑和机构对容纳知识来说实在是不够大。今天知识是网络的固有属性，而网络涵盖了商业、政府、媒体、博物馆、策展收藏和保持沟通的头脑。”

这真令人陶醉，但可能错得不能再错了。互联网中心主义似乎把我们最有见地的分析师变成了刚在地球着陆的火星人，想象不出地球这儿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因此，为了试探着理解这些奇怪的人类，他们冒险进入一个现代大学，在那儿遇到一群教授，后者花了好几个钟头和来自另一块大陆的陌生人合著论文，浏览几英里之外服务器上的学术论文，用Skype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啊，”火星人说，“我们懂了，这个互联网什么的就是创造你们全部知识的网络。来，为这干一杯！”

可怜的火星人，他们根本不明白真正创造知识的网络在别的地方，他们把学者、大学、会议、计算机服务器、书籍、标准和惯例、他们的研究现象和研究工作所需的工具和实验室看成了一种东西。“互联网”可能会增强或者偶尔削弱这些网络，也必定会为新网络的出现创造条件，但它不会让知识的内容及知识的构成方式发生任何根本性改变。按照温伯格的逻辑，我们也可

---

24 哈佛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成立，专注于网络空间中的法律问题研究，是全球领先的知识产权及网络法研究机构，其发起的FFM（Free Flow Media）项目旨在通过技术和法律的手段建立全球网络环境下的作品传播与著作权保护新体系。

25 国际畅销书《市场就是谈话》的作者之一和《小块松散结构》的作者。他是一名哲学博士，现任哈佛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温伯格常年为《连线》、《纽约时报》和《哈佛商业评论》等出版机构供稿，还经常担任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时事纵览》节目的特约评论员。著有《新数字秩序的革命》一书。

以说知识曾是机场或邮局的属性，它们过去确实推动了知识的产生，但是这种看法，相比于温伯格为“互联网”设计的角色，简直微不足道。

温伯格说，“知识是如今网络的属性。”非也非也，知识一直都是网络的属性，粗略地考察12世纪的第一代大学就能看出来。又一次，我们的数字狂热者把体积与秩序方面叹为观止的有趣变化，误解为新时代的降临，旧规则不再适用。或者，正如一位富有见地的批评家对温伯格的作品发表意见所指出，温伯格混淆了“网络体系结构的变化与网络化知识本身的来临”。“互联网”不是网络化知识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大多数互联网理论家都遗忘了这个见解。

但是温伯格的解释更令人困扰的地方在于，它试图把“互联网”从它所体现的复杂社会技术关系中分割出来，用它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分析，就好像它是从天而降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历史渊源或联系。这是当代互联网言论反复出现的特征（也是庸俗麦克卢汉主义的又一实例），因为它让其从业者得以将“互联网”（按乐观的说法，互联网是当代一切进步事物的化身，悲观的说法则恰与此相反）与一些社会力量或群体放到同等地位，不管是主流媒体、好莱坞、独裁者还是持不同政见者。只有切断“互联网”与其语境的联系，将其呈现为麦克卢汉式的“媒介”，才能进行简化记分（也即判断“互联网”对这件或那件事情是好是坏的无尽游戏）。

是到了结束这场记分游戏的时候了，因为除了混乱它什么也没有带来。记分游戏促使温伯格写道，“就在‘互联网’因为各种问题而受到责难的同时，像Politifact.com这样的网站正在对新闻媒体进行比以往更加严密的事实审查。”“互联网”得一分？毕竟Politifact.com是个网站，而网站在分类上属于“互联网”这一方。这简直傻透了：Politifact.com也许是个网站，但它也是老牌报业《坦帕湾时报》（*Tampa Bay Times*）的一个项目。是的，我们应当谈

谈被新技术变成现实的新形式的事实审查，但是若臆想好歹Politifact.com总归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互联网”本性的有趣事情（在某一刻还以为这种本性真的存在），那就真的大错特错了。

如此这般的模式

温伯格对互联网得分的认同表明，依靠“互联网”进行因果解释存在一个巨大的危险。一旦评论者知道他们要针对宇宙说些什么，比如世界是平的，知识不再包含在书本里，苹果对创新不利，独裁政权到处都在崩溃，没人再阅读严肃小说……他们总用“互联网”来提供快捷轻松的解释（还总是错的）。然而，互联网驱动的解释唾手可得，这本身需要好好解释。对技术支持者和技术批评家这类人来说，“互联网”就像格伦·贝克[26]关系图里的乔治·索罗斯，一旦你跟它接通，天大的阴谋也一下子合情合理了。用小说的方式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流派——网络设定（Webdunit）。

更糟的是，许多人奉为原创的互联网理论（即通过诠释“互联网”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大胆解释世界），往往不过是衍生而来的大杂烩，借用现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一些最陈腐最老套的方法。如果这些方法不佐以互联网中心主义的美味酱汁，它们所形成的解释将遭到更频繁的质疑、反对和不置一词。唉，“互联网”作为一种调查领域的概念新颖性，连同互联网中心主义不可抗拒的影响，挡住了基本理论框架中很成问题的地方。

以克莱·舍基（Clay Shirky）的《人人时代》（*Here Comes Everybody*）为例，

---

26 美国知名脱口秀“格伦·贝克计划”（THE GLENN BECK PROGRAM）主持人及福克斯电视台新闻名嘴。《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著有《常识：反对一个失控的美国》等书。

这本书在极客圈里风靡一时，说是提出了降低协作成本的创新见解。舍基大部分的理论工具借鉴了两个来源：苏珊娜·罗曼[27]（Susanne Lohmann）关于1989年东德抗议所使用的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舍基从中借用了信息连锁反应概念）；罗纳德·科斯[28]（Ronald Coase）的公司理论（舍基从中借鉴了交易成本概念）。唉，倘若我们跳出互联网中心主义的视角，上述两者都不见得能很好地、中肯地用来理解数字技术。

像大多数理性选择理论的传统学者一样，罗曼（舍基误以为她是个历史学家，实际上她是个政治学家）在解释东德的集体行为时，不是专注于历史和文化因素，或是考察新意识形态和新观念的出现。这种分析需要拥有比大多数政治学家广泛得多的当地知识。理性选择论学者接受的训练是运用数据来构建模型（很类似过去几十年那些没能预测到前苏联崩溃或其他重大事件的学者），因此他们的案例研究在设计上去掉了不少地方色彩。

因此，为了解释1989年这场抗议，罗曼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基本不依赖环境的信息信号与动机理论，说明人们如何同步协调其行为。由于罗曼模型里的人是单向度的和无关历史的角色，所以信息连锁反应理论在加尔各答也和在开罗一样有效（这就是说，除了给出一些平淡乏味的归纳概括，它基本上完全没用）。因此，该理论认为，如果人们看到大街上已经有其他人在进行抗议，会倾向于加入，但只有在抗议到了某个可计算的高点以后才会这么做。

这么一个无聊的方法就能帮助我们解释1989年（或就此而言，2011年）革命，未免太值得怀疑，尤其是因为这种分析由于专注于社会运动的信息策略，它必然会忽视社会运动反对的国家机构的动力学机制。正如两位著名东

27 1991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28 英国经济学家，交易成本理论及科斯定理的提出者，对产权理论、法律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有极大贡献，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欧历史学家史蒂文·科特金（Steven Kotkin）和让·格罗斯（Jan Gross）提到罗曼著作时所指出的，“光是由于共产主义国家的性质，就从共产主义经历出发来概述社会运动，这么做可能很危险。”然而，舍基不只是概述，他运用了罗曼的信息连锁反应理论来解释各地“互联网”的政治影响——“互联网”推动更好的信息信号机制，正因为如此，市民预期将反抗得更为频繁。舍基有句精炼的名言：“行为就是经过机会筛选的动机”，这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无聊理论家们有可能找到的最好的口号了。

理性选择理论对政治变化的诠释有多好呢？几十年后仍然众说纷纭，但是它的倡导者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正如唐纳德·格林（Donald Green）和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在他们对理性选择理论的猛烈抨击（它还瞄准了罗曼的著作）中所指出的，它的主要支持者“有一个从事‘方法驱动的研究’的共同倾向，并且……这个倾向是普世主义推动力的特征。”换句话说，既然建模是他们的锤子和唯一工具，理性选择理论的支持者就把一切都看成钉子，所以他们试图解释任何一种行为，不管是复杂的还是特定文化的，空谈动机和机会。难怪克莱·舍基能用信息连锁反应这一理论对厌食症女孩儿、开源社区、东德革命和白俄罗斯叛逆少年进行解释。这是个解释一切的理论，却是泛泛而谈，忽视细节，实际上它最终什么也没解释。正如格林和夏皮罗所指出的，政治行为远不只是动机和机会。实际上，“塑造它的可能是对集体目标的热情、对领导人的态度、运动中的卓越象征性人物，还有个人适足感和参与义务。”解释模式的选择取决于需要解释的是什么，它不能只是遵循自己构建模型或研究动机与机会的偏好，即便数字平台和技术能为人们机会和动机的演变状况提供大量数据。对罗曼关于1989年抗议的解释或舍基关于过去几年的政治抗议的解释进行批判，不是要否认技术的重要性，更不是要质疑抗议的需求，而是要指出，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更富深意、更启迪智慧的方式

来探讨这些事件。

再次引用格林和夏皮罗的话，理性选择理论“把对政治事件成因的公正探究，变成了摘要式写作，并且以自己偏向的理论为代表。如果一个人（在进行实证研究以前）信奉某个政治学理论，那么，如果遇到明显的实证异常会对此种理论造成威胁，那就要把它解释掉。”这或许最准确地总结了为什么当今许多带有互联网偏见的政治学理论为何总是错得离谱吧。舍基和他的追随者们所依赖的模型虽然名义上与“互联网”相关，实际上却是夹带着“某种政治学理论”的私货（也就是说，认为公民碰到正确的信号和正确的工具，会对刺激作出相应行动，并团结一致）。用它来解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发展简直太简单化了。舍基从未提到随他的方法而来的沉重知识包袱。实际上他只是把罗曼当成了历史学家，所以信息连锁反应理论可以说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叙事，而不是人类行为的简化模型。任何意外出现的人或事（比如发现独裁者也很明智地使用了同样的技术，或者是人们并不总是对刺激做出反应，或者民族主义和宗教这等力量对人们的行为方式施加着深远而不可预知的影响，本身也为技术所改变，等等）都被简单地斥为技术恐惧悲观主义。本着真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互联网中心主义通过互联网悲观主义和互联网乐观主义这两极来进行自我支持，把任何批评都打扮成这两个极端的某一种表现形式（并最终消化之）。挑战这种思想观念和这种说话与思考方式，立刻就会被斥为太悲观或太乐观，就好像想不出其他别的批判方式了。这就是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至少，它在热门辩论中是这么表现的），它不容许对方法论进行讨论，因为它认为只有一种方式来谈论“互联网”及其影响。

舍基对罗纳德·科斯的公司理论和随之而来的交易成本论的崇拜似乎更难反驳，这不仅仅是因为科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我们的互联

网理论家的著作里经常出现对科斯的引用。除了克莱·舍基，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也大量借鉴科斯理论来探讨开源运动。科斯的理论本身没有什么错，在商业环境下，它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解释，甚至推动了经济学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但是问题来了，以交易成本观点来考察一家加利福尼亚新创公司，比对伊朗社会应用这套招数更容易。更廉价的数字技术可能确实会降低伊朗的大部分交易成本，这样的结论尽管似乎是无可争议的，其实说了等于没说，因为除非我们对伊朗的文化、历史、政治有所了解，否则我们对所有这些想象中的成本下降的背景就一无所知。谁是有关参与者？有关交易是什么？

缺失了有关伊朗的这些知识，第一反应是选择最简单的模型，认为政府与持不同政见者是截然两分的，并设想它们自己的交易成本会怎样因为“互联网”而降低。对一个相当复杂的主题来说，这样的讨论方式看起来太草率了。用互联网专家唐·泰普斯科特[29]（Don Tapscott）的话来说，“互联网不仅在商业中降低了交易和协作成本，它在异议、反叛甚至暴乱中同样降低了协作成本。”好吧，但是这些国家没有别的什么人在参与协作或从事交易吗？还是只有持不同政见者？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团结吗？还是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议事日程？

互联网中心主义的解释，至少在其当前形式下，大大恶化、低龄化了我们的公共讨论。我们应该尽可能远离它们。如果这么做需要强行暂停使用“互联网”这个术语，转而寻求更加精确的术语，比如“对等网络”或“社交网络”或“搜索引擎”，就那样好了！很有可能整体（即“互联网”）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就是大于这些具体名词之和，而后者对我们如何思考世界施加了如此潜移默化的影响。

29 全球著名的新经济学家和商业策略大师，被誉为“数字经济之父”。

欺骗与后果

在互联网讨论中，与历史不符的想法太常见，太有生命力，已经很难用无知或懒惰来唾弃它们了。不是因为我们的互联网理论家们懒才没人查阅历史书籍，相反，是因为他们认为历史与此不相干，认为“互联网”与原有的一切都产生了明显的断裂，是以前难以企及的文明高点。这种“断裂对话”（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它就没有新纪元主义）本身就有一个历史。比如，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赫克特（Gabrielle Hecht），就在20世纪50年代围绕核武器的出现和核电能源而展开的讨论中看到了类似的主题和基调，当时的人们认为两种新纪元发现都标志着“历史的突破，新时代的黎明（即‘原子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在哪儿，一切都永远的不同了。”

更仔细的观察发现，“断裂对话”在我们的互联网谈论中随处可见。说到这一点，乔纳森·奇特林2011年在多伦多关于互联网控制的一场会议上发了言，这个例子再合适不过了。奇特林注意到国家、互联网公司和它们的用户所面临的挑战，断言听众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去辩论“互联网”问题，因为，回首从前，“我们真的没为用电的方式是为善还是作恶在这儿开过一场会。”恐怕找不到一种情绪，更准确地再现了互联网必胜论的天真和它对技术历史的全然蔑视。

事实上，针对电的辩论与我们现在针对“互联网”、它的民主潜力和它对我们大脑的影响所进行的辩论一样富有戏剧性，一样稀奇古怪。要不怎么解释一本像《沉默的革命：兼论蒸汽和电力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未来影响》（*The Silent Revolution, or the Future Effects of Steam and Electricity upon the Condition of Mankind*）这样的书会在1852年出版，该书许诺，以“完美的电力灯丝网络”为基础，“人类将达成社会和谐”。或者，又该如何理解这个事实，帕特

里克·格迪斯[30]（Patrick Geddes）、彼得·克鲁泡特金[31]（Petr Kropotkin）和其他19世纪的思想家坚信电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新工艺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引用法国历史学家阿芒德·马特拉[32]（Armand Mattelar）的话，“城市与乡村，工作与闲暇，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能实现和谐？或者，又该拿弗兰茨·拉瓦克泽克这样的纳粹工程师、国家社会主义工程师协会发起人怎么办？他坚信第三帝国能推动小型农场和小型商业的发展，从而通过创造充足而廉价的电来促进社会的去中心化。此外，对于扩大电力使用范围的物理基础设施，也有一套复杂而矛盾重重的历史，充满了旷日持久的争斗和针锋相对的辩论。只有靠掩盖和隐瞒这样的历史，我们才能把“互联网”说成是独一无二和异乎寻常的。

并不是我们的互联网思想家不真诚，或倾向于只说好听话，方便自己捞到更好的咨询项目（尽管偶尔这似乎也是一个因素）。相反，他们自己对自己的新纪元话语风格深信不疑。正如我们在本书后面会看到的，这既解释了他们何以怀着宗教般的热情投身改善人类生活水平的探索并不懈为止辩解，又解释了他们为何对当前陷入危机的行业机构缺乏共鸣。毕竟，决裂往往包含着牺牲，或者正如克莱·舍基喜欢说的，“没人受损失就不是革命了。”

想要站得住脚，宣告技术革命的又一次降临，必须满足两个标准：第一，它需要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和说了什么，这样它才如其所言，真正独一无二；第二，它应当掌控当前的整个局面，而不能一味刻意选择事实来适应其观点。在这些条件下，当前关于“互联网”深刻的革命性影响的宣告，很少有经得

30 著名的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现代城市和区域规划理论的先驱思想家之一，西方人本主义城市规划思想家的重要代表之一。他于1915年出版的《进化中的城市》一书，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活动的主要思想和观点。

31 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创始人。

32 著名传播学者，现为巴黎第八大学信息传播学教授，进行媒介、文化和传播的研究。

起仔细推敲的。例子有很多，但或许一个就够了。

像其他许多对年轻人如何使用技术进行评论的人一样，《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及其续篇《宏观维基经济学》（*Macrowikinomics*）的作者唐·泰普斯科特和安东尼·威廉姆斯（Anthony Williams）认为，“互联网”创造了全新一代，也即所谓的数字原住民。泰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爱死这些家伙了！他们正“为职场、社区和市场带来开放、参与和互动的新伦理。”进一步说，“网络一代不是被动地接受大众消费文化，而是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搜索、阅读、审视、验证、协作和组织上（从Mp3文件到抗议示威无所不包）。”他们是“审视一代”，“在他们或与同辈圈里人一起对信息进行光速筛选时，他们对权威更加怀疑。”更好的是，“今天的年轻人自己就是数字革命的权威，而数字革命正改变着每一种社会机制。”

这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很难说。一些研究表明，在所有年龄段里，年轻人对数字文化的许多方面，往往见识最少。举个例子，2010年，一项研究调查了用户对在线隐私的了解状况，它发现，“在各年龄段里，18到24岁年龄段有更高比例对隐私政策标签的含义、企业向其他公司销售或分享其数据的权利几乎一无所知。”正如该研究的一位作者所写，“许多人归于年轻人（所谓数字原住民）的网络悟性似乎并未转化为隐私知识。”换句话说，并不是年轻人不在乎隐私，他们在乎，他们只是不具备泰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认为他们具有的那种数字悟性。2009年对五所英国大学的学生所做的一项实证研究发现，“把1983年后出生的一年级学生描述成一个世代有些太过简单化了……（他们）在对新技术的使用和了解上并非同类……位于网络一代年龄段里的学生存在极大的差异。”但进行这样的研究自然不如冥思苦想“正改变每一个社会机构的数字革命”来得性感。后者的回报可能也更好。

古登堡在极客斯坦王国

如果我们今天所见证的不是“互联网革命”，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所观察的变化，就无足轻重无关紧要了呢？毕竟，互联网啦啦队长们就是这么责怪对手的：他们告诉我们，倔驴们一定是瞎眼了，因为他们总是说更快更多的交流不重要，哪怕它明摆着有好处。唉，这些啦啦队长没有注意到的是，否认最新技术的重要性，只有一种方式；承认它的方式却多种多样。讲一个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人物和口音，这样的探索不需要倔驴似的激情。挑战科学革命流行解释的科学史学家们难道要否认，牛顿和伽利略的发现曾经对人类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们当然不会这么做，相反，他们以一种略带不同的、更加微妙的方式指出，17世纪的自然哲学及其中世纪前身之间的延续性，远远多过中断的部分。正如科学史学家史蒂文·夏平[33]（Steven Shapin）所说，“过去并非在某一时刻突然变成‘现代世界’的：看到17世纪的科学从业者身上兼具古人今人两种气质，我们没必要惊讶。”我们这个时代，却把类似的变化设定成单独的一起或一系列事件（一场有着准确开始和结束日期的革命），这种做法其实是近来才出现的现象。“科学革命”这一表述，可能是由哲学家亚历山大·夸黑[34]（Alexandre Koyré）在1939年创造的。

要不看看医学史学家们又如何，他们并不认为，19世纪下半叶在细菌学上发生的众多变化就等同于“细菌学革命”（这仍是该学科一个流行术语）。否认那一时期确实发生过重要变化是愚蠢的，但是拒绝接受“细菌学革命”

33 当代著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科学史学家。爱丁堡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历任英国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讲师、高级讲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社会学教授，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代表作有《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1985）、《真理的社会史：十七世纪英格兰的文明与科学》（1994）以及《科学革命》（1996）。

34 法国著名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史学家，是第一个提出科学革命说法的史学家。

这样的标签，只意味着希望以不同的态度认识这些变化。

举个例子，历史学家迈克尔·沃博伊斯（Michael Worboys）对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所谓“细菌学革命”颇有著述。他确认有四个互有联系的变化，经常被人用来证明真的存在一场“细菌学革命”。深入研究这四个变化的证据之后，沃博伊斯得出结论，“历史学家们在理解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往里头塞了许多原本发生在更长时间段里的变化。在这十年里尽管的确出现了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显著变化，但在整个医学领域，连续性与变化之间的平衡却很不规则。”注意，沃博伊斯没有否认罗伯特·科赫[35](Robert Koch)或路易·巴斯德（好吧，叫“巴斯德”或许更合适）的重要性，他只是指出，这些发现改变医学实践的实际方式要迂回曲折得多，绝非预先注定或不可避免的。

试图既承认重要变化又不落入新纪元主义模式，如此微妙的解释在互联网研究中非常难寻。也许是时候跟互联网专家来个攻守易位了，别再让他们解释“互联网”了，我们必须先明白为什么他们要以这种特殊方式来解释数字技术，不断向“互联网”及其本质发出祈祷。为什么断裂对话和革命性话语风格取代了所有其他的分析形式？为什么我们会给老的活动贴上新的标签，会臆测懵懂少年掌握了全部的技术，会相信“互联网”引发的讨论复杂得无与伦比？是时候问个清楚了吧，如果讨论自身（即讨论所关注的议题和阐释的问题）用革命性的方式来构建，我们会忽略些什么？

没有人比克莱·舍基更好地证明了断裂对话的诱惑性和局限性，所以或许我们有必要回到他的理论。舍基到处都看到数字革命，而它在传媒业却尤

35 德国医师兼微生物学家，因发现炭疽杆菌、结核杆菌和霍乱弧菌而出名，于190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视为细菌学之父。

其显著。“如果有人想要我们说清楚未来将如何取代报纸，他们其实是希望我们说，不会爆发革命的……他们想要听到谎言。”他这样宣称。按照舍基的说法，革命不可预测的，只能实时进行判断。因此，“你越认真地相信某件事情是一场革命，你越容易承认你无法预测未来，而它是不是一场革命也无法预测。如果可以预测，那就不可能是一场革命。”这可真是个有趣的坦白，一心想断绝对技术未来主义者的批判。如果他们搞错了（他们总干这事），他们可以把这些错误一笔勾销，就当是超级革命时代所必须负担的业务成本。

但舍基同时也是个咨询顾问，他知道这一行的神奇咒语：要把每一场危机都打扮成机会。因此，我们听到他说，“没有什么法子铁定有用，但每一件事又都有可能管用。现在是实验的时候，许多许多实验。”然而，这只是舍基在唱红脸，认为反抗并非徒劳。等他唱起白脸来，他的态度就没这么确定了，他往往屈从于某种奇怪的数字宿命论，近乎数字失败主义：“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刻，我们整个社会扪心自问，这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想要新一波信息的创造、获取和传播的洪流将带来的那种变化吗？”对白脸舍基来说，信息之神早就注定了一切，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接受这种必然性，享受革命之旅。这些日子里，很多行业都弥漫着大量的焦虑情绪，舍基用时而红脸、时而白脸的手法，开出了既鞭挞又顾问的混合药方。但他断裂的讨论风格如此有吸引力，真正的奥妙在别的地方。说来也奇怪，是他对历史的巧妙利用（按传统，这类辩论是不爱探求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把印刷机的发明和“互联网”的出现划上等号。

这不是东德的虚假历史（那不过是穿着伪装的理性选择理论）。舍基的著作里随处可见对印刷机的论述。他在《认知盈余》这本书里专门用几页篇幅对古登堡的发明和社交媒体的扩散进行了直截了当的类比。在别的地方，他写道，“我们正集体经历着1500年，在这个时候，你看得出什么东西撑不下

去了，却说不出什么东西会取代它。”他认为，“现在要判断互联网对媒体的影响是否会像印刷机当年一样彻底，还太早了。但要判断某件从1450年至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正在逼近，倒差不多正是时候。”

怎么不能？以一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为例：“互联网”什么也没有改变。这里引用传媒历史学家马歇尔·坡（Marshall Poe）的话：“毫不夸张地说，互联网就是邮局、报摊、影像店、购物中心、游戏厅、资料室、唱片专卖店、成人书店和赌场的集于一身。老实说，这的确很了不起。但它的了不起和洗碗机的了不起其实没有什么不同——让你一直在做的事情变得比以前容易一点儿。”这似乎低估了过去几十年里所发生的一些结构性变化的意义，但要说舍基式的必胜论解释就比坡的观点更准确，也不见得那么明显。

由数字技术的扩散所引发的变化必须通过审慎的实证与历史分析来进行研究，我们不能只是宣称过去的一些辉煌事件（不管是印刷术的发明还是1989或2011年革命）在作用上与现实情况相当。尽管如此，“互联网”是新的印刷机这一思想似乎已经绑架了公众的想象力。它是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核心戒律之一。多亏了克莱·舍基（他是一部分的原因），古登堡的发明如今已成了“互联网”的一大起源神话——至于两件事之间隔着整整500年，大家就别管啦。

两本新书（作者都不是历史学家）都明确地把古登堡描述为卓越的极客。《观察家报》科技专栏作家约翰·诺顿写了一本书《从古登堡到扎克伯格》（*From Gutenberg to Zuckerberg*），看书名就再清楚不过了。他告诉我们，古登堡“一定是一个极客原型，”他必须应对“创业投资的早期骚动，这段经历，跟5个世纪后硅谷达人们的遭遇一样惨痛，因为他失去了他所发明的东西的所有权。”不出所料，诺顿得出结论，“更详细地考察印刷术所引起的剧变，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些头绪，知道应当到哪儿去观察网络的长期影响”。

这种风格的另一本书是杰夫·贾维斯的Kindle电子书，书名更为露骨——《极客古登堡》。在贾维斯看来，古登堡“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技术创业家，”他应当被视为“硅谷的守护神，因为他利用技术开创了一个产业（说不定甚至是工业化本身的创世纪）来改进世界。”还有更多呢，“古登堡就像现代社会的创业企业，依靠开发新效率，实现规模化，资产的重复利用，分工专门化，以及设定标准。”实际上，“他的企业和今日的硅谷创业企业有明显的相似性。他面临着相似的挑战，想方设法调整明显不合时宜的业务动态。他同样身处于一个颠覆性的工作氛围中，就像他的创业家后辈一样，由此也令他本人发生了深刻变化。”

行走在当今互联网炒作的泥沼中，你必须小心，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这种炒作自身对“互联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印刷机在技术支持者看来一直都很有用，不仅是因为我们知道印刷故事的结局——识字，科学，进步。看看美国最被高估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36]（Daniel Boorstin）20世纪70年代末写的东西吧：“电视机的民主化影响与印刷术的历史影响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既然布尔斯廷做出这样可疑的陈述（你最近还看电视吗？），后边要说什么也就很自然了，就是那种你可以从克莱·舍基或杰夫·贾维斯那里听到的夸夸其谈：“这是电视成为一个普遍而引人入胜的美国体验的时代，是美国人不管在哪都能目睹全彩色静坐示威和民权游行的第一个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民权革命的时代，一个规模空前的抗议大众化的时代，一个为少数派争取权力的新时代，一个对外交政策施行全新有效公共干预的时代，一个通过公众途径、行使宪法权利、请愿让美国总统下台的新时代。”布尔斯廷的缩短版是：闪开，马丁·路

36 美国历史学家、博物学家和前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两套三部曲——《美国人》三部曲和人类文明史三部曲。

德·金，是电视这一印刷机的天然继任者，赋予了我们《民权法案》!

古登堡如此受欢迎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极客和技术人员对中世纪的新教宗教改革颇有好感，而印刷机在这段故事里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科尔蒂（Christopher Kelty）一直在研究各种开源社区里的极客文化，他在《二比特：自由软件的文化意义》（*Two Bit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Free Software*）一书里对这种倾向做了精彩的描述。据科尔蒂所说，许多极客为反对今日世界的微软们而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时不时地利用各种有用的过去事件，或是源自历史事件的传奇故事，他们不是为了缅怀过去，而是为了使现在和未来变得有意义。

新教宗教改革的故事（再加上天主教与新教争夺教堂、信徒、牧师、高级教士的的讽喻之战，和伴随而来的控制与解放的场面）就是这样一段有用的过去。科尔蒂说“新教宗教改革”是个很好的讽喻故事，因为它把力量从控制里抽离开来，又从教义问答集、仪式、字母表、小册子和礼拜仪式、免罪与自救这一类东西里找到了故事，给极客提供了一条途径来理解力量与控制的区别，以及它与极客们身处的技术和政治经济环境有着怎样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极客讨论中，国家总是被打扮成君主角色，大公司则成了天主教堂，创业企业和程序员则是新教改革者，外行则是“卢瑟（意为失败者）”和“羊民（意为顺民）”。科尔蒂认为这类故事在极客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们“对本来没有现成故事好引用的政治、技术和法律环境做了解释。”

从坏书历史到坏博客历史

尽管科尔蒂的见解，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舍基和贾维斯讲的古登堡故事对技术人员和极客很有吸引力，但我们还是搞不清，为什么这种故事具有误

导性或不合时宜，或者，为什么它们会在极客王国之外传播开来。贾维斯和舍基都不是历史学家，因此在讨论印刷机的影响（他们都认为这堪比“互联网”的影响）时，他们都求助于同一个来源：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里程碑式的两卷本研究著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首次出版于1979年。（爱森斯坦不只是互联网乐观主义者特别喜欢的理论来源，互联网悲观主义者也是如此。）爱森斯坦对印刷机发明之后出现的“革命”做了极具争议性的解释。不理解她观点的局限性，就不可能理解当代鼓吹“互联网”重要性的主张。更因为她的解释给“互联网”增添了稳定性，她成了互联网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两派人马都特别喜欢的理论来源（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里也借鉴了爱森斯坦的著作）。就像理性选择理论一样，这个许多资深学者都认为相当有问题的学术成就，却以人人称羡、毫无争议的面貌展现出来。

爱森斯坦大量借鉴了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著作，认为印刷术在引发所有后续社会变革上的重要性没有得到足够的历史评价（因此她戏称它为“未予承认的革命”）。尽管她试图公平对待印刷机的历史角色，爱森斯坦却采用了一个有相当局限性的印刷媒体观，过分强调了她眼里这项技术的固有性质：固定性（例如保存文字的能力，否则这些文字就遗失或严重损毁了），易于传播，以及趋于标准化。根据爱森斯坦的观点，正是印刷技术赋予了文字这些新特质，她甚至把这些特质提升到了“印刷文化”的地位。后者给我们带来了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巨无霸汉堡、史蒂夫·乔布斯，还有大笑猫。

许多学者都曾指出爱森斯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极其切中当前的互联网讨论。第一个敲响警钟的是学术历史学家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时间在1980年，距那本书出版刚好一年。他猛烈抨击爱森斯坦“从她的资料库里生拉活扯出一些事实和论述，看似能满足她的即刻论战需

求。”更成问题的是，在格拉夫顿看来，爱森斯坦一味强调抄写员时代与印刷工时代的分裂，认为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格拉夫顿说，“早在机械化复制手段出现以前，文字就能以稳定的形式传播。”爱森斯坦却将这一点极力贬低。换句话说，如此煞费苦心地在不同文化和时代之间划上清晰界限，带有毫不掩饰的新纪元主义意味；事实上，“印刷文化”的许多特征，在这个文化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尽管它规模较小）。

最近文学学者马克·沃纳（Mark Warner，原文有误，实际应该是Michael Warner）和历史学家阿德里安·约翰斯（Adrian Johns）对爱森斯坦的解释提出了更猛烈的批评。沃纳在他的《共和国的信件》（*The Letters of the Republic*）（1992）一书中主张，不应当把印刷技术看成是处于文化或历史之外的东西。它显然并不具备独特的“逻辑”或“本性”，爱森斯坦所认定的“内在”特征几乎不具备普遍性，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如果说确实出现了这些特征，那么，它们无一不是复杂的谈判和偶然历史进程的产物，并非印刷技术的自然属性。“没有什么技术客观事实规定了什么是印刷术，”沃纳写道。接着，他以某种奥克肖特式的风格补充说，“当我们谈到印刷术时，我们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意思，但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传统。我们有一套事关宗旨和概念的历史词汇表，它为印刷术赋予了身份，有意义地为我们区分了用铅字印的书和用笔写的书。”

因此，人们必须首先接受技术与社会/文化的截然对立，进而假设是前者塑造后者，而非后者塑造前者，爱森斯坦的解释才站得住脚。就印刷机对社会造成的历史影响，爱森斯坦所采用的调查方式，自动排除了社会和文化如何在政治上、物质上和象征意义上造就印刷机的问题。对爱森斯坦来说，“印刷文化”的确发生了，它一出现时就包装在铁盒子里，它的“内在”特性完好无损，随时能够立即部署。正如沃纳所见，通过给予印刷文化如此神秘

的角色（要记住，毕竟她是一个麦克卢汉门徒），爱森斯坦得不偿失。“政治活动和人类机构在这个故事里消失了……文化受到了来自于其自身以外的冲击。宗教、科学、资本主义、共和主义之类的一一出现，是因为它们受到印刷术的影响，而不是因为它们一开始就进入了印刷的构造和意义。”

著有《书的本性》（*The Nature of the Book*）（2000）的约翰斯就更尖刻了。“（爱森斯坦的）印刷完全是‘自成一格’……跳出了常规历史分析的范围。它的‘文化’相应地也不受地点和时间影响。由于印刷文本具有一些重要特征，固定性是最佳候选，不管搬到哪儿，这些特征始终与之相伴，所以，印刷文本注定存在。可爱森斯坦却不曾分析这项属性起源何处。”所以，约翰斯写道，每当爱森斯坦的分析或历史本身出现空白，她就用印刷文化或它的某一种特征来填补。由此，爱森斯坦的方法“只确认了最明显的固定性实例。如果固定性没有表现为重大失败，它就考虑实例。即使在成功的例子里，它往往也会忽视取得成功所依靠的劳动力，相反，它认为这些劳动力取得的成果，是文字内在的力量。结果读者就落了个被遗忘的命运：他们的知识和技能，被重新归功到了印刷页面上。粗暴一点说……爱森斯坦的印刷文化根本不存在。”

这不只是书史学家之间的晦涩辩论。此刻最要紧的是印刷机（和更大范围的技术）的历史研究应该如何来做。爱森斯坦的方式是把技术及其特质视为固定不变、无关历史、毫无疑问的。她靠着摆布这么一个贫瘠的技术概念，探究其文化、社会和历史影响。尼古拉斯·卡尔书写“网络”，并将其与“书籍”进行对比的时候，也采用的是同一套麦克卢汉式方法。沃纳和约翰斯提出了某种相当不一样的东西：不再把技术放在社会之外，我们其实可以研究技术与社会如何相互塑造，对任何局部变量进行解释，跟踪不同社区采用不同技术所存在的微妙意义变化，探索这些差别是怎样出现的，解释这些社区

是如何着手开发这些技术的，等等。这不是要否认印刷机的重要性，而是以一个不同的、更加信息化的和增进知识的方式来重新展现这段历史。它尝试超越媒介中心主义（不管是爱森斯坦的书籍中心主义还是舍基的互联网中心主义），以求获得更加丰富、更加准确的书史观和互联网史观。

因此，就当前辩论而言，讨论的重点应当是：舍基受爱森斯坦启发对“互联网”所做的解释（这实际上是对“互联网文化”的所谓社会效应的解释，而非对它下面的物理基础结构的解释）是不是描述和认可这些技术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最佳方式。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足够努力，我们可能会发现另一种方式来谈论这些技术，提供更多细微差别，不遮掩重要的局部差异。

当然，舍基和贾维斯才不认为自己对“互联网”的解释表面上是历史主义，实际却有可能站在糟糕的历史基础上呢。他们都把批评他们的人称为悲观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倔驴，是一味反对变化的人。这是互联网中心主义回避对批评的最典型方式。舍基写道，“就印刷机而言，没有什么思维连贯的保守主义立场。当前文化的大多数捍卫者甚至不想解释为什么印刷机毁灭了抄写员行业是件好事，而互联网对报业构成威胁就不是好事，或者为什么新的发明者和新式试验的激增在1508年就很好而在2008年就很糟。它只是简单假定过去的革命很好而未来的革命很糟。”当然，就印刷机而言是没有什么连贯的保守主义立场（这同样是一个反文化的立场），但是正如爱森斯坦的众多批评者所指出的，有许多替代方式可以用来探讨印刷机及其影响（约翰斯对爱森斯坦的许多回答标题都是“如何确认一场革命”）。如果人们不把爱森斯坦所描述的事件看作是一场“革命”，那么他们或许也不太愿意在这些事件与今日正在发生的事件之间画上虚假的等号。

贾维斯甚至更进一步，他把这场关于如何评价技术的重要辩论说成是非黑即白的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的战斗，当然是在暗示任何怀疑爱森斯

坦这类解释可能会限制辩论的人都是脱离现代世界的人。这是他对阿德里安·约翰斯对爱森斯坦的质问所做的总结:“(约翰斯)指责……爱森斯坦……对印刷机评价过高……我为这种倔驴式的单方辩论的根源感到迷惑。为什么他们如此反对得到信任的工具呢?他们真的会转而反对机器是变化的动因、把权力从在职者手里转到暴徒手里吗?我干嘛要在乎他们的抱怨?我相信这些工具一直被革命者使用,一定有自己的角色。更有意思的是问问这个角色是什么,它的影响是怎样的。”贾维斯对约翰斯对爱森斯坦的批评的根本误解不过是问题的一部分。贾维斯-爱森斯坦世界观认为工具是固定不变的。它们置身于文化和历史之外,这种方式带有很多贾维斯对“互联网”本身进行论述时的特点。贾维斯的当前革命者总是信仰“互联网”,但是他们所发现的“互联网”没有疑问,一成不变,它的民主性像刻在石头上一样(有如金科玉律)。

在把基于方法论的重大批判称为技术恐惧症的同时,贾维斯和舍基正不遗余力地隐瞒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关“互联网”的完全不同的辩论(它不会假设一场革命,也不会用讨巧的时髦口号来抄近路)既是可能的也是亟需的。他们的“互联网”概念过于宽泛、一成不变,与局部环境相比过于抽象。这就是互联网的辩论和印刷机的辩论重叠的地方。但是在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关键区别:前一种辩论的解决方式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大得多的影响。其分枝的延伸将远远超出一直在跟爱森斯坦苦苦缠斗的历史学家社群。进一步说,我们选择如何分析展开中的互联网讨论又将决定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如何对它进行研究。过去几十年为纠正爱森斯坦的错误已经浪费了太多笔墨,我们不希望历史学家在“互联网”问题上再走同样一段弯路。

循环之再循环

如果爱森斯坦的印刷文化是拙劣历史被用来为当前的“互联网”辩论设定框架的一个例子，思想交流偶尔也会走向另一个方向，比如当我们的互联网评论家们一开始就带着当前的焦虑穿越回到历史，想搞清楚有多少与“互联网”相关的现代辩论自身不过是一个有关网络、信息和科技的更加宏大更加长久的辩论的一个子集。他们的使命本身没有什么错，有人甚至认为这正是历史所希望的，但是大多数这样的解释都很奇怪，因为在他们讲述某个有关“互联网”的故事的探索中，他们曲解了历史，把历史糟蹋得不像样子，给我们留下一个对历史的贫瘠解读和一个糊里糊涂的未来战略。

这应当足以让我们停下来深思，如果互联网中心主义（不管在坏历史里它的起源是什么）可能在推动我们把前互联网时期的历史改写为只有一个简单目标：建立一个条理清晰的目的论解释，比如说其他技术是怎样为“互联网”铺好路的，它们自身的管理为何没有接受“互联网价值”以至于延缓了“万网之网”的到来。这是最纯粹的互联网中心主义观念：它暗示我们关于过去哪种问题可以问和应当问。作为一种观念，它无需说出答案，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需要发现什么来完成“互联网”本身的宏大故事。

互联网中心主义对历史干的一件恶心事在吴修铭（Tim Wu，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备受赞誉的《总开关》（*The Master Switch*）一书中可以找到，它所采用的方式不仅糟蹋了内容，而且还给了早已被遗忘的晦涩方法论第二次生命。吴修铭，创造“网络中立”一词的法律学者，是让有关“互联网”的辩论逐渐展开的一位主要贡献者，在《总开关》里他试图探索其他技术（电报、电话、无线电、电影、电视）的历史，并阐明这些技术能就我们的当前困境告诉我们些什么。这听起来是个高尚的使命，但是任何接受这个任务

的人都应当清楚，以历史自己的方式与历史形成默契是极其困难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研究过去来阐明现在有可能变成一个“钓鱼式调查”（fishing expedition，即为搜罗证据而进行的调查），过去完全成了一个巨大的有毒鱼缸，存有足够的花边消息和奇人异事，用来支撑对几乎任何当前趋势或现象的解释。

吴在《总开关》里的主张是这样的：信息产业有一些奇怪之处，它往往被“信息皇帝”所支配（在理性上也备受摧残），史蒂夫·乔布斯就是这么个竭力追求绝对控制的主。这等皇帝的独裁统治及其信息帝国的一些结构性特征常常导致吴所谓的“循环”，这是曾经开放创新的产业不可避免的终点。它的发生或者是因为信息皇帝是聪明却冷酷的商人，又或者是因为他们收买政府为他们提供竞争保护。这就是好莱坞电影体系形成的方式和过程，它对拍什么电影和审查什么问题施加了前所未有的控制，作为一个封闭的电话网络，AT&T禁止其用户接入他们自己的设备，因而大大推迟了“互联网”的出现，而近来，苹果公司的app应用的世界，一个类似于国家政治局的决策控制机构就位于库比蒂诺某处，审查并批准它喜欢的app应用上架，把它不喜欢的删除下架。

吴为解决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阻止信息行业的企业进行垂直整合，也就是说，禁止生产信息的企业拥有或创建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反之亦然。但是政府的参与将到此为止：吴的历史解读暗示，政府参与通常是对信息产业发展不利的。他的理想是把政府和大企业都拦在信息产业之外，根据他的观点，这就是所有成功的信息产业发展起来的原因，包括“互联网”，而未来也应该是这个样子。阿门。

这可能看起来像一个有吸引力的绝妙观点，但实际上它不过是试图拿出又一个“涵盖一切的理论”。在这个例子中，“一切”要用一套固定不变的事

情（在吴的案例里是指关于开放和创新的事情）来解释，而它们已经渐渐主宰了我们对“互联网”的思考。首先，吴刻意撇开了没有出现居支配地位的这些信息产业（比如图书出版）。“循环”没有涵盖那里，它太拥挤了。令人感兴趣的是，有这么一个皇帝可能很快就要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杰夫·贝佐斯，他掌管着一个小创业企业叫做亚马逊，而吴自己似乎对亚马逊和它带来的价格效能一见倾心。第二，由于他的历史局限于美国（如果“循环”真的存在，凭什么它只在美国出现？），他漏掉了许多信息皇帝干得相当不错的外国案例。

难道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戴高乐时期法国极有影响力的文化部长和新浪潮电影教父，尽管披着一件公共服务的外衣，不就是这么一个皇帝吗？放大观察马尔罗的职业生涯将会显示，20世纪60年代法国电影业的巨大成功，是政府急欲资助陷入危机的小成本电影和支持青年文化之家（maisons de la culture）（此类电影可以在这里放映）的直接结果。这不是一个市场主导的创新故事，正好相反。而信息皇帝不一定被看作是邪恶的（也许他们根本不必让人看见；在吴的手中，互联网中心主义奇迹般复活了名声扫地的“伟人历史”的历史叙事风格。）同样，尽管极客对它们有很多的阴谋论的怀疑，然而政府是可以成为信息产业有影响的善意参与者的。

你不一定要到法国旅行来眼见为实。实际上，对美国的信息帝国历史做一个更加全面的观察也能揭示同样的信息。正如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在《美国展望》（*American Prospect*）中对《总开关》发表的辛辣评论所示，即便是对邮局历史（一个由政府创办的鼓励自由表达的通信网络）的匆匆一瞥也足以对吴修铭理论的多个地方进行反驳。邮局曾被认为是一个垄断行业，就其使命而言它一直干得非常成功。根据斯塔尔的观点，“政府没有邀请作为对手的邮政公司参与竞争，事实上，它施行的是垄断。然而由于议会采取不管立

场如何都对报纸发行提供补贴和在全国范围扩展邮政服务的政策，这种垄断有利于言论自由。”而在“互联网”，没人喜欢垄断企业，因为它们带有微软和IBM的味道，因此电信史这一章干脆被扔到了一边。互联网中心主义不容许任何竞争性假设。

正如斯塔尔所指出的，如果美国信奉的是吴修铭所谓“政府唯一正确的角色是私人权力的制动刹车，而绝非其援手，”的格言，那它就可能没法创建邮局或推动报业的迅速发展，而美国的民主政治也就会跟着遭殃了。拿最近来说，美国也差点儿没有发展出互联网或公共广播，两者都需要大规模公共投资。如此强烈的反政府情绪（这总是创新身上的寄生虫）是极客心态的一个共同特征，它对许多极客对政治的厌恶感负有部分责任。正如斯塔尔所说，“政府政策，在吴扭曲的叙述中，通常是一个规制俘获（regulatory capture）记录和美国人感到羞耻的怯懦错误。即便如此，奇怪的是，美国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通信行业的领导者，这部分是缘于政府所扮演的创造性角色。”这真是太神奇了，技术网站《信息世界》（*InfoWorld*）最近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就是“为什么政客们绝不应该对技术立法？”如果极客们是从吴那里了解了他们的历史，这种情绪就很自然了。

从方法论上看，吴对待信息产业的方式与爱森斯坦对待印刷文化的方式非常接近：他起初只是把他认为“互联网”所具有的特性投射回过去，假设他所研究的这个行业和技术有自己的本性，一套固定不变的特性和习性，然后有选择地对那些支持这些特性的例子大加称赞，而对不支持的则丢在一边。所以吴开始于一个直觉或预感，即“互联网”的开放性正受到威胁，然后穿越历史，试图找到某种趋势可以说明所有信息产业都曾体验过类似的压力，然后又回到现在宣布，历史表明“互联网”的开放性的确面临着威胁。

这是他开启自己的知识之旅的唯一前提，而最终这无关紧要，因为这样

的历史有着深深的激进主义情结。他的目标不是理解技术史，而是找到足够的历史证据从而（就像在乔纳森·奇特林的案例一样）让“互联网”获得永生。这种互联网中心主义自身会很糟，但它同时正给技术和传媒的历史施加着非常不健康的影响，“互联网”之前为人所知的一切现在都按照它的标准重新检验。由互联网中心主义授意的历史解释实在是糟糕的历史，即便它们在网络中立这样的问题上偶尔也鼓吹采取有效的政策。互联网中心主义让我们看不清现实，这令人担忧，而非庆贺。

所以我们对互联网中心主义的调查描绘了一个相当沮丧的图景。“互联网”这一观念不仅成了对数字技术进行更有见识更深入的辩论的障碍，它还支持了许多致力于善意利用“互联网”经验教训的社会和政治实验。它成了解决方案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为其效率改革运动提供工具、观念和隐喻。互联网中心主义使我们许多人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有些成就是由与数字技术毫无关系的陈腐而相当邪恶的逻辑所驱动的。

互联网中心主义还粉碎了我们对技术监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方式。它使我们错误地相信，除了贬低其重要性，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讨论这些问题。一直以来互联网中心主义对激进主义意志有很大帮助，它重新点燃（偶尔还创造了）极客宗教运动，后者在反对对数字技术进行政府监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从激进主义效能中获得的收益，在分析的清晰度和精准度上丢失了。它的整体视野，它错误的普世论，和它的过分简化主义，使我们无法就数字技术展开更加健康的讨论。

互联网中心主义已经成了某种宗教。要继续前进，正如法国传媒学者菲利普·布雷东（Philippe Breton）所说，我们需要“通信交流‘专门化’”。这种专门化已经是刻不容缓了。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暂时忘记我们关于

“互联网”的一切知识。如今我们在太多事情上随心所欲了，卷起袖子大干一场吧，让技术不仅约束人类的繁荣，还能确保人类的繁荣。接下来的章节把这个世俗化的方法用到了像政治活动和预防犯罪这样的不同环境中，它不仅阐明了当解决方案主义遇上互联网中心主义时会发生什么，而且彻底想清楚了深受解决方案主义者喜爱的技术如何对公民更有成效。

03 开放之痛

“渠道、人、产品甚或知识产权都不再是成功的关键。开放才是。”
——杰夫·贾维斯

“企业与政府的彻底透明不仅是一个决策，更是生活里的一个技术性现实。”
——唐·泰普斯科特

一如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布兰代斯[1]（Louis Brandeis）1913年所讲的名言，阳光可能是最好的消毒剂，但消毒剂，唉，对本就晒伤了的人就几乎没什么用处了。随着更多的个人信息进入到可以轻易读取的数据库（对更多透明、更多阳光和更多消毒的需求不断增长，这就是必然结果），数字化“晒伤”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了，然而，人们对此类风险的意识似乎仍然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尽管互联网中心主义者热衷于设想由互联网实现的透明性能给我们带来更有活力更负责任的公民生活，但这完全不见得是最终定论。一旦我们放弃“互联网”概念，留心构成互联网的具体数字技术，我们就大概会发现：这个现实可不那么稳当。

看看成千上万为8号提案（加州禁止同性婚姻的一项投票提案）捐款的加

1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犹太人，被称为人民的律师。美国进步运动的主要推动人物。

利福尼亚人的窘境吧。诚然，他们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因为对多样性的宽容而获得奖励。但他们利用国家政治体系表达个人政治观点，这就值得赞赏——且不论在反对者眼里，这些人是多么地狭隘。

加州1974年《政治改革法》在美国各地的竞选筹款法规里极具代表性，它规定，捐款超过100美元，受捐人就必须向全世界披露捐款人的姓名、地址和雇主。好吧，可能不是全世界，起码开始不是。20世纪70年代通过这项法案的时候，立法者做梦也不会想到，任何人拿着智能手机就能轻易获取此类信息。从理论上说，信息披露必须“公开”，但实践起来不见得是那么回事：光是要大费周章地到积满灰尘的破烂市政厅档案馆里找到这些表格，就足以决定它们湮没无闻的现实命运。

快进到2008年。有个狂热的计算机大师（其身份至今无人知晓）创建了Eightmaps.com这个网站，让8号提案的捐款人信息能够被公众获取，并显示在Google地图上，还给地址旁边加上附有捐款人姓名和职业的标记。随着这些个人详细信息对外公开，想要确定这些捐款人在哪儿工作并在其同事面前给他们难堪，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这事儿还真的发生在了加州大学一位大学教授身上：他为8号提案捐了100美元。结果，他不仅成了一些愤怒来信的讨伐目标，其中一封信还被抄送给了他的大学同事和主管。

关于Eightmaps.com这类网站的明显问题是，它利用了我们对透明度的崇拜（这种崇拜几乎没得到过事实的检验），可以拿来压制几乎任何一种政治事业（不管这项事业落在自由派-保守派光谱的哪个地方）。别天真地以为只有保守派会碰上这个问题（当然，有些专家就是这么想的）；如今，像Eightmaps.com这样的网站分分钟就能建好（数据和技术基础架构都能免费获取），许多其他重要的社会辩论同样会受到极大影响。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如果你觉得右翼暴徒会通过Eightmap人肉你，就像左翼暴徒用

Eightmap人肉社会保守派那样，你还会向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拉美裔全国委员会或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捐赠吗？”

Eightmaps.com这类网站引发的公民挑战，人们做出了几种回应。一是宣称“互联网”已经一劳永逸地改变了信息的生产、获取和传播方式。由于还没有开发出某种功能强大的“互联网”开关，我们必须接受而非对抗这一新现实。就像杰夫·贾维斯等互联网专家所主张的，我们只应该更新我们的心理期待，学会如何与这种升级版“公开性”共处，期待完全透明带来的披露好处或许能超过它在公民参与方面付出的代价。推崇法律的人可能会更进一步，建议我们好好修补上述规范。就加州一例而言，这可能意味着把需要信息披露的最小捐款数从100美元提高到比如1000美元，甚或彻底取消信息披露规定。

上述回应（也即提高心理期待，改变现有规定）都建立在如下美好愿望（有时甚至被表现成生活的现实）的基础上：这里再一次引用劳伦斯·莱斯格的话，“网络不会消失”。莱斯格并不分解“互联网”，将其不同部分孤立开来，努力理解究竟哪一部分表现出增进民主或压制民主的倾向，而更喜欢把“互联网”当作一个统一整体，某种有逻辑有灵魂的东西，不会顺从于目标明确的政策干预。莱斯格一边沉思透明性提高带来的各种民主挑战，一边写下了“网络不会消失”这句话。他的主张值得给予更为详细的研究，因为它们极好地展示了互联网中心主义怎样蒙蔽了一些原本极为聪明、才华横溢的思想家。

2009年10月，《新共和》周刊发表了莱斯格的争议性文章“反对透明”（Against Transparency）。（莱斯格在他2012年出版的《失落的共和国》（*Republic, Lost*）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扩充。）莱斯格观点的核心是，“互联网”改善了政治信息的获取度，而这并不足以修复政治，甚至可能对它造成破坏，

尤其是如果这种信息一旦遭到误解，就会转换成无数愤世嫉俗的偏执性叙事，而后者早就是美国公众生活里的永恒存在了。

莱斯格认为，过去几十年的信息爆炸大多是不协调的。“公民极客”大军扫描了政府的文档，创建数据库来储存，把捐款人和政客之间的关系用可视化的方式展现出来，还练就了不少其他有技术含量的揭丑本事。根据莱斯格的观点，这些极客举措带来的那些推论（即X公司给Y参议员捐款，后者可能在Z问题上为之说话）可能失之于过分简单，是错误的。拜数字化所赐，越来越多的事实和花边消息随处可得，但它们本身几乎没什么意义；它们需要得到诠释。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可能有绝对把握地认定，Y参议员在Z问题上的投票真的就是X公司捐款的结果。仅仅公布捐款信息并暗示这可以解释投票结果，只会让选民更加愤世嫉俗、怀疑一切，因为他们所看到的花边消息可能正好与民众对政治腐败的既有成见不谋而合。

这一切听起来很真切，此外，信息有社会意义上的生命，它赖以传播并进行阐释的政治环境也事关重要——这些，莱斯格都说得很对。信息公开并不发生在政治真空中，只有当透明方案带来了出人意料的讽刺性后果，更多的关注度才是件好事。但在讨论解决所论问题的时候，莱斯格跑偏了，也暴露他的互联网中心主义思想（这是互联网中心主义与解决方案主义纠缠在一起产生的病理学症状的又一证据）。按照莱斯格的观点，信息透明给政治进程造成的问题，类似于文件共享之于音乐产业，或Craigslist[2]之于报纸分类广告所造成的挑战。莱斯格叙述的是一个有关权力与控制的精彩故事，而所有的素材，因为都跟“互联网”有关，都成了这套叙事的一部分。他是这样描述的：

---

2 Craigslist 是由创始人 Craig Newmark 于 1995 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湾区地带创立的一个网上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

伴随透明而来的这些麻烦事具有一种模式，凡是关注过互联网加诸我们的灾祸（或福祉，取决于你的看法）的人，对此都应该很熟悉。由此而来的反应也是一样。模式似曾相识。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控制，而从控制受益的人不顾一切地想恢复控制。恢复看上去是否有理，取决于你的立场。但不管你的立场如何，恢复的企图注定失败。不管下多大力气花多大功夫，只要有“互联网”在，控制就是徒劳的。

在莱斯格看来，“互联网”就像某种自然力量（或许就像飓风），把各种“灾祸”“强加”到我们身上。我们不应抗拒它，只能减少我们的损失。因此音乐产业原本就不该打压Napster，在莱斯格看来这是反互联网的，而报纸行业不该抱怨Craigslist或Google新闻，也不该出于相同的原因，把新闻故事藏在付费墙后面。正好相反，音乐产业或许该靠征收固定的文化消费税来拯救，而报纸应当改成非营利机构。为什么莱斯格会认为这些解决方案不错呢？哦，那是因为它们具有“不折不扣接受互联网原本架构的突出美德，并想方设法根据这种架构，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产品。”正是在此背景下，莱斯格这句“网络……不会消失”的语录才应运而生。然而，仔细研究这句语录，我们便知道，莱斯格的互联网中心主义烙印，能够轻易地蜕变成绝望的技术失败主义：“但是网络不会消失。我们不打算杀死‘地下网络’（微软在一篇论述点对点对等技术必然延续的空想式论文中这么称呼它）。我们不打算对获取新闻信息或免费床垫广告进行监管。我们不打算回到二十世纪。”

在由透明性所引发的挑战背景下，莱斯格主张最好是对法律进行修补，采用公开募资竞选的方式，以免公民产生“政客可能被收买”的想法。为此，让莱斯格选择法律而不是技术的解决方案的原因就特别重要：网络是神圣而

永久的，所以对其节点的任何修补都是过时的。然而莱斯格的文章在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他所描述的互联网上显出一丝不真诚（或许莱斯格自己在描述“互联网”时爱用耸人听闻的语句并非偶然）。当莱斯格论述承认“互联网架构”的必要性时，人们可能会受其引导，以为他实际上说的是物理基础架构，毕竟这是“架构”通常的意思。但是“互联网”的物理基础架构没有一处规定了《纽约时报》是否应该运行付费墙，或者Google新闻是否应该为聚合报纸的新闻故事而向其支付费用。这些可能是愚蠢的提议，即便付费墙在《纽约时报》似乎运转良好（尽管互联网大师们对此从不看好）。但是它们的所谓“愚蠢”并非来自其与“互联网架构”的固有对立。以为“互联网”像圣经和古兰经一样，对如何监管新闻、音乐获取或“免费床垫广告”信息等问题有着简单的答案，不啻于相信互联网的运行法则就跟重力法则一样可靠。

讽刺的是，这个立场是大学教师莱斯格在其职业生涯里所竭力反对的。但激进主义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莱斯格接受这样一个立场就一点问题没有，只要它符合自己激进主义议程的要求。就个人而言，我跟莱斯格的议程有许多共同的目标，对他的方法表示批评我丝毫不感到愉快，但我的确认为它们在理性上无法成立，可能会误导技术上的门外汉。互联网中心主义和所有的宗教一样，可能自有益处，但在解决复杂的问题方面（不管这些问题是关于新闻业的未来，还是透明性的副作用），却是极其糟糕的向导。

是时候放弃互联网中心主义的主要宗旨了，别再把物理网络与贯穿其中的观念意识混为一谈。既然我们知道这些观念意识是有条件的、脆弱的，可能还受到硅谷巨大财富的影响，我们就不应当再把这些观念意识说成是物理网络不可避免的自然产物。与其说对每一个数字化挑战都要通过衡量其对“网络”需求的响应程度来作出回应，我们更需要学会如何从构成“互联网”的具体技术和平台方面，参与严格以实证为基础的讨论。如果在某些情况下，

这意味着闯入透明性和公开性的禁区，那就这样吧。在“互联网”观念绑架了我们的想象力以前，我们一直做着这样的权衡。没有一个严肃的哲学家会宣称透明性或公开性是勿庸置疑的美德或人类社会应当追求的绝对价值。没有一个完美的理由能解释为什么突然之间我们就应该接受“互联网”的总体哲学，并欣然接受其关联价值的至高无上，仅仅是因为它的拉拉队长们相信“互联网不会消失。”数字技术造就了社会和政治困境，但却并未准备现成的答案，即便“互联网”让我们相信不是那么回事。

坏的归数据库，好的归民主？

2010年阿根廷南部小镇布兰卡港的年轻程序员曼纽埃尔·阿里斯塔朗（Manuel Aristarán）采用免费开源工具构建了一个叫做Gasto Público Bahiense的创新网站，大致可翻译为“布兰卡港公共开支”。阿里斯塔朗的网站在简洁性上具有颠覆性效果：它直接提取市政当局网站发布的开支数据，并用简单明了的可视化方式呈现出来，从而使辨识开支模式成为可能。最终，公民能够调查有多少钱给了具体的承包商，或者判断教育还是交通运输在市政资源中吞掉了更多份额。

这个国家方兴未艾的“开放政府数据”运动有很好的理由来庆贺。并不是说这种数据以前无法获取（可以获取），但要获得它，用户必须对每个项目都逐一执行搜索。严格来说这也不是什么艰苦的工作，但是对想看宏观图景的人来说这太乏味了，结果就没有多少市民愿意费这个功夫。

事实证明，庆贺很短命：阿里斯塔朗的网站启动一年后，市政府重新设计了官方网站。通常来说这会是个好消息，但这次重新设计比以往设计闪亮按钮和炫目横幅广告更加雄心勃勃。市政府改进了对数据库的访问，现在，

凡是想要读取数据的人必须证明他们是真正的人，方式是输入一个验证码（CAPTCHA）（你打开新邮件账号或发表博客评论时或许已经遇到过验证码，通常，它要求你输入不太容易辨认、计算机脚本难于读取的文字）。因此，尽管任何人都仍然能读取数据甚至从市政府网站上复制它，阿里斯塔朗用来把数据输入“布兰卡港公共开支”的计算机脚本却再也帮不上忙了。

极客们自然火冒三丈。戴维·萨萨基，一位开放政府活动人士，在自己的博客上记录了这件事，把它称作“开放政府在阿根廷的一次大倒退”。碰巧其他几个阿根廷活动家正考虑采用阿里斯塔朗的软件来为自己所在的城市建立类似网站，但最终他们决定放弃，因为这个系统过于依赖于市政当局的一时兴致，活动家们与其跟官方敌对，不如与官方合作。（回头想想，这其实是个非常明智的举动）。但是，回到萨萨基的批评，就算这个重新设计真的是“开放政府的一次大倒退”，又有什么要紧呢？难道说开放政府的倒退也就意味着阿根廷政治生活或民主的倒退吗？市政当局不“接受互联网自身架构”就犯了什么死罪吗（至少在劳伦斯·莱斯格的普世论看来是这样）？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都指向一声不绝于耳的回响：是的。更开放的政府对政治来说更好，在用户和政府门户网站之间人为地设置障碍，是非常反互联网反网络的举动。可在过早下结论之前，我们不要忘记，布兰卡港这个例子只不过是执行“自下而上的开放性”的众多实例之一，它的出现仅仅是因为主角是一个没有政治议程的高尚极客。

但让我们来想象一个更加险恶的场景。假设阿里斯塔朗精心设计的图表，连同它们所依赖的汇总统计数据，有可能给某个民粹主义、擅长操纵媒体的运动绑架，后者致力于削减学校经费，把所有的钱转到比如附近的朗姆酒酿造厂或干脆花到某个年度庆祝上，而政府知道自己太软弱，难以抵抗这种压力。在这样的情形下（与25年前拉丁美洲喧嚣纷乱的政治文化几乎没什么不

同），“开放政府”的议程就得让位于维护民主政府的议程，哪怕民主政府里一团混乱，充斥着受人憎恶的妥协和逃避。低效率的民主总好过运转良好的独裁。如果上述条件站得住脚，允许用户看到数字而拒绝计算机脚本似乎是一个说得过去的折衷。

这并不是说，布兰卡港正濒临政变的边缘（不管有没有阿里斯塔朗的网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但这也不意味着政变威胁是对市政府网站的访问设置进行修补的唯一合法借口。如果当局真的反应过火，对其反应进行批评的唯一合法方式，就是从阿根廷地方政治的需求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评估。换句话说，他们的行为是否达到“开放政府”的全球标准和所谓的中立标准，几乎无关紧要。而“开放政府”这个词，在像萨萨基这样的活动家手中，则弥漫着互联网中心主义，即便它从未提到“互联网”这个词。

布兰卡港市政府的行动是否对莱斯格的“永不消失的网络”构成威胁，这就更没什么关系了。当然，解决方案是技术性的，如果严格遵循莱斯格的逻辑，它的确有悖于“网络”及其开放性与透明性的精神。但那又怎么样？为什么这就是个坏主意，尤其是在它对网络本身的影响似乎如此渺小的时候？为什么一个非技术解决方案（莱斯格在回应报纸危机或音乐盗版时所提出的那种）反而更可取？

人们可以设想，阿根廷政府当局原本可以调整法律（或调整法律解释），完全放弃公布开支数据。然而对民众而言，这样的结果之于民主，肯定比以仅供人类阅读的格式公布这些数据更加糟糕。当然，什么也不做，放手让阿里斯塔朗继续维持他的网站，可能也是个适当回应，但是这个结论必须等到对当地政治做了大量实证分析之后才能得出，而不能基于所议解决方案与“互联网灵魂”的匹配程度来简单假设。互联网灵魂是过分热情的法律激进主义者杜撰的精彩神话，我们越早忘了它越好。不管它对激进主义者的目标

有什么作用，许多此类运动的目标一点也不值得称道。这套“网络独一无二、相互连接，但它又很脆弱”的神话还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而且，伴随着多种数据平台变得相互连接和容易访问，出现了大量切实的问题，它还束缚了我们给予回应的双手。

摆脱双击

从这个单一网络的神话中解放出来，我们就可以重新找回许多本以为已经败给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政策选择。运气好的话，我们甚至可以找到办法应对由Eightmaps.com这类网站引发的挑战，又无需牺牲过去几十年确然出现的真正实现透明的机会。黛博拉·约翰逊（Deborah Johnson），普利希拉·里根（Priscilla Regan），还有肯特·韦兰德（Kent Wayland），分别是伦理学家、隐私学者和人类学家，在2011年一篇令人着迷的文章“竞选信息披露，隐私与透明性”里，就如何做到这一点提出了一些精彩的跨学科初步想法。从标题你就可以大概猜到，这篇文章调查了在网上公开各种竞选信息披露记录（这与Eightmaps.com开发者所采集的那些信息非常相似）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作者的核心见解是，作为读取这类格式（从在线数据库到搜索引擎）中间载体的新电子系统，并不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毫无问题的高可预测性的信息传播者。这些平台实际上对它们所传递的信息进行着转换和修改，这是麦克卢汉名言“媒介即信息”真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值得警醒的少数几例之一，因为它迫使我们面对让我们得到想要信息的信息基础结构。对这个基础结构有一种浅薄的态度，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称之为“双击”，它把交流和知识的产生当作相对不复杂和无摩擦的事情，无需数据库和搜索引

擎这样的中间媒介就可以发生。作为普通的计算机用户，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观念，即信息只需轻轻一点就可以立刻出现在浏览器中；而它怎么从原始资料到这儿的（我们的电子邮件存在哪家著名云存储服务上？），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往往比我们所点击的实际内容（不管是什么）要有趣得多。但是，唉，我们几乎不会去费心琢磨这种小事。

出于类似的心态，居中协调我们访问竞选数据的信息系统并不像透明的玻璃房子，更像某种镜屋。“它们不允许其他人看到里边发生了什么…而是把有关人和机构的数据放到一所六壁全是镜子的房子里，身处其中的观察者至多可以部分地‘看到’（这是经过中间处理的一瞥）房间里那些被观察者在做什么。”因此我们的新基础结构至少以四种方式影响着穿行其间的信息。其中两种与我们最为相关的就是作者所说的“跳转”（每当为一个目的收集的信息比如镜屋里人的影像，在另一个场合被用于另一个目的时就会发生）和“高亮与遮蔽”，由此，一些披露的信息片段在勾画这个人的名声、隐藏其他更恰当的信息片段时，就承担起计划外的不太相称的角色，这与镜屋里的影像扭曲人体表面样子的方式很相似。

Eightmaps.com就是“跳转”的一个直接例子，竞选信息披露表格的预期设想并不是给义务警员网站提供数据，但“高亮和遮蔽”有点儿难掌握。假设你曾经给一个竞选活动捐过款，这条信息在相关网站也及时做了在线更新。最后，通过“跳转”的方式，这条信息几经辗转来到流行聚合网站比如《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后者有一个竞选捐款栏目。《赫芬顿邮报》在其搜索引擎优化策略上非常聪明，它的标题起得很有技巧，为它在Google上挣到了较高的搜索结果排名，所以对许多查询来说，它的链接往往出现在靠近Google搜索结果最前面的位置。因此任何用Google搜索你名字的人都会看到，《赫芬顿邮报》关于你的迷你页面的链接在Google搜索结果里排名数

一数二的位置，而它除了你的竞选捐款信息外什么也没有。

再看看法律教授杰伊·加德纳（Jay Gardner），他自己就被记录到最近一篇文章里。加德纳给不同的竞选活动都捐过款，《赫芬顿邮报》从联邦竞选委员会（FEC）网站上撷取了这一信息。尽管关于他名字的第一条搜索结果是他供职学院的教职员主页，沿搜索结果第一页往下滚动则通常显示《赫芬顿邮报》的条目。加德纳担心的不是自己反对的候选人会有狂热支持者向他表示愤怒。相反，他担心的是他还能不能好好工作，也就是说，教学。加德纳碰巧教的是宪法，一个承载着政治意义的学科，学生要是觉得任课教授的学问受意识形态驱动，恐怕会对教授嗤之以鼻。“在上这门课时我极力保持意识形态和党派上的中立形象，我相信这增加了我对一大批学生的说服力。”而今，加德纳没法再选择保持中立了，因为他的政治认同显示在搜索结果的第一页。

然而假设加德纳一辈子就捐过一次钱而且很快就忘了这件事，他远离政治，连朋友们都称他“不问政治”。可Google和《赫芬顿邮报》之间存在紧密（而又非正式的）关系，任何搜索他名字的人都会上当相信与事实大相径庭的信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会被不成比例地夸大并“高亮”显示，而他个性中其他更贴切的部分则被“遮蔽”。

这个“跳转”与“高亮”新分类法是如何帮助我们应对高度网络化和唾手可得的信息平台的一些意外结果的呢？与莱斯格对互联网中心主义宗教式的狂热不同，约翰逊、里根和韦兰德认为，只要对技术基础结构稍作调整，就能带来不同的结果。发到网上的竞选筹资信息披露记录可以是“只读的”，这样一来，尽管可以在FEC网站上读取，但是这些记录想在其他地方下载或复制就不容易了。当然，这与阿根廷的官僚们所做的非常相似，这类措施或许能带回一定程度的现实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如今已面临威胁）。

阻止“跳转”的另一个办法是使公布的数据更难被发现，或者至少尝试

让搜索信息的人最终回到FEC网站上，毕竟，FEC网站不像商业发行机构，没有太多的动机遮蔽和放大信息。或者人们可以想办法把数据库字段“绑”在一起，让人没法通过“解绑”方式来高亮和遮蔽信息的特定方面。再或者，难以置信！人们可以探索办法限制由Google助长的《赫芬顿邮报》对人们声誉的影响力（一些法律学者甚至已经提出了激进的步骤，让用户有权对有关自身搜索结果给予回应）。或者人们可以给竞选筹资数据加上到期日，让它在比如竞选五年后自行销毁。如果数据带有“自行销毁”代码，每一次重新发布后都会创建到期日，这恐怕甚至有助于对付像《赫芬顿邮报》这样的第三方网站。

为什么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约翰逊、里根和韦兰德推测这是因为捐款数据的自由流通恰好符合我们对政治领域透明度重要性所做的宽泛理性假设。这听起来很对，但互联网中心主义在隐私与监管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可能是一个更加恰当的因素。我们迟钝，不仅因为我们迷信透明性，还是我们迷信“互联网”的直接结果。讽刺的是，除了支持“解决方案主义”的丑恶观念，对往往并不存在的问题进行无休止的探究，互联网中心主义也开始妨碍我们为确实存在的问题思考有效的技术解决方案。评价解决方案的时候，不以其优点为基础，而以它们与自由、开放和透明的“网络”及其“架构”的默契程度为出发点。这是新纪元主义更加黑暗的另一面：一方面，由于我们认为自己正生活在独一无二的非凡时代，任何与互联网不兼容的东西都应该被清除干净，解决方案由此便应运而生；同时，我们还认为，不论“互联网”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它们都应当以不损及“互联网”的方式来解决。

从晒伤到太阳能

两种方法，确切地说也就是在心甘情愿卷起袖子修补“互联网”和莱斯格的技术失败主义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的确，莱斯格试图解决一个多少有些不同的问题，他实际上的靶子是政治文化中的犬儒主义，而非对隐私的逐渐侵蚀，或Eightmaps.com这类网站对公众生活的可怕影响。莱斯格甚至没有把“跳转”（信息从源头到第三方的轻松迁移）标记为需要担心的东西。但是他的许多其他担忧，尤其是公民从他们在网上发现的政治信息中得出错误推论的可能性，的确与那些有关高亮和遮蔽的担忧相重合，虽说他实际上从未用过那些词。

哪怕美国选择采用公开筹资竞选（莱斯格偏爱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也不会神奇消失，因为数字镜屋的构成远远不只是竞选数据。比如说，法庭记录的数字化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如果不是更可怕的）挑战。如果你同意在一件轻度争议性案子里充当证人，你恐怕料不到，要是有人搜索你的名字，这项信息也会出现在google搜索结果非常靠前的位置，这可是承蒙《赫芬顿邮报》搜索引擎优化算法的好意哦。

这个问题引起了来自许多学者的极大关注和担忧。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授彼得·维恩（Peter Winn）就警告说，这类信息在网上随处可见，可能导致司法程序的各方不太愿意合作。“一旦参与者开始因为向法庭披露他们的敏感信息而感到恼怒或受伤，一旦信息被用于其他目的而非解决争执时，诉讼当事人、证人、还有陪审员，都会越来越不愿第一时间说出真相，”他写道。另一位网络法大师乔尔·雷登伯格[3]（Joel Reidenberg）指出，高亮和遮蔽

3 法学教授，纽约福特汉姆大学 (Fordham University) 法律和信息政策中心 (Center on Law andInformation Policy) 主任。

的问题在下面这个背景下也是应努力克服的："如果个人信息是从法庭档案里摘录下来并通过数据挖掘而遭利用，或与得自数据掮客、其他公共数据库或其他公开信息的其他信息相结合，原有背景就会丢失，数据挖掘将会助长对个人行为进行典型刻画，导致刻板成见。"雷登伯格警告说："实际上，把个人全部信息都变得这么透明，公众并不真正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发生了什么变化，更讽刺的是，个人描述信息的准确性，因会因脱离背景语境的汇编和侧写而打折扣。"

2012年《马里兰州法律评论》的一项研究考察了法律体系所牵涉的每一个人的隐私利益和权利跟提供更便利的法庭记录给公众调阅这一社会利益如何达成平衡的问题。实际上，技术对实现这个目标可以有极大的帮助，但前提是信息系统的设计师愿意根据各方人等所获权限，给每一方开放选择性访问权。因此，数据可能仍能在线访问，但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一切，而是每个人都能看到一部分内容。因此，作者写道，"默许从公众可查阅的记录中编辑所有非当事人名字（包括陪审团成员、证人以及那些无意中牵涉到案子里的那些人）的政策，过去在实践中一直不可能做到，而现在有了合适的技术工具，就成为相当平常的一件事了。"当然，这对互联网的开放性，以及对这个世界上的《赫芬顿邮报》和Google们（更别说"网络"的福祉了）未必是件好事，但是干嘛要用它们自个儿的幸福来决定公共政策的路线方向呢？或者说，就为了不破坏网络的开放性，我们就非得选择实际上会带来更低整体开放性的纯法律解决方案吗（就好比本来会在网上公开的文件，突然又仅限于在实体法庭档案里查阅了）？干嘛要让一些含糊不清、捍卫互联网价值的辩护词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无法专注于平衡真正重要的价值呢？（"平衡"在这里是个不错的词，我们不可能拥有所有的价值。）如果我们只是一点点地尝试，"网络"真的会受到伤害吗？

莱斯格因为宣传四种截然不同的监管模式（技术或代码、法律、市场、规范）而博得大名，而有意思的是，对一些由信息基础结构日益数字化和网络化而引发的棘手问题，他却极不情愿思考怎样用技术去解决。面对近乎所有的社会问题，互联网中心主义似乎都很容易拿出一套失败主义的叙事来：如果某个技术解决方案对文件共享不起作用，那么它就一定对报纸或法庭记录也不起作用。为什么？因为这三者有一个“互联网”的共同视角，按真正的互联网中心主义者的风格来看，一切有“互联网”视角的东西一下子就落入互联网规则和目标的统治了。一切都变得相互关联，一切都是“互联网生态”的一部分——这是控制论（cybernetics）理论家超级热爱的可怕隐喻。最后，凡是要对在线技术运作方式施以干预的做法，哪怕是非常基础的干预，一概不允许。

然后呢，自然就是令人不舒服的真相了：为缓解新发现的开放性所带来的后果而提出的所有技术解决方案，比如把数据置于“只读”模式，给搜索引擎屏蔽掉对索引敏感的数据，加上到期日等等，都像极了娱乐业的那一套，希望硅谷为自己的在线隐私斗争做贡献。对莱斯格这样的倡导者来说，如果他认为这样的技术是应对不断增加的透明性的合理机制，不啻于他认可了好莱坞最喜欢的工具包。此外，在一种情况下接受一些技术解决方案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拒绝它们，这可能会戳穿“互联网”整体划一的观点，而后者往往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就把某些解决方案弃若敝履。

因此，目前所有这些遭到拒绝的技术修补，其效果如何，并没有经过多少实证调研。它们遭到冷落是因为“与互联网的本性相抵触”，违反了莱斯格加在互联网文化身上的“混搭”或“读/写”精神，而莱斯格这种教条主义方式，跟印刷研究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别无二致，后者非要把固定性和标准化跟印刷机文化关联起来。

由此我们便有了“网络不会消失”这样奇怪的声明，仿佛网络真的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事实上，网络不会消失是因为莱斯格花了整整十年发表了成百上千的（甚至成千上万的）演讲来使大家相信“网络”不应当进行修补，并且它诱发混搭的特色应当保留和受到尊重。这在反对好莱坞的要求时非常有效，事实上后者有时真的很过分，但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网络”成了一个巨大的抽象概念，它既包括15岁孩子制作猫咪视频，也包括阿根廷政府市政当局修补它的网站。我们身处智力迷宫，要从中寻找出路，这样的办法可没什么帮助。

人们可能会问，为了让帕洛阿尔托的一个15岁少年能混剪猫咪视频而无需坐牢，布兰卡港的地方政治就应当有所牺牲吗？从实质上看，莱斯格这样的互联网中心主义者就是这么要求的。我绝不愿看到15岁的孩子因为盗版而锒铛入狱了，但我也认为，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更具说服力的方式来进行论证，它既不需要互联网中心主义那一套过分简化的事实，也不会因为会与互联网的本性相抵触，就缩手缩脚，不敢对我们创造出来的技术修修补补。不敢修复我们所创建的技术基础设施，不敢去关心它，这等于向一种更糟糕的冲动屈服：比技术恐惧症屏蔽技术的愿望更糟糕，也比互联网中心主义者保持“互联网”永远不变的愿望更糟糕。

要是晒伤了，我们的应对办法不是放弃日光浴。但我们不认为晒伤必不可免，于是就大造声势要求立法确保实现更好、更快、更廉价的晒伤疗法。相反，我们对技术进行修补：买防晒霜，撑一把伞，然后继续生活。虽然布兰代斯说过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尽管阳光是一种大有可为的绿色能源，我们大多数人也并未陷入“太阳中心主义”的奇怪意识形态，认为技术干预违背法条，只因它们帮助我们操纵了太阳光的效能，在有些场合利用它而在其他场合阻挡它。我们可以同时拥有太阳能电池和太阳眼镜，防晒霜和窗帘，

或者温室和空调：说它们谁与“阳光的架构”相抵触，违背了阳光启蒙和消毒的精神，那就太荒谬了。当然，你可以反驳说，我们能摧毁“互联网”，气候变化暂且不谈，但我们不可能“摧毁”太阳，因此我们应当谨慎对待“互联网”，把它提升到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我认为错觉的根源就在这里：“互联网”至高至上，但阿根廷一个网站上微不足道的调整就能摧毁它，这样的“互联网”不值得保护；那就是个神话，而且还是个相当有破坏力的神话。

透明性之伤

很难说哪一种情况更糟：是莱斯格对“互联网”的无条件屈服，还是他极客同伴们的盲目热情，后者给“互联网”加上了太多东西，接受最极端的解决方案主义心态，相信它的到来给了他们权利（或许甚至是责任）在各行各业推广透明性，一刻不停地调查透明性征途中更加隐秘、少有人探索的那一面。在他们的世界里，透明性只传递（信息），绝不可能带走什么东西。

英国透明性理论家戴维·赫尔德[4]（David Heald）对透明性进行了有用的区分：一种透明性是内在的价值，透明本身就是目标；一种透明性则只有工具性价值，是达成某种更重要目标（比如责任）的手段。由此，赫尔德写道，“‘正确’的透明性受到重视，因为人们相信它们有助于形成比如说有效的、负责任的合法政府，推进社会公平。”这意味着，也存在‘错误’的透明性，它可能带来民粹主义、妨碍审议、增加歧视。弗拉基米尔·普京下令在俄罗斯全国各地投票站安装网络摄像头的时候，援引了一大套有关透明性的堂皇说辞，可人们恐怕很难相信他此举言行合一，而不是假装俄罗斯选举比其西

4 英国设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金融管理教授。

方批评者的选举更民主和透明，好合法化自己对总统职位的恋栈不休。（当然，这里的花招在于想办法操纵摄像头下的选举，对俄罗斯的官僚们来说这算不上一个多么有挑战性的任务。）

在德国，海盗党是刚刚登上这个国家政治舞台的新面孔，它是靠一个互联网中心主义平台来运作的。海盗党受到其他党派的猛烈抨击，因为它强烈要求公布“元老会议”（掌管联邦议会内部事务的高级别审议机构）的内部审议。这当然是符合透明性利益、并视透明性为内在价值的举动，但它对改善议会内部审议质量又有何用？来自其他机构的证据并不支持海盗党的观点。1993年，主要负责设置美国货币政策的美联储系统下属的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FOMC）屈服于国会压力，开始在委员会投票前公开审议记录（在那之前，FOMC只公开委员会成员的个人投票和会议纪要备忘录）。这是透明性的胜利？也许吧。但是新规定似乎也对讨论的质量造成了重大影响。2008年一项研究对比了新透明性规定生效前后委员表达异议的程度，它发现“面对公开会议记录的决定，美联储决策者们的回应似乎是，减少对主席提案发表异议。”

这种现象或许可以解释为：委员会成员试图预测个人审议对其职业和形象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并给出相应的缓和措施，而实际上这可能会损害诚实的政治辩论。美联储系统的批评者们很清楚，透明性也可以用来玩政治，因此对美联储的运转能力具有破坏性影响。难怪罗恩·保罗（Ron Paul）等反美联储人士一直要求对该机构的政策制定进行更多审计，哪怕美联储指出，这可能会逼得自己要花更多时间去对抗政治攻击，分散其对经济政策的关注。

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对责任和透明性的担忧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决策过程。如果我们要对决策承担责任，我们的决策质量会有什么变化？在1999年的一项研究中，珍妮弗·勒纳（Jennifer Lerner）和菲利普·泰

特洛克（Philip Tetlock）发现，只要决策者不知道事后审查者的观点，他们就会进行“先发制人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这极有可能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但如果决策者事先知道受众的观点，那么就可能进行某种“态度转换”，让自己公开表达的观点符合听众的期待。随着社交媒体的激增，以及用于探测最小族群公共舆论的数据挖掘技术越来越多，我们应该料到：政客和其他决策者们必然会遵循他们对公众舆论的阐释来行事。

另一组心理学研究则发现，当众表明自己的最初立场之后，我们不大可能通过随后的审议改变想法，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被看作是前后一致的决策者。詹姆斯·麦迪逊[5]（James Madison）在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上就曾表达过对审议环境的这种担忧，他说，“如果成员一开始就公开表态，那么他们以后就会认为，一贯性要求他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而如果采用秘密讨论的方式，人一旦发现自己不再认可先前意见的正当性和真实性，会对他人意见保持开放，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捍卫立场。”换句话说，追求透明性是有代价的，有时这些代价可能远远超过了预期收益，大多数时候找不出合适的理由要以增加透明性为名牺牲审议质量。

透明性和信任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复杂。在多种透明性方案为何会侵犯（而非增强）信任这个问题上，哲学家欧诺拉·奥尼尔[6]（Onora O’Neill）一直是一个特别敏锐的观察者。在奥尼尔看来，培养信任是一个比促进透明性更重要的公共目标，如果后者损害了前者，或许我们就应当克制自己对网络和数据库世界必然势头的热情。奥尼尔写道，“透明性增加，可能会造成洪水一般未经分类的信息和错误信息，除非对其进行分类和评估，否则它们带

5 美国第四任总统。他是最后一位去世的美国开国之父。

6 剑桥大学 Newnham 学院院长，著名的康德哲学专家，主要研究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来的恐怕只有混乱。这可能会增加不确定性而非信任……透明性可能会鼓励人们不再那么诚实，从而会增加欺骗，减少信任的理由；人要是知道自己所说或所写的一切都将公诸于众，便可能篡改实情。”

透明性作为内在价值和作为工具性价值的区别特别重要，这就是原因所在。我们争取让公共或私人生活的某一方面增加或减少透明性时，出发点不应当是因为我们重视透明性（或者就此而言，不透明）本身，而应该是因为透明性促进或者损害了其他更重要的利益。数字技术可能使我们生活的更多要素受到外部审查，这一事实不能证明增加透明性有利。绝不能把互联网中心主义者所珍爱的、但同时又是虚构出来的“网络”福祉看得比培养信任更重要。

不这么想，就等于是让对“手段”福祉的盲目关注决定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你可能还记得，解决方案主义者假设问题而非调查问题，借助“互联网”的思想观念，他们用一种特别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方式来假设出非常特别的问题。“互联网”能增加透明性？好吧，这意味着透明性很重要并且本身值得追求。这可能会成就一个战略奇迹，使“互联网”合法化并巩固其推进透明性的媒介名声，但它未必是聪明改革（smart reform）的一剂良方，后者需要对世界政治进行彻底深入的实证调查。

彻底深入的实证调查可能会表明，实际上公民（即活生生的、有呼吸的真实公民，而不是理性选择理论所虚构的机器人）可能并不想在政治中有更多的透明性，也没有可以利用透明性的带宽。约翰·希宾（John Hibbing）和伊丽莎白·希斯-莫尔斯（Elizabeth Theiss-Morse）曾在《隐秘的民主：美国人关于政府应如何运转的信仰》（*Stealth Democracy: Americans' Beliefs About How Government Should Work*）一书中研究了美国人对国家民主应当如何发挥作用有什么样的实际信念和愿望（而非政治理论家对此种信念和愿望的设想）。这次里程碑式的研究指出，大多数公民对亲身进行政治决策、为决策者提供信

息输入、知晓决策过程的隐秘细节统统不感兴趣。相反，美国人要的是作者称之为“隐秘的民主”的东西，由此民主程序（很有点儿像B-2轰炸机隐形飞机）确实存在，但一般情况下公众却感觉不到。

这是一篇令人着迷的论文，但这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将它用到透明性问题上。希宾和希斯-莫尔斯警告说，让公民完全了解政府运作机制，不太可能让公民对政治产生任何更多好感，因为政治一开始就未必是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因此，两人认为，“我们不应当以为，如果有什么新的办法能让人们对决策过程的每个边边角角都了如指掌，这就能解决人们对政府的负面看法。人们不需要对政治过分满意，也并不想这样。”

有些时候，这种过分满意甚至可能妨害政治。希宾和希斯-莫尔斯对比唱票与计算议会出席率这两种做法，前者传统上一直是公共记录的一部分，后者则由《国会季刊》等出版物新近开始采用。

既然这些数字对外公开了，那么一个政客不太高的议会出席率到下次竞选时就可能出现在对手的负面广告里，成为招致攻击的由头。然而，一如希宾和希斯-莫尔斯所指出，“100%参与率和95%参与率的区别，只不过是法定召集人数的一点点。”突然之间，政客们再也不能决定如何平衡自己的各项义务了，政治在整体上因而遭受了损失。由此，《隐秘的民主》的作者们写道，“议员们本来是要去做一些对民众利益更有好处的事情，比如说呆在办公室或委员会会议室，和选民会面，与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研究或讨论问题。但是公众关注的压力迫使他们匆匆忙忙地对每一个结论已定、不成问题的议题进行投票。”

这个例子恰当地说明，不管是以尖端数据库和可视化为基础，还是以纸和笔为基础，都不应该脱离应用领域的性质、节奏和限制条件来评估透明性的价值。同一种透明性解决方案，在允许负面广告的地方与不允许的地方，

对选民的影响可能会非常不同。透明性的狂热爱好者（极客圈里有不少这样的人）带来了各种宏大而抽象的方案改善世界，但忽视政治给这些方案带来的微妙差别和不确定性，恐怕会是错误。

一旦把透明性从工具性价值表现为内在价值，受害的就不只是政治了，许多其他机构也体验过类似压力。迈克尔·鲍尔[7]（Michael Power）对“审计社会”的兴起做过经典研究，内中指出了审计所造成的两个不安后果，不仅发生在企业背景下，也发生在公共机构背景下，并且都伴随着对更多透明性的追求。第一个后果，鲍尔管它叫“脱钩”（decoupling），可以划入阿尔伯特·赫希曼“悖谬论-无用论-危害论”三分法的“悖谬论”这部分。以政客和企业高管们为例，他们面对着与日俱增的压力，要将其一切言论进行归档。于是，他们回到自己的秘密隔间，只口头交流，以免有任何东西落在纸面上。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要求透明，得到的东西越少。又或者，政客和高管使用另一种做法，采取一种名为“雪花效应”的回应方式，制造海量的劣质数据，有效阻止人们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实际绩效跟审计及透明性方案捕获的人为绩效脱了钩。这些人或许会让我们产生错觉，以为只要“双击”它们，就能客观而毫无问题地获取“真理”，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别有一套规避透明性的动机。这种见解难称新颖，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论不平等》（*Discourse on Inequality*）（1754）一书中早就抱怨说，“与其说账簿与账目审计揭露欺诈，倒不说是掩盖欺诈；因为骗子随时都有新招规避谨慎的人，谨慎的人却不见得随时有新招防住骗子。”

鲍尔还指出了透明性造成的另一个意外后果，他称之为“殖民地化”（colonization）。这很好地与赫希曼三分法中的“危害论”部分相吻合，也即

7 伦敦经济学院会计学教授，著有《审计社会》一书。

盲目追求改善的意愿却侵犯了其他重要价值。前文所说的议员出席率就属于这一类：出席率受到记者和竞争对手的密切关注，故此议员力争百分百的议会出席率。凡看过流行犯罪系列剧《火线》的人都知道“殖民地化”给组织带来了什么后果：警方为了让统计数据好看、从而让市长的竞选提高胜算，结果追捕错了嫌疑犯；学校不遗余力地提高考试成绩，结果让孩子们学到的东西少了许多。当然，这同样要怪公众日益沉迷于标准化和量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不能仅仅归咎于透明性），但把透明性本身当成价值的目标来追求，而不管要提高透明化的具体实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确为这些问题的扩展蔓延创造了合适的条件。至于透明性是由职业审计人员还是由网络连接武装起来的业余人士来实现，其实无关紧要。

信息简化主义的危险

《审计的社会》出版于1997年，但可以说，自那以后，审计的诱惑越演越烈。问题在于，既然数字技术让我们可以廉价地搜集和存储数据，跳过复杂的哲学与实证分析就可能会很诱人，而事实上分析对在给定环境下分析透明和模糊来说至关重要。然而，直接非难新的技术环境变化并不对，因为正如我前面已经指出的，如果不自动跪在透明性和“网络”的神明面前，人们原本是很容易想象怎样以不同方式构建这样的技术环境的。因此，我们还需要解释相关的态度和观念，正是这些态度和观念维持现行技术环境，让它无声扩张，同时还把这些发展表现成一副命中注定、永恒和自然而然的样子。以启蒙时代的态度来面对信息的解放力量，是互联网中心主义和解决方案主义的根源。总觉得信息多比信息少要好，有更多办法分析同一条信息总比办法不多要好。法律学者朱莉·科恩（Julie Cohen）把这套态度称为“信息处理冲动”，认为它催生了一

种心态：把信息搜集等同于“发展进步的唯一必然之路”。

技术公司早就明白启蒙时代对信息的偏爱对自己很有利。这是人们总是觉得技术公司做的事情比其他美国公司高尚得多的原因之一。与埃克森美孚或麦当劳不同，Google正在做一项启蒙事业，这本身赋予了它不同的待遇。Google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才有了“整合全球信息，让人人皆可访问和受益”的企业使命。这一使命掩盖了如下认知：有些信息，哪怕它已经落入公共领域，也不应加以整合或“利用”。从没人提起过“整合信息并增加其实用性是好是坏”的伦理问题。相反，Google只沉迷于效率问题，因为它认为（鉴于我们的启蒙主义偏见，它的看法没错），自己的目标是极少有人反对的。

已故的托尼·朱特[8]（Tony Judt）在他最后一本书里谈到，可怕的“东拉西扯地面向经济性的转变”，把持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公共辩论。“知识分子不问某件事是对还是错，而是政策有效率还是没效率。他们不问一项措施是好是坏，而问它是否会提高生产力，”朱特叹道。他接着说，“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未必是因为对社会漠不关心，而是因为他们一直都不加批判地以为经济政策的要点就是产生资源。”朱特没有提到硅谷，但是难以否认，硅谷对效率问题的专注也胜过对道德问题的专注。硅谷生产出来的不是经济学理论的抽象资源，而是信息（Google的员工队伍里有一位首席经济学家也不足为奇了）。只要能高效生成并处理信息，人们就觉得启蒙运动的遗产得到了妥善继承。

硅谷追求整合全球信息（Google只是众多被告之一）的问题在于，它往往屈服于最恶劣的过分“信息简化”。这是一种通过信息棱镜查看所有知识

8 历史学家、作家、大学教授。他以其对欧洲历史的贡献而闻名，是纽约大学研究欧洲历史的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教授和纽约大学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研究所主任。他还经常为《纽约书评》写文章。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7年则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的倾向，社会学家尼古拉斯·秋卡斯（Nikolas Tsoukas）指出，其错误在于以为“一组索引”就足以“充分描述即将发生的现象。”如果不对知识略加篡改，整合全球知识会很难进行；借用詹姆斯·斯科特的表述，不管是叫威权政府还是硅谷的创业企业来做，让知识“清晰可辨”很困难。

根据秋卡斯的观点，每当人类把思想看作自主的对象，能以原始形态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进行交换，不因执行发送和接收的通信信道或节点造成失真，信息简化主义就繁荣起来。这就是终极双击：不仅认为各种思想观念独立于用来进行传输的基础结构，它们相互之间也完全独立。人类和制度怎样交流，这个观点的看法很天真。它曾经在控制论理论家中流行一时，后来近乎湮灭，但现在借助互联网中心主义者的新纪元主义呐喊，正迎来某种程度上的智性复兴。

法律学者马克·芬斯特（Mark Fenster）认为，“透明性理论在其核心采用了经典的线性沟通模型，它假设了一个简单的信息传递过程：单一信息源通过单一信息媒介，来到单一目标受众。”正如芬斯特所说，这种单向度的控制论式沟通阐释太过肤浅，透明性的狂热者们看不到“现代政府杂乱无章的官僚机构，‘信息’的不可靠本质，令人困惑而又泄气的公众能力，还有，归根结底，传播过程自身的困难。”唉，实际上，各种透明性调查所揭示的信息，在信息简化主义者所设想的客观而纯真的状态下就几乎不存在。因此芬斯特认为，“政府信息中所包含的任何‘消息’只能产生并存在于相应的、塑造信息的政治和监管框架之内，它通过媒体环境来传播，可媒体环境却一边传播消息，一边重塑消息。”控制论所假设的无瑕完美传播过程根本不存在。另一个支撑信息简化主义的重大谬误是，它以为一则信息能够以完全独立自主的方式单独存在，不会从一开始就受到人类的阐释。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很早以前说过，目标明确的主题，是信息的先决条件。美

国人平均一生要花两年时间与口渴作斗争，这可能是对现实的精确描述（其实不是），但是只有当人（比方说可口可乐）热切地期盼得到它，它才成为信息。正如秋卡斯所指出的，“把某事简化为所谓的客观信息，然后假装这些信息能充分描述身边的现象，这其实是在掩盖信息背后的目标，信息本身并未清晰表现这样的目标。”

用更简单的话来讲，所有衡量和描述政府开放性的尝试，一开始就随着某种基本模型（哪怕它隐性无形）而展开，这个模型描述了政府是什么和它们应该是什么。为了完全理解特定背景下，提高政府透明性是不是有益之举，我们需要让这些模型（也即能够测量什么、应当测量什么的基础性理论假设）现出原形。

我们必须抵挡诱惑，不能认为这些模型可以自然而客观地代替它所测量或透明化的现象。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最新工作表明，对那些我们加以透明化的事物，只有抑制它们固有的不稳定、主观和矛盾特性，我们才能将之简化为可以处理、优化和修补的信息。随着社交网站、搜索引擎和移动手机帮助我们生产或收集更多信息，这种诱惑必定会增加。简化主义本身并不坏，甚至可能会带来理性的解放，但这需要我们不断提醒自己，为了放大特定指标或政治模型，我们简化了些什么东西，我们抛弃了现实的哪些部分。

开放性及其救世主

若不是解决方案主义者的透明性词汇表充斥着模棱两可的术语，信息简化主义一些最糟糕的问题或许尚可避免。一旦解决方案主义者开始谈论起“开放性”，对“透明性”的诉求看起来就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糟糕的是，文化和知识遗产让我们认为这些概念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东西。解决方案主

义者，尤其是那些心怀极客信念的人，经常自行制造并消费一些神话，有关“开放性”如何有助于进步和成功云云，而这只会增加混乱。

人们大概会以为，这种对开放性的崇拜产生于推动开源软件的社区。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极客文化的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科尔蒂看来，哪怕在极客圈里，开放性的价值（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还是一种用来实现更高利益的工具）目前并没有多少共识。正如科尔蒂所指出的，“开放往往趋向混乱。每个人都号称要开放，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分享，每个人都赞同开放显然是件要做的事，毕竟，开放性构成了‘开源’的半壁江山嘛。但尽管有这么多的显而易见，‘开放’恐怕仍然是‘自由软件’运动里最复杂的组成部分。”因此，一如我们在前文有关透明性的讨论中所见，开放究竟是手段还是目标，并不很清楚。

科尔蒂说，在开放性的功过上根本没有什么极客公论。“开放性本身就很好吗，或者开放性是实现某种其他目标的手段吗，是又怎么样呢？什么人想要实现开放性，出于什么目的？开放性是一个目标吗？或者它是实现不同目标，比如‘互操作性’或‘一体化’的一种手段呢？这些又是什么人的目标，谁设定的？企业的目标与大学研究者或政府官员的目标有什么不同吗？”因此，如果科尔蒂没错，那么，开源软件社区在技术讨论中一直在灌输这种观念：“开放性”本身在价值和意义上是分裂的。

与此相反，我们的互联网讨论往往受某种开放性原教旨主义所支配，该原教旨主义认为“开放性”对几乎任何问题是万无一失的解决方案。探讨网络与技术系统中的开放性时，人们不去讨论它是会鼓励还是危害创新、是会提升还是贬损正义、是会促进或复杂化民主审议（说到“开放性”在我们置身的纷乱世界里什么用，我们最可能展开的就是这种讨论），而是一味认为“开放性”永远向善，而其对立面（我们根本没法清楚地界定“开放性”的对立

面到底是什么，已经相当能说明问题）则是恶的。

以“开放-封闭”的方式看待每个技术问题，这种摩尼教（一种将基督教与伊朗马兹达教义混合而成的哲学体系，认为世界总是光明与黑暗对立的。）倾向，令得人们对一些出于战术性目的接受开放性，并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利用开放性的企业产生了近乎宗教般的推崇。这里的手法，再一次类似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把固定性等特质归于“印刷文化”的做法。把开放性看成是是一种“互联网”价值，因此，每当可以用开放性来解读“互联网大使”（今日世界的Google和Facebook们）的行为，人们就情不自禁地拿它解释这些公司的成功。由此，企业的成功又拿来证明“开放性”的确是一种互联网价值。互联网理论家永不犯错，奥妙就在于此。

以推崇Google的吴修铭为例，在他看来这是个门户开放的公司，犹如一只神兽。在《总开关》一书里，吴把Google的诞生看作“无畏的创举”，它的理念“隐约带有救世主的精神”。它的创始人（或许就像耶稣？）“自称为现有秩序的挑战者，挑战一些最基本的逻辑前提，包括信息本身的真实构成、所有权的意义、美国公司的责任甚至人生的目的。”Google所象征的简直就是“信息开放的乌托邦”，其目的在于“把开放性的旗帜深深地插入电话的核心领地”，并且从不惮于“对抗或驯服互联网的基本结构”（要记住：对抗是徒劳的，网络，及其“基本结构”和“架构”，不会消失。），它是“开放性最伟大的企业斗士，”“开放性运动”的领袖，“开放性的互联网福音书的耶稣化身。”吴眼中的Google也是一个“开放性传道者”，这与“完美主义传道者”史蒂夫·乔布斯，“竞争传道者”前联邦电信委员会（FCC）主席里德·亨特（Reed Hundt），“控制模式最卓越的传道者”前时代华纳CEO杰拉德·列文（Gerald Levin）都有极大不同。福音书、救世主、传道者，耶稣化身……在吴的笔下，他仿佛在神圣的山景城瞻仰Google圣殿时有了某种醍醐灌顶的感

觉。奇怪的是，他从未提到，他自己一直是Google的一名（无偿）顾问，在塑造其“开放性”早期战略时曾给予其极大帮助。（2007年时任Google特别创意主管的克里斯·萨卡（Chris Sacca）告诉《商业周刊》，“吴帮助我们开创了一个战略…在这个领域里他是股独一无二的力量。他未来要实现的成就，你才刚刚看到小小的开端呢。”）这样的内幕有时让我们很难分辨，吴究竟是在赞美Google的天才还是他自己的。

吴激情四溢的分析描述了Google对开放性自然而一贯的偏爱，它的高管一看到网络的结构便再难抗拒其魅力。它是印刷辩论的再次翻版，而Google的“开放性”不过是“互联网基本结构”的一个副产品，就像固定性，在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阐释中它只是印刷某种永恒特征的表现形式。Google可能在塑造或维护“互联网”结构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它将开放性定位成“基本的”而非“有条件的”，它可能在市场营销和智库上花了大把的钱来表现自己是“开放性福音传教士”，它在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开放性”福音传教士——但这一切，并没有进入吴的分析视野（他也是福音传教士中的一员）。

让我们用一种截然不同的实证分析来跟吴的救世主宣言比较一下。前者没有对Google在开放性万神殿的神圣地位并未进行任何先验性假设，而是寻找各种联系来解释这种身份为Google带来了些什么，又是如何实现的。两位荷兰学者金伯利·斯普利尤文伯格（Kimberley Spreeuwenberg）和托马斯·珀尔（Thomas Poell）详细地研究了Google如何对“开放手机联盟”（Open Handset Alliance）（84家为Google安卓平台进行软硬件开发的公司所组成的共同体）的内部工作进行设计、管理和定位。Google及其高管从不错过任何机会来吹嘘其移动平台的工作方式不同于苹果，“开放性”占主导地位。

然而，一如荷兰人的研究所指出，“开放手机联盟”的“开放性”或许用词不当，因为“在开源的理性之光照耀下，能否将安卓描绘成‘开源项目’，

就非常值得商榷。”作者写道，“尽管在公开介绍中，安卓是一个旨在‘阻止任何业界参与者限制或控制其他创新’的项目，可在安卓生态体系内部，Google显然一直对其他相关参与者进行着控制。”

这种控制是通过狡猾的软件许可和对软硬件设计的限制性技术说明来实现的，它们都被包装在“兼容性”的老套措辞中。更有甚者，Google和“开放手机联盟”一家硬件合作伙伴之间曾泄露出一些通信内容，信件内容表明，Google有可能打着‘开放’生态系统的名义，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对其合作伙伴实施控制，比如让表现良好的合作伙伴抢在竞争对手之前获得某些功能，对不守规矩的合作伙伴发出禁用某些功能的威胁。

同样的，由于Google扩军到移动手机行业的兴趣有一部分是为了保持其在广告业的强大地位，这家公司在战略上就没打算一板一眼地遵循“开源”剧本的规则。相反，它根据企业战略选择那些它愿意遵守的规则（比如，它不允许独立开发者给操作系统本身编写代码，因为这可能会弱化Google对开发的控制，间接也就弱化其从获取用户数据上得到的利益，妨碍其实现广告目标）。

这并不出乎意料，但与其先对Google为开放性所做的一切大加称赞，倒不如研究一下开放性为Google带来了什么好处。一位敏锐的观察家这样说Google：“它销售产品的原则是‘开放性’和‘连通性’，但构建组织的时候却用的是另一套。”为什么这个开放性和连通性的市场会存在，它与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其他原则有怎样的关系，这一市场是如何受操控的：如果人们认为“互联网”的“开放性”自然而然、毫无疑问，那么，就不大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借用社会学理论的可怕说法，“开放性”和“互联网”这类理念是构建出来的，而且是彼此共同构建的结果，它们并非从天而降。除非我们准备好去研究这种构建是如何发生的，否则我们不仅会写出糟糕的技术史，而且还

会制定出极端混乱的政策，把昙花一现的不稳定现象（当然这也值得商榷）当作环境里恒久自然的固定状态。

因此，尽管互联网中心主义者认为Google默认情况下是“开放的”，反对者让我们称之为互联网现实主义者则认为Google做了大量工作来让自己显得“开放”，并调查了这些工作的具体内容。互联网中心主义者大多是民粹派，不讲究实证主义，互联网现实主义者一开始则不对“开放性”和“透明性”的内在价值做任何的假设，更不认为它们是数字网络的固有性质。后者尤其重视这些理念如何参与到特定的辩论和技术，有什么样的表现。互联网中心主义相信“开放性”自身向善，互联网现实主义者则调查“开放性”说辞为政府和公司做了些什么，政府和公司又为它做了些什么。

谁为“开放政府”赋予“开放”之名？

像“开放性”这样模棱两可的术语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最近各种推动“开放政府”、解放“开放政府数据”的政治运动带来的混乱、兴奋和失望。当然，没有人确切清楚这些政治运动究竟在做什么：把五个“开放政府”专家放在一个房间里，你会得到六种不同的意见（天知道会发多少推文）。这种混乱并没有阻止政府宣称自己为这个模糊理想承担义务。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办公室发布的第一条总统令，就是要求行政分支机构以开放格式在网上发布信息。2011年9月，美国和其他七国政府甚至签署了一项多边“开放政府宣言”，指出“世界各地的人们日益要求政府更加开放”，同时签约国承诺以开放格式及时发布高价值数据。

定义的复杂性可能不太一目了然，但真的极其复杂。俞哈伦（Harlan Yu）（普林斯顿大学）和戴维·罗宾逊（David Robinson）（耶鲁大学）对这种混乱

背后的根源进行的分析，或许最为睿智。“开放政府数据”这样的说法并未表明，我们讨论的是能够让政府更加“开放”（从减少秘密这个意义而言）的那种数据，还是能从某个偏僻政府档案馆长期受冷状态中被解放出来、对政治议程和机密几无影响的那种无害数据？“开放政府”指的是让列车时刻表和城市地图更唾手可得？还是指公开能让政客陷入窘境、职业生涯告终的数据？

如果只涉及地图和火车，就几乎没有理由对这一待议改革的政治结果感到兴奋（或焦虑）了。如果这就是开放政府数据的全部，奥巴马下达第一号总统令时恐怕会另选一种更具象征意义的东西。然而，如果“开放政府”的改革范围更加广泛，我们就需要对其逻辑进行更加严密的审查。毕竟，向“开放政府”转型如果仅仅追求把列车时刻表放到我们的iPhone手机上，那它就没必要牵扯或引发政治自由层面的任何变化。据我们所知，由于纳粹有一套令人羡慕的列车系统，他们肯定非常赞成列车数据全球查询。

正如俞和罗宾逊所主张的，“哪怕政府仍然黑幕重重、难以理解，仍然可以对政治中立的主题提供开放数据。比如匈牙利城市布达佩斯和赛格德就都提供机器可读取的在线运输时刻表，允许Google地图为用户在当地旅行时规划路线。”这种数据不就既是开放数据又是政府数据吗？显然。但它大概并不会使匈牙利变得更民主。事实上，尽管这个国家一直在向独裁统治不断推进，它仍可能实现“开放政府”的一次成功尝试。

正如我们早前所见，这是互联网中心主义的一个常见问题：它根据“互联网”的假定价值重新定义了“开放”这样的术语，又把这些重加定义的术语反馈回公众对话，这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词语的含义已经改变。当然，如果北朝鲜打算公布其列车时刻表，没人会把它误认为是民主。但是在像匈牙利这样的国家，政府有可能利用我们对数字化开放性的崇拜，让自己显得比实际上更民主、透明和正当。如果更好的车次图能让你在人权和保密性指数

上加分，我们的得分系统肯定有地方出了大错。

甚至就连民主国家也不可能抵挡住这种诱惑。看看美国吧：在奥巴马统治下（名义上‘更开放透明的政府’的时代），行政当局气势汹汹地起诉泄密者和告密者，扩展政府的分级计划，甚至禁止记者曝光拥护开放政府工作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名字！

然而，还有一个理由值得我们小心谨慎。奥巴马的开放政府方针包括Data.gov，高价值机构信息库。“高价值”，就像“开放政府”，是一个极其模棱两可的词，就奥巴马政府而言，它还意味着“改善机构及其运转的公共知识”或“创造经济机会”的数据集。换句话说，“高价值”不一定意味着“包含透明性或责任”。因此，果然不出所料，机构的各种无关信息涌进了Data.gov（切莫怀疑美国官僚机构对繁文缛牍的热情），其中一些数据其实早就能在网上获取了。这究竟对透明性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呢？

俞和罗宾逊研究了“开放政府游说团”的一些宣言和声明，这是由各种善意的技术活动家组成的，帮助奥巴马政府设计规划“开放政府”的早期工作。这些活动家详细阐明开放政府数据背后的八个重要原则——及时性、完整性、不受许可限制等等，但主要的着眼点是信息披露过程的技术细节，对政治则鲜有疑问。所以，俞和罗宾逊指出，“北朝鲜政府领导人发布电子版宣传语……便可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却不太可能让这个臭名昭著、毫无责任感可言的封闭政权增加任何一点透明或责任。”

正如明白“开放性”为Google做了什么非常重要，明白“开放性”（以及哺育并促成它的更宽泛的“互联网”叙事）在为鼓吹“开放政府”优点的政府做些什么，同样很重要。我们已经指出，“透明性”和“开放性”都有自己的局限，鼓吹过头的话，可能轻易使民主过程沦为骗局。当然，如果剂量小，尤其是在问题太多、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制衡手段的领域，增加透明性和

开放性绝不会有什么损害。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开放政府”这样模棱两可的词置于更加严密的审视，恐怕会不情愿地任由某些政府自夸子虚乌有的进步，让更加重要的改革陷入停顿。

肯尼亚政府对“开放政府”表现了巨大的热情，国际反腐败组织“全球廉政”（Global Integrity）的纳萨尼尔·赫勒（Nathaniel Heller）却一直对此有所怀疑。官僚主义者们自然一点儿也不喜欢它，政府机密才不会提上“开放”的议事日程，所以他们取而代之，选择上传破坏性最小的数据库。正如赫勒所指出的，“任何政府，把健康数据库放到网上……总比让国家政党筹资变得更透明性要冷静（坦白说政治争议也更少）。”只要开放政府解决方案主义者一心沉迷于方法，沉迷于标准和数据库的质量而非实际内容，这些标准和数据库就会传播开来，什么进步也不会发生。

在联合王国（英国），联合政府同样极其热衷于做出“开放政府”的承诺。戴维·卡梅伦及其阁僚甚至对“沙发审计员”（armchair auditor，也即一种众包项目，让民众监视公立机构的支出、合同和犯罪行为）的工作大加赞许，承诺把数量众多的政府数据集发布到网上（他们还是讲信用的）。与此同时，政府一边向信息自由的相关法律发动攻击（卡梅伦抱怨说它们“让政府的动脉里结了水垢”），一边跟收费设想眉来眼去：凡公民向公共机构索取档案，政府都可收费。保守派圈子里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意见：借着“沙发审计员”兴起的东风，削减对BBC旗下专业调查员的拨款。值得一问的是，就“开放政府数据”来说，既然卡梅伦已经被看成“开放性”捍卫者，他的内行背景会不会让他更方便向信息自由的请愿开战。如果好心的解决方案主义者和极客们反遭了重重攻击，那就太可惜了。

但就算是卡梅伦信奉的是最不成问题的“开放政府数据”，恐怕也不只跟效率有关。“开放政府”兴许只是“小政府”的一种委婉说法（这又给“开

放政府”的说法平添了不少模糊）。毕竟，它的说辞延续了新公共管理[9]的部分古老行政理念，后者曾在撒切尔时代流行一时，认为实现公共机构效率最大化的方法，是把公共机构变成面向消费者的营利实体，同时把监督、质检和审计功能外包给第三方（公民就是这第三方里新兴的一部分）。如果一切都可以像维基百科那样管理，干嘛还要什么大政府呢？依靠卡梅伦的“大社会”好得多嘛，让公共部门饿肚子，同时指望“沙发审计员”能像“莱维森调查”[10]（Leveson Inquiry）一样有效。

治理专家贾斯汀·隆戈（Justin Longo）注意到“开放政府”说辞和新公共管理相似得令人不安，猜测前者没准儿只是后者的一匹特洛伊木马，我们正为新技术推进开放性和透明性的巨大潜力而欢欣鼓舞，却可能忽视了这些技术用途的深刻政治性。隆戈写道，“支持数据更开放，意在让公民消费者建立联盟，借助开放数据曝光公共服务决策，突显绩效问题，在公共部门内部增加竞争，加强公民的消费掌控权。”哎呀，如果美国真有哪位从事“开放政府”项目的极客关心这场运动的说辞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用途，他们掩饰得可真好。

开放数据方案生来就处在一个被各种政治斗争搞得四分五裂的世界，也难怪交战各方总是千方百计利用这种方案来谋取自身利益。建立数据集并希望它们只被用于“善意”目的，这远远不够。数据集进入了一个由真人构成的世界，真人就有许多此消彼长的关切和愿望。这些关切和愿望满口甜蜜承诺却无意兑现，解决方案主义者提出的方案理解不了这一点，自然起不了什么作用。

---

9 这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新公共管理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影响甚广。

10 旨在调查英国媒体的操守问题，是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在 2011 年 7 月发起的，由已关闭的前《世界新闻报》手机黑客事件引起。

以跨街区犯罪统计数字化地图为例，“开放政府”的狂热人士对此非常热情。理论上说他们的逻辑是合理的。地图能帮助警察提高效率，帮助他们识别问题地区，它们还能帮助公众对去哪儿和在哪儿居住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毫不出奇，事实比想象中复杂了一点儿。更好的犯罪统计数据或许能帮助一些人不在危险街区购买房产，同时也让其他人卖房产变得更加困难。于是，已经住在这些危险街区的人可能就不太愿意第一时间举报犯罪。事实上，2011年一家保险公司举行的一次调查说，11%的受访者声称因担心街区较高的犯罪统计数据会大大降低自己房产的价值，曾看见过犯罪却并未报案。帝国学院的数学教授戴维·汉德（David Hand）指出，“开放数据的倡议忽视了这种反馈效应，也就是说，发布数据的行为本身将影响到未来数据的质量。”或许我们希望数据开放——可别太开放。

印度近来的土地记录数字化及随后的在线发布，名义上是尝试向弱势群体赋予权力，实际上却可能把权力授予富人和权势群体。数字记录刚上线供全世界浏览，一些大胆的商人就发现，许多穷人家庭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大多数情况下，这并非对土地巧取豪夺所造成；当地文化，以及在当地文化占主流的口头交易，无处不在的腐败，还有穷人的识字率，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穷人手里没有记录。

换句话说，所有权主张在网上无法找到，可能是因为数字化努力设计不当、选择性太强，并不一定意味着现有居住者对土地没有所有权。结果，发现许多居民实际上无法证明土地所有权之后，一些富人家庭就雇请律师，迫不及待地把穷人踢出局。事后看来，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比如选用其他方式来记录、认可土地所有权主张（举例来说，除了官方地契，还可以用家庭旧照片或地图来追溯所有权），或者，对没有明显必要深究土地权数据的第三方，限制其数据浏览权限。

这里的关键在于，和大多数开放政府方案一样，不是不该收集或流通信息；而是要充分了解信息所处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复杂性，再进行收集和流动。有时候，维护环境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比如打击治安犯罪）可能只需生成半透明或半公开的信息，就像阿根廷的那个例子。这种折衷不是世界末日，它也不是“开放性”的投降，更不是民主的告饶，因为民主的蓬勃发展靠的就是妥协，靠的就是对表面上无法调和的利益关系加以巧妙协调。开放性的暴政是我们痴迷于互联网中心主义的结果，必须抵制。

04 欲毁掉政治，修补它

“我们不是政客。我们革命就是要赶走政客。我们是社会大众。这是一场社会革命。”
——**菲德尔·卡斯特罗**
（Fidel Castro）

“我们提供的不是一个程序，而是一个操作系统。”
——**玛丽娜·维斯班德**
（Marina Weisband），
时任德国海盗党政治主任

“民主是对一切理想和乌托邦最清晰的反驳。它毁了每一条浪漫之船。它的历史就是一个错误与宽恕、愚行与拙行的目录。在其最好的时候，民主提醒的也不是人们的大智慧，而是我们的大愚蠢，它告诫我们要自我反省。”
——**约翰·杜伦·彼得斯**

互联网中心主义可以说是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但它已经有了自己的政党：海盗党。尽管在北美仍然处在非常边缘的地位，在欧洲，海盗党已经搞出了相当大的声响，甚至向欧洲议会派出了几位代表。海盗党运动兴起于瑞典，最初几乎完全专注于改革版权和专利法。然而它渐渐扩展到这两个议题以外，接纳了匿名、隐私和言论自由等议题。

这本来还是值得称道的，如果海盗党没有把这些议题统统归在“互联网自由”这么个极不靠谱的旗帜下的话。然而，一个颇为含糊的词“互联网”，加上一个定义不清的词“自由”，“互联网自由”就成了一个非常情绪化但却完全没有意义的陈词滥调，三教九流的街头小贩都开始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臭名昭著的百万富翁、文件共享网站Megaupload创始人金·达康（Kim Dotcom）是其最大支持者之一，满口“自由”和“创新”的花言巧语，想

以此转移公众对其网站推动大规模侵犯版权行为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互联网自由”观念，还剩下多少判断力？声称追剿Megaupload就是对“互联网自由”的攻击，等于说追捕从图书馆偷书的人就是对“文学自由”的攻击。今天，“互联网自由”观念动员起“匿名者”（Anonymous）的激进主义分子发动网络攻击，好让他们的英雄（如金·达康之流）得到正面的新闻报道。

今天的版权法很可能已经不公平不适用了，但这需要经过实证论证，而不是简单假设它与“互联网”存在所谓不兼容。版权改革和匿名保护之所以重要，原因很简单：在明智的立法支持下，它们将为人类繁荣提供更多机会。海盗党全心投入的应当是人类的繁荣，而不是“互联网”的繁荣。

是的，数字技术既威胁到这种人类繁荣，也能实现它。在带来新的、更年轻、更懂行的声音以帮助改善未来决策上，它具有重要意义。而海盗党却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他们的目标是保卫所谓“互联网自由”。这个词的模棱两可暂且不管，其价值却总是工具性的，而非内在的：我们认为“互联网自由”有价值，是因为，在许多场合下它会导向“人类自由”。而有时它也未必（如Eightmaps.com网站），在这种情况下，剥夺它，就不是毫无道理或倒行逆施。

尽管互联网中心主义决定了海盗党所探寻问题的范围，解决方案主义还是极大地影响着他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海盗党不只试图捍卫“互联网”，他们还竭力使其政党模仿互联网的神奇“架构”，仿佛“互联网”就是21世纪政党工作组织方式的模板。在德国，这样的尝试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高级的阶段：德国海盗党使用一整套工具来改善党内信息流动。除了聊天、维基和邮件列表，他们还使用一个叫做“Pirate Pad”的协作文本编辑器，它允许几百人同时编辑一个文档。竞选海报不是由专业广告公司设计的；相反，支

持者可以把他们自己的设计上传到维基。Twitter则被用来生成竞选口号。

海盗党从这种开放性中得到了什么好处，一下子还不是很清楚。当该国最受尊敬的出版物《明镜》(*Der Spiegel*)周刊询问该党，信奉“互联网”是否实际上反而有损其理想，这真可谓一语中的。“还有哪个政党把全国委员会会议在网上直播，或允许人们观看其议会党团会议？还有哪个政党党员的手机号码能通过Google搜索找到？”正如《明镜》所指出，“大家持续闲聊也有消极的结果：这使该政党难以被视为一个政治参与者来严肃对待。”

海盗党最超前最引起广泛讨论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叫做“液态反馈”(Liquid Feedback)的在线系统，它使该党能更好地理解其成员对当下议题的看法。它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任何一名该党成员都可以注册到(可选择使用化名)“液态反馈”，对海盗党应当做什么提出议案，如果有超过10%的其他成员对这项提案有兴趣，它就转到下一个阶段，党员们可以投票支持或反对它。

在提案提交后进入投票阶段前，其他党员可以就一个类似主题发起反提案，或者对如何完善原先这个提案提出建议。有趣的是，党员可以把他们的选票转让给自己认为对特定主题更内行的人，因此公认为交通政策专家的某人，最终就可能投十张票而非一张。为了防止某些这样的专家积聚和滥用权力，已转让选票可以被其最初“所有者”收回。“液态反馈”的投票不具约束力，它们只是把基层意见告知党的官员。大的政策提案仍然要在党代会上讨论和投票。因此，“液态反馈”旨在为海盗党的工作提供知识信息，其结果仍然通过相当传统的方式来决定。

理论上这听起来很棒，多了不起的一个提高参与度的办法啊！可现实却要残忍得多。据《明镜》周刊报道，在德国某地区，海盗党只用“液态反馈”收集两个议题的普遍看法，而关于割礼的争议性法律的在线民意调查，却只有20人参与投票，这可是个有近1,800万居民的联邦州啊。“这是个没人现

身参与的草根民主，”《明镜》周刊总结道。其他德国政党则指控海盗党窃取了它们的想法，却假称这些想法来自“互联网”。正如绿党一名高级党员沃克尔·贝克（Volker Beck）2012年6月告诉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那样，“可笑的是，海盗党从议会搞到我们的提案，又把它放到“液态反馈”系统上讨论……他们拿我们的内容当他们自己的再提出来。”暂且把贝克的担心放在一边，令人费解的是，“液态反馈”究竟有什么地方那么新颖和革命。政党总部为当下议题建立的衡量机制一直都存在。焦点小组、民意测验和数据调查都发挥着许多和“液态反馈”一样的功能，只有一个区别：后者在真正的新议题（假如它们不是从绿党偷来的话）上更加自由开放，可以出现在党的议程上。这倒也没错，但它说不上是政党建设的革命。早在博客和维基出现以前，就有从政党报纸到地方党小组的现场会议这类信息渠道，普通党员有充分机会表达个人观点。

海盗党的计划有些诡异的乌托邦的意味，它想当然地认为，古老的、久经考验的（痴迷于等级制度、领袖、规则和官僚机构的）从政方式，完全是不完美沟通基础设施所造成的灾难性结果。既然基础设施可以改善，为什么不把那些遗留成本也一并消除呢？如果今天博客、维基和社交网络允许即刻的和时间无限的审议，如果它们让我们能用某种灵活的职位轮换代替领导阶层，从而彻底摆脱官僚主义，那何必还留着这个旧系统呢？最坏情况下这就是新纪元思维在作祟：认为新的总是更好，因为它是新的；旧的应该丢掉，因为新的太容易得到了。

于是，最讽刺的地方来了：尽管海盗党手里有完美的基础设施，他们仍然无可救药地不关心政治。维基不能弥补战略方向的缺失、动人口号的缺失和对违纪者的无能为力。由此，对海盗党的支持正在变弱，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因为单靠基础设施，无法产生精彩的改革思想。在德国，海盗党的支

持率从2012年4月的13%，降到2012年8月的区区6%。正如一位德国民意测验者克劳斯·彼得·朔普纳对《明镜》周刊说的，“海盗党现象一开始真是太迷人了，但人们最终还是怀念有担当有主张的强人。黑压压一片的群众模式很快就失去了动力。”政党政治的成功，需要一套与成功编辑维基百科完全不同的技巧、态度和组织结构；每个人的一点一滴贡献，或许足够搞出一篇像样的文章，但对于创建一个有效政党来说，可能就差点意思了。

尽管信赖群众智慧，海盗党却并没有在不涉及纯数字化的议题上提出过什么有意义的看法。它在社会不公、欧债危机或未来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表现也乏善可陈，更别说性别不平等问题了，他们这个男性主导的政党，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每个人都可以就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提交提案和反提案，这意味着海盗党要花大量时间评估那些可能并非极为重要的议题（尤其是与债务危机或阿富汗战争相比）。看看他们最近的议题吧：是否应废止对德国最危险狗类的排名。“液态反馈”营造出政治活动和广泛参与的模糊印象，而弄清这些活动和参与是冲着什么目的来的，同样很重要。

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液态反馈”可能会让海盗党明白其成员在每个议题上究竟想要什么。然而，鉴于今日政治之复杂性，指望普通公民在希腊欧元债务重组或监管纳米技术上有非常成熟的见解，这似乎太天真了。当然，公民们可以也应当针对这些问题参与审议，但这种审议在征集和汇总意见方面所需要的，可比一个花哨平台要多得多。这种干预在机构设计上需要远多于此的创新，而不仅是让选民通过意见箱提意见，或匆忙对一个议题表示赞成或反对。

海盗党心目中理想的政治代表制度，似乎是詹姆斯·麦迪逊所说的古老代议制模式，政客必须毫无保留地遵照选民的意愿。另一观点来自“伯克派”，把代表视为托管人，一旦当选，就按照他认为最符合选民利益的

方式做事情，即便有时不得不违背选民的眼前偏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有许多政治哲学家曾指出，这两种模式都不够好，依赖某种悖论，正如政治理论家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在《代表的概念》（*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一书中所主张的，我们甚至不应当试图去解决它。海盗党靠的似乎是一个相当过时的甚至原教旨主义的代议理念。或许，他们接受代议制模式，仅仅是由于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为数字领域（这往往是他们唯一的专业领域）以外的复杂问题承担责任。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真的有必要问问他们究竟该不该从政了。

尽管海盗党试图模仿“互联网”的理念，如今评论家们却普遍敦促其他政党模仿海盗党，这种反馈回路在互联网中心主义的世界早已司空见惯。2012年5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由德国记者史蒂夫·凯特曼（Steve Kettmann）所写的时事评论，对巴拉克·奥巴马入主白宫时没有采用“液态反馈”系统表示遗憾。毕竟，在2008年大选后，他有了庞大的网络追随者，这些人都可能在决策上对他也有所帮助。“如果奥巴马先生效仿了海盗党的做法，他就不仅可以通过Facebook和Twitter发送更新，而且可以把大批支持者纳入一场广泛对话中，在决定他就任初期要优先解决哪些问题和有多少问题要求助于保守派方面，给他们一个实实在在的发言权。”凯特曼写道。

事实上，奥巴马政府确实对此做了许多尝试，只是他们成效甚微。其2009年首创的“开放问题”栏目（任何人都可以在线提交向奥巴马总统提出的问题并对此进行投票）中最受欢迎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大麻合法化的。另一个类似信息渠道是白宫网站的一个版面，叫做“我们即人民”（We the People），任何人可以在这里提交请愿并参与投票，敦促奥巴马采取行动，如果请愿在30天里达到25,000个投票数，白宫就必须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做出回应。2012年9月初受欢迎的请愿中包括诸如“在迈克尔·维克事件（Michael

Vick，美式足球四分卫，2007年4月因被指控运作非法斗狗而被判21个月监禁）上表明总统立场”，“建议交通安全管理局有关部门拯救他们的防爆犬项目”，或者“立法赋予男女在公共场合裸露上身的同等权利”。这可能都是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而难以理解的是如何理解其背后这些选票的意义。比如坐拥2.8千万Twitter追随者的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当红青少年偶像歌手），一条由他发出要求支持某个请愿的推文，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为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议题带来2.5万张投票。白宫是否应当放下一切而回应这些议题呢？

那么，“液态反馈”能告诉奥巴马“有多少问题要求助于保守派”这种说法又怎么样呢？很难搞清楚，是凯特曼对美国政治体系太天真呢，还是对“液态反馈”这类软件能实现什么样的成就太狂热。如果奥巴马知道，他的使用“液态反馈”的支持者中，有51%认为他需要对共和党人“好一点”，这个总统究竟该怎么做呢？放弃医疗保障改革，再看看“液态反馈”民众有什么反应？在美国背景下，“液态反馈”就是一个对不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两大政党都已依靠精密的微定位工具来揭示并诉诸我们最隐秘的需求和欲望。可以说，我们需要的恰恰相反：是领袖显示出哪怕一点点勇气，采取某些激进措施，即便它们与公众眼下所需要的相违背。

完美的未来——民主无缘

尽管海盗党对软件充满天真和信任，却也值得表扬，因为它没有完全失去对政治的信任。它们可能在代议制民主上不是世界顶尖专家，但至少他们愿意致力于维护政治程序，他们准备好为不同的法律发起活动、参与竞选和进行宣传。他们可能看起来不太像传统的政治家（资深议员喜欢抱怨海盗党

穿短裤参加立法会议），但是与“匿名者”运动不同，海盗党寻求在体制内发挥作用。他们可能会鄙视某些党派及其当选议员，但他们似乎仍然相信，政党和代表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这一点上，海盗党不像某些当代解决方案主义者那么极端，后者希望彻底消除政党和复杂代表体系，籍此改善政治。一方面受海盗党“液态反馈”软件的启发，一方面受维基百科和各种点对点项目成功的鼓舞，史蒂文·约翰逊在《完美的未来》一书中对转向他所谓“液态民主”的好处大加称赞。在传统民主政治中，公民选举代表来代表他们制定法律，在液态民主政治中，公民不必选举代表，他们只需把选票转让给他们认为对该议题更内行的人就行了。因此，约翰逊写道，“在液态民主下，你可以把你的选票转让给你的朋友，授权她以自认为合适的方式‘用掉’它”。

本质上说，约翰逊是在提议采纳海盗党的机制。凭借这种机制，海盗党找出对其社群具有重要性的议题，并把它变成新政治体系的核心。如果海盗党声称这是受“互联网”启发，那么约翰逊同样如此。“代理投票人就像有影响力的博客和信息聚合器，它们在媒介消费者和大新闻组织者之间开辟了新的空间。”为什么要费心搞这个计划？约翰逊解释了它的各种优点。首先，它能帮助我们摆脱党派偏见的陷阱；他写道，“把自己的选票转让给你最内行的朋友，你便削弱了简单化的党派投票的空间：你的代理投票人可能会完全支持来自其他党派的候选人，如果她认为他们是最有资格的。”第二，它可以减轻每个选民身上的信息负担，因而“你无需因为投票关系重大，就得成为通晓一切的专家。你可以选择你的目标领域，让你在其他领域里信任的人做出剩下的判断。”第三，约翰逊认为，“液态民主”将远远超出投票亭的范围，创造出新的参与空间。他写道，“与每隔几年挑选候选人不同，普通公民有了一个直接参与决策过程的平台，一切取决于他们的兴趣和专业知识。”

约翰逊的主张的指导精神并不算新。“液态民主”听起来可能花哨时髦，但是它所描述的做法，以“代理投票”和“委托投票”的名义伴随我们好长一段时间了。刘易斯·卡罗尔[1]（Lewis Carroll）1884年在他最早一篇论文里就提出过这个问题。许多后续评论（大多数由理性选择理论的支持者做出）出现在20世纪中叶。“液态民主”是一套古老解决方案主义思想的有趣例子，它随着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兴起而再度流行。

新技术为直接参与而创造机会，这给我们带来的兴奋由来已久。在1969年《公共选择》[2]（*Public Choice*）刊出的一篇文章里，日后将在里根政府身居要职的詹姆斯·米勒三世（James Miller III）主张，“我们必须正视沟通成本一直在降低这个事实，许多人同时表达观点现已成为可能。”他尤其惊异于“日新月异的电子技术、指示设备和录制设备……（这些）可以用来记录政治决策，让每个选民都有机会在所有议题上投出自己的一票，并通过机器记录下来。”和40多年后的约翰逊一样，米勒希望把这些计算机用在代理投票上。“与其定期选举代表干上一两年任期，为什么不让公民直接投票，或把代理权委托给其他人，想多久就多久呢？”米勒与另一位主张“梯度参与”的约翰逊有个惊人的相似之处：米勒也认为，选民参与存在某种梯度性，某些选民决定把某些议题的投票权委托给他人，而在其他议题上则不委托：“最关注的选民会在个人控制台上对每个议题投票。另一位选民则可能把代理权委托给他认为会与他投票一致的人，只要他有足够时间和知识去直接参与。然而，大多数选民会结合采用这两种极端做法。”

回顾一下便可知道，米勒的主张并未流行起来。然而，鉴于互联网中心主义和解决方案主义的双重诱惑，它很有可能盛行起来，尤其是现在，它有

1 英国作家、数学家，著有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2 这是公共选择理论家的主要发表渠道，公共选择学派从属于理性选择学派。

了像史蒂文·约翰逊这样的拉拉队长。但是，作为解决方案主义的典型代表，米勒和约翰逊他们两位，对错综复杂的政治进程都未曾表现出基本的理解，而只是把它简化为处于解决方案主义者控制下的唯一变量：投票。他们都没有提到，立法过程还包括讨论、谈判、妥协和审议；投票只是一连串漫长事件的最后阶段，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事件保持着传统，几不可见（当然，除非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而媒体又得到了风声）。

米勒和约翰逊的政治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公民投票，只能投票支持或反对，就像在约翰逊引为灵感来源的某些新闻聚合器。以加利福尼亚为例，那儿的人真的喜欢对阳光之下的每一个议题进行投票，可这往往对他们有害。这种公民表决给这个州造成麻痹效应，掏空了它的金库，制造出一连串大多数加利福尼亚人根本记不住的编号提案。我们这些人固然认为这个体系不正常，但也不会认为，代理投票或液态民主是对它进行改良的恰当手段。给加利福尼亚的体系进行一个液态小调整，真的是改革美国政治的好办法吗？

在约翰逊的“液态民主”里，被认为是无所不知的专家，最终将从见识稍逊的选民那里积聚选票；他们知道“真相”，因此不需要审议、谈判或妥协。难怪剩下的就只有投票了。这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政治观点。它还极其不切实际地假设，见识稍逊的选民一定能在每个自己不懂的议题上找到专家，并验证其在特定领域的资格。评价某人在比如气候变化或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专业技能，为什么会被认为是件毫不费力的事呢？对专业技能进行评估的专业技能可并不容易。

此外，更有可能的是，在现有机制下，成千上万其他选民，还有记者、其他参与竞选的候选人，都会注意到候选人资格凭证上哪怕最不起眼的一点出入；当你评价你朋友是否对某个议题比较在行时，除了你，没人会去注意。太晦涩难解的议题又怎么办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认为，公民在所有重要

议题上都有足够多可兼为专家的朋友呢？约翰逊似乎是这么想的，他认为，既然习惯上我们总爱向美食家朋友打听去哪儿吃饭，当涉及政治决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多奇怪啊。我没有哪个朋友在洪都拉斯经济形势和阿拉斯加气候变化效应方面是专家，难道说这样的人只有我一个？我是不是应该打电话给我的美食家朋友呢？

在政治版 iTunes 中下载幸福

约翰逊受“互联网”启发而对新政治哲学做出的解释，的确强烈暗示了他对现代政党体系的反感，尤其是他对“简化的党派投票”的抨击。但他的反感，尚不如某些试图一劳永逸“修补”政治的解决方案主义行动那么明显。举个例子，几家公民性创业企业曾试图用更有效的手段来取代美国看似运转失灵的两党制体系。“美国选举”（Americans Elect）就是这么个组织，它相信“互联网”能帮助找到一位第三方候选人来参加2012年总统选举。托马斯·弗里德曼[3]（Thomas Friedman）在《纽约时报》上对“美国选举”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认为它能对美国政治起到“Amazon.com之于书籍、博客圈子之于报纸、iPod对音乐和drugstore.com之于制药业”的作用。

弗里德曼在2011年7月写下了这句话。到2012年5月，“美国竞选”对美国政治所发挥的作用，甚至赶不上“pets.com对宠物商店起到的作用”，也就是说，没什么作用。当然，弗里德曼不孤独，其他许多被“互联网”冲昏头脑的专家，同样以为“美国竞选”将永远地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劳伦斯·莱斯格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提醒我们，互联网这些东西多么具有革命性，

3 美国公认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工作者，著有《世界是平的》。

他宣布，“十个州的一万次点击，就可以帮助一位候选人走上通往赢得‘美国竞选’提名的进程。”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竞选”尽管有“互联网”的承诺为保证，也无法找到一位合适的候选人，它发现，让任何一位值得注意的人参加竞选，单靠发推文很难做到。

但是近来解决方案主义者的攻势，已经远不止试图颠覆总统竞选进程的程度。政党体系本身正日益受到攻击，许多互联网叛逆者正整装待发，试图用基于互联网的灵敏组织方式来取代它。这套新说辞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Here Comes Everybody*）里所流露出的民粹主义和反组织思维；这本书有一个很动人的副标题——“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插入一段马克·扎克伯格2008年所说的颇具舍基风格的话：“我们正处在互联网的关键时期，有许多这样那样的应用程序，沟通应当有足够高的效率……这样人们就应当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需要一个庞大组织，数百万人组织起来筹集数百万美元，只为某个具体目标而战。”既然人们现在可以不依靠组织（不管是政党还是工会）就组织起来，干嘛还要留着那些既慢又没效率的机构呢？

这种反机构反政党的话语风格，很快就进入到旨在通过摆脱政党来修补政治的具体解决方案主义项目中。最令人瞩目的要属Ruck.us，它的标语口号是“无需政党，只要人民”。这家创业企业的联合创始人，是前参议员汤姆·达施勒（Tom Daschle）38岁的儿子内森·达施勒（Nathan Daschle），民主党州长协会（Democratic Governors Association）前执行董事。该网站的使命像它自己说的一样雄心勃勃：取代两大政党，因为它们都已变得“过时和陈旧”，一如Ruck.us另一位联合创始人雷·格兰德宁（Ray Glendening）对《华盛顿邮报》所言；再者，要把“互联网”变成这个国家政治表达的主要渠道。

其运作方式如下：当你注册这个网站时，你会被要求提供一些关于你个人兴趣爱好的基本信息（比如你更关心对外政策还是税收？），还有你的核心政治信仰（比如你认为政府应该在教育方面发挥作用吗？）。Ruck.us接着会计算出你的“政治DNA”，为你匹配相似的用户，鼓励你参加与此相关的“拉克”（ruck）（根据该网站的说法，“这个词来自英式橄榄球，球员松散地挤在一起，跟另一支队争夺控球权，这就形成了‘拉克’”）。Ruck.us就像政治版的Netflix，它的目标推荐引擎实质上是这样：如果你对控枪表示过强烈反对，那不妨试试参加禁止堕胎运动。这像极了Netflix喜欢“洛基”（Rocky，电影明星史泰龙的同名电影）就推荐“兰博”（Ramboo，史泰龙的另一部电影《第一滴血》里的主人公，这里指代该电影）的做法。

一旦置身“拉克”，成员就可以仅关注由其他成员发布的新闻，或者更加主动，自己分享信息：尤其鼓励分享有关请愿、组织和事件的链接。随着网站对用户了解得更多，新问题提了出来，新一轮“拉克”又推荐过来；每一轮“拉克”成员关系总在变动，几乎没有什么社区的感觉，因为每个Ruck.us的成员可能同时属于几十个社区。因此，焦点在以特定议题为中心的个人行动，绝非那些过时的理念，比如团结一致、集体追求共同目标等等。这听起来没什么地方特别赚钱，因此Ruck.us还发起了“赞助商拉克”，这是由国家野生动物基金会（National Wildlife Foundation）和Livestrong这类单位资助的活动，其目标和信息流一定程度上受赞助商支配。（在政治上这可能不是一场革命，但在院外游说上Ruck.us绝对是一场革命！）

回到2012年4月，当“美国选举”最死忠的粉丝仍然相信它会改变美国政治的时候，内森·达施勒为CNN写了一篇时事评论文章，高度评价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鉴于30年前我们对我们的局限性都还懵懂无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选项，量身定制、个性化和即时性，在19世纪缔造两党制体系

时一种也没有出现，”他叹息道。他接着称“‘美国竞选’的创新如此令人兴奋……它把我们从有害于我们政治体系的过时结构中拯救了出来。它是政治版iTunes。”达施勒也认为，网络不会消失：“趋势无可否认。变化正迎面而来，它的形式可能是‘美国竞选’、Ruck.us和所有其他颠覆性技术的集成混合。”混搭式民主可不见得是德·托克维尔[4]（Tocqueville）在《美国的民主》里描述的那个样子。

如果这些思想来自加利福尼亚某个读《连线》杂志的桀骜不逊的网络自由主义者，那倒不值得那么关注。但达施勒深深扎根于Ruck.us致力于颠覆的这个结构当中。这里的问题不仅是Ruck.us可能会对政治造成破坏，更在于，“政治版iTunes”这个想法，居然出自一个政治老手的脑袋。在此，互联网中心主义的主导地位或许能告诉我们一些真相。

Ruck.us背后的推动力，大都来自这样的观念：我们生活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因为一切都在变化。“政治是美国文化中最后一个尚未被技术根本改变的领域。当你环顾四周，我们生活中的每个领域都有大把选择，除了政治参与渠道：我们仍然只能二选一，”Ruck.us联合创始人格兰德宁说。但“政治版iTunes”究竟意味着什么呢？iTunes所颠覆的，不过是音乐产业批量销售歌曲并称之为唱片的能力。这是否意味着，如果达施勒如愿以偿，只有“重磅议题”（那些得到最多“拉克”或最佳赞助商的议题）才会参选，而那些没那么受欢迎但也许更重要的就不会？这怎么能说是好事情呢，尤其是对那些持不受欢迎的少数派观点的人来说？或者“政治版iTunes”不过是全球理想超市的粗略参考，在那儿公民消费者能选购实现情感幸福最大化而不要求太多回报的理想？除了拿iTunes做类比，还有什么方式能更好地

4 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和历史学家。

概括当代政治消费化这种情形吗?

果不其然，不是每个人都对Ruck.us兴奋不已。乔治华盛顿大学传播学教授戴夫·卡普夫（Dave Karpf）对《政客》（*Politico*）杂志说，“通过技术颠覆两党体系的设想，往往都有同样的基本缺陷：它们把政治当成了商业市场。”然而，根据卡普夫的说法，“我们的两党体系并非由市场问题构成；它的形成，来自选举体系的设计。吸引到多数选民的政党联盟赢得一切。位居第二的政党联盟一无所获。由此产生了两个政党。每次皆是如此。新的信息技术并没有让这有什么改变。”使美国形成两党政治的各种深层次结构问题，跟技术或信息缺乏没什么关系；因此，指望数字平台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实乃天真幼稚。这里再次强调，“互联网”是对不存在的问题给出的宏大解决方案。

这里的终极讽刺在于，互联网中心主义的解决方案主义者错误地判断了问题，又试图用相当草率的方式对此加以修补，由此他们自身可能出现问题。当然，现代政治（当然也包括美国政治）并不完美。但我们好心的极客们也需要稍微深入地理解两党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党派政治带来的各种积极影响。反党派主义在当前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时代并不鲜见，这种情绪在美国政治和社会思想中曾多次出现，许多早期思想家就认为，政党政治简直就是一套破产的分裂体系，它早已误入歧途，失去了统一性和整体性。绕开政党的尝试，不论是史蒂文·约翰逊的“液态民主”，还是Ruck.us模式，都不新奇，它们与志愿主义哲学（philosophy of voluntarism）非常一致，后者出现在“进步时代”[5]期间，认为公民可以绕开政党，成立自己的小团体和志

5 是美国国家建设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大约是指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这个时期。“进步”这个词喻指运动的支持者所具有的前瞻性思维，或者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的进步性。历史学家则认为，“从根本上说，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乃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新兴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起的问题的反映”。

愿者协会，对抗特殊利益集团。

在《天使的一面：了解政党和党派政治》（*On the Side of the Angels: An Appreciation of Parties and Partisanship*）一书中，南希·罗森布鲁姆（Nancy Rosenblum）对美国政治中的党派性做了开创性辩护，盛赞了“政党政治的创造性和党派性的道德独特性”。她还指出，政党不仅反映而且积极创造着党派成员的政治利益和主张。政党容易受到批评：选民发现它们令人厌恶；特殊利益集团和富有的捐赠人发现很容易利用它们；政党可能对公众舆论反应太慢，妨碍党员独自处理重要问题。然而，尽管存在这些缺陷，政党还是扮演了一个重要且往往不易察觉的角色，让政治生活变得更公平合理，更有创造性。它们控制竞争，调解审议，在时下重大议题背后举足轻重。

最重要的是，政党有助于为党派性蓬勃发展创造条件，不管中立派专家怎么想，党派性还是有许多益处。它把多元化牢牢地确立为城市里的唯一规则，迫使执政党承认，它自己那套“真理”，可能只是其中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根据罗森布鲁姆的观点，党派性“并不认为，多元化和政治冲突是迫于无奈，是对分歧必然性的实用主义承认。它要的是严格自律，承认我方政党的地位只是永久性多元政治的一部分，是执政党的临时特征，是一场假装代表整体的、心照不宣的哑剧。”

罗森布鲁姆认为，企图用某种缺陷更少、争议寥寥的东西来取代党派性，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她雄辩地写道，“让政治摆脱非理性，这本身就是非理性。”同样，历史学家西恩·韦伦茨（Sean Wilentz）认为，尽管党派性在今天的舆论中口碑极差，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反政党潮流在定义上就是反民主的，因为政党是普通选民发表意见、主张权益的唯一可靠工具。”换句话说，尽管可能有一天，数字技术会让颠覆政党体系和回避党派性变得更容易（像“美国竞选”和Ruck.us这样的创业企业一定会为完成这个使命而锲而

不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项计划就值得追求。我们为党派性问题找到了一个强大的“解决方案”，这也并不意味着党派性就是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解决方案主义和互联网中心主义迫使我们怀着对数字工具的全然敬畏来假设问题，而不顾民主政治自身的需要和要求。正如政治理论家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所说，“对既有事实的厌倦是自由人的大敌。”

学着爱上不完美

解决方案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它拒绝承认，不管它是否明确要求政治家应该完全诚实透明，或在现实中超越所谓党派的局限性，都可能会给我们的政治文化施加消极的影响。不能为完美而追求完美；民主是件复杂的事情，缺了失望，成功也就无从谈起。

放弃完美主义，将以完全不同的角度展现政治。如果人们认为政治总是不完美，而这种不完美是个好事情，那么解决方案主义对透明性的执着追求似乎就被误导了，原因很简单：这种追求不假思索，它把更低的投票参与率、偶尔的虚伪和犹豫不决这类妥协都视为罪恶，然而，任何现实主义的政治模式，都至少偶尔会把它们看作是美德。

解决方案主义者不明白，政治家不是充气床垫或吹风机，那些东西很容易按照五星标准打分，就像我们在亚马逊购物时做的那样。不是说我们根本不会评价他们，我们会，但这种评价归结为一个二元选择，我们每隔几年就在投票亭进行一次。一个深谙妥协之道并接受不完美有其必然性的政治家可能获得连任，但一款同样掌握这些技巧的吹风机绝不会得到五颗星。在波兰异见者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把民主定义为“永恒的不完美，罪恶、至善和恶作剧的大杂烩”时，他一定想到了什么。可你试试看用这句广

告语来推销吹风机。

如果对政治的失望会变得更加明显（鉴于信息环境的变化，可能会这样），那么我们极需找到新途径让公民理解政治的不完美。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在政治中坚持过于简单化的、简化主义式的“成功”标准，把手段（出席率）当成神来膜拜，认为它超过目标（立法会议讨价还价的结果），那么一连串“糟糕”数字就会看上去很糟，令人沮丧。

阳光基金会（Sunlight Foundation）（这是一座旨在利用数字工具提高政府透明性的技术解决方案主义堡垒）的约翰·翁德利希（John Wonderlich）热衷于说，“人们对政府的期待发生了文化变迁，它是由在线购物和实时获取金融信息的体验所推动的”，这话实在令人惋惜，而非赞叹。亚马逊购物者的心态，是高度重视即时回报，很少为他人做出牺牲。试试告诉这位购物者，他的欲望不可能全都得到满足，因为别人同样有令人信服的利益，它们也必须予以考虑——市场根本不是那样运转的。

然而政治的繁荣出于平庸，它是真实的，谁都能感觉得到；终有一天，所有人都注定会失望。如果谈判总是能够导向双赢的局面，就不需要政治了。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说过，“我们所鄙视的政治‘平庸’，不过是我们强迫政治家代表我们做的一堆妥协。”接受政治的平庸，就是承认公民不同于消费者，他不可能总是对的：消费者可以凭自己挣钱实现目的，被当作皇帝，期望得到最好的吹风机，公民则需要接受某种谦卑，准备好做出某种牺牲，只要是出于团结其他人的目的。

把消费者（甚至激进主义消费者）心态引入政治领域，将把政治变得令人失望，根本难以忍受。大多数公共机构的使命，是提供市场不能或不应当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但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拿与私人同行相同的标准来对待它们。就算没有恼怒的消费者不断提醒其表现不佳，公共机构的这项工作就够

有挑战性的了。凯瑟琳·尼德汉姆（Catherine Needham）在她2003年出版的《公民消费者》（*Citizen Consumers*）一书中告诫说，“根本危险在于，消费主义可能培养出心怀怨恨的私有化公民，他们对政府的期待永远得不到满足，无法培养起对公共利益的关切，而后者一定是民主参与的基础，也是对公共服务的支持。”

然而，并不只有“阳光基金会”的解决方案主义者在期待“互联网”表达某种也许根本不该表达的概念。知名的政治理论家一直主张“监督式民主”，政客在（公民、非政府组织、调查团和机构的）持续监督下进行工作，因为，众所周知，政客往往有缺点、效率低和腐败。并不是说这么做是错误的（此种背景下经常被援引的腐败和官僚胡作非为的故事显然不是什么童话故事），但“监督式民主”理论极少阐明，何种政治活动不应当进行详细审查、监督和评分。这里的危险，跟透明性方案的常见情况一样，在于增加的阳光被认为只对它自己有好处，而不是被当作其他更高利益的推动者。

在《捍卫政治》（*Defending Politics*，这或许是近几年出版的对政治实践的最机智辩护）中，马修·福林达斯（Matthew Flinders）发现，“监督式民主”存在的许多问题，与迈克尔·鲍尔在更广泛的“审计社会”中发现的一样。福林达斯告诫说，监督式民主的主要精力不是培养社会美德，而是“在所谓政客不可信的‘公理’基础之上，对政客和决策者进行控制、监督和详细审查。”

《卫报》最近一篇文章就体现了某种颇具代表性的公众舆论观点。它引用了一名普通选民的话，该选民抱怨说，“我认为政客就是小偷、说谎者和骗子”。这是一种不诚实的、侵略性的政治模式，它鄙视政客，推崇“我明白了”式的报道方式，津津乐道于“扒政治的皮的喜悦”。最令人不安的是，它对公民责任几乎绝口不提，而是一味强调他们的权利（基本上也只是一种权

利：知情权）。正如福林达斯所指出的，把公民当成消费者，会让他们以为，政治能达到“人们通常要求私营单位所达到的服务标准……这在政治上等于自杀。”

随着过去的报纸和电视档案馆实现数字化，随着全部演讲都为后世录制和转录下来，随着人们的早期推文和“逗弄”（poke）行为受到详细审查，向解决方案主义屈服，把政客与公共机构说成是骗子——这样的诱惑已变得难以抵抗。政客过去常常为他们不敢恭维的出勤率数据感到羞愧，但很快，他们将面对各种基于他们所说的一切的“真相”指数。最近政治圈里盛行核对事实，各种相关项目随之激增，比如PolitiFact.com（隶属于《坦帕湾时报》）、FactCheck.org（隶属于Annenberg公共政策中心），还有《华盛顿邮报》的Fact Checker（以1到4级的“皮诺曹（Pinocchios）”等级为政客的讲话评分），都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事情的蛛丝马迹。眼下，这种项目仍然需要人工分析和排序，但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聪明，档案馆变得越来越大，核对事实或许会外包给算法。

我们信仰真理？

由麻省理工大学研究生开发的“真理护目镜”（Truth Goggles）项目大受媒体好评，它是迈向事实核对自动化（至少需若干步骤）的重要一步。这个小软件能够集成到你的浏览器里。每当你访问《纽约时报》网站上的文章，就可以在浏览器里点击“真理护目镜”图标，该软件就会在扫描文章中的事实声明。如果文章包含了PolitiFact已核实事实声明数据库中6六千个（还在增长中）条目中的任何一条，那些事实就会用黄色高亮显示，其他文本则将被模糊处理。点击高亮的条目声明，会出现一个弹窗，显示出PolitiFact对这一特

定声明的评价（即它是真实的，还是真假掺半的，基本真实的，还是基本虚假的，或是虚假的等等），同时提供一些背景信息。

因此，我们又碰到了双击心态："真相"奇迹般地悄悄进入了我们的浏览器，尽管PolitiFact的真相猎手和麻省理工大学的创新者的高尚努力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大多数情况下也未经详细审查。但谁又会盯着真相猎手和创新人士呢？该评价范畴的两端极值（真实和虚假）看起来相当靠谱；标为绝对"真实"或绝对"虚假"的声明（假如它们与气候变化或进化无关），可能不太会有争议。但这两种声明之间的标值又是怎么样呢？我们真的能信任PolitiFact的判断吗？它把某件事情标为"基本虚假"，而或许它本应是"基本真实"。

2011年12月，著名博客和记者格兰·格林沃尔德[6]（Glenn Greenwald）指出，在对有关反恐战争和非法拘禁恐怖分子嫌疑人的陈述是否正确进行判断时，PolitiFact至少是部分求助了所谓"中立派"外交政策专家。这些专家似乎秉持中立，不受意识形态左右（PolitiFact的事实核查包括来源核查部分，用于评估陈述的准确性，列出了它所询问的专家）。有这样一个例子，PolitiFact先是非常模糊地重新表述了国防部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操作性定义，接着把罗恩·保罗（Ron Paul）"美国公民容易遭到本国政府暗杀"的断言标为"基本虚假"。格林沃尔德指出，做过这种假设的绝不止保罗一人；许多著名律师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也持同样观点。然而，PolitiFact选择向两名所谓的中立"专家"求助，如果格林沃尔德的话可信，他们绝非中立，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的新保守主义者。格林沃尔德是位了不起的辩才，在论辩中他的确有一种夸大事实的倾向，但此时此刻，他有充分理由：这里说到的两位专家确实有一贯支持全球反恐战争许多基本

6 前英国《卫报》记者，报道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爆料美国"棱镜"监控项目的第一人。

原则的历史。PolitiFact陷入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泡沫中，却对此浑然不觉。

一旦他们给争议性言论盖上同意或不同意的戳记，一旦这些戳记又在我们的浏览器中找到了永久的位置，“华盛顿专家”的假中间路线在公众对话中就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了。所以，半自动化的事实核查确实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它可以暴露事实性错误），但这些解决方案的达成，可能是以维持应予质疑甚至加以颠覆的意识形态框框为代价。这一特殊缺点是可以克服的，只要PolitiFact及其极客朋友们放弃双击的想法，承认自己也应当像接受事实核查的政客（他们热衷审查的对象）一样，接受详细审查，或许甚至更多。

未来几年，像“真相护目镜”这样的项目可能会越来越多，并更加成熟。一开始，它可能不会使任何公开言论消失（甚至某人从政以前发表的那些言论）。大多数政客已经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和所发推文）都可能永远存在，极客们则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提醒他们，事实的确如此：阳光基金会下属项目Politwoops收集并高亮显示政客们删除的推文，仿佛永远都不给他们机会对其所说的话表示反悔。也许，阳光基金会宁愿政客们一言不发吧。

存储、搜索和萃取文本的技术很重要，但它们只是开始。过不了多久，分析音频和视频文件以搜寻欺诈行为蛛丝马迹的技术就会变得十分廉价；音量、停顿和语气变化的“解读”能力和面部表情“解读”能力，将成为分析音频和视频的关键。随着计算机计算力越来越便宜，算法越来越好，影像资料库借助社交媒体越来越大，几十年来有关如何从人的面部自动“解读”情绪的研究开始结出果实——著名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的工作尤其突出，他的研究曾为福克斯电视系列剧《别对我撒谎》（*Lie to Me*）提供灵感。这些技术将要实现的远非只是分析特定言论准确性这么简单，它们能指出政客是否认真对待自己的承诺，他们对自己做出的声明是充满自信呢，还是就连自己也在怀疑，他们备受赞誉的改革计划可能根本不起作用。

这就是解决方案主义者应该多加小心的地方。“真相护目镜”这类项目似乎信奉这么一种政治模式：它认为虚伪、前后矛盾和模棱两可本质恶劣，对良好的政治有害，应该加以消除。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需要质疑的，不仅是认为言论真实性能在“皮诺曹”（Pinocchios）评分体系里进行归纳评价这种想法，还有认为虚伪、撒谎和模棱两可会毁掉政治这种理念。如果使用剂量超大，它们肯定会，但如果是小剂量，虚伪、撒谎和模棱两可与其说是恶行，毋宁说是美德。它们使政治进程得以运转；没了它们，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也就随之消失了。因此，尽管更新更聪明的技术最终能帮助把这三种恶行一股脑儿全消灭，那也不会改变我们很久以前就发现的政治真理。事实上，虚伪、撒谎和模棱两可都有许多有影响力的支持者，这些观点有许多是在我们痴迷“互联网”之前写的，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政治哲学家朱迪斯·史克拉尔（Judith Shklar）写过一本书，《平凡的恶行》（*Ordinary Vices*），在书中她认为，向虚伪开战是徒劳无益和适得其反的做法，因为虚伪是成就自由主义的一种结构性条件。她说，自由主义改革者不应该再把注意力集中在虚伪身上，而应该追寻其他问题——首先是残忍。“自由民主制的悖论在于，它鼓励虚伪，因为说服政治需要……对所有发言人的角色进行一定掩饰。另一方面，开放的政治竞争结构夸大了虚伪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因为所有政党都能、也的确在相互指责对方犯下了这一恶行。热诚坦率是否会特别好地为自由民主制服务，目前一点也不清楚。”

史克拉尔之后过了几十年，政治哲学家露丝·格兰特（Ruth Grant）又为虚伪做了一场重要辩护。她认为，某些虚伪实际上是积极的，甚至是必要的。因此，她认为，“大而化之地谴责虚伪，这才是一种政治恶行。当诚实政治的定义不是有操守的政治，而是那些‘现实主义者’（实际上只是些愤世嫉俗的人）毫不掩饰的自私自利时，尤其如此。”最近，政治理论家大卫·朗西曼

（David Runciman）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某些类型的政治虚伪甚至是可取的，值得鼓励。他对最近人们痴迷于铲除虚伪的举动给出了一个准确的解释：不是今天虚伪更多了，而是由于媒体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政治曝光，人们更容易发现虚伪了。

撒谎从政治理论家那里得到的关注要少一些，但历史学家马丁·杰伊（Martin Jay）在《撒谎的美德》（*Virtues of Mendacity*）一书中弥补了这一知识缺陷。真相可能使人失去力量，并不总是值得公开，或者正如杰伊所说，“说真话可以……是强者的武器，而撒谎则是弱者的战术。”没有谎言和虚伪的政治，根本就不是政治。按照杰伊的观点，“不管我们如何定义其本质，限制其轮廓，政治永远都不会是一块全无谎言的地带，只有真实、真诚、正直、透明和公正。或许……这终究也是件好事情。”期待政客总是说真话，等于是让有意识加以平庸化的政治服从完美主义者的标准，而那将使政治失去任何意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鼓励政客撒谎，只是说我们应当记住，谎言可能经常发挥着某种促成功能，尽管许多时候它们会促成腐败和懒惰，而在另一些时候，它们能促成妥协和希望。

强劲的事实核查文化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结果：自相矛盾、模棱两可的政治表述，将让位给更加具体的、着迷于数字的解释。这可能适合某些目的，以比尔·克林顿在2012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的演讲为例，它与共和党阵营罔顾事实的总体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种意外变化也可能对政治造成削弱性影响。正如政治学家德博拉·斯通[7]（Deborah Stone）在开创先河的《政策悖论》（*The Policy Paradox*）一书中所说，自相矛盾在民主政治中有许多积极用处；与其说它是一门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艺术。斯通说：“模棱两可促成了

7 美国学者，一生从事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她曾先后担任美国布兰迪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图兰大学以及杜克大学的教授。《政策悖论》是她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个人意图和行动向集体结果和目标的转变。没有它，协作和妥协会困难得多，就算不是不可能。”

比如，以相当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语言来定义政策，可能有助于政客获得来自许多不同层面的支持；精确性可以稍后再说。“‘保护美国人的利益’就是个模糊概念，每个人都可以团结在它周围。”她指出。事实上模棱两可能把事情做成，给政客以喘息空间，让他们致力于解决某个问题而免受媒体和公众关注干扰。因此，斯通写道，“立法者可以这样来满足‘做点儿什么’来解决问题的要求：首先通过一个具有模棱两可含义的模糊法规，然后让权力机构暗中敲定更具冲突性的幕后细节。”最重要的是，缺少了模糊性，冲突可能永远都解决不了，妥协可能永远都无法达成。“模糊性有利于谈判和妥协，因为它让对立双方可以凭借同一个决议宣告获得双赢，”斯通最后总结道。

要求政治更精确，要求政客把他们的想法记录到推文、“戳人”行为和博客帖子里，强迫他们对自己宁愿说也不愿做的想法表明态度，这都不可能改善我们的民主状态。我们必须抵制住诱惑，拒绝接受“互联网”的礼物，兴许它不过是伪装的灾祸。我们再也不能不首先调查什么值得做，就对这个数字技术新武库赋予我们的能力盲目迷恋了。

网络，领袖，统治集团

认为“互联网”能让我们摆脱政党，修复民主政治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这种观点要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1994年《连线》杂志一篇文章引用了著名技术投资人兼评论家埃丝特·戴森（Esther Dyson）的一句话，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开放网络使人们能临时组织起来，而非拘泥于某种刚性团体，那么有组织政党也就不再需要了。”当然，戴森的情绪只是极客对现代政

治（以及“互联网”修复现代政治的潜在可能性）普遍不安情绪的部分体现。正如《连线》这篇文章的作者乔希·奎特纳（Josh Quittner）所说，“网络只是达成目的手段。目的是对政府施以反向工程，把政治拆解成零件再修复它。”解决方案主义老早就跟互联网中心主义接上头了。

尽管如此，每一种新技术，不管是花哨的加密工具，还是山寨版的维基解密，或者对本来没用的数据进行可视化操作的小发明，都重新点燃了解决方案主义者的冲动，掀起又一轮新纪元主义，这回过头来又被当作证据，证明某种激进干预有道理，或干脆直接用来制裁不作为。结果，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提醒，“互联网”及其各组成部分成了重塑政治机构的范本，不管其现有结构对促进各种不同的人类利益做了些什么贡献。

因此，继劳伦斯·莱斯格之后，政府透明性运动的参与者希瑟·布鲁克（Heather Brooke）提出，“与其重新设计互联网来适应不受欢迎的法律和不受欢迎的领袖，我们其实可以重新设计政治结构来反映互联网。与其信任国家干预会为了保护我们而控制互联网，不如信任当个人在自由交谈、自由相聚时表现出的那种善意。”国家及其机构饱受怀疑，就好象“互联网”自有办法保护用户免遭侵犯隐私或网络犯罪似的。这里的信息毫不含糊：“网络”在这儿，要习惯它！上一次我核实过，这个举世闻名的“互联网”基本上是由盈利性公司创建的，它们有明确的赚钱目的，而非捍卫人权。为什么我们要参考这种模式来重新设计政治机构呢？

法学教授、前白宫代理首席技术官贝丝·诺韦克（Beth Noveck）以类似口吻警告说，“如果机构不和网络合作，网络会在它们周围发挥作用，使政府体系变得日益支离破碎、没有效能和脆弱不堪。”所以，我一点也不吃惊，她主张“民主理论和管理机构的设计必须为网络时代而重新考虑。”好吧，至少没说它是什么新纪元。

极有可能，这种对网络化、去中心化和无领袖结构的痴迷，认为它们较中央集权体系及其领袖（政党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具有所谓优越性的心态，互联网中心主义要负主要责任。对这种网络形成之容易和速度之快的过度兴奋，大体上解释了网络膜拜出现的原因。网络在把事情办成这方面可能不如等级体系，但这并不会让互联网中心主义专家感到困扰，他们觉得自己的任务是只要看到“互联网”都要大声赞美，而不是致力于分析，何种组织结构对特定改革议程更合适。

借用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中一句有关理性选择理论的招牌式隐语：“新获得能力的群体正聚集起来，在从前束缚其效率的结构之外工作。在每个地方，人们都聚集起来完成某项任务，注意，是每个地方。这些变化将改变整个世界。”“从前的结构”成了不必要的过时废物，它们阻挠了群体的自我实现。掌握权力的是群体和网络，它们是某种分布式存在，往往跨越国界；统治集团和国家，受限于固定的疆界和行动纲领，处处都在吃败仗。

网络拥有几近天赐的优越性，这种理念贯穿于舍基对维基解密的解释中，后者是一个管理所有网络的跨国网络。故此，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舍基说，“国务院绝不可能到维基解密那儿就所谓国家利益来一场对话，连跟那玩意儿扯上些关系也不可能。朱利安·阿桑奇不是美国公民，他是澳大利亚公民。他不是在美国的土地上操作的，他在爱尔兰。‘五角大楼文件案’的讨论完全发生在整个国家母体之内，维基解密的讨论则发生在国家的外部。”群体胜利了，民族国家失败了。网络很好，统治集团很糟。全球很好，本土很糟。

这里的问题在于，克莱·舍基相信，如今的全球事务是按“互联网”的需求而运行，而实际上，这个故事要复杂得多。现在的（曾经的？）环球网络维基解密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确进行过一场关于国家利益的对话。事实上，至少根据若干可信的报告，维基解密的确给了国务院复查外交电报和突出应

修改内容的机会，只不过国务院既讨厌又粗心大意的统治集团据说拒绝了这个机会（马克·史蒂芬，阿桑奇的众多前律师之一，就曾声称，在国务院的要求下，有两封电报实际上被维基解密撤掉了）。阿桑奇自己经常抱怨美国政府阻挠他的高流动性分布式跨国网络，不只是因为华盛顿能精准定位（不是直接定位，而是通过语言风格）这个网络的中间媒介，从信用卡公司到技术提供商。如果说真有什么启蒙故事讲述了统治集团之死和跨国网络时代的降临，那么维基解密的故事绝对不算。

说当前追求政治组织网络化扁平化模式的时尚仅仅是由于互联网中心主义，这是不对的。简单回顾一下经济学和生态学历史就能看出，对扁平化解决方案的偏爱早已出现，它未必构成了一套条理清晰的哲学，而是对招人恨的等级制管理方式做出的反应。数字网络不过提供了基础设施的外观，使扁平化管理模式能在其中发挥作用。这些新出现的机会可能会强行让自己变成应对一切组织挑战的优先解决方案，即便手头的任务需要更垂直化的等级制结构；渐渐地，改革运动开始把这种扁平主义接受为优先选择。这恰恰是社会理论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表达的意思，他悲叹说，“很遗憾……左派反对党的许多部门如今对等级制观念深恶痛绝。盲目崇拜某种组织形式（比如说完全扁平化），往往妨碍了人们探索正确有效的解决途径。”

而领袖，和统治阶层一样，被视为负担，变成了“互联网”要消灭的东西——仅仅为了让政治斗争更有效。监管技术与创新的国务院高级官员亚历克·罗斯（Alec Ross）对阿拉伯之春非常乐观。“想想过去的革命英雄，波兰的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捷克共和国的瓦茨拉夫·哈韦尔（Vaclav Havel），或者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今天发生在中东的这些革命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类型的英雄形象，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互联网分散了领导权。”但有没有可能，我们之所以看不到这些形象，完全

是因为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府一直在有组织地拘禁和折磨反对派（常常还是在华盛顿的默许下）呢？罗斯没有说。

就连那些参与了革命的人，似乎也沉迷于某种幻象，认为“互联网”颠覆了以往一切政治真理。曾经成为埃及青年起义公众人物之一的Google高管威尔·戈宁（Wael Ghonim）写道，“旧式革命需要有领袖。而我们的革命，以及阿拉伯世界发生的其他革命，都是一场没有领袖的运动。每个人都在做贡献。”当然，人们也是这么描述维基百科的；而事实上，“互联网”正是戈宁的操作性隐喻。“这是Web1.0和Web2.0的区别，在前者当中，互联网基本上是用户只能阅读和观看的内容，在后者当中，用户就开始针对内容相互沟通和协作了。在革命2.0中，没有人是领袖，每个人都是领袖，”他在2012年出版的一本书里写下这段话。这是个在互联网中心主义的空气中生活和呼吸的人。

除非人们以为穆巴拉克下台革命就结束了，这种逻辑才能成立。如果你以更长远的视野来看当时的形势，而不是把起义的结束当成革命本身的结束，那么这场没有领袖的革命算不算得上可喜的进展，根本就说不清楚。埃及后来发生的事件突显了戈宁思维的无比天真。夹在统治集团、军队和穆斯林兄弟会之间，自由派和亲西方的年轻人心怀政治就如维基百科的坚定信念，却基本上被排除到政治进程之外。更有甚者，明确领导阶层和共同目标的缺失，进一步分裂了这个“网络”，乃至其对手根本无需费多大劲。阿拉伯之春一年多以后，埃及政治社会学家哈泽姆·坎迪尔（Hazem Kandil）在《异议者》（*Dissent*）杂志上指出，“只要革命者无法安排好他们的等级组织，不能鼓励同胞做出艰难抉择、承担风险、接受短期的不稳定状态，那么人们就毫无希望把英勇的起义变成一场彻底革命。”

青年运动中的一些人很晚才明白，以网络形式对抗两大强力集团是何等艰巨的挑战。2012年6月，“4月6日青年运动”领袖艾哈迈德·马赫（Ahmed

Maher）对《纽约时报》说，“我们是点燃世界的火花；我们知道如何激发情绪……但除非我们有一个能站稳脚跟的强大实体，除非我们明天就能组建一个政府，我们才能成为替代选择。过去我们没搞明白，媒体并非街道居民的替代选择。”按照马赫的说法，创建这样的替代选择——一场超越网络局限性的真正的政治运动，是他的组织计划在未来五年要做的。“互联网”也许促成了阿拉伯之春革命，但“互联网”（至少是无条件盲目信仰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网络的心态）也让这些革命变得非常难以完成。

技术逃避主义者 vs 技术理性主义者

极客的政治迷茫，不仅在于那些摆脱重要中介机构、摧毁令人窒息的统治集团的乌托邦计划。还有一种同样令人不安的倾向是完全抛弃政治，指望技术（特别是“互联网”）能让我们摆脱政客再也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温和一点，指望我们能用技术专家和管理来取代政客和政治。前者是技术逃避主义者，他们认为技术，以“互联网”为例，会使政治变得过时；后者是技术理性主义者，他们认为技术和“互联网”可能会减少政治活动的政治性，转而拔高它的技术专家维度。两者都极端危险。

技术逃避主义者阵营的最佳代表，是德国出生的投资家彼得·泰尔（Peter Thiel），他靠PayPal发家致富，并且是Facebook的第一个外部投资者。泰尔是个很奇怪的人：自封为自由主义者，为罗恩·保罗竞选总统提供大量资助；又是Palantir董事会主席，这是一家顶尖的情报收集和数据挖掘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为美国国防界的利益效命，而后者其实是像保罗这样虔诚的自由主义者想要摧毁的社群。

Palantir还是开放政府的忠实信徒，向主要发起方阳光基金会捐过大量金

钱。Palantir主要服务于情报界，后者造就了美国政府的保密文化，但这并没有影响Palantir对“政府开放”的支持。这似乎相当奇怪，但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Palantir在YouTube频道上的一段视频展示了如何将阳光基金会创建的“开放政府”数据库导入这个公司的开源情报软件。注意这里的讽刺意味：“开放政府”运动正在为情报业提供更好的数据，而情报业反过来又支持着政府开放的主要敌人。

然而泰尔已经习惯了这种争议性。他因为支持堂吉诃德式的理想而备受媒体关注。他最有争议的一个想法是，付给有前途的年轻人每人10万美元，鼓励他们从大学退学，追求创业目标，他们中许多人都有改变社会的强烈倾向。这是最纯正的解决方案主义：世界问题似乎迫在眉睫，我们手中的技术又似乎如此强大，多等几年让这些年轻人毕业都好像是鲁莽之举。泰尔还有另一项堂吉诃德式的创举，他支持永久自治的海洋社群，让极客在国家的管辖之外工作、生活和做实验。为此他捐款超过一百万美元支持海洋家园协会（Seasteading Institute），由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孙子帕特里掌管，目前正在旧金山海岸以外199英里（320公里）的地方建造这么一个无政府区域，在那里，美国的一切监管——从控枪法律到建筑规范，统统不再适用。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功夫呢？也许，正如一位敏锐的智者所言，“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打算尝试更宽松建筑规范的首选地点，就是199英里之外的大海。”

2009年，泰尔为自由意志主义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撰文解释为什么自己的技术逃避主义名声是一件严肃追求。“在我们的时代，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伟大任务，就是找到一条出路，逃离一切形式的政治，不管是极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灾难，还是导向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轻率示威。”他写道，“关键问题于是成了一种手段，一种超越政治之上而逃离的手

段……逃离的模式必然涉及到某种迄今未经检验的新过程，它可以引导我们发现某个从未发现的国家，为此，我全身心投入到新技术，它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自由空间。”泰尔接着论述说，赛博空间（即网络空间）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空间，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末，PayPal的创始愿景专注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货币，不受一切政府控制和削弱，这就是货币主权的目标，从来如此。”

现在，从理论上看，PayPal似乎的确完成了技术逃避主义的梦想：最终人们将不再与银行和国家绑在一起，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参与交易。然而，除非人们认为PayPal这类平台运行于绝对的权力真空中，国家、机构和统治集团对交易各方及PayPal自己无法施加任何压力，否则这不可能是真的。PayPal可能在理论上消除了对银行的需求，但它的投资者仍然需要银行来兑现PayPal开出的支票，因此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技术逃避可言。

看看PayPal在维基解密传奇中曾经扮演的角色吧：是的，最初它是为阿桑奇的理想募集资金的伟大工具，但从维基解密挑战美国政府那一刻起，PayPal就从阿桑奇身边逃走了（同时冻结了维基解密的账号），与彼得·泰尔打算逃离现实的方式大致相同。同样，截至2012年7月，PayPal修改了它与文件共享网站的合作方式，要求任何有意使用PayPal向用户收取会员费的网站，必须确保自己不存有任何非法文件。PayPal非但没有颠覆娱乐业的权力（就像泰尔的技术逃避主义信仰所暗示的），反倒变成了让这种权力永存的有用工具。极客们对权力缺乏远见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技术逃避主义的最近一次现身，可以在新书《富足》（*Abundance*）中发现，它的合著者之一是彼得·戴曼迪斯（Peter Diamandis），一位富有的创业家，奇点大学的联合创始人。奇点大学是推广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思想的一条渠道，他认为计算机有一天将和人一样聪明，人接下来将会永生。

奇点大学以易于理解的方式，把这套思想与技术福音书的其他一些核心思想一道加以介绍，很适合对这个大学趋之若鹜、舍得掏10周2.5万美元学费的忙碌高管们。（泰尔也是奇点的一位热心支持者，曾经捐款给库兹韦尔；他恐怕不大可能给某人钱，让他从奇点大学退学吧。）《富足》的基本信息是，技术正不断把东西变得更好更丰裕，因为“当我们透过技术透镜来观察，几乎没有什么资源是真正缺乏的；主要是难以获取。”因此，我们最好听从戴曼迪斯这样的技术慈善家的意见来解决世界上一切最紧迫的问题，从饥饿和独裁主义，到教育和医疗保障。“高科技革命创造了一大批全新的富有技术慈善家，他们正在利用自己的财富来解决与富足有关的全球挑战，”他写道。

戴曼迪斯向我们承诺一个富足的世界，它基本上不需要任何人做出牺牲，而既然没有人利益会受到伤害，政治自身就没有必要了。事实上，所有问题都能在局部得到修复，从而绕开了既有利益；“在今天的超链接世界，在任何地方解决问题，解决一切地方的问题，”他这样说道，这一定是那本书里最空洞的话了。（如果“橙色国家”的人用一两条推文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还在为纳尔戈诺-卡拉巴赫征战不休呢？戴曼迪斯没有说）。“政治”这个词只出现了一次，在参考书目中网站的网址（foodpolitics.com）里。技术会取代政治，因为它会避开流通和分配问题，代之以生产和应用问题，这是技术逃避主义的核心信仰之一。没有政治，没有某种强迫或施以惩罚的威胁，一些参与者，不管是国家、公司还是个人，可能不会与他人合作，拒绝减产或采用更有效率的技术，或为破坏环境或公共利益而承担相应代价，技术逃避主义者自然想不到这些。

技术记者乔·格特纳（Jon Gertner）在《纽约时报》为这本书写了书评。乔指出，《富足》可能会掩盖气候变化这类问题，“因为要阻止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必须依靠巨大的技术推动，还要摊上改变人类行为的麻烦事儿，还

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政策并促成国际谅解。换句话说，它一开始就不符合作者主张的DIY（自己动手）或技术慈善式修补的范式。”同样，指望分发平板电脑或电子阅读器能够解决非洲的文盲问题是一回事，让政府切实承诺选择阅读器，而不是使用课本、修建修学校或雇佣更多老师，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前者是应用问题，后者是分配问题。没有任何技术能解决后一种问题，因为这场辩论由完全不同的思想所激发，比如什么是教育、政府资金应如何分配，这些思想和我们所讨论的技术几乎毫无关系。

与泰尔及其技术逃避主义者招牌不同，技术理性主义者并不以使我们摆脱建筑规范为目标。跟优秀的技术专家治国论者一样，他们倒是希望尽快采纳这些规范，无需太多不必要的磋商和辩论。在这种模式下，他们认为，政治除了修补坑洞和对付流浪狗之外，别无他用。政治事务被简化为行政管理事务，而这些问题能科学地加以解决，因此无需浪费时间讨论其优点，以免政治进程出于持续混乱状态。杰夫·贾维斯告诉我们，“如果极客接手（他们会的），我们可能会进入政府走向科学理性的时代。”在电影《社交网络》里，贾斯汀·汀布莱克（Justin Timberlake）扮演的Facebook前总裁肖恩·帕克（Sean Parker）就满腔热情地宣告，“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终将在改革政治中扮演角色，它终将发生，因为……那些系统将把政治变得更有效率。”

相比之下，技术理性主义者们认为，今天的政治效率极其低下，需要修补，即便不是彻底更换。前Google高管卡蒂·斯坦顿（Katie Stanton）曾短暂供职于奥巴马政府，目前为Twitter工作，她把自己在华盛顿的经历比作“素食者困在了香肠加工厂。”她的前老板、Google的埃里克·施密特抨击华盛顿是“在职官员的保护机，那儿的法律都是游说者写的”（但这种反游说者情绪一点也没有妨碍Google迅速扩展它自己在华盛顿特区的游说活动）。许多极客对政治极不耐烦，他们认为政治除了空谈，一无是处。在他们看来，审议

是现代民主机体内的癌症，用行动、用干实事代替空谈将更加富有成效，因为这样的饶舌几乎毫无用处。说到底，了不起的app应用从来不是靠委员会开会搞出来的。所以，开放政府的倡导者、《维基政府》的作者贝丝·诺韦克以深受行政管理人士喜爱的那种语言告诉我们，“早就该重新考虑在一小部分代表机构减少参与的合理性了。”明白了吗？

这个令人费解的语言结构究竟什么意思，很快就变清楚了。她写道，“数字环境提供了参与公共理性交流的新方法。有了新工具，人们就可以通过共享地图和图表来‘交谈’，不需要开会了”。地图和图表可比辩论和会议好多了！因此，诺韦克抱怨说，“处在技术和民主交叉点的大部分工作，都专注于如何创建基于人口统计的代表对话。重点在审议，而非协作；在对话，而非行动；在信息，而非决策。”这是对维基政府的一种相当沮丧的看法：与其让公民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不满和忧虑，还不如给他们一个机会，用维基百科的风格，帮助绘制社区地图。政治过时了；技术专家统治来了。我们会检查某张在线表格，告诉政府有哪个坑洞需要填补，但我们不会讨论修补坑洞的工人是否应该得到更高的报酬，或者我们是否需要更好的道路。

在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的著作中，能看到更加猛烈（甚至反民主）的反政治情绪。这位地缘政治学的天才神童近来把自己重新塑造成了技术梦想家。在与妻子合著的《混合现实》（*Hybrid Reality*）里，卡纳暗示，不仅是讨论，甚至就连选举都需要放弃，这样技术专家统治模式的势头才能持续如初。借鉴了乔纳森·奇特林的原生性理论（技术中心主义又一次昂起了它丑陋的脑袋，为疯狂的治国理念摇旗呐喊），卡纳以政治局一般的委婉风格写道，“某种原生性统治体系能够被设计出来，它既确保稳定性，同时又推动积极变化。”

这是什么意思呢？嗯，“积极变化”对帕拉格来说，意味着“利用技术对

国家大事进行审议、提供公共服务和纳入公民反馈，这最终可能形成一种直接参与形式，比间接代表和非经常选举体系更可靠。”他接着说，“如果只剩下阿根廷、匈牙利和泰国伪民主的徒劳民粹主义的选择，我们不可能害怕技术专家统治。设计更完善的技术专家统治应该取代的，正是这些运转失灵的民主（如今它们是主要候选对象），这可能为公民带来更多利益。”

这一切听起来与其说是“维基政府”，不如说是“邪恶政府”。审议和辩论遭到压制；技术专家和行政官员被赋予随心所欲的支配权；改变生活的深刻政治事务，改头换面成了事关效率提高的事务。政客呢，和预料中的一样，因为其党派意识形态而遭到厌恶。掌管Google创业基金的比尔·马里斯在一次访谈中，极其完美地诠释了极客对政治的反感，和对行政管理的强烈敬意。此人对政治深恶痛绝，极其希望用技术专家统治来取而代之：

> 思考政府政策往往让我不寒而栗。政府里充斥着各种事情，它迟钝而复杂，没人能了解。硅谷发生的伟大事情，往往不是靠政府政策完成，而是靠单个的人完成的，他们站起身来改变世界、发明创造、为自己和孩子们创造更好的生活……在我喜爱、信任和尊敬的人里，很少有真正想从政的。因为，他们有什么动机去从政呢？通常不会是财务方面的，但愿吧，但是也没有多少做出改变、有所作为的动机……有的人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都献给了政府和政策，我讨厌这么干，我会问自己，“究竟有无尺寸之功？”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政治和政府之间划清界限。有些人的工作真的很辛苦，服兵役，修桥，工程师，国家卫生研究所，与此相反的是那些跻身华盛顿最高层的人。你不禁要问：“你们这些家伙是不是完全脱节的呀？”

这一小段愤激之言说明了一切：对孤胆英雄、创业家的崇拜；没有政府干预的“互联网”神话；对提供足够财政激励（如果把所有政客都看成骗子，还有其他什么东西能激励人们参与政治呢？）的政治事务的构想；政治和行政管理之间的鲜明区别，以及对前者的极大反感。

技术专家及其局限

人们本来认为，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技术专家统治的知识贫乏，以及政治相较于它的优越性，将是不争的事实，无需更多辩白。早在1902年，温斯顿·丘吉尔在一封写给H·G·威尔斯的信里就警告说，“没有什么比国家政府掌握在专家手里更要命的了。专家知识是有限的知识，而知道痛点在哪儿的普通人的无限无知，用来指引方向，却比专业人士的严苛管理更加可靠。”期望极客知道点儿历史，这难道太过分了么？

杰夫·贾维斯热衷于极客管理的科学理性政府，这很是奇怪，因为，这种科学理性政府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类计划完全没有什么独创性可言（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互联网中心主义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力量，仅凭与“互联网”有联系这一点，它就把陈旧的、早已抛弃的倒退观念重新打扮成独特的、开创性的进步观念）。贾维斯对“科学理性”政府的要求真的与圣西门[8]（Saint-Simon）的主张不同吗？后者在1821年说，“在新的政治秩序下……决策必须是完全独立于人类意志的科学论证的结果……在这样的秩序之下，我们将看到，现有政治体系的三大缺点都会消失，它们是随意性、无能和阴谋诡计。”

8 指克劳德·昂列·圣西门，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在首次出版于1961年的《为政治辩护》（*In Defense of Politics*）一书中，对这套迄今为止最为一厢情愿的思维（及其对随意性、无能和阴谋诡计的不敬）做了最完美的批评。“假设圣西门所厌恶的‘随意性’不过是多样化的产物；‘无能’，不过是对局限性的感知；‘阴谋诡计’，无非是任何适度自由的国家都存在的不同利益的冲突……那么，这就是政治自身的特性了，而且是相当好的特性……本质上说，困扰对政治学满怀希望的人的，不过是普通政治里存在的冲突元素；令他们兴奋的，却一直是科学的特权，是它公认的‘统一性’好名声。”支持这后半段论述的思想（即科学的统一性），早已被新一代科学史学家们所抛弃，他们遵循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范式，指出科学性的学科依赖截然不同的思维和论证方法，而所谓统一性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个神话。认为冲突对政治不利的想法甚至更加可疑。政治中存在那么多冲突，只是因为，有选择自由的人一定会寻求冲突性议程。圣西门所谴责的政治随意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真正自由的社会，追求何种自由几乎是不受限制的。因此，人们不可能设计出什么算法或整套法律来解决接踵而至的矛盾和冲突。圣西门对自己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某种很有诱惑力的解决方案（虽不如“互联网”那么好，但是也足够好了），只不过他所认为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作该书时，伯纳德·克里克够有先见之明的。他预见到技术远不只是一堆产品和系统；它还可能是某种打着改革政治和清除缺陷旗号的思想风格，这种学说能“使人们摆脱缺乏确定性和妥协泛滥的局面……并且为纯粹的政治重新提供活动空间，使其重新得到发展。”克里克写道，这种学说的关键，是坚信“只要理解了权力和生产的技术，社会中一切……都能得到理性控制。”换句话说，克里克早就批判了解决方案主义；他

自己痛恨的东西，互联网中心主义，也被一并带了出来，他给它取的名字叫做“唯科学主义。”

许多研究技术专家统治论的学者都赞同克里克的结论。社会学家基恩·梅诺（Jean Meynaud）对法国技术专家统治论进行了研究。他写道，“技术专家心态最重要的组成要素之一，就是他坚信，对事实进行理性分析和解释，至少在心怀善意的人之间是能达成一致的。如果技术专家相信自己已经彻底理解了一个问题，当碰到和自己理论相反的情况时，他总是会感到惊讶，甚至苦恼；他必然倾向于将这归结为无知或敌意。”既然他的解决方案有这么明显的好处，人们怎么能意识不到它们呢？

梅诺推断，技术专家统治论者坚信自己能优先获知真理，认为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都是笨蛋。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和其他事情相比，Google为什么对其扫描全世界书籍的追求招致大规模反对大感迷惑了。1999年和2005年之间担任Google品牌经理的道格拉斯·爱德华（Douglas Edwards）曾这样描述：“在拉里·佩奇和塞尔吉·布林看来，真理往往是不言自明、无可争辩的。其他人意识不到真理，无损真理之绝对性。显而易见，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是一个好主意。显而易见，书籍里蕴含着大量的宝贵信息。显而易见，帮助人们找到书里蕴含的信息是件好事。显而易见，只有人们在作者的书里找到有用信息，作者才能受益。这里没有任何灰色地带。说到底，真理是个二元函数。”

但真理真的是个二元函数吗？如果人们傲慢地以为，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才是唯一“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那么，或许是吧。技术专家统治论的思维把多元化视为敌人而非盟友，或者，以极客自己的说法，它是“bug”而非特色。两位研究技术专家统治论的学者认为，它的基本假设“是发生分歧

不是因为人们必定有所不同，而是因为他们收到了错误信息。”这里的悖论在于，尽管技术专家统治论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大多数技术专家统治论者却竭力疏远任何含蓄的批评，即引发分歧的可能并非实用主义和追求效率。

遗憾的是，克里克对技术至上思维的批判，受到的关注不如同时代其他一些学者提出的类似批判：比如简·雅各布斯对缺乏想象力的城市规划的批判，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对所谓“强求一致作风”的批判，弗雷德里克·哈耶克对中央规划的批判，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以及迈克尔·奥克肖特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一下子都浮现在我脑海里。这些对规划者和改革者的自大自负所做的重要批判，大多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在人与其他人共同生活在城邦的体验中，有些东西本质上无法用公式化表达，也无法用优化技术来约减。思考和审议不可避免；哪怕是最完美的算法也不能让我们省掉它们，否则我们的政治文化将陷入枯竭。

因此，现代改革者的思维定式（一如其批判性倾向）有着广泛的知识分子传统。“互联网”只是存在已久的冲动与欲望的激活器和巧妙的遮瑕霜。然而，否认过去二十年带来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创新浪潮，激增了不计其数修补政治的新方法，那将是徒劳无益的。

好的意图，即便批着令人兴奋的混搭外套，也无法为天真正名。自克里克写下对技术思维的批评之后，有一个事实不曾改变：不先彻底理解是什么和为什么就去修补政治，仍然是非常危险的举动。或者，说得直白些，按照愚蠢的想法行事，代价永远小不了。政治思维还有政治道德需要培养；它不是自发产生的，硅谷天才也不例外。1993年，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米格尔·安吉尔·森特诺（Miguel Angel Centento）对技术专家统治论的思维定式做了一番研究，他说得非常好，“高级学位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当代的‘利维

坦’们（Leviathans，传说中的怪物和恶魔）构建这样的社会，人的寿命更长，痛苦更少。即便这样，那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专业知识能阻止利维坦把我们变得更加野蛮。”

05 算法“守门人”的危险

“是的，廉价设备正趋向民主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正日趋民
主化。但足球很便宜人人都能踢，
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是罗纳尔多。”
——**弗兰妮·阿姆斯特朗，**
英国纪录片制片人

有一天，时任高雅在线杂志《格尔尼卡》（*Guernica*）总编的约珥·惠特尼（Joel Whitney）突然收到一封来自Google的邮件。作为一本涵盖政治、文学和艺术的杂志，《格尔尼卡》的作者来源广泛，从诺姆·乔姆斯基[1]（Noam Chomsky）到阿米塔夫·戈什[2]（Amitav Ghosh），从阿马蒂亚·森[3]（Amartiya Sen）到梅根·欧罗克[4]（Meghan O’Rourke）。这不是普通的匿名Tumblr微博客，但它也并非大手笔投资的文学渠道；他们就是能花很少的投入办很多事。

Google的电子邮件通知惠特尼，《格尔尼卡》 的AdSense广告体系

1 美国语言学家，转换-生成语法的创始人，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
2 著名的印度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著有《罂粟海》、《烟河》等小说。
3 以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年）。
4 美国诗人和评论家。

（Google这个项目使加盟网站能通过运行自动生成的定向广告赚钱，这些广告是针对网站内容和受众设计的。）成员资格将被撤销。对《格尔尼卡》这类网站来说，每月读者只有区区六位数，AdSense收入虽少，但却比较稳定——这还只是Google对文学世界众多不太引人注目的积极影响之一。

Google愤怒邮件的导火线，是一篇名为“早期性体验”的短篇小说，它几个星期前出现在《格尔尼卡》，刊登在“创新传记写作”这期专刊上，编辑是知名作家戴博·奥林·安弗斯（Deb Olin Unferth）。这篇短篇小说为同样有名的作家克兰西·马丁（Clancy Martin）所写，其作品曾发表在《纽约时报》和《哈泼斯》杂志上。这是个第一人称、1500字的有关早期性体验的故事，其中提到了手淫和失贞。Google，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其古板算法，把这篇小说标为不合时宜，与Google行为准则相抵触。Google算法认为《格尔尼卡》是色情文学，然后这家公司听从了它的判断。《格尔尼卡》刚得知这项决定后没多久，它网站上运行的Google广告就给关掉了。Google有一套申诉流程，但在格尔尼卡这个案例里，它根本没起什么作用。惠特尼说，“我们甚至咨询了一位朋友（他去年买过我们的筹资餐会门票，是位义务支持者），同时也是Google的雇员，他告诉我们这是由算法决定的。反正Google还是拒绝了我们的申诉。”还有哪个神智清醒的小在线出版商还敢出版克兰西·马丁这样的自传呢，如果这意味着放弃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格尔尼卡》并非孤立事件。2011年底，生活在纽约的尼日利亚流亡人士奥摩耶尔·索沃（Omoyele Sowore）收到一封来自Google的类似电子邮件。索沃经营着一个叫做“撒哈拉记者”的网站，该网站发表有关尼日利亚事态的社论文章和公民记者网络提供的现场新闻报道。有一篇报道聚焦该地区的警察暴行，并上传了一些新闻图片。Google算法发现这些图片太暴力，就通知索沃，暂停该网站参与AdSense的资格。向Google提出的申诉如石沉大海。

直到保护新闻委员会一名高层出面干预后，Google才同意重新考虑对“撒哈拉记者”的处理（大概是考虑到，这件事如果被激进主义言论自由组织传出去，会起到很坏的宣传效果）。

表面上看，这两件事似乎没那么有争议。毕竟Google是家私有公司，它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运营它的广告业务；不可避免会有人试图利用其广告系统非法赚钱。或许不该允许宣扬种族暴力或恋童癖的网站借助Google赚钱。因此，如此令人担忧的，并非Google选择生意对象这件事。甚至不是Google对创新小说的过分拘谨（人们可以料想，即便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也不会从Google AdSense中赚到多少钱，如果他选择在博客上连载《尤利西斯》的话）。甚至也不是Google把如此重要的决定外包给算法这件事。这里真正令人气愤的，是Google对其算法的所谓中立和客观性的坚持。它不承认自己的算法可能存在缺陷和偏见应予修正，而是表现得很偏执，似乎允许人们偶尔评论其算法，都像是要它完全放弃自己对人工智能的信仰。

Google不愿承认算法有时可能会出错，这让它摆脱了许多棘手的伦理问题。以Google的“自动完成”（Auto complete）为例，这个功能很有用，用户仅输入几个字符，Google就能提出若干备选项，补完搜索查询。通过借鉴其他用户的历史搜索，“自动完成”能预料，如果你输入“罗马不是”，很可能会以“一天建成的”结尾。干嘛不干脆省下输入整句的这几秒钟呢？既然他们的搜索查询有如此多相似，干嘛不为用户节约其宝贵时间呢？

唉，我们不光是Google信息图书馆的主顾，我们还是其许多书里的主角。Google不断修补其算法，增加新特色，这些书也就不断发生着变化。Google“自动完成”这类服务带来的一个间接后果是，现在任何人都能看到，针对特定主题的哪类搜索最热门。当我在Google中输入“布兰妮·斯皮尔斯

是”，“自动完成”基于大多数其他用户的历史搜索给了我四条建议。原来，有人曾询问布兰妮是不是“邋遢鬼”，她是不是“死了”或“很丑”，或者我最喜欢的，她是不是“三个脑袋的外星人”（进一步调查发现，这是一本书的标题）。

布兰妮·斯皮尔斯是一位公众人物，这里的争论充其量也是没什么实际意义的争论。但是想象一下，你有个处心积虑想要诋毁你名声的敌人，出钱让用户以“恋童癖”这个词和你的名字为关键词来进行搜索。通过Craigslist和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招募的狂热水军所制造的搜索量，足以让这个新查询项取代其他几个关联你名字的更正面的查询项。现在，每个搜索你名字的人，同时也被告知，你可能是一个恋童癖者，还有，记住，你没地方可以申辩，因为现在由Google算法说了算，它们永远不会出错。

很难说德国前第一夫人贝蒂娜·沃尔夫是不是类似众包式抨击事件的受害者，但在2012年9月，她起诉Google“自动完成”搜索结果把她的名字跟“妓女”和“伴游女郎”这种词放在一起。沃尔夫案只是这个搜索引擎巨人所面临的众多法律挑战之一。Google坚持认为，其算法为获知真相提供了一个无中介的客观途径，却在欧洲和亚洲屡屡遭遇法律上的麻烦，并且已经在法院输了好几场官司。这些官司的原告，大多是激怒的个人和机构，他们发现自己的名字和品牌跟各种恶意词语和影射关联上了。在日本，一个日本人控告Google“自动完成”结果把他跟自己从未犯过的罪行建立链接，Google被勒令予以修改。同样，在法国，它暗示某人是“恶魔崇拜者”和“强奸犯”，遭到起诉后，Google同样被勒令修改其“自动完成”结果。Google在意大利也输了一场类似的官司。

在几乎所有案子里，Google都援引了算法的中立性，声称“自动完成”的结果只不过反映了其他人搜索过什么内容。正如该公司发言人回应其中一

起诉讼时所说，“我们认为Google不应当为出现在“自动完成”中的词语负责，因为它们是由计算机算法基于用户历史搜索预测的，而不是由Google自己。”Google当然知道其算法可能会被愚弄：在2010年，一个名叫布伦特·佩恩（Brent Payne）的商人求助于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上的廉价人类劳动力，给愿意执行其指定搜索的个人提供小额报酬。他的聪明把戏的结果是，任何在Google上搜索“布伦特·佩恩”的人都会看到，“布伦特·佩恩搞了这个小把戏”成了“自动完成”的推荐选项之一。这个恶作剧起作用了，直到佩恩把他的经历公之于众为止。

并非每个受到Google“自动完成”影响的人都会跟这家搜索引擎巨头对簿公堂。采取一套更人性化的政策对人会有什么坏处，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或许Google的底线例外）。这实际上并非言论自由问题，因为没人要求Google从搜索索引里移除攻击性信息；如果它们真的存在，实际包含这种信息的页面就还能找得到。但Google完全可以主动拒绝展示负面推荐结果，比如“白痴”和“魔鬼”这一类的。那些想要“约翰·史密斯是魔鬼”这个结果的人，只能输入整个查询语句，干嘛要给他们节约时间？事实上，Google对文件共享网站的态度已经是这样；如果你想让Google给你提供来自“海盗湾”（臭名昭著的盗版内容交换平台）的链接，Google“自动完成”不会给出任何提示，你只能自己输入整个查询语句。

或者Google能找到办法让公司和个人在网上表明身份，选择删除有关自己的负面自动提示。最低限度，它可以创建提示投诉渠道，既然Google也有自己的社交网络Google+，这就容易多了。这对没钱维护网上名声的小企业来说，可能特别重要。如果竞争者能借助Cragslist或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来生成有关这些小企业的“自动完成”结果，这可能与其业务成败利害攸关（类似情况同样发生在另一个叫做Places的Google服务上，使用该服务的一些公

司报告说其竞争公司“关门了”，该信息一旦流入Google信息帝国，就可能使其竞争公司失去成千上万潜在消费者）。

但只要Google坚持认为其算法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这一幕就不会发生。事实上，镜子与反映这类措辞在Google的自我展示里无处不在。玛丽莎·梅耶尔曾长期身为Google高管，后来跳槽成为雅虎一把手，她在谈到其前雇主时曾说，“我们一直试图为世界打造一面虚拟镜子。”当被问到数字平台在2011年席卷英国的暴乱中所扮演的角色时，Google的埃里克·施密特同样援引了镜像这个说法。他说，“一边照镜子，一边又试图打碎镜子，这是错误的。（引起暴乱的）问题不管是什么，互联网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反映。”

注意，把“互联网”当作统一的社会力量，使施密特避开了任何有关其构成要素的有意义讨论。（在这一点上，Google不是一个人在战斗；Facebook也喜欢躲在这样的镜子措辞后面：“我们在系统里的角色，就是不断创新和更新系统，好让它反映现时社会规范。”）但是，对于把握Google在今天公共领域的角色来说，镜子是个糟糕的比喻。这个公司不仅在反映，它还塑造，创造，甚至歪曲，在此过程中，它采用了各种做法，而这些做法，是无法化简为一套统一的“互联网”逻辑的。社会学家唐纳德·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对金融模型所做的阐述，同样适用于Google：从它最初如何选择展示和切割现实，同时为自己创造新的现实这一角度来看，与其说它是个照相机，不如说它是个引擎。

把Google工程师和记者做个比较。后者可能会喜欢这个观点，也就是说，他们也只是在详尽反映或记录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但要是记者认为新闻工作不会同时改变现实，在政治进程里引入（往往令人不安的）新刺激（比如在视听节目里发言，或高亮显示某人信息中最民粹主义的部分），那就太天真了。现实可能会得到很好的记录，但报纸、广播电台、电视频道同时也是

复杂社会技术系统，成千上万参与者在追求他们自己的议程，这常常与现实记录本身毫无关系。

事实上，对当代资本主义制约新闻业发展的各种状况（从对个人职业安全的持续焦虑，到创作成功的在线内容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才能给我们一个更好更负责任的新闻业。与其说躲在“客观”或“中立”的标签后面，假装任何持记者证的人都自动认同这些价值观，更有建设性的做法，是去调查，究竟是什么样的障碍（不管是文化上的还是经济上的）阻碍了这些价值观。如果“客观”和“中立”仍然被认为在从事新闻活动的环境中有用，那么支持它们冲破所有障碍的努力，一开始就可以诚恳些。

同样，Google也应当从镜子和反映的说辞后面走出来，承认自己在塑造公共领域的巨大作用，以更负责任的方式扮演这个角色。“客观”是个艰苦的工作；不是说把重要工作委托给算法就万事大吉。新的算法霸主不能指望着扮演伦理机器人；只有通过自我反思和道德想象，它们才能不辜负其公民责任的重担。

哎，他们的现有态度远远及不上这个理想。《连线》的史蒂文·列维在他为Google所写的圣徒言行录式的传记里说，“布林和佩奇深信，如果Google算法决定了何种结果为最佳，并且长期点击率也显示该算法满足搜索者需求，这些搜索者就会干扰搜索结果。”他们真的相信这一套，但史蒂文·列维干嘛不费点儿心调查一下为什么？我们的技术记者是时候学学控制一下自己为圣徒代言的冲动，质疑一下硅谷滔滔不绝的这类故事了。

为什么布林和佩奇相信这个相信那个，他们又是怎么让几乎所有人都跟着相信的，我们需要对此加以解释，而不是视为理所当然。不能认定这种信仰不言自明地正确，就好像仅凭给定算法的技术效力，就足以解释google的成功似的。每个工程师都知道，达到同样目的，通常有很多种方式。为什么

其中一些方式，即使其呈现方式是纯技术的、毫无问题的，光用效力这一看似永恒的概念解释不清楚；为什么这类概念硬要给自己贴上永恒和值得追求的标签；“互联网”理念是如何改变这类概念的诉求的；为什么是“镜子”而不是“引擎”成为解释Google的首选隐喻，这些都是我们关于技术的公共对话必须解决的谜题。

沉没在算法海洋里

跳出技术专家向外行介绍工作时讲诉的那套宏大而乏味的故事，我们就会站在一个更好的位置上来理解技术的内部运作，它们对公民的影响，以及如何改革和监管它们。Google自己的话语风格就是个很不错的调查目标，这不仅是因为它不断提到镜子和反映。Google还喜欢援引“民主”这类高尚名词，来证明其算法的计算结果不仅客观而且公正。因此，在解释为什么要按现在的方式来呈现搜索结果时，Google网站告诉我们，“(这是)网络上的民主在发挥作用”，他们的意思是，通过链接为自己最喜欢的网站投票，然后由Google的PageRank算法计算来确定哪些结果应当出现在顶部，每个人都得到了发言权。

他们的“民主”定义真是奇怪。举个例子，Google搜索理论赖以为基础的平等思想就相当肤浅：是的，人人都能通过“链接”投票，但那些拥有资源、能带来更多链接的人(可能靠的是付钱给有影响力的网站，让它们跟自己建立链接，或者通过搜索引擎优化来骗过系统)就拥有比那些不能这么做的人更多的权力。这绝非“一人一票”。充其量这也只是个寡头政治，而非民主。再者，Google排名算法除了要考虑一个特定页面有多少其他网站链接，还要考虑至少两百个其他要素，比如网站载入速度。为了使民主隐喻在这种

语境下能起作用，“民主”本身需要重新定义。Google对民主的卡夫卡式的怪诞诠释就像这样：你进入一间投票亭去投票，结果却发现选举委员会还要考虑你的时尚品位、你的口音、外面的天气，以及其他许多因素，可以预见的是，这些信息是不可能告诉你的。

想想吧，为了证明其创新和敢想敢干的态度，Google是多么喜欢突出其科学背景。这不仅是因为Google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吹嘘自己硅谷校园环境的根基，更是因为它主动把自己放到科学的万神殿里，在那里，例外可以被准许，指责可以被制止，因为高尚的使命不亚于启蒙运动本身。“我们是科学家。因此如果成功了，那太好了。如果没有，我们会试试别的办法，”埃里克·施密特说，他试图支撑Google产品的合法性（谁会疯狂到反对科学的发展并暗示这些产品中可能有一些需要改进呢？），把Google尝试新事物的好奇心和能力表现成是科学方法的一种延伸。

然而科学确有其道德准则，在任何曾试图进行牵涉到人类的实验的人看来，这都是显而易见的。许多这类实验需要得到各种人类课题小组和机构研究委员会的批准。科学家们不只是自发地“尝试新事物”；他们往往早在进入实验室以前，就被迫对其工作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深思熟虑。哪个机构研究委员会会批准Google堂吉珂德式的计划？它派大量信息采集车采集流动在WiFi网络中的私有数据。哪个机构研究委员会会批准Google Buzz项目？这个Google在社交网络的灾难性尝试到头来侵害了许多用户的隐私权。哪个机构研究委员会会对塞尔吉·布林在Google Buzz失败后找的借口感到满意：“我从来没想过这是一件事关隐私的事情。”好吧，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一家公司（尤其是像具备Google此种规模和影响力的公司），不首先确立对伦理困境的制度性重视，就率性“尝试新东西”。

也许Google对它作为公共生活保护人和守门人的新身份感到不爽。很有

可能，复杂的伦理困境并不是它最初卷入时那个样子。它的商业气质与公共责任常常剑拔弩张，迄今为止，前者几乎总是获胜。埃里克·施密特说他不想“批评消费者做傻事……我们爱我们的消费者，即便我不喜欢他们目前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Google没有把自己当作《纽约时报》或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继任者。施密特没有把Google用户称为公民；相反，他把他们设定为“消费者”，这立刻就给公司的肩膀卸掉了很多压力。毕竟，消费者总是正确的，即使偶尔犯傻。只要Google愿意，尽可以假装它不存在公民角色；但这么做绝不会让这个角色消失。捍卫中立纯属胡扯，Google自己越早承认这一点，并设法负责任地行使其新发现的权力，未来它就越少犯Google Buzz或WiFi这类错误。

我们再也不能认为，由新数字媒介（及其数字精英拉拉队长）推动的新过滤器和算法实践，毫无问题，无比客观，自然优于之前的过滤器和实践。这些新过滤器可能会更快、更廉价和更有效率，但速度、成本和效率，与这些过滤器和算法将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公民角色只有浅表的联系。不对这些更快、更廉价和更有效率的过滤器进行应有的严密伦理审查，我们就有可能犯解决方案主义的错误，为不太重要的问题的改进欢呼雀跃，而对更重要问题的严重恶化却完全忽视。

哈佛大学伯克曼中心的大卫·温伯格对“互联网”的论述简直大错特错。他说，它的“过滤器不再过滤掉信息。它们向前过滤，把结果推向前台。那些未通过过滤器的信息，在后台仍然可见，并可以获取。”同样，温伯格宣称，“过滤器不是减少信息和隐藏未通过过滤器的信息，而是增加信息，展现整个深海”，这不仅给了硅谷一张道德的自由通行证，而且屈从于互联网中心主义的一个核心信念：单凭这些新过滤器在“互联网”产生，它们就一定是神圣的，就一定不受其创造者偏见的影响，就一定完全不受设计和部署它

的权力背景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另一个危险是，由于假定数字过滤器不同于其类似先驱，我们有可能模糊它们之间巨大的理论和概念差异。这是把“互联网”设想成文化的必然结果，它与印刷文化颇为相似，把它连贯稳定的特性复制到自己的产物中（毫不奇怪，温伯格确定“互联网”有五个“最基本的属性”，进而在具体平台中对此加以确定）。事实上，这些新的数字过滤器中，有一些不仅拒绝显示“整个深海”，而且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隐藏它；连贯互联网文化的理念，令我们无法察觉这些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拼命想理解今天的数字平台运作方式的人，最好别简单地假设“互联网不存在”）。就算是概略地实证研究一下流行社交媒体平台所采用的过滤机制，也能揭示同样多的内情；它们依靠截然不同的过滤器，而不同的过滤器创造了截然不同的可见状态。

看看Twitter的“趋势”功能，这个过滤器依靠几种信号和算法来判断，哪些主题正成为整个平台上的“趋势”。某件事是否成为Twitter上的趋势很重要，原因很简单：一旦这个故事达到这种令人垂涎的地位，它就会吸引到更多关注，甚至远远超出Twitter，成为全国性乃至全球性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Twitter也是个引擎，而不是照相机；它不只反映现实，它主动创造它们。

因此，如果某个重要讨论制造出大量声响，却从未达到趋势的地位，便常常将其归咎于Twitter的审查制度。“占领华尔街”的讨论就是这种情况，这多发生在#occupywallstreet标签下，却一直无法在Twitter雷达上看到。许多用户和评论者都以为，这种事情的发生，一定是出于政治原因，于是立马开始鸣冤叫屈。这种抱怨有些奇怪，因为他们似乎以为，在其他时间里，Twitter“趋势发现”引擎的运转就是完美无瑕的。

每当有人对审查制度进行指责时（尤其是当贾斯汀·比伯从趋势中消失的

时候），Twitter的某个工作人员就会站出来说，趋势是基于多种因素而非推文数量来确定的。比如，所讨论主题对Twitter用户来说是否够新也要加以考虑。其他因素是什么？好吧，我们不知道：Twitter和Google一样，没有公布它所监控的信号，生怕一旦这方面的知识泄露了，系统就会受人愚弄。

康奈尔大学的一位传播学教授塔勒顿·吉里斯皮（Tarleton Gillespie）调查了众多针对“趋势”审查制度的申诉，对Twitter趋势算法发表了一份很有意思的研究。他指出，即使抱怨审查制度的人认为他们“知道”“趋势”衡量的是什么，事实上也不可能说得那么言之凿凿。因此，他论述说，#occupywallstreet没有成为趋势可能意味着：

（a）它正遭到刻意审查

（b）它实际上没有人们以为的那样流行

（c）它非常流行但一贯如此，不是突然剧增

（d）它既流行也在剧增，但不是以算法设计所能测量的方式

（e）它既流行也在剧增，但还赶不上一些把它挤出榜单的流行文化现象

（f）它既流行也重要，但不如通过战略博弈挤进榜单的流行文化现象那么流行

（g）它没能成为趋势就是因为它没有成为趋势，因而无法享受“趋势”自己所提供的放大效应。

Twitter没说它依靠的是哪一组因素，而随之而来的模棱两可，只是使某个给定趋势看上去浑然天成。这又是行动上的双击心态：在标明趋势应优先考虑哪些因素这个问题上，人类判断的极偶然结果，被说成是只要开着计算

机运行脚本就会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客观结果。

在《工程革命》(*Engineering the Revolution*)一书中，历史学家肯·奥尔德(Ken Alder)论述了法国军事工程师是如何摆出一副所谓“技术专家姿态”的。凭借此种态度，“技术发明者”声称自己是中性通道，被动地斡旋于认识论和周围世界之间。这使他们在1789年革命后，能一边周旋于交战各方，一边设计出最尖端的枪炮。Twitter和其他许多技术公司一样，也经常摆出这么一副“技术专家姿态”，假装它只不过在进行客观中立的衡量。正如吉里斯皮所指出，“‘趋势’承诺对谈论中的话题进行精确详尽的数学式分析，却又把它展示得像是自动生成、仿佛不言自明的事实一样。”

Twitter对公共讨论中哪些方面构成一个趋势做出假设，对应该衡量哪些方面进行判断，在衡量完后又把它们反馈给公众。这个公司不只“反映”(按硅谷行话来说)公众兴趣，而且主动塑造它们。它不是依照某些“互联网基本特征”来塑造它们的；相反，从一开始，它就对公众讨论是什么样子和应该是什么样子有其基本愿景。我们有失去这些愿景的危险，如果我们屈从于互联网中心主义，并且天真地以为，所有这些决策都反映着“互联网”的本质，得到其日渐彰显的精神的指引。

因此，吉里斯皮说，“一个以前曾经成为趋势的词，想要再次成为趋势，就会有更高的门槛。言下之意就是，在对具有更长保质期的现象的公共讨论中，算法更喜欢新奇的东西。这是长久以来对广播新闻业的一种批评，如今在社交媒体上重现了。”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这将逐渐损害新旧媒体之间的断裂性和不连续性，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新纪元主义传播者原本对此倍加推崇。和乍看上去不同，Twitter更像福克斯新闻。但这种见解不只在分析上有用；它们对媒体激进主义和改革也非常有用。对由Twitter算法引发的各种偏见进行这种极具实证性的调查，而不是提出轻率的、民粹主义的、无事实根据的

审查要求，为如何改革Twitter营造了更好的基础，没准儿还将把这家公司推向一个不同的衡量标准。

许多用户（但愿他们知道！）可能对Twitter衡量跨群组讨论受欢迎程度的方式感觉不爽。在此，Twitter相信，与跨不同群组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讨论相比，发生在群组内部（在同一区域彼此关注或拥有共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用户之间）的讨论不值得出现在“趋势”里。你可能会憎恨全球不平等或喜爱同性恋平等权利，但如果你的“弥母”不管有多么强烈，却没有突破你的群组，它就很可能不会出现在“趋势”里。但正如吉里斯皮所指出，广度优于深度的这种偏好，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选择，建立在对公共讨论运行方式的某种设想之上。

别一心以为过滤器毫无问题、无比客观，我们需要知道，它们可能会使哪些其他引导公共讨论的哪些途径消失或不再流行。进一步说，我们希望，拒绝接受另一种“技术专家姿态”的程序员和工程师足够勇敢，捍卫自己对公共讨论如何展开的一贯见解。对公共辩论的本质采取假设是必然的（在设想哪些人会使用自己产品的时候，所有的设计师最终都需要选择一种弱化的见解）。然而，陶醉于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我们，已经让太多设计师容易推卸了自己的责任。

弥母产业让你名扬天下

一旦我们开始留心数字过滤器和算法究竟如何运作，一旦我们弄清它们到底隐藏和揭露了什么，互联网中心主义的许多创世神话可能就再也站不住脚了。这类神话里有种观点认为，“在互联网”，思想象病毒一样传播，全凭自己的意志，最具病毒式传播特点的弥母（memes）（这些快速传播的文

化单元的艺术术语）尤值一提。对公共话语来说，很少有比这种观点更有害的了。

把布琼布拉[5]（Bujumbura）的新闻带到华盛顿是一回事，把Twitter或Facebook的新闻带到“离线”世界完全是另一回事。前者取决于“这里”和“那里”之间的真实物理差别，后者只是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副产品。一旦“在线”和“离线”之间的清晰间隔倒塌，我们不再把“博客圈”和“社交媒体”当作真实行动以外存在的独立实体，我们大概就能用清醒和经验主义来对待公共生活的中介物了。

社会学家内森·约根森（Nathan Jurgenson）对这种分裂在线和离线的倾向有个恰如其分的词，称为“数字二元论”。他认为“数字二元论”是当代大部分关于数字技术的辩论的根基，在大家普遍担心“虚拟”入侵“真实”，或在线连接不如线下交往时，表现得尤其明显。然而，事实上，事情从来没那么简单，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不如说是两种世界的混合，而且一直如此（约根森的观点尽管仅针对各种数字技术，但也跟历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极有说服力地提出的一种更广义的认识相吻合。后一观点认为人类与技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分裂是人为的，有历史上的来历）。广告商早就使用社交网络数据为我们定制电视了，再为在线和离线之间的分裂辩护，在逻辑上简直令人窒息。同样，既然Facebook已经有法核对我们最终会在“离线”超市购买哪些在网站做广告的产品（它靠跟用超市会员卡跟踪购买行为的公司合作来实现），仍坚持存在这条在线-离线的巨大鸿沟，不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再看“博客圈”这个词，人们在公共讨论中提到它时往往带有贬义。哈

5 东非国家布隆迪的首府，这里指偏远的地方。

佛大学争议性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发表在《新闻周刊》上的反奥巴马封面故事引发了广泛讨论，由此他对众多批评者做出回应。“我实在受不了美国的自由派博客，”弗格森写道。“美国的自由派博客圈几乎每天都是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这不仅荒谬，更暗藏祸心。”那么，这些博客是谁，他们又属于哪个博客圈子呢？

弗格森在文章里提到的“自由派博客”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有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前政府官员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还有前吉米·卡特总统的演讲撰稿人、著名记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单凭他们用博客回应弗格森，就相信这些人拥有某种共同“博客”身份，认为它优先于他们的其他身份（如著名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是最典型的互联网中心主义。干嘛不抨击他们都敲键盘或坐椅子？就连弗格森在回应里提到的安德鲁·苏利文（Andrew Sullivan），也是个非常牵强的“博客”：哈佛大学博士，曾任《新共和》周刊编辑，苏利文是以资深保守派知识分子身份挑战弗格森的，而非穿着睡衣的“博客”。想象一下，如果“在线”和离线之间的鸿沟不存在，尼尔·弗格森立马就需要多花些心思羞辱他的批评者们了。“互联网”思想及与其有关的全部神话，通过这种方式侵蚀着公共讨论，导致了对偷懒捷径的滥用。

公关行业从“在线”是个独立的知识空间这一提法中受益最多。它巧妙利用了这种数字二元性，把乏味的新闻稿打扮成自主生成的有趣“弥母”。麦迪逊广场和K街就靠着“在线”的方式，让传统媒体报道本来绝不会报道的人物、产品、问题和事件。如今，这种报道屡遭声讨，往往也正说明有太多“在线”网民在谈论它。

看看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涌现出来的众多弥母吧，比如“看不见的奥巴马”（指演员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表演）或“大鸟”

（指米特·罗姆尼削减公共广播公司经费时的言论）。说它们的出现是自主和有机的，是民众声音的自然聚合，这种想法可能很有诱惑力，现实却远比这复杂，倒不仅是由于Twitter和Facebook算法采取了各种方法“促成”了其病毒式传播。

以“看不见的奥巴马”为例。根据《今日美国》的一个报告，“在@InvisibleObama发出第一条推文后短短15分钟里，该账号就被《牙线》（*Mental Floss*）杂志、新闻网站《沙龙》（Salon）和《华盛顿邮报》记者克里斯·齐利扎（Chris Cillizza）和专栏作家埃兹拉·克莱恩（Ezra Klein）在Twitter上提到。”这四个Twitter账号共有超过一百万个关注者。这是全国性重要专栏作家在平面媒体上具有的那种影响力，Twitter只不过使大腕儿们能根据这种影响力即刻采取行动，无需等上好几天。这本身没什么不光彩；我们根本就不该以为，某件事能仅凭自然和自主的力量就在“互联网”上“成为趋势”。同样，虽然我们忍不住想要吹捧@RomneyBinders这个Twitter账号（指米特·罗姆尼大受恶评的言论“美女活页夹”，罗姆尼本意是指收到了很多女性的求职资料）病毒般大获成功，但不应该忘记，同一个账号，在罗姆尼的活页夹之前，叫@FiredBigBird（并且从第一场总统辩论起就有了数量可观的追随者）；其所有人为了利用“活页夹”八卦新闻改了它的名字。

营销天才莱恩·霍利戴（Ryan Holiday）受够了网络公关的黑暗与盘剥成性，写了一本令人大开眼界的书——《相信我，我在撒谎：媒体操纵者的自白》（*Trust Me, I'm Lying: Confessions of a Media Manipulator*）。他说，“（现在的系统太容易受人摆布了，）我猜，就算有人想要设计一种更容易摆布的系统都不大可能。”霍利戴书中所讲的东西相当令人震撼，它证实了弥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人为的，不是天生的。这并不是说所有弥母都是这样形成的；事实上，有些人的确喜欢观看别人吃怪东西、往搅拌机里塞怪玩意儿的照片和

视频还到处转发链接，但这种“真实性”比我们想的要少得多。正如霍利戴所说，公关业的目标，是“营造这么一种感觉，让人以为弥母已经存在，记者（或音乐总监或名人造型师）做的只不过是让它流行起来罢了。”有多种策略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霍利戴自己就把他所谓“交易链”手法玩得炉火纯青，首先他给一个小博客提供故事，比如通过设置虚假邮件账号向博主透露消息甚至爆料（配以模糊照片以达到最大的真实性效果）。如果这个博客上了钩——干嘛不呢，它要更多流量，又毫无损失——那接下来就只需要说服大博客链接到这个小博客了。

小博客甚至可以采取主动，一开始就在Facebook和Twitter推它自己的帖子，然后把它提交给不同的新闻聚合器，比如Reddit。这就是公关公司可以插足的地方了，它们在Reddit建立多个账号，通过投票把帖子顶上首页。做到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像Gawker这类大博客的作者和全国性媒体的记者，在搜寻故事创意时都会仔细察看这类聚合器。即使这个故事最终只出现在Gawker，这也已经成功了：它或许不是世界上访问量最高的博客，但读它的人是媒体精英，他们需要“点子”来填满自己的专栏和电视节目。

对霍利戴来说，博客（说到“博客”，他主要指Gawker或《赫芬顿邮报》这样的营利性网站）不过是“制造新闻的滩头阵地”。由于其非常独特的经济模式，它们的故事和标题越有争议性，它们从流量增加中赚到的钱就越多，博客对任何哪怕只有一丝争议的东西都趋之若鹜。霍利戴讲了一个很说明问题的故事，他出任公关代理的一家公司卷入了官司，他需要向公共领域提供一些信息，以便引起辩论。“我匆忙搞出一套假的内部备忘录，打印，扫描，然后把文件发给一大堆博客，好像我是该公司的雇员，泄露了‘我们刚刚从老板那里得到的备忘录’。我原先曾直接把事实告诉这些博客，可它们毫无兴趣。可搞了这么一档把戏之后，它们立刻兴高采烈地发出了‘独家！’和

‘揭密’的帖子。”一分钟以前还令人昏昏欲睡的东西，摇身一变就成了具备弥母因素的刺激性素材。

如果法兰克福学派的老前辈、令人敬畏的文化批评家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今天来写他们的开创性著作《启蒙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1944），他们定会需要修改其中最著名的章节，把“文化产业”替换成“弥母产业”。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公关业隐秘的初始操纵，被YouTube和Facebook这类平台的商业动机搞得更糟了。它们有自己的理由来推进弥母：它们创造了某种共享文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更多页面访问量，更多用户互动（也即用户对这家公司展示了更多的兴趣），最终带来了更多更好的广告。一个贪婪的产业碰上另一个贪婪的产业，结果，弥母就出现了。

和Twitter“趋势”的例子一样，很有必要调查特定平台的过滤器和算法在塑造弥母形成条件时所扮演的角色。比如YouTube前娱乐内容经理费力西亚·威廉姆斯（Felicia Williams）对技术作家B.J.门德尔松这么说：“没人确切地知道YouTube算法是怎么工作的，但我注意到，如果一个视频发布后，在前几个月引起热议，并且保有稳定人气，那么它就会被标记与观众非常贴近，以‘热议’、‘流行’、‘相关视频’的方式高密度轮番展示。这种相关性排序增加了人气，结果导致更多传播和观众量的指数级增长。”

换句话说，公关业只需尽量花钱在短时间内维持住一个视频的人气；幸运的话，YouTube就会通过向用户推荐这个视频，造成弥母自主传播的印象。最终，这将把这个视频变成弥母，媒体不计其数的报道也就顺理成章了，它们中大多数都属于“现在请看来自互联网社区的奇闻”这一类。事实上这类新闻报道应当这么读，“现在请看来自最有创意公关公司的奇闻”，但互联网中心主义使得我们的新闻渠道在运用这种最离谱的委婉语时，一点也不担心

遭到起诉。

当然，YouTube绝不是唯一的被告。Facebook的过滤器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关注已经流行的、经常被点击的内容，同时忽略掉其他弥母价值不高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你的新闻馈送（news feed）中。这是挪威学者泰纳·布赫（Taina Bucher）在研究Facebook的EdgeRank算法时发现的。EdgeRank决定了当你登录这个网站时，会看到朋友们分享的成千上万新闻里的哪一些。根据布赫的研究，Facebook想把具有较高弥母潜力的东西发给我们；因此它研究了用户最乐意点击哪些种类、来自哪些朋友、什么主题的故事。布赫甚至提及，“算法偏见有利于那些能带来更明显参与度的故事。”这种态度本身没什么错，但和Twitter的例子一样，它的确对公共生活怎样运作、该奖励哪种行为体现了某种见解，并确然便利了弥母的制造。在此援引中立性，认为Facebook只是反映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弥母的出现是有机的自然现象，Facebook并未主动参与，这其实是与实证证据完全相悖的。

公共生活“弥母化”更大的问题是，着眼于谁能谁不能成为“在线热门”来确定编辑决策，必然会同时影响到报道对象和报道方式。媒体学者C.W.安德森指出，能用技术熟练驾驭新闻发布渠道的新一代媒体人，对有关现有和潜在读者的海量量化信息重度依赖，认为读者是“算法受众”，这些人有着极容易识别的需求和欲望，用合适的算法很容易就能识别并给予满足。相比之下，更具公众视角的早期一代新闻出版商则认为，受众基本上是“审慎的”，他们试图把读者纳入自己眼里符合公众利益的对话，而不管它是否吻合受众的实际期待。至少理论上说，唯有提出更好的论点，才能让这些对话和公共讨论尘埃落定，而哪个论点更好，并不由每个论点获得了多少页面访问量来决定。

把这与莱恩·霍利戴所描述的新闻环境做个对比。他曾引用BuzzFeed创

始人、无与伦比的弥母之王约拿·佩雷蒂（Jonah Peretti）的话说，围绕让人悲伤的内容很难创造弥母。“如果某件事情是晴天霹雳，人们不会分享它……问题是看过之后你会感到沮丧……这就好比，你在把悲伤情绪传递给朋友，那么，你怎么会想把悲伤情绪传递给朋友呢？”佩雷蒂说。那么，也就难怪霍利戴在书中所说，来自遭受经济衰退打击的底特律的两组照片，同时发表在“互联网”上，只有一组实现了病毒式传播。

这种区别如何解释？没火起来的那组照片中，有好多相当悲惨的当地人镜头；而火起来的那组，则全是建筑物和当地色彩。由于《赫芬顿邮报》的推波助澜，其中一组成了弥母；另一组毫无起色，只收到29条评论，而《赫芬顿邮报》的评论有4，000条还要多（更别说Facebook上的25，000个“喜欢”了）。公共生活弥母化是霍利戴深恶痛绝的东西，也许他自有理由。“网络经济状况使人无法准确描绘底特律的复杂状况……城市令人难以释怀的毁灭，这类简单故事传播和留存下来，而复杂的故事，比如城里满是亟需帮助的人，却流传不开，”他这样写道（鉴于他所要传递信息的急迫性，即便他偶尔陷入互联网中心主义，或许也是可以原谅的吧）。

这种弥母逻辑，也就是说，基于受众已知信息，以目标受众可能如何反应来评价一切的倾向，也在迅速侵入我们文化的其他部分。在音乐产业，唱片公司日益依赖能对任何歌曲进行多维度分析的复杂算法，它根据之前上榜歌曲的漫长历史分析现有歌曲的上榜可能性，并为之打分。正如克里斯托弗·斯坦纳（Christopher Steiner）在《自动化》（*Automate This*）一书中所指出，像Music Xray这样允许音乐家把歌曲传到网上，并对其进行流行潜力分析的创业公司，为音乐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效力和大批全新的艺术家……主要唱片公司（其实是所有的）依赖算法来选择签约音乐家和推广歌曲，这一天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看起来，这似乎解放了艺术家，他们以前得靠人类主导的人才发现模式才能得到“发掘”。现在，算法过程被塑造成了一种更加客观的模式，因为人类的判断力减到了最低限度；这种方法部分体现了科学史学家彼得·盖里森（Peter Galison）和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所谓“机械客观性”。然而，我们不应忽略主观性给艺术带来的好处；很多优秀的艺术，本身就意味着冲撞和挑衅。优秀的艺术不是为了收集Facebook上的“喜欢”，或在Kickstarter筹集资金。让发掘新音乐家的过程成为算法的逻辑，妨碍了音乐的创新。这类算法音乐许多都卖得出去，但过上二十年，人们未必会喜欢。

正如斯坦纳所说，“算法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艺术家，但由于它们的判断建立在过往流行的基础上，我们最终得到的东西，很可能正是那种已经被我们遗忘了的流行乐。这种技术的明显弱点，就在于它的分析里收入了这些年来太多的平庸音乐。”当然，算法可以进行不同的配置，还有些独立唱片公司可能愿意发行注定不受欢迎的音乐，然而，难以想象，主要唱片公司会拒绝这个依靠算法稳稳当当赚到更多钱的机会。

熬过大数据

随着我们过渡到弥母饱和的“算法受众”世界，我们已经很难记得从前还有那样一段日子：严肃媒体不痴迷于某件新闻是否有“晴天霹雳”的效果，只报道重要而值得关注的新闻，不管它对受众情感幸福有何影响。赞美“大数据时代”，默许各种统计办法和指标入侵新闻业，就是屈服于解决方案主义，认可一种截然不同、骄傲自满的新闻业。对受众一无所知，以及由此带给新闻领域的效率低下，未必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即便最新工具把解决方案变得平常且显而易见。要克服解决方案主义，抵挡诱惑不去解决“对受众无

知”这个问题，这很困难，尤其是工具唾手可得，也尤其是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新纪元话语风格正努力让我们相信，革命时代要求激进的革命措施。

不难看出，生成受众新数据的压力来自哪里。约瑟夫·塔洛（Joseph Turow）写了一本很有启发意义的书，《每天的你》（*The Daily You*）。书中指出，高质量内容的出版商根本无法如愿在自己的网站上卖出足够多的广告。因此它们求助于广告网络，后者为它们提供无限多广告，然而这些广告所得到的回报（往往只有两三位数），远不如由出版商直接售出、绑定在某个特定出版品牌（比如《纽约时报》或《卫报》）上的广告。因此，这些出版商就想求助于另一套承诺向出版商提供有关其读者详细信息的中间媒介（这些偷偷摸摸的邪恶媒介总能挺过难以克服的“互联网”挑战）。这种信息大多收集自其他网站和社交网络，通过存储在读者计算机上的cookie文件，或者借助更新更时尚的技术（比如“设备指纹”，出版商甚至能看到已经删除、或从未存储过cookie文件的用户。这种技术对手机特别管用）来记录。

靠着这么广泛的信息，出版商竭力让读者在网站上逗留最长时间，因为这也能让它们从广告商那里赚到更高提成。要做到这一点，可以给用户看猫咪搞笑图片和底特律的建筑图。再比如说，给他们看专门针对用户兴趣的高度个性化幻灯片（有些人可能喜欢猫咪，但狗狗爱好者呢？），确保读者会持续点击。

“每天的我”（The Daily Me）这类网站，使在线出版商能根据新访客在其他网站的阅读情况，为之提供故事和广告。塔洛专访了“每天的我”创始人兼CEO，后者给他举了个例子：一个定期阅读《波士顿环球》的读者，跟着从博客或搜索引擎找到的一个链接，最终来到《达拉斯晨报》网站。由于两家报纸都与“每日的你”有生意往来，又因为访客在《波士顿环球》上读过足球新闻，保存在其计算机上的Cookie文件便靠着“每日的你”施展的魔法，

告诉《达拉斯晨报》也应该向他提供足球新闻。塔洛特别提到，“当广告随新闻一同展示时，其文本和照片会实时排版，插入足球词汇和照片以行推销。”因此，足球迷看到的是与足球相关的广告，“篮球迷收到的同一种产品的广告里，出现的是爱好篮球人士所熟悉的词汇和照片。”如果“每天的我”CEO的话可信，这会带来更高的点击率和更高的网站页面浏览量。

突显特定新闻故事，修改广告以反映用户兴趣，这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不对的。但塔洛指出，这种做法正迅速扩展到新闻出版工作的编辑领域，不光是因为新闻媒体存在推动读者不停阅读和点击的经济压力。塔洛引用一位数字出版业内人士的话说，由于现在个性化广泛应用于从旅行到金融的其他行业，用户和出版商可能也更迫切地想在新闻中对此进行试验。塔洛引用另一位高管、时任时代公司数字业务总裁的话说，像时代这样的公司，“都在努力寻找合适的方法推进编辑个性化，同时又不引发受众恐慌。”这位高管似乎对这能奏效深信不疑：因为“许多公司都开始为特定受众创建内容，”他的公司（我们所说的可是《时代》杂志！）目标是“在创建内容时灵活地应用数据。”

据此，塔洛得出一个相当令人沮丧又难以反驳的结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个性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出版商甚至营销人员将以量身定制、符合广告销售需求和特定个人声望的软性新闻或娱乐节目，来包装个性化广告。”它可能会先从一些看似无害的事情入手：对标题甚或第一段进行个性化处理，以便反映网站所了解（或能发现）的读者信息。但很快（堪比亚马逊在书籍行业的壮举），这种实践或许就会扩展到对文章的实际文字进行定制。比如语言，就可能会反映网站对读者教育程度信息的猜测（为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提供《经济学人》式的词汇；为大多数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提供《纽约邮报》式的词汇）。又比如说，一则关于安吉丽娜·朱莉的新闻故事，可能会提到她自编自导的有关波斯尼亚的电影（如果你喜欢国际时事），也可能提到

她与布拉德·皮特的生活八卦（如果你喜欢好莱坞花边新闻）。许多公司[比如“自动化见解”（Automated Insights）和“叙述科学”（Narrative Science）]，已经利用算法来自动生产故事。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没准儿还是个利润非常丰厚的步骤），是让这类故事瞄准具体读者，给我们带来根据用户需求量身定制新闻故事的新一代内容农场。

这种改变对我们的公共生活意义深远：上面所说的这种个性化，可能会破坏整个城市都阅读相同报道所带来的团结一致、集体行动和充分讨论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让这些问题的特定讨论方式保持继续存在；我们不能屈从于仅从效率角度看问题的诱惑。旧体系无法衡量受众对个别文章的反应，广告商的做法简直毫无效率（它们对报纸投放广告，却不知道每篇文章有多少人阅读），然而这种低效率其实是相当有好处的。

正如记者雅各布·韦斯伯格（Jacob Weisberg）所指出，新闻业是公民企业，由无知引起的低效率对它是有益的：“我常想，有多少人会读《纽约时报》对奥尔巴尼州政府的报道。说不定正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读，《纽约时报》才在这篇报道上不惜巨资！在Google的世界里，没人会点击这些新闻故事，它们的优先度会下降。”或者干脆消失。传播学教授大卫·卡普夫论述了过去一直伴随传统新闻业的“有益的低效率”：“对广告效率的信息缺乏，再加上广告位的缺乏，一道推高了价格”，这就形成了“有益的低效率”。而今天，当每一次点击都能永远保存下来，“广告商能衡量广告展示次数和点击率。它们把广告瞄准小众市场和小众对象。更高效率降低了广告价格。于是，传统媒体组织就无法负担其现有经费开支和基础设施了。”

效率语言（大多数极客和经济学家所信奉的唯一真神）也慢慢悠悠渗透到这场辩论里。这是《Slate》杂志专栏记者马修·伊格莱西亚斯写给定向广告（targeted advertising）的情书：“更有针对性的定向广告，为消费者和广告商都

创造了经济效益。更有效率的广告，给公司带来了动力，为改善服务实际品质上更多投入的资源。更有效率的广告，能为本因缺乏收入而捉襟见肘的内容创造市场。”明白了吗？

这听上去很棒，然而一旦你开始看到在线广告商所面临的实际压力，由广告网络和广告交换所积聚的巨大力量，为获得点击以便从定向广告上赚钱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恐怕就很难认同伊格莱西亚斯的乐观态度了。人们恐怕无法赞同他的这句话，“在用户跟踪的世界，内容精确性没那么重要。编辑工作成了发现受众（任何受众），然后，后台跟踪就会根据这位读者的其他信息，向他投放有可能感兴趣的定向广告，鞋子或app应用或厨房用具或汽车保险或别的什么东西。”伊格莱西亚斯的说法几如童话：抽象地追求效率，忽视当代数字出版世界的实际动态，全靠把一项技术（这里即定向广告）的积极功能投射到某种高度理论化的经济模型上来发挥作用。

“打倒守门人！”……守门人如是说

然而，坚信过滤器和算法的中立、客观和不证自明，并非网络天真病的最高境界。这顶可疑的高帽子，不妨送给如下这种普遍的信仰：“互联网”正使我们摆脱守门人和中介。“非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这无疑是英语中最丑陋的词之一，现在却时常被宣告为数字时代的本质特征。[6]由于创新技术的出现，据信各行各业的中间人都必将走上和渡渡鸟一样的不归路。一旦编辑、出版商和书店凋亡了，故事就没了，最后，我们的公共生活，就会从中间机构的偏见、低效率和隐秘议程中得到解放。这种观念里有成立的地方，

5 作者说“Disintermediation”这个词丑陋，是因为这是一个生造出来的合成词，字母很多，发音困难，普通人生活里很少用到。下一段里的“hyperintermediation”也一样，是作者在讽刺。

但我们不应当错过一种更为重要却不太容易注意到的进展：公共生活的数字化也将产生许多基本上不可见（兴许也不可信）的新中间媒介。

以博客为例。20世纪90年代末第一代博客上线时，在它们和剩余世界之间的唯一中介，就是托管公司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到2012年，人们开博客可能会在Tumblr或WordPress这样的商业平台上，而博客上的所有评论，则通过Disqus这种第三方公司来管理。中介机构还不止于此：Disqus自己就与一家叫做Impermium的公司进行合作，后者依靠各种机器学习工具来检查贴出的评论是不是垃圾信息。是中介的增殖而非消亡，使博客变得如此广泛流行。也许，更合适的词是“超级中介”（hyperintermediation），而非“非中介化”。

Impermium的新服务甚至走得更远：该公司声称已开发出一种技术，“不仅能识别垃圾信息和恶意链接，还能识别各种有害内容，比如暴力、种族主义、公然亵渎和仇恨言论，使网站所有者能在读者读到它之前实时采取行动。”Impermium号称有30万网站客户（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它被整合到广泛使用的第三方工具中，比如Disqus）。至于中介，这听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一家加利福尼亚公司为一些世界上最流行的网站做决策，对什么是仇恨言论和亵渎进行判断，却没有一个人来审查，它自己的算法是否存在偏见或过于保守。与其说为非中介化的神奇天堂而欢呼雀跃，我们倒是该好好看看Impermium垃圾信息算法的黑箱。

对非中介化解放潜力的信仰，在有关书籍出版业未来的繁多作品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这个领域的存在，本身就违背了它所做的预测（应该有人出本书，谈谈这些不断预言出版业走向终结的末日预言者）。

互联网中心主义者对新纪元的理解引起很多问题：如果书籍能在网上借阅和购买，谁还需要图书馆和书店呢？如果作者能自出版，谁还需要出版商呢？如果文章甚至书籍能加以个性化以符合读者兴趣，谁又会需要编辑呢？

把这套逻辑推至极端，如果算法能写文章，谁又需要作家呢？对守门人的这种批评在极客中如此受欢迎，其原因可能与之前提到的对宗教改革（那可以说是今天互联网文化的创世神话）的狂热崇拜有关。正如教堂被看作是多余有害的守门人（它妨碍信徒与上帝直接沟通），出版机构也被认为是对弥母和创意世界进行无中介访问的阻碍。有人满怀信心地说，“互联网”将使弥母摆脱创意人群的压迫，而正是这些人才敢声称，并非所有弥母都生而平等，有些实在是糟透了，或许根本就不该创造出来。

没人比亚马逊创始人兼CEO杰夫·贝佐斯更迷恋这种高度民主化的发展。他喜欢吹嘘说自己致力于消除守门人，因为它们“减缓创新”，阻碍“自助平台”（在此平台上，每个人都能出书，而且用不了几分钟）的发展，而这正是亚马逊自己极其热衷的。贝佐斯对机构的民粹主义式愤怒继承了马丁·路德抨击教堂的优良传统，这一点，在他吹嘘说Kindle畅销书排行榜“挤满了小出版社和自出版作家，而《纽约时报》排行榜则被公认的成功作家所统治”时，得到了完全展示。他没解释为什么这个成就值得庆贺，似乎它是不言自明的，就好像一本书的制作方法和它的思想内容同等重要。Kindle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书，二十年后有多少还有人读呢？和弥母产业的其他解决方案主义弟兄们一样，贝佐斯似乎认为，出版的目的是生产数量最多的书籍，让最多的人读到它们。在文人看来，这是一种有悖常理的功利主义。这些书是数独谜题，还是托尔斯泰小说，根本没有关系，它只关心书籍下载量、页面翻阅量和创造出的弥母。

亚马逊的前途，有赖于解决方案主义者所钟爱的两个修辞策略。第一个策略是“创新对话”策略，所有创新，不管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或政治后果，都被视为天然优秀。毕竟，创新是进步，进步怎么能是坏的？第二个策略是“工具对话”，它的目的是把技术辩论重塑为几乎只关乎工具的辩论，并进一

步引申为工具以怎样的方式赋予了用户力量。两种对话都使我们关于数字技术的讨论变得贫瘠；两者都必须早点被认识到，并加以抵制。

创新对话的危险，可能不会一下子就很明显。创新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典型的一个口号，而它却从未得到本该得到的批判性关注，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善意的，却忘记了痴迷于创新如何曲解了我们对过去的阐释。历史学家大卫·艾杰顿在《过去的震荡》（*The Shock of the Old*）一书中指出，最近的技术史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是优先考虑发明创新、而非技术设备实际用途的阐述。我们往往忘记，大多数创新和发明最终都毫无结果，而那些有结果的，为保持运行通常也要进行重大修补和维护。进一步说，我们往往在引入更新、更快和更炫目的选择后，把旧技术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抛诸脑后。我们把二战看作是机动运载工具的战争，然而，更有可能的是，它始终是一场马的战争：正如艾杰顿所指出，纳粹德国在入侵苏联时，动用了625,000匹马。

然而，被时下的创新崇拜搞残废的，不仅是技术史。未来政策往往也深受其害。问题是这样的：由于普遍认为创新只有积极影响，几乎没人愿意去检查它意想不到的后果；正因如此，人们普遍认为，不言而喻，大多数创新都是有益的。一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小组考察了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所有创新相关的学术文章。研究发现，在接受考察的所有论文中（几千篇），只有26篇文章提出了创新的负面或不良后果。大约每一千篇文章中有一篇，这个比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变化。这类被忽视的统计数据，揭示了大多数学术文献对该主题的“亲创新偏见”。

这种亲创新偏见，使得创新与各种助推因素研究（这一调查领域通常由商学院涉足）与创新后果研究（通常由公共政策和科技研究这类学科进行，但极少采用“创新研究”的名号）产生了清晰的界限。因此，失败或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创新，自然就不会算在创新词汇里边；只有成功的、毫无风险的技术

才是创新。此外，确然纳入了考量的创新后果，往往颇具线性特征，相当直接。当杰夫·贝佐斯阐述Kindle相关“创新”时，他知道，他的目标受众不可能考虑到任何可能不直接、非预期或不期待的后果；我们大多数人也怀有某种形式的“亲创新偏见”。

但也并非总是这样。加拿大学者本诺瓦·戈丁（Benoit Godin）一直对作为概念的“创新”思想史进行探究，根据他的观点，2500多年来，这个词也曾有过负面含义。“创新者是异端，革命者，骗子，”戈丁说。然后，事情起了变化。“当到处都开始经历变化、尤其是‘革命性’变化，并有条不紊地创造更多变化时，创新就得到了积极倾听。”在20世纪60年代，着迷于现代化议事日程的西方政府，由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和顾问支配，它们剥去了“创新”这个词的政治内容，把它变成了新奇、发明、创意、独创性、有用性的代名词，或哈佛商学院年度聚会上大受欢迎的时髦口号。

如此一来，几乎没有多少学者从事创新伦理研究，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创新成果会公平地造福所有人，因此，这类讨论很少涉及公正性。这是错误的，深入分析制药业创新（及其所牵涉到的知识产权申请）可以表明，对全球正义的思考，对创新探索是否有可能切断穷人和病人药品使用途径的思考，同样会影响到我们讨论创新的方式。正如三位知名学者在最近一篇论述创新扩散公正性的文章中所指出，“从创造了什么、什么人可以获得该物品的角度来看，创新可能会恶化现有的不公平，或制造新的不公平，也可能减少现有的不公平。”当然，这要求我们超越对新颖和效率的痴迷，针对权力、合法性和伦理道德提出有难度的规范问题。工具对话则提出了另一种不同性质的挑战。为更好地理解它们怎么一回事，不妨借鉴一下传播学学者马吉德·泰拉尼安（Majid Tehranian）对“技术中立者”和“技术结构主义者”所做的区分。在泰拉尼安看来，技术中立者“往往是顾问，

他们没有多少理论主张，也有相当多的利益考量不跟客户对着干。他们总是对后果问题采取中立立场：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是那样。”技术中立者通常第一个承认“互联网”有好有坏，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它。他们相信技术自身完全中立，不站队，在正确的人手里，它们能创造奇迹。他们很少关注技术创造者隐秘的或不那么隐秘的议程，以及这些技术会用在什么样的特定条件下。他们认为，在底特律街道上发现的一把枪，与保存在工程博物馆里的枪一样，可能是中立的，也可能导致暴力。这得看情况，他们告诉我们。更具乐观气质的技术中立者，往往主张对具体的技术采取极端自由放任的态度：既然得看情况，不妨给技术一个机会吧！这就是为什么杰夫·贾维斯要求给面部识别技术一个公平审判：“在还没使用和理解一项技术之前就禁止它，这明智吗？想想看，（面部识别技术）在以下场景会多么有用：寻找失踪儿童，或在发生卡特里娜飓风或2011年日本大地震和海啸这样的灾难时，知悉受害者下落。”事实上，尽管他们承诺权衡利弊，技术中立者从未进行过任何深思熟虑：三年里只有一次是出于“善意”目的使用的技术，与每时每刻都是出于“恶意”目的而使用的技术，具有同样的中立性。他们更有可能主张采取解决方案主义措施，因为他们一贯忽视解决方案可能碰到的复杂背景，也想不到这些背景会有许多出人意料的办法削弱解决方案的效力。另一方面，技术结构主义者用截然不同的哲学来探究世界（而不只是技术在其中的地位）。根据泰拉尼安的研究，他们相信技术“源自制度性需求，通过制度性管理和社会力量总能调解其冲击，因为技术本身就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技术结构主义者认为，信息技术“既非自由技术，也非暴政技术，从根本上说是权力的技术，它锁定在现有或新兴权力技术结构当中。”因此，任何技术，就可以既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既是单一的，又是复杂的，既能授权，也能除权。

因此，特定技术的影响，不要假定它源自技术内在或固有的自然属性，

也不要假定它是中立的，因为，一切取决于环境。相反，要推断技术的影响，就要分析特定技术的具体方面（这些方面自身常常处于变动中）会怎样重建政治社会关系，将全新参与者引入博弈中。要慢而耐心地进行分析，不对大写T的“技术”或大写I的“互联网”进行任何华而不实的假设。技术结构主义者会努力避免互联网中心主义和解决方案主义提出的那种轻松修补。

很容易把技术结构主义者误认为是悲观主义者，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并不认为，通过技术实现的这种解放是虚幻的、不合逻辑的，只不过，他们认为这种解放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中，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它实际上甚至可能带来新的束缚。是的，Google的自动驾驶汽车会使驾车变得更容易，甚至减少交通事故致死人数，但合理的交通运输系统应该追求许多其他目标。自动驾驶汽车会让更多人选择开车，让公共交通变得更糟糕吗？既然人们不必亲自驾车，他们就可以在通勤期间处理电子邮件，因而会在车上度过更多时间，这会导致更严重的郊区拥堵吗？

对技术结构主义者来说，亚马逊涉足出版业，不只是个通过更新颖完善的阅读和出版工具、实现更多个人权力的神话。要接受这个神话，就意味着只关注创新带来的直接、预料中的理想结果，无视间接的、意料之外的不良后果，对工具加以神化，忽视工具所促成的实践。还是援引已故的托尼·朱特的话，有时候，别光问什么最优效率，也要问问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一旦不再受制于创新和个人实现的神话，我们就能看到，如果亚马逊无守门人世界的梦想变成现实，那么这个公司自己就会变成一个强权的守门人。一则，通过实质上把出版过程交给变幻莫测的市场，它将使某个书籍项目更有希望（是的，我们想要更多眼镜巫师的故事！），而其他的则希望更加渺茫（拜托，别又是某个名不见经传的日本将军的传记！）。无需卡尔·马克思我们就能意识到，出版经济学（谁在何时得到什么报酬）决定着可以接受的智力

风险范围。相比于不得不先打着零工花十年工夫写书、还指望着项目能填补亏空，如果作者知道自己能收到一笔预付款，名不见经传的日本将军传问世的可能性会更大。是的，偶尔，亚马逊可能会发现一本值得获普利策奖的好书，但在一个由亚马逊控制的世界里，大多数这种书籍可能根本就不会写出来。亚马逊可能是个不情愿的守门人，但它仍然是个守门人。

但我们也需要明白，这个关于守门人的讨论到哪里为止。如果十年以后，亚马逊决定让作家们步仓库工人之后尘，被机器人所取代，谁又会真的感到惊讶呢？如果人们一开始就假设，守门人有害，效率有益，那么作家也是守门人：他们暂时束缚了弥母和创意，而实际上买家想从书中得到的，正是弥母和创意（请放心：亚马逊不会消灭同样也在束缚弥母和创意的买家——总得有人最终为书买单啊）。

凭借Kindle电子阅读器，亚马逊收集了关于个人读者及跨人口统计特征的阅读习惯等丰富信息；它知道读者在Kindle字典里查询哪些词汇，哪些段落读者最频繁地画线强调，以及读者要读多少次才能读完一本书。在工具对话的优良传统下，所有这一切都被描述为增强读者体验，在这一点上，亚马逊并没有撒谎。但是，除了阅读，这种统计数据还增强了许多其他东西，包括亚马逊进行弥母驱动式的出版能力，这种出版了解受众胜于了解自己，甚至在潜意识里就能迎合其每一个奇思妙想。

没有什么能阻止杰夫·贝佐斯利用这种认识自动化地大量炮制书籍，把作家完全晾在一边，提供这种个性化服务（准准地按中每一个读者的情感和智力按钮），这样一来，凡是购买的书，没有一本不会被读完。越来越多报纸和杂志已经转而借助“叙事科学”这类公司，来为其提供由算法生成的文章（通常是关于运动和金融的）。没有理由认为，亚马逊不会在这一块儿做得更好做得更久。好些规模更小的创业企业已经在挑选并出售没有人工参与而

完成的书籍了（当然，它们通常在Amazon.com上销售）。

如果人们认为，文学的目标就是弥母福利的最大化，或确保所有读者都得到满足（为什么不呢，既然他们读的书本来就反映了他们的潜意识倾向和偏好？），那么亚马逊就应当被视为文学的救世主。但如果人们认为，有些观点就是比其他观点更糟，有些弥母就应当歇菜而非四处传播，作家身为公共知识分子，扮演着绝对无法外包给算法的重要公民角色，文学的目标之一就是拷问和摧毁，而不只是满足和增强，那么，亚马逊无守门人的幻想世界，实在是没什么好庆贺的。

不加批判的批评家

不管是想改善政治还是文学，解决方案主义者都遭遇了同样的挑战。这种改良计划不可能一开始就赞美工具的力量（或逻辑），不管是开放政府数据库，还是电子阅读器。这些工具可能会消除低效率或模棱两可，而只有忘记或忽略解决方案主义者希望改善的活动的目标和愿望，才能把这看作是件好事情；指望新闻业或出版业靠着更多的数字变得更好，实则是对它们究竟是什么一头雾水。

Yelp这类网站可能会声称，对任意一家餐馆，自己提供的评论都比当地专业餐馆评论家在都市报纸上发表的评论更广、更多、更客观。但把来自Yelp上的意见看得更重，等于是忘记评论家的实际工作；他们的美食品评是以一套截然不同、难于在网上复制的目标和理念为基础的。Yelp不关心你去过一家餐馆一次还是几十次；它也不关心你尝过多少道菜。事实上，它并不关心你到底去没去过那家餐馆；佛罗里达州一家披萨店店主，因为熊抱奥巴马总统的照片而名声大噪。他发现，随着他的生意成了全国新闻，他的Yelp

评论数量也从2跳到2500，大多数由从未驻足他小店的人做出。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Yelp并没有给你提供一种方法，根据一套解释意大利美食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意大利餐馆的菜品。相反，你评价意大利菜和评价日本菜都用一样的方法：它们都可归结为一堆星星和一段简洁评论（如果你有兴致写）。成千上万人的判断以这种方式聚合在一起，这其实并非重点，因为，已经处于个人评论层面下，就不太可能捕捉到美食评论家眼里真正重要的东西和品质了。

社会学家格兰特·布兰科（Grant Blank）对现实的评论实践进行了大量研究，出版了《评论家、评级和社会：评论社会学》（*Critics, Ratings, and Society: The Sociology of Reviews*）一书。正如他在书中所指出，大多数职业食评家至少会在自己评论的餐馆就餐三次；一些人报告说到访多达七次。他们一般会带上几个朋友一道，以便试吃菜单上的各种菜品。为了检验一致性（评价厨师厨艺水平的一个主要标准），他们会在不同场合点同样的主菜。为了避免被认出并受到有别于其他食客的特殊对待，餐馆评论家往往要化装。按布兰科的研究，标准程序“包括戴帽子、假发、眼镜、墨镜，假装怀孕，用其他假名预订，有几张不同名字的信用卡，请客人用他们的信用卡付账。”丹尼斯·雷·惠顿（Dennis Ray Wheaton），长期效力于《芝加哥》（*Chicago*）杂志的一位餐馆评论家，甚至会在自己身上布线，身藏一台磁带录音机，以便偷偷口录要点又不被逮住。

评论家的一个主要挑战，是评价菜品是否符合特定烹饪风格的外部标准。一直以来，法餐的规则和礼仪都由像乔治·奥古斯都·爱斯克菲（Georges Auguste Escoffier）的《烹饪指南》（*Le Guide Culinaire*）这类书来整理，它首次问世于1903年，现在仍在出版。“法餐之复杂，在于酱汁与食材的搭配；味道很重要，但纹理与色泽同样如此。更复杂的是，评论家不能只评判单一项

目，而必须根据每道菜在味道、纹理、色泽上的平衡与协调进行评判，”布兰科指出。克雷格·克莱伯恩（Craig Claiborne）对确立《纽约时报》餐馆评论准则发挥了很大作用，像他这样的评论家，不只私下里对爱斯克菲书中的精确标准非常熟悉，对烹饪过程也是烂熟于心：他用自己的退伍军人津贴报名了瑞士一家备受赞誉的烹饪学校，他自己就个优秀的厨师。

当然，Yelp绝不是第一家向餐馆评论家发出挑战的创业企业，现在归Google所有的Zagat，凭借用餐问卷拔得头筹；据其创始人的说法，它所提供的，“是你能得到的最接近科学的结果”（他们真的很跟Google很搭调）。但起初由Zagat，现在由Yelp提供的科学，是有关美食体验评论聚合的科学；它远不及惠顿或克莱伯恩所实践的那种餐馆评论，因为它实在没有办法用复杂术语来定义卓越。在Yelp上得到较差评分的餐馆，不太可能从餐馆评论家那里收获好评（两者也就这点共同之处），至于差的服务，也跟差的菜品一样很容易发现。然而，好餐馆之所以好，有整整一套原因（从菜品水平一致到遵守整套烹饪标准），非专业评论家可能根本看不出来。如果目标是吸引消费者就餐，向Instagram上传照片，向Twitter发送更新，在这之间的空隙里用美食填满他们的胃，那么Yelp堪称完美。但如果人们把烹饪视为拥有独特卓越标准、独特知识与工艺传统的艺术，如果人们认为烹饪同时还有教育和召唤的使命，那么Yelp或许是失败的。在美食评论家看来，即便是“数据库里没收录的餐馆”（借用作家约书亚·科恩的有趣表达），可能也值得造访；至于你这种典型Yelp用户，如果它不在Yelp上，好吧，那它就根本不存在。

这不一定就要变成一场“业余Vs专业”的争吵，为此引发的互联网辩论实在太多了。创作新闻报道或百科全书条目所要求的专门知识，与写餐馆评论所需的知识，可能完全不同。我们不应当屈服于互联网中心主义，臆想“互联网”什么也没有毁灭，或“互联网”毁了一切。我们也不应当因为它带

给我们的便利，就把它当作偶像崇拜起来。

然而，互联网专家确实把一切对Zagat和Yelp这类网站固有缺陷的批评，变成了某种精英蔑视大众的宏大元叙事。按这个逻辑，“互联网”带来的几乎全是破坏。数字新技术和解决方案所提供的东西和它们尝试解决的问题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不匹配，而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极大破坏性体现在，它把人们对这种不匹配的种种真实顾虑，统统刻画成了卢德主义和保守派抵挡技术变革的例子。

2000年，食评家史蒂文·肖（Steven Shaw）在《评论》（*Commentar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叫做“Zagat效应”的挑衅性文章。肖对Zagat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抱怨，直指其运营过程中某些结构性问题。肖的异议之一是，Zagat对卓越的定义在餐馆评论行业看来是不正确的。他指出，联合广场咖啡店成为Zagat纽约第一餐馆的原因，是因为在调查问卷里“你最喜欢的纽约餐馆是？”一问中，回答该餐馆的人数最多。就算在Zagat自己的排名榜上，从食物、装饰和服务方面（传统餐馆评论的标志），都有餐馆得分比联合广场咖啡馆高。由此肖得出结论，“如果你想知道一家餐馆有多好，平均分具有严重误导性。”

把联合广场放到第一位，等于是说《美国派》是1999年最佳电影，因为40%受访者把它列为他们当年最喜欢电影，而《美国丽人》、《黑客帝国》和《搏击俱乐部》（都在同一年上映）每部只得到了20%的投票。肖的观点不是说这种衡量毫无意义，而是说不管它们在衡量什么，都绝非餐馆评论家所追求的卓越。因此肖写道，“联合广场咖啡店的确是家非常不错的餐馆，是家因为友善服务而为许多纽约人所钟爱的餐馆，在这座城市还算好的餐馆里，它或许是最平易近人的了，还有它简单而滋味浓郁的美食。但考虑到同样受欢迎的老牌餐厅，把它排在几十家其他就餐场所前面显然很是荒谬，尤其是纽

约还有一些世界级餐馆，比如Lespinasse、Jean Georges和Daniel。”

克莱·舍基在《认知盈余》里讲了同样的故事，他的版本里充满了民粹派和反正统派对职业评论家的愤怒，预言凭借“互联网”的帮助，民众终于摆脱了美食评论家们其自命高雅的做作。舍基抱怨说，“肖完全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喜欢联合广场咖啡店胜过与Lespinasse就显然荒谬，他称Lespinasse为世界级餐馆，只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然而，肖的确指出了为什么这是荒谬的：根据Zagat自己的排名，联合广场咖啡店在食物、装饰和服务方面输给了Lespinasse,而结果它还是成了纽约市的顶级餐馆。这并不是因为肖是个憎恨普通食客的精英分子，而是因为，就连普通食客，也根据大量他们认为与就餐体验相关的标准，给其他餐馆打了更高的分数。

然而，在舍基笔下，肖对Zagat方法固有偏见的犀利批评变成了对普通人的攻击。因此，秉承互联网中心主义的优良传统，舍基对精英评论家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攻击性演说。舍基抱怨说，肖“不愿把联合广场咖啡店宣判为差餐馆；它只是不为他这样的食客所偏爱，这就是说，职业性地在餐馆就餐的人，他们喜欢拿点儿小恐吓当开胃菜。然而如果他抱怨得太明显的话，便有可能败坏其引导受众的初衷。”这番对肖的厉声批评，不过是舍基在为激昂的断裂对话清扫道路。这套对话向我们承诺，旧世界已经消失，新的数字世界正在形成。“回到餐馆评判只能参考职业评论的时代，这一区别没有多大关系（对受众的严重藐视并不那么明显），但在今天，对‘你最喜欢的餐馆是哪家？’这个问题，人人都能找到聚合式答案，我们想要的就是这种信息，我们甚至可能更喜欢它，而非由职业评论家发表的评判。”

作为互联网专家的典型代表，舍基甚至都不愿费心问一问，除了为单个消费者提供含糊不清的权力实现的感觉，这个趋势是有利还是有害。他也没有兴趣搞明白，是什么使前Zagat和前Yelp时代的餐馆评论如此有价值，甚或

值得去捍卫。让我们把舍基的失败主义与肖为烹饪这种社会活动所做的辩护比较一下吧：

> 是伟大厨师的精妙想象力，最终创造了有教养的消费者，和之后对烹饪越来越高的要求。在Zagat风格的调查的影响下……一家想要生意兴隆的餐馆，将不得不使主动迎合大众口味，就好比一位英文助理教授，身负在学生评价表上得高分的压力，势必给学生布置更简单更受欢迎的课文。要得到Zagat选民的称赞，餐馆不是靠推出具有挑战性的、复杂的或超前的烹饪菜肴。要收获Zagat读者的爱戴，餐馆靠的是提供金枪鱼汉堡（一如联合广场咖啡店，它提供的金枪鱼汉堡非常好）。

如今，人们可能并不认同肖关于烹饪的目标、宗旨和社会功能的观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舍基在这些方面毫无建树；他的主要兴趣在于针对“互联网”发表论述，把“互联网”当作他最喜欢的因果解释。这里的操作逻辑很简单：前互联网时代意味着专家意见，后互联网时代意味着平民主义；我们是后互联网，因此，我们是平民主义。在舍基看来，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要知道这是革命，所以一切抵抗都是徒劳的！），只要人们似乎还一切尽在掌控，这就肯定是件好事情。

按照这种逻辑，我们该推崇大众文化参与，认为这本身就值得追求，而不管它对文化做了什么，就算是我们在iTunes和Spotify上给唱片和歌曲的评分，可能也比那些职业乐评人的评分更好。解决方案主义者该乐坏了：这种评分不仅给艺术提供了更多“客观”意见，并且在这一创造（或者至少是评分）文化的过程中把公众卷入其中；因而它们更具民主性和参与性。所以，即

便乐评人消失了，照此逻辑，也没有多少人会怀念他们。

这种观点有几个问题。首先，它对文化参与的褒奖往往远胜于对文化本身的褒奖。这种方式是由后勤物流而非过程方法的考量来推动的。也就是说，它似乎并不在意人们在听什么（不管是贾斯汀·比伯，还是斯特拉文斯基），只要他们有办法投票支持或反对，创造弥母，并从中搞出个YouTube视频。社会学家南希·韩拉汉（Nancy Hanrahan）对这一问题尤其敏感：

> **无法否认的是，由新技术造成的对文化专门知识的侵蚀，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民主的，因为在创造和评价文化的过程中，有了更加广泛的参与。如果民主像CD销量或网站点击量那么容易量化，这种观点倒也可以站得住脚。然而，必须仔细思考的不只是参与，还有参与的条件。如果通过数字技术和网络结构带来的更多文化参与只有利于市场，却阻止了艺术创新，或者是牺牲了对艺术的批判性反思，还有什么理由认为这是民主的？另一方面，如果民主意味着扩展了审议、公开或者真正多样性的机会，目前的情况还差得很远。**

另一个民粹派解决方案主义者经常遗漏的重要观点是，职业乐评人（这同样适用于影评人和书评人）承担着许多无法轻易委托给大众的其他功能。这种功能之一，就是识别出创新的、甚或是有争议性的高质量音乐行为，向公众解释为什么它们值得欣赏，因为，正如阿多诺曾说过的，“没有专门知识，没有内行的习惯性知识，就几乎无法理解正在形成的新知识。”

在iTunes为歌曲写评论的人，不太愿意费心把他们评分的每首歌曲跟经典作品进行比较，也不太愿意费心尝试预测从中可能会出现什么新风格。传媒学者莱恩·吉里斯皮担心，“对评论的消费心态，鼓励人们把艺术和娱乐仅

仅当作实现愉悦目标的手段，却消除了对挑战性、实验性先锋派作品的鉴赏与沉思。”他是对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人写评论的原因与职业评论家不同；他们通常感兴趣的是对自己的体验进行评论，而不是从给定作品中总结意义。作家丹尼尔·门德尔松（Daniel Mendelsohn）对此间的区别深得真髓，他写道，“所有的评论都是基于这个等式：知识+品位=有意义的评判。这里的关键词是有意义。对一件作品有强烈反应（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却不具备为评论增添分量的广博学问，这样的人不能算是评论家。”

这不是说，没有iTunes评论或Yelp的世界会更好。理想情况下，我们会认识到，扩大公众文化参与，同时捍卫甚或补贴职业评论家所发挥的重要公民职能，具有重要意义。屈服于解决方案主义者的诱惑，把新技术平台说得更客观更有效，是对低效的、靠人力驱动的陈旧技术进行升级，等于是选择了一条对抗性的、南辕北辙的道路，它拒绝承认，主观性、低效率和无知，在我们整体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一直扮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互联网”并不是那些“缺陷”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缺陷；相反，它们是我们应该加以捍卫的重要而脆弱的成就。

06 更少犯罪，更多惩戒

“想象一下，如果亚当和夏娃并没有住在花园里，而是住在智能大楼里，那会发生些什么事情。神圣的设计师可能会做好安排，让他们永远见不到苹果。”

——厄休拉·富兰克林[1]
（Ursula Franklin）

“乌托邦所谴责的，不在于道德上的恶，而在于一个充斥着缺陷与瑕疵的世界有多么无耻——这是一种存在论上的谴责，而非道德上的谴责……它所反对的世界，是充满了邪恶、吞灭之火、谎言与欺骗的黑暗世界；是动荡、无知、死亡的世界；是美好事物尽皆泯灭、计划前功尽弃的世界。”

——托马斯·莫尔纳

随着最新技术的采用，警察们获得了光明的未来——这不光是因为他们可以用Google监视潜在的犯罪嫌疑人了。还有其他几种不那么明显的发展趋势，必然会令得他们的工作更轻松、更高效。但这几种趋势，同时也对隐私、公民自由和执法程序提出了棘手的问题。

首先，警察执法，正是利用“大数据”受益的有利地位。随着摄录设备成本不断下降，实时发现罪行、做出反应，现在技术上已经做得到了。以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这样的城市为例。和美国其他许多城市一样，今天，奥克兰城里覆盖着数百个隐蔽的麦克风和传感器，这是一套名为“枪声定位”（ShotSpotter）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不光能提醒警察出现了枪声，还能对枪声来源进行三角定位。校验了声音确属枪声之后，人类操作员会通知警方。这

1 德裔加拿大教育家、作家、女权运动家。

套系统并不便宜——据报道，“枪声定位”系统每年每平方英里的费用是四万到六万美元——但在罪案侦破领域，它们还算不上最时髦的东西。智能手机就能做得很好的工作，何必使用昂贵的麦克风呢？归根结底，设计一套吸引人、又不给人添乱的应用程序，创造合适的激励动机（比如唤起公民的道德良知，或者把犯罪报告变成一款游戏），让市民完成犯罪传感器、容易分心的人类操作员的部分任务，这不就行了吗？

改善“枪声定位”系统的其他方法，并不难于想象。从原则上说，枪声定位系统是被动式的；它们也许有助于阻止或者迅速应对犯罪，但无法根除犯罪。计算成本的下降，传感技术的大幅进步，接入庞大在线数据库的能力，可以让我们从事发时识别犯罪（也就是“枪声定位”系统所做的工作），发展到事发前预测犯罪。更智能的新设备无需预测枪声，而是着眼于检测过去枪响之前出现的声音。这就是技术和大数据意识形态再次登场的地方；它许诺说，能够通过对过去发生罪案的数据进入更深入、更庞大的分析，再结合先进复杂的算法，预测、阻止罪案的再次发生。这种做法，称为“预测警务”（predictive policing），虽说才出现短短几个年头，就有许多人吹捧它是警务工作的革命。它是“解决方案主义”的缩影；说到应用技术和大数据来彻底消除罪案、解决犯罪问题，再也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例子了。它看起来太容易、太合乎逻辑了；谁不想在事发前预防犯罪呢？

美国警方对“预测警务”（获选《时代》杂志2011年最佳发明）的前景尤感兴奋；以英国为首的欧洲人也正在慢慢赶上。举个洛杉矶警察局（LAPD）的例子。他们使用一种名为“PredPol”的软件。该软件分析了历年来官方公布的财产犯罪（如入室盗窃、汽车盗窃）统计数据，将巡逻地图分为500平方英尺见方的区块，计算实际犯罪的历史分布和频率，接着告诉警官哪些区块要严加巡查。

事前预防犯罪比事后执法、调查效果更好，也更廉价。因此，虽说巡警们不见得能在案发过程中抓住罪犯，但他们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仍然有助于震慑犯罪活动。不过，有时候，警方真的能赶上正在发生的罪案。2012年6月，美联社报道，洛杉矶警察局的一位队长看到“PredPol”建议他派警官到所属巡逻区的边缘地带，进入某个监控网格区域。但他吃不准这个建议的可靠性。一如队长预料，警官们什么也没发现；但几天过后的夜里，他们回来巡逻，逮到有人正在砸窗户。该算“PredPol”得了一分？

“PredPol”和类似的软件都是近期才开始试运行，尚不足以得出任何确凿的结果。不过，过渡期间的结果看起来甚为可观。在洛杉矶，5家警察分局在人口约为130万的巡逻区域采用“PredPol”技术之后，犯罪率下降了13%。圣克鲁斯市（The City of Santa Cruz），如今同样采用了“PredPol”系统，入室盗窃案下降了近30%。在全美各地的诸多警察部门，都可发现类似令人振奋的统计数据。目前正在建设的另一些强大系统，也能轻松地进行重新配置，满足更多的预测需求。以纽约警察局最新的创新为例。这项技术名为“车牌识别系统”，它将逮捕记录、911报警电话、车牌识别技术、辐射探测器等数据，全部同步到全市3000个闭路摄像头上。它可以对场景进行实时监控，根据大量的数据理解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这一步飞跃到预测现场即将发生什么事情，应该费不了太大功夫。

如果说“PredPol”的“预测”听起来挺耳熟，那是因为它采用的方法，灵感得自那些著名的互联网公司。2009年，洛杉矶警察局的一位高级警官在《警长》（*The Police Chief*）杂志上盛赞亚马逊公司“理解客户群中不同的类别，归纳其购买模式，”这种能力令得该公司“不仅可以预期、甚至可以促进或者塑造（客户）未来的行为。”因此，正如亚马逊的算法能够预测你下一次有可能购买什么书，类似的算法应该也能够告诉警察哪一种类型的犯罪有多大的可能

再次发生，在哪里发生。你以前偷过自行车？那么你兴许也有意抢劫杂货店。

在这里，我们碰到了算法上的一个老问题：它们的客观性来自一种假设，极度缺乏透明性。我们无法检验亚马逊的算法；它们完全不透明，从不受外界审查。亚马逊称，保密有助于他们维持竞争力。当然，这么说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同样的逻辑能应用到治安领域吗？如果没人能检验算法（如果预测警务软件来自私人企业，那很有可能是这样），我们就不知道算法里预设了什么样的偏见和歧视性做法。此外，算法还逐渐主导了我们法律制度的其他许多领域；比如，人们还用它们来预测某个罪犯获得假释或缓刑后，有多大的杀人（或被杀）概率。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开发了这种算法，并已经在巴尔的摩、费城和华盛顿特区进行过测试。这种概率信息能够影响量刑建议和保释金额，所以绝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我们又怎么能知道用来预测的算法并未反映创作者的偏见呢？举例来说，犯罪往往发生在贫困和种族多元化的地区。算法，还有它们假定的客观性，会不会带来更大的种族定性？如今，在大多数民主地区，警察要拦下街上的行人并进行搜查，是得有原因的（不能光是猜测，还需要证据）。但配备了这类软件之后，警察能够单纯地说，是算法叫他们这么做的吗？如果是这样，算法又该怎样出庭作证呢？技术中立主义者很可能会忽视这类问题，侧重于算法警务带来的抽象利益；反过来说，技术构造主义者对现代警务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限制条件和偏见已经有了若干基本的了解，可能是更为关键的人物。法律学者安德鲁·格思里·弗格森（Andrew Guthrie Ferguson）对预测警务做了详尽研究。他并不否认预测警务可以用到更多的地方，但同时也警告说，不要对算法抱持太大的信心，屈从于信息简化论。他指出，“预测算法不是预测未来犯罪的魔法盒子，恰恰相反，未来事件的概率模型，是建立在当前环境的脆弱性上的。”

但算法为什么能发挥作用呢？弗格森指出，将来会出现犯罪，不是因为过去出现了犯罪，而是因为“激发了第一次犯罪的环境脆弱性仍未得到解决。”比如说，算法预测又将发生一起蓄谋偷车事件，而警察正好看到一个人在预测地区之一带着一把螺丝刀，这就能作为拦下此人的合理怀疑（这样一来，在法庭上，警察拦截此人的合法性是很难遭到质疑的）。但是，正如弗格森指出，如果警察前一天就逮捕了之前发生罪案的责任人，但模型尚未反映出这一信息，那么，它做出的预测就不相关，而警察也需要另外拿出理由来拦截此人。如果他们拦截了该路人，也不能够在法庭上说，“这是模型告诉我们的。”然而，这对遭到警察拦截检查的人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好理解，毕竟这个人并不熟悉预测软件及算法。

再有就是报案率低的问题。尽管大多数凶杀案会报案，但很多强奸和家庭闯入事件并未报案。即便并未报案，但每当负责街区出现怪事，当地警察仍能够通过一些途径听到风声。反过来说，预测警务可能会对统计数据的综合实力抱有天真的信念，取代这类直觉认识。如果只用已经报案的罪案数据来预测未来犯罪、指导警务工作，某些类型的罪案就会无人研究，无人追查。

那么，该怎么运用算法呢？如今很少有人探讨这件事，但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财政部门汲取不少经验教训。举个例子，2012年8月，算法交易造成了两起灾难性事故后，香港和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当局起草了建议书，要求对算法交易所用的计算机系统在设计、开发和修订上进行定期的独立审计。这样，就像财务审计师可以证实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算法审计师也可以验证算法是否运转正常。随着算法进一步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从Google的自动完成技术[2]到“PredPol”），将之交由合格的、热心公益的第三方定期审查，

2 也即在 Google 的搜索框中输入几个字，它便可根据先前的搜索对其进行补完。

应该属于审慎之举。

审计解决方案的一个优点是，它不要求接受审计的公司公开自己的商业秘密，这一点是提高算法透明度的主要障碍（当然，软件公司是这么说的）。

你被 Facebook 逮捕了

警方还在硅谷找到了强大的盟友。像Facebook这样的公司已经开始使用算法和历史数据来预测哪些用户有可能借助自己的服务从事犯罪活动。运作流程是这样：Facebook自己的预测系统研究特定的行为线索，将某些用户标记为“可疑”：比如，只给18岁以下的人发信息的用户；大部分联系人均为女性的用户；输入“性”或“约会”等关键字的用户。之后，工作人员可以核对各种情况，在必要之时向警方检举用户。Facebook对自身品牌这么看重，道理很浅显：绝不能让人以为这个平台是藏污纳垢之所。

2011年，Facebook开始使用微软提供的服务“PhotoDNA”，可扫描每张上传的图片，并将之与联邦调查局全国犯罪中心提供的儿童色情图像进行对比。自那时起，Facebook又将分析范围扩大到图片之外。2012年中期，路透社报道，Facebook利用预测算法，锁定了一个中年男子，他与13岁女孩谈论性，并安排次日见面。警方联系了这个小姑娘，接管了她的电脑，逮捕了这名男子。Facebook处于算法监控的最前沿：一如警察局参考从前的犯罪统计，而Facebook参考性侵犯罪案发生前进行的实时聊天存档。有趣的是，Facebook声称，自己使用的算法比人类干预程度要少，借此证明算法的正当性。“我们从没想过要建立一个让员工监控私人对话的环境，所以，使用假阳性率非常低的技术，对我们非常重要。”Facebook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对路透社说。

借助这种方法逮捕向儿童下手的性侵害罪犯，我们很难对此质疑（更不必说，Facebook也没太多选择余地，现行美国儿童保护法规定，青少年使用的在线平台必须对恋童癖提高警惕）。但能让Facebook去预测任何其他犯罪吗？毕竟，它很容易就能介入许多类似的警务工作：检测潜在的毒贩，识别有可能侵犯版权的人（Facebook已经不允许用户发布许多文件分享网站的链接了），预测下一代的捣蛋鬼（尤其是在2011年英国暴动发生之后）。既然有了这些现成的数据，人们几乎无法抵挡使用它的诱惑。2012年6月，一名枪手在科罗拉多州一家电影院大开杀戒，枪杀了12人，这种借助数据的诱惑更是达到了最高点。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新闻标题说明了一切："数据挖掘能够阻止杀戮吗？"标题句尾的问号，大有随时可以拿掉的势头。

从许多方面看，互联网公司预测犯罪处于比警察更有利的位置。后者需要许可才可获取私人数据，而Facebook这样的公司则可随心所欲地查看用户数据。从警方的角度看，让Facebook来干这些脏活很可能更为有利，因为Facebook自查无需通过法院系统。尽管Facebook兴许会感觉把这事儿变成一档生意从财务上而言太保守（它宁可继续扮演好市民角色），规模更小的公司恐怕抵挡不住捞快钱的诱惑。2011年，荷兰卫星导航公司TomTom（现将部分卫星导航技术授权给了苹果）爆出了隐私丑闻：它把从客户处收集来的GPS驾驶数据卖给了警方。主张保护隐私的活动家克里斯·索菲安（Chris Soghoian）同样证明，各互联网和移动公司均为执法机构设立了"付钱就窃听"的易用接口。

公开可用的信息也都待价而沽。因此，警方已经开始研究社会网络网站上的骚动迹象（大多是借助了私人公司的技术力量）。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新近发表的一份宣传小册子，就敦促执法机构"借助社会媒体的

力量，推动更佳的警务工作。”想要帮忙的公司多着呢。弗吉尼亚州的创业公司ECM Universe吹嘘自己名为“执法专用内容速析”（Rapid Content Analysis for Law Enforcement）时形容说，“这是一套社会媒体监控解决方案，能实时监控Twitter、Facebook、Google群组，以及其他诸多用户自由表达的网络社区。”ECM的小册子上说，“这一解决方案采用文本分析，将威胁的语言与监控对象关联起来，碰上可疑迹象时会对调查人员加以提醒。”什么样的可疑迹象呢？《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篇文章说，ECM Universe协助科罗拉多州拉普顿堡警方锁定了一名在twitter上放狠话说要“杀人”、“烧[此处删去脏话]学校”的男子。这些话倒是说得挺直白，但要是当事人只不过说了句“害人”、“警察去死”，那该怎么算呢？

随着ECM Universe一类的公司积聚起实际犯罪分子发送的海量推文和Facebook更新存档，他们还能够预测犯罪行为发生之前的非威胁性言语线索。所以，就算你只发了条推文说，你不喜欢酸奶，也可能把警察招到家门口，尤其是如果有人三年前发过同样的推文，结果发完推文的当天就拿枪打死了人。

然而，和Facebook不同，警察和外部公司都不可能看到用户在社会媒体平台上行为的全貌：他们看不到私信和“沉默”行为（如点击链接、打开页面等）。但Facebook、Twitter、google+，以及类似的公司肯定全都知道，所以他们的预测能力比警方强大许多。他们甚至可以根据用户从事特定行为的概率来对其评级。

Google数据挖掘工程师写了一本虚构作品，名叫《硅谷丛林》（*The Silicon Jungle*），201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可不是一家经常出小说的出版社）。书中提到了一个很合适的例子，说明这种系统有可能遭到怎样的滥用。小说以一家搜索引擎公司尤巴图（Ubatoo，跟Google惊人类似）的数据挖掘业务为背景。一位暑期实习生开发了“恐怖分子量表”（Terrorist-

o-Meter），这是一种通用的恐怖主义倾向分数，公司可以把它指派给所有的用户。当然，对自己得分不满意的用户，有机会改正——为此，需要向尤巴图提交更详尽的资料。这看起来像是个疯狂的点子，但尤巴图的企业文化对创新特别着迷，实习生可以大胆尝试（这或许是对Google的又一次影射），项目进行了下去。

为建立“恐怖分子量表”，这名实习生整理了一份“有趣”图书清单，暗示读者对颠覆活动有着潜在的兴趣，并从尤巴图的一家网上商店里寻找购买了这些图书的客户名字。接着，他又寻找这些客户经常去的网站，利用这些网站找到了更多的人——靠着诸如此类的办法，他掌握了5000人的姓名（这可是个神奇的数字）。实习生很快发现，一家类似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团体找上了自己，这个团体想借助这5000个名字加快招募成员的活动；此外，各家国防和情报机构也都在找他，迫不及待地想把这5000人送进关塔那摩。

我们不知道Facebook有没有类似的“恋童癖量表”。但鉴于它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用户分析，建立类似的量表恐怕不会太困难——而且，Facebook不光可以为恋童癖打分呢。“瘾君子量表”怎么样？还有，“共产分子量表”怎么样？——约瑟夫·麦卡锡[3]（Joseph McCarthy）肯定爱死这个了。只要掌握足够的数据和正确的算法，我们所有人都势必显得可疑。那么，如果，我们根本还没犯下任何罪行，Facebook就把我们交给了警察，那会怎么样？我们会像卡夫卡小说里的人物一样，拼命琢磨自己犯了什么罪，为还自己清白奋斗余生吗？ Facebook会不会给我们提供一条脱罪之路，交钱以换回自己名誉的清白？如果它的算法是错的，那会怎样？

预测警务的前途，尽管有可能是真的，但由此带来的危险性，也丝毫不

3 美国参议员，曾在任上主持过对进步人士的迫害活动。

假。解决方案主义者们有必要克制一下冲动。警方需要把他们的算法交由外部审查，纠正其偏见。社交网站需要建立清晰的标准，说明自己实际上做了多少预测性的自我监管，对用户做了多大程度的性格侧写，提交了多少数据给警方。Facebook也许在预测犯罪上比警察更有效，但不能让它擅自行使这些警务职能，却又不遵循民主制度下限制警察职权的法律法规。我们不能打着追求效率的旗号，规避法律程序，颠覆民主规范。

为什么在柏林你应当搭乘地铁

预测警务的限制性似乎很强，但跟另一些最新的技术相比，它实际上反而显得更人性化、更具有解放意义。知道罪行可能很快发生，巡逻警官可以前往现场，做好日常的警务工作；他们不会把所有犯罪嫌疑人都关起来，也不会在潜在的犯罪区域修起一道高墙来。这么做太严酷，也太昂贵，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能做得到。

但并不是所有情况都这么清晰明了。假设说，警察知道每个星期五晚上总会出现大批从夜店里出来的酒鬼司机（但愿他们不用预测软件也想得到这一点）。警方可以加派更多警官到夜店所在区域巡逻。但警察会把所有这些人都抓起来吗？大概不会。或者，他们可以采用其他策略，阻止喝醉了酒的人坐到方向盘后面。比方说，凡是带着车钥匙进入夜店的人，买酒时都得交出钥匙。更实际一些的做法是，为汽车配备最新的呼吸分析仪，如果测出司机喝了酒，就不让汽车启动。这对警察来说岂非更好的安排？这样，他们不必浪费宝贵的资源，执行率能达到100%，甚至歧视和种族定性等间接问题也迎刃而解，因为不再需要拦下车进行临检了（反正，再也用不着怀疑司机是否酒后驾驶）。

机会引发犯罪的观点，以及伴随而来的“应当设计环境，灭绝犯罪发生的可能性”之信念，是所谓的“情境犯罪预防”学说（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简称SCP）的基础，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就对犯罪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早期的福利主义法强调改造单个罪犯、改变基本社会条件（也即所谓的犯罪驱动器）。情境犯罪预防与此不同，它主张的方法并不以道德、改造问题为预设条件。它也不追求改造罪犯，告诉他们为什么做错了什么。情境犯罪预防认为，一旦消除了屏障，失去了控制，犯罪就会顺理成章地自然发生，而不是什么异常事件。

犯罪学家大卫·加兰（David Garland）在他的开创性著作《控制文化》（*The Culture of Control*，和“情境犯罪预防”类似的理论，他自己称之为“日常生活犯罪学”）中假设，“犯罪是一起不需要特别动机或意向，不存在病理或异常的事件，而非大量事件，犯罪是铭刻在当代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惯常现象。”因此，依照这套逻辑，若是按照正确的方式设计环境，就有可能彻底消除犯罪，或至少减轻其严重性。“注意力不应该放在个人身上，而应该放在互动习惯、环境设计、控制结构以及附加其中的动机上。新的政策建议会着重强调以预防来取代治疗。”加兰指出。

为说明“情境犯罪预防”逻辑在现实中的应用，让我们来看看各城市地铁系统里旋转门的设计。纽约地铁设有大量等身高的入闸（正式名称也叫高入口/出口入闸）。除非伪造地铁票，人不可能绕得过这些入闸口（事实上，最初安装在纽约的时候，这类高入闸违反了纽约州的防火条例，因为防火条例中规定必须设置允许更大客流量的出口）。因为不能欺骗系统，碰上紧急情况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反对安保至上》（*Against Security*）一书中，社会学家哈维·莫罗什（Harvey Molotch）描述过一起案件：纽约警方因为没有地铁票，没法绕过全身闸口，无法及时应对站台上的枪击事件。受害人不幸送命。

柏林的地铁则明显不同：人应该买票并验票乘车，但因为没有入闸口，要是没车票也能搭便车。如果被逮住了，搭便车的人必须支付罚款。纽约的系统让你别无选择，只能遵守；而柏林系统，尽管施以罚款的威胁，但同时也在向公民责任发出呼吁。有两位“情境犯罪预防”的主要理论家在为该理论辩护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例子，“从道德上看，让社会中人不容易受到犯罪诱惑更可取，比诱惑横生、又在人受了诱惑后施以惩处的做法好。”站在这个角度，纽约系统不光高效，且在道德上比柏林的系统更高明。

司机喝醉酒，汽车就不启动；社区安装门控系统，不容许外人进入；修桥的时候，采用让人无法跳河的设计；公交采用自备零钞系统，司机无需携带现金，从而减少抢劫——这些都是“情境犯罪预防”付诸实践的例子。从广义上讲，“情境犯罪预防”采用了五种政策杠杆（也即增加风险，提高努力，减少回报，减少刺激，减少借口）；而人们又通常会把这类杠杆里的一种或几种转变成预防犯罪的物质环境（举例来说，让乘客上车时往金属盒子里投硬币，因为抢劫者必须破坏盒子，或者搬动盒子，这提高了抢劫者要付出的努力；而司机不必再携带找零的现金，没有多余的钱可偷了，这就减少了抢劫者的回报）。“情境犯罪预防”几乎总是涉及到一些技术上的修修补补、工程设计和操作处理；没有呼吸分析器，就不会有“司机喝了酒就不启动”的汽车；没有视频摄像头、智能大门，以及高级生物识别设技术，就不会有门控社区。受技术影响小的活动（比如读一本书），不像受技术影响多的活动（如乘坐地铁、驾驶汽车等）那么容易受“情境犯罪预防”干预。

但随着我们的所有活动都逐渐开始受这样那样的技术影响，这种局面可能很快就会改变了。如果你放弃实体书，转而阅读电子书，那么“情境犯罪预防”工程师就可能限制你在电子阅读器上的行为，对你加以干预。电子阅读器可以禁止高亮、消除匿名性，或是让行文中所有猥亵内容自动“黑屏”。

又比方说，你还是坚持阅读实体书，但把你的传统老花眼镜换成了Google设计的花哨智能眼镜。Google公司还申请了专利技术，能够在无需人工输入的条件下，识别出现在视频里的物体。把智能眼镜和这种新的物体识别技术结合在一起，潜在的干预范围就大大扩展了；喝醉了酒、睾酮高的男性，戴上这种眼镜，说不定会根本看不见异性。又比如说，你想在电脑上读书，因为如今人们吹嘘说，阅读应该是一件跟朋友一起做的社交活动，你把书在Facebook里打开了。万一它正好是帮助设计“恐怖分子量表”里的“有趣书籍”之一，你的恐怖分子得分就会叫你危险地滑向“嫌疑人”的边缘。信奉“情境犯罪预防”理论的好人们，哪个不想禁止你阅读书中内容；或者，趁着你还在读第三章，就把你甩进国土安全部的黑名单里去？

在通常的“情境犯罪预防”环境下，这种高度个性化、有极强针对性的干预很罕见，因为我们的技术环境是为群体设计的，不是为了单个的人。但最近出现了两种明显的发展趋势。首先，反恐战争，以及其一整套以预防风险为主的措施，让如下的观点变得“正常”了起来（只要看看我们的机场就知道）：与特定描述相吻合的人，有必要跟他人区别对待；只有通过个性化，才能识别这类的人，将之区分出来。换句话说，不光可以预防实际的罪行，甚至可以预防假冒的罪行——也即，有些行为成了“罪犯”专用，仅仅是因为与犯罪者的特定描述相吻合（在这一点上，“情境犯罪预防”听起来不像是警务，而像是筛选）。其次，各种商业平台（也即创造或分享观点的平台，如YouTube、iTunes、Kindle Store、Google Play等）竞相涌现，让许多个人行动（包括言论）受制于公司，而非政府。如果是山姆大叔让你闭嘴，这是审查；如果是苹果这么做，这就是单纯的服务合同条款（你可从没仔细读过那玩意儿）。警方需要一些涉嫌理由来监控你的Facebook私信，可要是Facebook自己这么做，那完全是因为它有这个能力，也有合适的算法。

但对“情境预防犯罪”表示担忧，尚不存在直接而明显的理由，毕竟，（不管依不依靠数字技术）消除犯罪难道不是件好事吗？这个例子说明，只关注效率有可能遮掩了以下观点：或许，执法项目也应当促进其他目标。各位读者可能还记得本书早前讨论过的阿尔伯特·赫希曼简明的“悖谬、无用及危害”理论。这三个主题，曾出现在对“情境犯罪预防”的无数批评当中，且深刻地揭示了它无数的不足之处。在不屑一顾地说这些批评反动和保守之前，我们实在有必要三思。因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它们所批评的“改革”，本身就有可能跟自由主义相对立。如果连自由主义本身都陷入了险境，那么，抨击一下这些所谓的“改革家”，应该没什么坏处。

“碰碰车”的危害性

对“情境犯罪预防”的一种常见批评论调（基本上是无用论的变体）是，它能利用技术迅速地修复问题，但却并未解决犯罪的根源，从而有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因此，一种类型的犯罪遭到“屏蔽”之后，罪犯会转而去做另一种。又或者，屏蔽常见途径之后，他们会通过不同的途径开展相同的犯罪活动：如果有些房子安装了现金的报警系统，抢匪们只需换到没安装这种系统的邻居家就行了。

还有一些批评提到的人不多，但更耐人寻味：一些学者认为，“情境犯罪预防”计划变得无处不在，这样一来，要在不适合使用“情境犯罪预防”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执法就更困难了。如果日常生活里的每一样东西都采用纽约地铁入闸口那样的监管方式，那么，来到没有入闸口控制装置的环境，你不觉得有必要做正确的事。比如说，你习惯了充斥着“情境犯罪预防”的环境，突然来到一间小型杂货店，店里没安装闭路电视摄像头，也没有新奇的

防盗系统，店主又正在忙活别的事情，看不见你在干嘛，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危害论的批评提出最发人深省、令人不安的观点，它一方面承认某些“情境犯罪预防”技术确实有效，另一方面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这类措施成为我们维持治安的主要方式（考虑到数字新中介机构的大量出现，不难想象这类举措会变得有多么占主流），我们有可能会失去些什么。这类批评回避了手段和效率的问题，它假设手段正像设计师们想的那样发挥作用，从而对这类项目最终目的是否合乎道德、在政治上是否恰当提出了质疑。一个没有犯罪的世界值得我们去追求吗？让人不可能犯罪（而不是在事后给予惩戒），我们得到了些什么，又失去些什么呢？这种方法对重要的民主价值观，如团结、异议和审慎有什么影响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很不叫人看好。首先，许多评论家认为，究其核心，“情境犯罪预防”培养、并助长了公民之间的不信任情绪；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情境犯罪预防”的指导精神，是“最佳的政策，就是以适量的良性怀疑态度对待大多数的陌生人，甚至邻居。”大卫·加兰指出，“情境犯罪预防”背后的智性方法，不光“违背了传统的认识，也即认为秩序来自道德自律、服从权威，”也“颠覆了传统的福利国家信念，也即为了社会的有效运作，必须团结社会的所有成员，因为所有人都是包罗万象的公民联盟的一份子。”“情境犯罪预防”培养的世界是原子论的，自私的个体永远只关心安全，不光无法信任他人，更不可能展开道德推理。这样的人极为擅长权衡新报警系统的优缺点，但却难于衡量自身的价值。

另一点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个性有可能成为“情境犯罪预防”无情效率下的牺牲品。故此，对追求“实现人类美德的自动化”所固有的危险，加拿大法律哲学家伊恩·克尔（Ian Kerr）做出了警告。他形容说，那是“通过技

术，而非道德或法律，限制、有时候甚至彻底消除道德行为，把人编程去‘做正确的事’。”克尔关心（他讨论的内容基本上仅限于最近出现的技术，如电子书或DVD上使用的“数字版权保护”，以及无人驾驶汽车）的是，这类计划会带来一种“道德无能”，人类把道德放到自动导航仪上，不再培养诚实的品性。克尔指出，“数字锁确实能保护业主实现特定的结果，但这是以放弃道德诚信工程为代价的。”

这种“道德诚信工程”不仅限于我们去小店里买东西；还规范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与他人沟通。换句话说，支持“情境犯罪预防”的人最喜欢用的借口（也即一旦“情境犯罪预防”装置普遍化，它们能帮助我们越过“道德日下”的关卡），可能站不住脚。在我们与朋友日常互动的背景下（人们自然地期待诚实、信任、真诚），能将“情境犯罪预防”逻辑普遍化的唯一方式，就是给每个人配备一台测谎仪。而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很可能正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旦人人都戴上Google的神奇眼镜，对朋友使用迷你测谎仪（说不定是以云技术为基础的）的成本也就微不足道了。

克尔举了大量例子，说明技术不再给人类操作员做正确事情的余地，比如一旦你离开超市的停车场，购物车就再也推不动；高尔夫球车编好了程序，司机不能把它开到离草坪太过靠近的地方。对克尔来说，这就像是迪斯尼乐园里的碰碰车——孩子们开着特别设计的小车穿过封闭轨道。好吧，“开着”这个说法可能不大合适。当然，孩子们坐在驾驶座上，甚至能把车开到一边去，但地底下铺设的隐藏轨道，总是把车指引回场地中央。迪斯尼的碰碰车不可能撞毁；司机们也无非是受了欺骗的乘客。克尔指出，碰碰车不是要训练孩子们如何开车，而是在取消训练，因为这里不允许犯错。这里蕴含的更广泛恐惧在于，碰碰车的逻辑已经慢慢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我们需要把一部分的决策权交还给人类——哪怕这会带来更低的效率，更多的犯罪。

克尔的担忧有说服力，但他的分析里总有些地方让人感觉不对劲。首先，他将道德行为的范围定义得太过狭隘。假设你是一个心不在焉的大学教授，喜欢在繁忙的交叉路口琢磨叔本华，而不是仔细盯着其他的车辆。但你同样是一个很有道德、很有自我意识的人，而且，为了生活，你必须每天开车上班。那么，考虑到你爱走神，你不愿意撞伤他人，你选择了最安全的汽车，车里几乎所有东西都是自动化的。你大可以开心地想着叔本华，又不会从你最心爱的学生身上碾过去。这似乎有悖常理地暗示，有意识地做符合道德的事（尽管需要借助技术来实现这一愿望），反而损害了你的道德。当然，你不可能在每一次左转时都有机会表达你无可挑剔的道德感，但你对自己的驾驶能力拿不准，就把控制权交给了汽车本身，这同样是在表达你的道德心。

当然，还可以拿出其他理由来反对自动化无人驾驶汽车；比如说，随着城市进一步大幅度蔓延，它们说不定会彻底破坏美国残存的公共空间。但这种批评跟克尔对自动化本质的担忧非常不同。或许，我们可以找出很好的论点来解释，为什么掌握非自动化汽车的驾驶方式，跟修理摩托车具有同等程度的智性和审美刺激。同样道理，也有人会主张，依靠自然导航（如风吹的模式，潮汐的高度）比依靠GPS更可取；正如靠详细的菜谱烹饪，比让机器人来指示下一步怎么做更可取。正如最近有本新书的作者赞美自然导航时说，“较之使用这些方法，理解为什么它们管用更重要。”但这并非是对美德的真正关注；就算是《GQ》杂志的读者，也不见得有多少人精通修理摩托车、自然导航，还同时是分子烹饪家[4]。选择是必须要做的，只不过，这些选择更多地是与美学有关系，而和美德无关。

驳回克尔的担忧还太早了点；相反，我们要把它再探讨得复杂些。法律

4 分子美食是一种美食流派名，据说是世界上最前卫的料理方式。

理论家罗杰·布朗索德（Roger Brownsword）在最近的作品中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很适合的途径。按布朗索德的说法，监管机构可以使用3种机制来让我们做正确的事。他们可以通过道德机制，指出某事相较于完善的社会标准是对还是错，故此应不应该做。他们也可以通过理性机制，向我们的自利提出诉求，认为我们不应当做某事，因为它最终会害了我们。最后，他们可以通过布朗索德所谓的“实用性机制”。例如，本着“情境犯罪预防”理论家的精神，他们可以让事情从技术上变得不可行，不用再想着打动我们的道德或理性利益。

克尔对“碰碰车”表示担忧，他认为，只有前两种机制才能保持美德，培养我们的个性，但布朗索德指出，只要在使用时给予审慎的考量，第三种技术机制同样做得到。比方说，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购物上瘾，你可以向银行提出请求，一旦你在同一家商店消费超过100美元，就冻结你的信用卡，那么，从事实上来看，你就从理性机制转向了技术机制。同样，如果你选择驾驶更安全的完全自动化汽车，因为你想要挽救别人的性命，免得自己惹上法律方面的麻烦，你并不见得离开了道德和理性的领域，因为道德和理性考量是你做出决策的幕后动力。

或者，我在这里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如今有些赌场依靠面部识别技术，识别、阻止此前就被赌场劝阻的赌博瘾君子再次进入赌场。虽说这里存在一些与隐私相关的问题（不过，加拿大的赌场最近已经通过创新性地使用加密技术，解决了最棘手的隐私问题），但在技术的帮助下克服人的赌博上瘾症，很难说这有什么违背道德的地方。只要你是自己做出这一决定的，而不是让技术为你做决定，那么，把一些执法的事情交给技术去做，并不存在问题。不过，一旦出现第三方来代替你履行这种机制（不管是公司还是监管机构），事情就真正变得棘手起来。监管机构为什么想这么做呢？也许，这能带来更高的效率，更

多的效用，减少犯罪，但这样的话，我们就又回到了“情境犯罪预防”和克尔的数字锁上。或许，监管机构相信，你受制于所有人都存在的认知偏差和局限，正因为此，你可能会受到诱惑去做你其实并不想做的事情。

这最后一类假设，就是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和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所说的“推搡”（nudge）层出不穷的原因：“推搡”，是以聪明的方式摆布人选择默认设置（作者称之为“选择架构”），让你吃健康食物，为了退休而储蓄。推搡之于摆布，一如公关之于广告：它在无形和不言明的条件下完成了所有的背景修补，把事情做完。最有效的推搡让当事人产生了“自己当事”的假象，却不给他们太多的选择。

布朗索德认为“推搡”存在两个问题。“推搡”看似属于理性机制；通过“修补”我们的“选择架构”，监管机构似乎正是为了我们的自利着想。但在真正民主的社会，选择恰当的机制，以及何时在不同的机制之间进行切换，应当付诸公共辩论和审议。换句话说，说节省汽油钱就是开节能汽车的“正当”理由，不见得没有问题。同样道理，说保持苗条、找到更好的工作、更漂亮的伴侣就是少吃饭菜的“正当”理由，也不见得没有问题。没错，也许我们希望人们开节能汽车，应对气候变化，停止中东的冲突。没错，我们希望人们少吃些饭菜，因为新近的研究暗示，肥胖率的增加跟气候变化息息相关。没错，也许，正如一些持“对肥胖保持宽容”立场的活动家所主张，不应该对超重污名化，我们真正看重的应当是“健康”——而不管人高矮胖瘦，都可以强壮、健康。

“推搡”仍然属于解决方案主义，只是采用了其他的手段。单纯依靠技术层面的命令强行对某事施以“推搡”的伎俩，是以为社会上对目的和手段存在共识，可惜这样的共识并不存在。随着“推搡”的层出不穷，有关我们应该做什么、怎样去做的不同意见，可能确实销声匿迹了，但这并不意味着，

对问题施以“推搡”伎俩真的管了用。“推搡”带来的效率，有可能是被迫达成共识（而不是在公共领域进行真正的民主商议）的结果。

“推搡”存在的另一问题更加阴险：只有当“推搡”让我们像监管机构预期的那样行动，它才管用。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需要“推搡”得使劲些（下手太轻了没用）——这就让人不可能不照着监管机构的期待去做了。或许，听到汽车发出警报声，提醒有乘客没系安全带，你仍然可以继续开车。可大多数人一定认为这很烦，会要求乘客把安全带系上。你大概以为这只是让监管机构修补了你的理性机制，而实际上，你根本是纵容他们借助“实用性机制”对你加以摆布了。

道德日下的公民？

在布朗索德看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机制取代了道德和理性机制。相反，问题在于，一旦技术里预设进了法律和规范，就很难质疑、修改它们了。它们几乎完全消失在了背景当中，令人感觉浑然一体；事实上，人们经常将之视为内置环境的扩展，而非某些聪明社会工程师故意计划出的结果。但如果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规范和法律不断进行修正、展开辩论的世界里，那么，或许我们应该对将这么多监管委托给技术的做法保持警惕。正如布朗索德所说，“道德社会需要对其承诺不断进行辩论。在这样的社会中，做一个技术管理下的被动监管对象没问题，但同样需要主动地发扬道德公民精神。”

近一个世纪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根据对世界的亲身体验，写下有关修订现有理论（包括哪些事情属于道德，哪些不属于）之重要性的观点时，表达过类似的担忧（当然，布朗索德本人并未将自己的看法与杜威扯上关系）。在杜威看来，道德规则是“某种知识工具，有待通

过据此行事而招致的后果，来对此进行检验、证实和修正。”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诚实地承认道德情境的不确定性，以及道德规范在经受结果检验之前所具备的假设性质。”

举个例子或许可以更清晰地说明杜威的想法。从前，蓄奴、或是限定某些阶层的白人男性参与政治事务，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实证明，按照这样的道德戒条行事，结果是灾难性的，于是，规则做了修改。从杜威的角度来看，在这两种情况下，道德体系都运作良好，因为它让我们认识到了道德的不公正，并对其做了相应的修改。故此，道德不是追求某一类固定的结果，而是维持法律和协商空间，接受这些结果，或对结果展开辩论、修正，如有必要，甚至要将之抛弃。正如杜威自己所说的那样，“正如肉体生命没有了物理环境的支持就不可能生存，道德生活没了道德环境的支持，也不可能延续。”杜威的“道德环境指的就是法律和协商空间的累积，将人们很久以前就以为达成共识的观点给予更新换代。

转向实用性的、靠技术促成的层面，有可能会损失一部分这类的空间。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看到，这并非必然：受一种不同的设计伦理和哲学所启发的技术，事实上可以产生更多（而非更少）的此类辩论。唉，解决方案主义者的技术，来自“情境犯罪预防”式犯罪学，以及蓬勃发展的论述“推搡”的行为主义文献，它们并不以培养或维持杜威式的辩论为焦点；而是以提高效用和效力为重点，它们希望把事情解决掉。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本人就是个杜威迷，他曾经写道：“要维持阵营化的可逆性：这是当前道德关怀与技术相遇的形式”（在这一文本中，阵营化的意思是强迫一种工具或技术只用于一项特定的功能）。解决方案主义者的技术和设计，其问题在于，为了追求不可逆性，他们努力想要实现与杜威、拉图尔主张截然相悖的事情。受这类的技术包围着，我们别无选

择，只能按照无名社会工程师以为的普遍规范来行事，最好不对这些规范是否恰当提出质疑。

然而，为发挥积极主动的道德公民意识，人需要知道事情还可以怎么做；人需要至少从抽象上把握这些技术的可逆性。这种眼光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我们的技术环境，能够提高或减少人提出质疑的可能性（这取决于技术环境的构建方式）。如果你只去过纽约地铁站寥寥几次，你大概以为，使用全身式入站闸是运营现代化地铁系统的唯一方式。因此，你不大可能对当前安排的公正性提出怀疑，也不大可能发挥出布朗索德和杜威所赞许的那种积极道德公民精神。

与此相比，柏林的系统，则主要靠理性和道德机制来发挥作用。每当你看到检票员对逃票搭便车的人处以罚款，你就有了一次反思车站无人闸方法是否恰当的机会。或许，你会得出结论，这套系统太宽松了，或者，检票员太严格了，又或者，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被逮到逃票，不应该吃官司。柏林的构建环境更接近杜威设想的那种能促成道德公民精神的道德环境。反过来说，纽约的系统太有效了。从解决方案的意义上来说，它符合所有人的设想；就像史蒂夫·乔布斯说的，“它管用。”故此，那些叫人不舒服的问题（比如关于正义和不平等，种族和公共基础设施等）根本没机会拿上台，这反倒成了一件值得庆贺而非哀叹的事。

然而，赞美这样的效率是一种成就，莫过于堕落成了解决方案主义最卑鄙、最极端的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说，解决方案主义有可能优化了现行公交运输系统，但它无法跳出这个框框去思考；因为它有意识地封闭了公交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的反思空间，让人不大容易设想出更佳的安排。当然，这里我们也忍住诱惑，不把所有事情都归咎于技术；技术本身，并不是杜威式思考和道德生活的对立面。布朗索德对实用性、以技术媒介的机制论述得过于

简单——当然，论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能够刺激（而非妨碍）思考的技术，也想必十分复杂。若是设计得当，技术可以扩大（而非压缩）造就我们道德生活的协商空间。

问题在于，从执法的角度讲，没人愿意宣传并不完美的技术；一种以戒除吸毒为目的的技术，并不打算拉开毒品合法化的大讨论——恰恰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技术可以促进讨论，但若是由国家机构和正式的官僚组织来实行，它们又往往难于实现这个目标。因此，由于执法的制度性逻辑，技术解决方案大多呈现出“不讨论”、只重视效率的倾向。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点，道德和理性机制的优势也就更明显了。此外，技术的完美倾向，也更能让我们懂得欣赏这一点：因为法律不完美，才创造出了协商的空间。

先行制止的危害

上述内容如果都是真的，再考虑到纽约人同样经常接触到其他管理更宽松的入闸口设计，为什么没人反对纽约地铁的全身式入闸口呢？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没有多少人认为进入地铁站必须收费是一件值得自己关注的重大争议性问题。共识早已达成——甚至早在社会工程师钻这个空子之前就达成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和法规都这样；和“推搡”一样，很多时候，遭到挑战的不仅仅在于所选机制是否恰当，更在于法律本身是否恰当。换句话说，争议的主题分成了两个层面：你不得焚烧国旗，到底是因为该行为违法，还是因为新一代的智能匹配技术不会点燃任何像国旗的东西；以及，焚烧国旗是否属于违法行为。

法律学者丹尼尔·罗森塔尔（Daniel Rosenthal）就利用数字技术先发制人（相当于是情境犯罪预防的互联网版）写过一篇重要文章说，由于修正嵌入技

术系统的法律非常困难（罗森塔尔称之为“停滞”），技术机制前景堪忧。数字技术预防犯罪方案认为自己所执行的法律是最终极的，是完善的；它们构成了一个固定变量，这类方案不会对此进行修订。正如杜威很早以前就意识到，这是一种相当天真的看法，世界上从来不缺糟糕的法律，而随着实践不断更新着我们的理论，就算是良好的法律也会过时。

例如，许多法律（反私藏大麻、反通奸等等）从技术上说是明文规定，但很少执行。甚至，正是因为警察不大可能执行法律，公众并不强烈反对某些犯罪活动（如各种不道德犯罪，只有参与其中的人才会受到此种罪行的伤害）。可要是将这类犯罪的执法委托给技术，我们最终就会对相对不重要的犯罪过度执法。更糟糕的是，技术执法的过程，以及随后产生的不可能状态，或许会促使公众修正先前认为此类罪行相对不重要的看法。一如另一位法律学者迈克尔·里奇（Michael Rich）指出，“如果让进行某些行为变得不可能了……就会让反对此种行为的社会规范自我强化起来，政府决策者必须极为确定，’不可能’手段只能对准社会真正谴责的对象。”

事实上，有太多人会违反某一法律，本身或许会促动政府修改甚至废除该法律。彻底摒绝了违反法律的机会，政府也就失去了从人民那里学习的一条重要渠道。研究禁酒历史的学者们都很熟悉这一教训。

当然，挑战法律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非暴力不合作（civil disobedience）。然而，在一个不可能违法的世界里，是不可能出现非暴力不合作的，因为不管违法者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制度没有留下任何违法的途径。许多哲学家和法律理论家争辩说，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说我们有权选择非暴力不合作，这并不是什么牵强附会的事情。例如，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认为，这一权利源于我们挑战政府的其他所有权利。只要违背法律是事关我们尊严（或者其他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如言论自由）的一

项重要权力，我们就有权不服从。实用性考量在这里无关紧要：预见到我们抗议徒劳无功，并不能剥夺我们的这一权利。

对德沃金来说，非暴力不合作还有一个重要的信号价值，因为它能够表明待议的法律并不符合民众共同的信仰或道德——这也是我们应当多仔细想想的原因之一：我们的智能数字环境是让抗命变得更容易了，还是变得更难了。反对越战的时候，要是征兵卡是用防火材料做成的，焚烧征兵卡（触犯了联邦法律）还会给反战人士带来那么多象征意义吗？或者，以20世纪最具象征意义的非暴力不合作行为为例：黑人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拒绝从公交车前排的座位上站起来，坐到后排的黑人那儿去。[5]帕克斯之所以能做出这一勇敢的行为，因为公交车和它所采用的社会技术系统效率非常低下。公交车司机让帕克斯让位，因为他无法预测有多少乘客需要用到前排的白人专座；等公交车上的乘客逐渐多起来，司机只能实时调整座位的分布区块，而当时帕克斯碰巧坐在临时变成“仅限白人”的座位上。

现在，假设帕克斯搭乘的是不久的将来会投入使用的智能公交。公交车上配备有传感器，可提前判断最近的车站等候着多少名乘客，于是，公交车可以计算出自己能够在不引发冲突的情况下搭载多少名非裔美国人；不能上车，或找不到座位的黑人乘客，公交车会给他们发送礼貌的信息，通知他们等待下一趟车。公交站台上安装的摄像头搭载智能面部识别方案，不停地清点着每个族裔有多少名乘客在候车，并相应地将公交分为黑白两个区块。公交车司机（如果还有的话）可以接入大数据计算机门户（类似警方的预测软件），查看历史数据，判断当天可能会有多少黑人乘客，再根据天气、新闻

5 美国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期间，黑人和白人在公交车上的位置是分开的。1955年12月1日，帕克斯在公交上拒绝听从司机的命令，不肯站起来把自己坐的前排座位让给“白人乘客”，遭到警方逮捕。此举拉开了一场大规模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序幕。

报道、车站上候车乘客社交网站个人资料等信息，算出发生种族冲突的概率。司机甚至可以直接拒绝最可能导致发生冲突的乘客上车。

这样的新交通系统会很方便吗？当然。它会给带给我们罗莎·帕克斯吗？恐怕不会，因为她一开始就绝不可能坐到公交的前面。很可能，完全高效的座位指派系统（在无处不在的技术、传感器和面部识别的配合下），剥夺了美国历史上最令我们感到骄傲的一刻。通过诉诸道德或理智机制而执行的法律，留给人足够的摩擦空间；摩擦孕育张力，张力创造冲突，冲突引发变化。反过来说，如果法律通过技术机制执行，产生摩擦和张力的空间都很小，变化的余地也就不大。

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称赞“叛离”（隐晦地表达“违法”之意）是“一个创新的引擎，一种免疫学的挑战，确保大多数人的健康，抵挡单一文化带来的风险，它是多元化的蓄水池，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先进的安全系统容易转为制度化，整合到巨大的官僚系统当中；如果警务职能转入技术之手，再加上技术带有的中立光环，以及它看似无关人类利益及制度的自然起源，甚至会让这种制度化的进程，以十分不明显的方式，发展得更快。施奈尔指出，受这类措施保护的社会，不一定道德，更不见得可取；它们有可能相当可怕。建立一种让人不可能违法的技术环境，就等于是关上了对社会变革异常重要的社会调节阀。“有时，告密者需要公开文件，证明自己的政府在老挝、柬埔寨进行了非法的轰炸行动。有时，钚加工厂的工人需要联系记者，讨论雇主在安全措施上的不作为。还有时候，一位黑人妇女需要坐在公交车的前排，拒不起身。没有了‘叛离者’，社会变革就不可能发生；停滞把持了局面。”施奈尔指出。约翰·杜威想必同意。

然而，社会变革的出现，不一定需要公众漠视法律（如禁酒令），也不一

定需要非暴力不合作（如罗莎·帕克斯）。有时，只要违反法律就足够了。有些时候，因为口袋里装着大麻被逮捕，好过你根本没法把大麻放进口袋里，因为逮捕更有可能吸引媒体的关注，引发公众对禁毒法令的辩论。另一方面，预防犯罪，却通常是一桩沉默的无形买卖。此外，丹尼尔·罗森塔尔认为，在案件没有提交给法院之前，法院不能做任何事，这意味着预防犯罪削弱了法院在审查法律好坏、过时与否中的作用。他指出，“尽管法院通过宪法审查、司法解释和普通法分析模式来调整法律……但若是法律不呈交到法院（提请法院介入，是人违反法律的结果），法院无法审查。”

迈克尔·里奇介绍了一连串这样的犯罪：一旦进入庭审，就会导致不公正的法律被推翻，或至少是被重大修改。“弗吉尼亚州裁定米尔德雷德和理查德·洛文结婚违法，该案上诉至高院后，推翻了弗州的反异族通婚法。[6]得克萨斯立法禁止焚烧国旗，格雷戈里·李·约翰逊（Gregory Lee Johnson）按照该法被裁定有罪之后，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废止了得州的这条法律。得克萨斯州又立法禁止私人之间同性性行为，约翰·格迪斯·劳伦斯（John Geddes Lawrence）和泰隆·加纳（Tyrone Garner）进行此种行为后被定罪，上诉最高法院后，得州的这条法律也遭到废除。”他写道。从逻辑上讲，如果人们从技术上就不可能违反相关刑事法规，那么，认为法律不公正的人就没有办法来抗议了。

有些法律似乎更为稳定，而另一些范围有限的问题（如核研究），哪怕走错一小步，也会导致可怕的后果。不是所有的消除犯罪和预防犯罪系统都同样邪恶；有的系统实际上能经受得起所有的道德测试。正如迈克尔·里奇在

6 1958 年弗吉尼亚州两居民米尔德里德·杰特（女，黑人）和里查德·洛文（男，白人）在华盛顿结婚，婚后返回弗州，被指控违反州禁止异族通婚法令，处一年监禁或 25 年内不准在弗州居住。洛文夫妇不服，提出上诉，即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1967 年 6 月 12 日，美国最高法院废除了弗吉尼亚州的禁止白人与其他种族通婚的法令。

研究中指出，利用技术杜绝酒后驾车，对我们表达权利的潜在影响最小。也很难想象会有多少人通过酒后驾车来违反法律，进行非暴力不合作。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些情况，人们逼不得已要酒后驾车：比如你喝醉了，却必须送怀孕的妻子去医院。但跟酒后驾车致死的人数比起来，这种情况相对较少。所以，我们必须尽量避免全面的反技术话语，不能认为所有的技术性干预都于法不容，对道德具有天然的腐蚀性；不是这么回事。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危险，尤其是规范我们行为的数字中介机构（从电子书到智能眼镜）层出不穷的当下。接受一种转移机制的活动，并不意味着接受另一种转移机制的活动大幅蔓延，尤其是后者在预防犯罪方面表现得更加可疑。一如里奇指出，如果酒后驾车程序因为“对无辜司机的自主权和隐私权只有最低限度的干预”而获得成功，“社会在评估禁止超速（或防范其他超出交通领域的犯罪）程序的时候，或许会变得不够谨慎。”这里的要诀是，要抵制住技术乐观派和技术悲观派过分简单化的诱惑，根据每一种技术干预自身的优点去进行评估。

可惜啊，互联网中心主义阻止我们尽量清晰地理解诸多此类问题。多亏劳伦斯·莱斯格和乔纳森·奇特林已经撰写了大量有关数字预防犯罪方面的文章（莱斯格甚至已经触及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未来）。然而，这两人都过分沉迷于互联网中心主义新纪元主义式的宣言，似乎是在错误的假设上得出结论的。他们认为，数字预防犯罪的做法基本上是一种新现象，是因为有了“互联网”、电子书和MP3文件才存在的。代码就是法律，但地铁入闸口亦然如此。莱斯格确实注意到，楼宇和建筑能够也确实受到规范，但他没怎么下功夫去解释转向以代码为基础的规范，是独特的当代环境之产物，抑或仅仅是犯罪学思维各种长期趋势的延续。

丹尼尔·罗森塔尔指出，在讨论莱斯格和奇特林作品的时候，“学者们有

时候会把数字预防犯罪描述成一种崭新的陌生前景……事实上，数字预防犯罪并不是什么革命，而是现有监管技术的延伸。”以奇特林为例，他对“互联网”及其“开放性”、“原生性”价值的迷恋，以及他相信“互联网”会教给我们重要的功课，恰好构成了一种集权的论调：拒绝承认某些在技术机制下发挥作用的尝试其实可能是合法的，未必会导致道德沦丧。

从理论战的角度而言，这里真正的敌人并不是犯罪学本身。相反，犯罪学里用来支持“情境犯罪预防”类方法的东西，来自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 theory）。理性选择理论偷偷把效率邪教从后门里塞了进来；它不讨论道德、品格、美德这一类问题，也对此做了完全的回避。因此，我们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当前的困境是特例，是新技术的结果，是我们对新技术浅薄认识的结果。事实上，用数字技术进行统治的企图，是一种远为长期的趋势（它们可能属于大卫·加兰控制理论的文化范畴）带来的后果，只不过，这一趋势并非始于硅谷。

有人担心，苹果及其相关设备（奇特林眼中的“首席怪物”）或许会带给我们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做正确的事。可惜，这种担忧来得太迟，也太过误导。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了，要挑战它的逻辑，必须在所有战线上向它发起全面挑战，而不仅仅是在iTunes商店里挑战。我们认为苹果的模式吸引人，不是因为史蒂夫·乔布斯催眠了我们（尽管这是一部分的原因），而是因为苹果采用了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随处都能碰到的模式。继续把“互联网”或“网络空间”想象成一片独特的概念性版图，按照其自身趋势和喜好发展和操作，对我们没有多大的好处。我再强调一次，“互联网”只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带来的结果，而非原因。

保镖与氛围

不光只有政府需要选择采用何种机制来执行规则。私营机构同样要做出类似的决定，只不过要用到另一把钥匙，也不是出于监管的原因。对私人机构来说，这类决定往往要使用排他法：和谁做生意，不和谁做生意。急于出租物业的房东，希望尽量减少麻烦，尽快筛选出有问题的申请人。夜总会很乐意把不适合自家营业场所氛围的顾客挡在外面。顶级餐厅希望顾客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大多数一流餐厅都喜欢有钱有名望的客人。

但请注意，即便是酒吧和餐馆这类看似相同的场所，也会选择不同的方法。芝加哥大学的法律学者利奥尔·斯特拉希莱维茨（Lior Strahilevitz）在《信息与排他》（*Information and Exclusion*）一书中，用一套简洁的分类方式，对不同的排他策略做了分析。夜总会通常会派一名保镖站在入口，要他判断谁能进，谁不能进；斯特拉希莱维茨把这种策略叫做“保镖权。”相比之下，餐厅很少会聘用保镖，而是采用更为温和的策略（索取高价，强迫顾客预订，要求一定的着装规范，设计华丽的菜单，把许多初来乍到的顾客吓跑），这套手法往往能有效完成任务。前一种方法使用的是暴力，后者则通过语言和美学进行软排除。此外还有一些排他策略，比如房地产开发商在地产旁边开发高尔夫球场，以便确保只有喜欢高尔夫的人才会购买公寓，这里的高尔夫球场，就属于“排他性设施”。但这里我们暂且不做讨论。

在情境犯罪预防的条件下，行使“保镖权”很有诱惑力。如果你喝醉了，呼吸分析器就不让你开车；如果保镖不喜欢你，他就不让你进门。反过来说，排他性的氛围，则主要按照布朗索德的理性机制来发挥作用：你确信这家华丽的餐厅不怎么适合你。有时候，餐厅甚至可能利用道德警告，暗示不合规矩的顾客会破坏其他客人的就餐体验。从这个角度说，“排他性氛围”仍然更

像柏林而不像纽约，因为它不存在技术执法。没有任何东西正式阻止你前往该餐厅；如果你坚持要去，你大可以去，只是要承受由此而来的后果。如果你能提前预订好座位，不会有保镖拦着你不让进。

利奥尔·斯塔尔希莱维茨认为，在不同环境下选择哪一种排他策略，基本上是一个信息成本的问题。如果资源所有者不能轻易获得有关每一名潜在进入者偏好和行为的信息，那么排他功能就只能委派给进入者，并更容易营造排他性氛围。如果信息容易获取，那么资源所有者更乐意保留控制权，选择“保镖权”策略。有经验的保镖站在门口，能了解俱乐部老板要知道的大部分信息（当然不是全部）；餐馆的着装规范和第一印象则要复杂得多，不能充分说明就餐者和餐馆是否搭调。

斯特拉希莱维茨分析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意识到，置身于如今这样信息饱和的环境，靠保镖比靠营造排他性氛围更容易、更廉价。餐馆筛选潜在顾客不再昂贵了：只需索取其Yelp或Facebook身份即可。通过这种方式，餐馆可以比任何保镖都更快地掌握更多信息。不足为奇，一些夜总会已经在门口索取顾客的Facebook信息了；就连保镖也喜欢更详尽的信息来源。不过，斯特拉希莱维茨忽视了选择保镖权、放弃排他性氛围的另一个原因：一旦进门，主动验明身份入场的人就能得到折扣和个性化服务。Facebook已经提供了这样的应用程序：依靠面部识别，允许用户在安装有摄像头的加盟商店和酒吧获得折扣。

斯特拉希莱维茨是乐观主义者，又是芝加哥著名法学院和经济学院的门徒，他的话语风格又牢牢地根植于理性选择理论。所以，他对这样的发展自然大感兴奋——不光是因为效率更高的缘故。无需成为坚定的自由市场信徒，人也会发现他的一些论点确实挺有说服力。例如，他认为，如果我们有着全面的在线声誉，一些雇主大概会放弃种族和性别歧视，转而关注我们的资历

和过往成就。一些有趣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个想法。例如，《法律和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看背景审查对美国企业的聘用决策有何影响。研究发现，不做背景审查的企业，会将申请人的种族视为卷入刑事司法系统的考虑因素。由于非裔美国男性比白人、拉丁裔人士的入狱率都高得多，所以，求职时更频繁地遭到拒绝。但进行背景审查的企业，聘用非裔美国人的概率比不做背景审查的企业高8.4%。故此，这里的结论是，掌握申请人的信息越多，就越不可能发生统计性歧视。

最近，另一项研究发现，人的Facebook资料能很好地预测人的工作绩效，尤其是诸如自觉性、守约性和求知欲等特征。求职者若是当着网上朋友的面说谎，日子恐怕不会太好过，所以Facebook大概能更好地反应求职者的性格。从理论上说，这还可能降低根据种族或性别对求职者做一连串假设的必要性。如果Facebook显示求职者挺不错，那么不管他们属于什么类型的人，应该都很好。

许多这样的观点听起来很有说服力。然而，“保镖权”策略核心的那种力争寻找最合适、近乎完美的匹配的精神，听起来也很可怕。它确实有潜力把我们禁锢在自己的内心世界，让我们越来越难以看到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更难于与之交往。它或许可以让我们摆脱社交尴尬（人人都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但它同样也可能阻挡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斯特拉希莱维茨在书里举了一个排他性氛围策略的例子：里约热内卢的高端海滩。海滩分成了12个岗点，每个岗点相隔半英里，各自吸引不同的人流。这样一来，著名的伊帕内玛海滩很受艺人和左翼知识分子的欢迎，9号岗点吸引同性恋者，7号岗点吸引冲浪客，11和12号岗点多为上中产阶级的主妇们光临。海滩仍然属于公共财产，没有什么东西会阻止男同性恋到7号岗点，或是上中产阶级的主妇们到伊帕内玛岗点。但斯特拉希莱维茨指出，“社

会规范和传统是很有力量的，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去海滩的人穿的衣物较少，到海滩去容易遭窃贼，故此，如果邻近晒太阳的人跟自己思维相近，两人的互动会更轻松，也更容易分享浴巾和遮阳伞。”

听起来不错。但弄错这些海滩的人虽然并不多，总还是有一些的吧？我记得自己曾以游客身份到访过半数的海滩，去之前又没读旅游指南，说不准哪个地方针对是哪些人群。从排他性氛围策略换成保镖权策略，会不会更符合公众利益呢？里约热内卢不一定是最合适的例子，毕竟那儿的海滩是公共财产，但世界各地可并不缺私人产权的海滩。如果我们偶然（或者决定）去拜访一处非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最喜欢的海滩，我们真的希望出示Facebook身份方可进入吗？

HBO电视剧《火线》第一季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尴尬时刻：年轻（也并不完全心黑手辣）的毒贩德安杰洛·巴克斯戴尔（Angelo Barksdale）带着女朋友来到一家巴尔的摩高档餐厅。他们看起来非常不舒坦，就像是鱼儿离开了水，他们搞错就餐的流程，对服务员说些蠢话。然而，很明显，这家餐厅也代表了他们热切渴望归属的诚信社会——只要他们能够放弃毒品买卖。在剧集的后面部分，还出现过一次类似的场面。原来是警长的老师霍华德·“邦尼”·科尔文（Howard“Bunny”Colvin）带着自己最成问题的学生们到一家餐厅参加正式的晚宴，很明显，所有学生从来没到过这种地方，所以，有那么一刻，大家目瞪口呆，忘了暴力、毒品和咒骂。如果餐厅选择“保镖权”策略而不是排他性氛围策略，德安杰洛和邦尼的学生们永远不会有机会进到店里（尽管，在后一例中，因为邦尼在场，他们才得以进去）。

或者，我们再来想想面向富裕人士的报纸。出版社可能会得出结论，报纸网站上大部分负面评论都来自羡慕富人的下层人士。所以，它搞了一个创新的付费墙：它不是向所有人收取费用，而是只向收入低于年薪3万美元的人

收费（这种东西，可以利用数据丰富的公共领域准确做出判断）。报纸采用这种做法的假设是：只有动力极强、渴望向上爬的穷人才会付费。这兴许能让报纸摆脱恶评，但就促进包容性、有意义的公共讨论而言，似乎不是什么好办法。排他性氛围的魅力恰恰在于，它们是规避性的，能促成原本不可能出现的对话、转换和认识。

在数据丰富的世界，保镖权规则和数字先行制止规则至上，有可能使我们的童年和青春岁月失去与之相关联的那种兴奋感和尝试感。吸烟、喝酒、性行为、色情、前卫的音乐和电影：如果从现在开始，我们再也不可能在不首先经过一个对信息如饥似渴的数字中介就去体验它们，那么，我们就真正失去了一些宝贵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有不少都是违法的，但这里，违不违法并非要点；真正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规避这些制度。

反对技术失败主义

从抽象的角度看，数字先行制止、情境犯罪预防和基于声誉的控制，似乎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信息无处不在，而且越来越便宜。我们所有人都带着手机。技术似乎是按照自己的规律（摩尔定律）在前进，而我们人类，只能适应环境，修改法律满足技术的要求。

这种情绪弥漫我们的技术公开辩论中。出于这个原因，《华尔街日报》的戈登·克罗维茨（Gordon Crovitz）写道："不论怎样的好坏参半，技术只会进步，不会倒退。"《纽约时报》的尼克·比尔顿（Nick Bilton）撰文探讨多重任务时指出，"对社会是好是坏……这一点不相关了。"帕拉格·卡纳和艾伊莎·卡纳夫妇在《混合现实》里指出，"技术的流动受不情愿的政府阻挠最多，但更准确地说，技术只会回避他们、无视他们，径直寻找乐意的接受

者。”所有这些评论家都采取一种我所谓的“数字失败主义”立场，也就是主张，这头首字母为大写T、名叫“技术”（Technology）的无形且自发的生物，有着自己的进程，他们或明或暗地承认，我们人类对此几乎无能为力。

认为技术是一种自主力量的观点，有着相当漫长的知识谱系；1978年，政治理论家和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在《自主的技术：技术失控成为政治思潮的一个主题》（*Autonomous Technology: 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中做了或许最为准确的总结。早有人数百次指出，这一观点在研究技术变化方面是一种非实证性的懒惰方法。可它从未真正从技术流行论调里销声匿迹。最近，在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科技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中，它又一次强势出场。凯利是硅谷的行家，又是《连线》杂志第一任执行主编，从凯利的想法近距离观察技术失败主义，应该是个不错的着眼点。此外，还有很多“互联网”思想家，从尼古拉斯·卡尔到史蒂芬·约翰逊，都曾说自己受过凯利《科技想要什么》的影响。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凯利的理论为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发展和繁荣打下了知识根基。

凯利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断然否认自己的失败主义。凯利使用了花哨的字眼“技术元素”（technium），用来代替首字母为大写T的“技术”（Technology）。他宽慰读者们说，“技术元素想要的是我们要它渴望得到的东西，想做的是我们要它做的事情。”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振奋消息，但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打碎了这个幻觉：“但除了这些动力，技术元素也有它自己的渴求。它希望自行解决、自我组装成层级结构，就像大多数大型深度互联系统那样。技术元素还希望达成每一种生命系统的心愿：自我延续，自我维持。随着它的发展，这些内在的欲望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强大。”

凯利把能说的好话都说尽了：技术既是我们创造的，又是一种有自己需

求与欲望、基本上独立于人的自主力量。凯利的想法全是诸如此类的故弄玄虚，他一面向我们许诺，人类能够控制技术；一面信誓旦旦地对我们说，人类不需要这样的控制，因为一切已经太迟了。因此，他写道："我们的关注点，不在于是否要拥抱技术。我们远远不止是拥抱；我们已经与它共生了。"紧接着，"大多数时候，我们权衡自己体验的优缺点，发现技术提供了更大的好处，但又没大多少。换句话说，我们自由选择拥抱它，并为此付出代价。"因此，我们同时得到了神秘主义（我们和技术共生，我们已经拥抱了它！）和激进的力量（每当我们拥抱技术，都是因为我们想要这么做！）——这可真是个相当奇怪的组合。

但凯利许诺说，这一切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技术想要的无非是进化，技术本身就是其他形式的进化。因此，他指出："技术元素的进化，也即观念的有机体，模仿了遗传生物的演进，只不过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技术就是自然，自然就是技术；抵抗徒劳无功——有谁想要挑战大自然呢？凭借这一简单的认识，凯利发展出了一整套理论，能够解释从恶意软件"震网"（Stuxnet）到Google Glass的每一种发展，他只消声称：这就是技术想要的东西。

我们只需要发展合适的倾听工具，其余的自然会随之而来。所以，凯利指出，"只要倾听技术的故事，预测它的趋势和偏差，跟踪它当前的方向，我们就能有望解开个人的困惑。"他还曾写道，"我们可以选择修正法律、政治和经济假设，迎合未来既定的[技术]轨道。但我们不能逃避它们。"所以，他想要说的其实是：技术有自己的故事要讲；我们应该倾听它，并对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假设做相应的修正。

但人们或许会问，既然我们能够塑造技术发展的轨道，为什么还要修改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假设呢？如果这些轨道并不是既定的，那会怎样？如果我们能监管Facebook和Google，为什么还要改变我们的隐私概念？如果我们能

够限制情境犯罪预防和数字先行制止激发的各种措施，不让它们影响不同意见的发表和审议，又何必纵容它们肆无忌惮地蔓延？再说，我们又该将从前的假设修改到何种程度呢？如果凯利假装听到的技术之声，其实不过是硅谷公关部门的营销话语，那会怎么样？凯利才不会为这样的问题烦心呢；相反，他倒向了有利于创新的方向，他断言：不应该浪费任何弥母："对新想法的最初反应，应当是立刻付诸尝试。并且，只要它存在，就不断地尝试，不断地检验。"这对你是个好消息吧，听到了吗，地雷老兄？

凯利的分析里并未出现任何有关分配的讨论。他没有讨论该由谁去吹奏亚里士多德的长笛[8]——是富有的人吗？有才华的人？还是随机分配？——凯利设想，技术会生产出足够的长笛，分配自然也就不成为问题了。和彼得·戴曼迪斯一样，在凯利描绘的世界里，技术保证了丰裕，一旦达到了丰裕状态，对资源的争夺也就不必要了。这种对人性的解读方法似乎太过浅薄，因为要是人人都有了长笛，肯定有人想要两支，哪怕单纯是为了跟邻居显摆也好。如果缺失了强健稳定的政治制度，丰裕毫无意义。

凯利想法里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是（他在诸多技术专家中相当具有代表性），他是跳出地方社群、甚至民族国家的范畴进行思考的。他的赛场是整个人类，整个宇宙。这种哲学观，用"宏观主义"（macroscopism）来形容最合适：从如何满足整个人类需求的角度来分析一切事情。因此，如果地方社群选择限制某种技术，或对其加以彻底禁止，就等于是从人类手里偷了东西。按照同样的逻辑，欧洲人简直阻碍了人类前进的各种可能性，因为他们规范转基因食品，还有着更严格的环保标准。用冠冕堂皇的全球正义说辞，打压

8 亚里士多德的长笛，指的是亚里士多德对公平与争议的讨论。亚里士多德曾提问说，如果有一支最好的长笛，应该分配给什么人呢？是出价最高的人？社会地位最高的人？还是最有权力的人？亚里士多德的答案是：应分配给最擅长吹奏长笛的人。

现有地方性实践的意义和回旋空间，这只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罢了。

凯利讨论了阿米什人及其对技术的公然拒绝（有人或许会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明确地表达了上述情绪。凯利对阿米什人最感困扰的地方就是，阿米什人拒绝使用某些技术，实际上放缓了各地的创新："通过限制职业范围，收窄教育领域，阿米什人不光阻碍了孩子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也间接影响了我们所有的人。"凯利从没想过，政治社群有权自决，只要这些社群是通过民主方式来限制技术的（当然，阿米什人并非一贯如此），其实对人类是有好处的。凯利非但不批评阿米什人不民主的手段，对其意图达成的目的也漠不关心。

类似地，在讨论对技术施以限制的时候，凯利认为，所有此类的限制都没有用，甚至有害。"如果我们以全球性的视角看待技术，禁止的做法似乎很短命。尽管某个地方可以禁止某种东西，但它会在其他地方茁壮发展。"他继续说，"在全球性市场里，任何东西都是消灭不了的。地方上可以禁止一种技术，但它只会溜到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但我们分明是住在一个由地方社群规范技术的世界里，为什么应该采用全球性的视角呢？一种技术在一个地方消失，又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因为在前一个地方，社群认为这种技术不可接受，又有足够的力量执行禁令；而在后一个地方，社群信任这种技术，或是力量太弱，不足以抵挡营销攻势。

凯利想法的问题在于，尽管名义上谈的是技术，骨子里却是在谈政治；更糟糕的是，它鼓吹的还是相当恶劣的政治。没人会喜欢这个想法：技术就跟纳粹主义一样，是自然的延伸（唯有失败的可能性，才强迫其转入更为务实的模式）。凯利谈论自然与技术时说："技术的主导地位，归根结底，来自……造就星系、行星、生命和意识的同一种自我组织。"不妨再看看这一段："我们往往把人造技术和自然分离开来，甚至把人造技术视为反自然的，无非

是因为技术发展得足可与其本源一较高下。但究其起源与基本，工具和我们的生命一样自然。”现在，让我们把凯利的宣言与纳粹技术官僚弗里茨·托德（Fritz Todt）的哲学比比看。托德说：“如果说，技术的创作在外在表达上与自然互相矛盾，是因为技术的真正本质是自然法则带来的结果，这就太矛盾了……技术的创作，必然要在与自然的和谐中昂然展现；不能纵容技术变成没有盲目的、任性的措施，与自然发生冲突。”纳粹听到了技术的声音：技术为他们带去了毒气室。

同样，凯利思想自由放任的部分直接来自安·兰德（Ayn Rand），尽管他并不承认两人之间的联系。兰德的名字很少出现在技术理论背景下，但她的确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新反工业革命”（The New Anti-Industrial Revolution），迎头直击技术监管的主题。兰德论点的关键，可归结为一句精辟的话：“受‘限制’的技术就等于受审查的思想。”因此，兰德本着宏观主义的优秀传统写道，“（对技术的）限制，意味着对未知的进行监管，对未出生的加以限制，对未发现的设定规矩。”由于我们永远不知道技术监管会扼杀什么样的创新，我们一开始就绝不应当进行技术监管。“有谁能够预测信息比特将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打动一颗活跃的头脑，并且带来些什么东西呢？”接着，兰德又警告说，“生态十字军”会毁了我们的牙刷，“一群嬉皮士编程的计算机”（她可是在1971年这么写的！）则会延缓人类的进步。按照这个逻辑，社会不应该限制使用生物武器或者石棉，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们可能带来什么好处。

为支持“技术（也就是现在的‘互联网’）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观点，凯利和其他技术评论员往往援引摩尔定律。在凯利看来，“摩尔定律背后的曲线，是技术元素向我们发声的一种方式。”硅谷普遍认为，摩尔定律就跟自然规律差不多，是雷·库兹韦尔“奇点运动”（singularity movement）最初的一

个神话。长久以来，它一直在技术行业扩散传播，人们经常用它证明一些行动计划的正当性。

关于摩尔定律，证明足够严谨的研究并不多，但芬兰创新学者伊尔卡·托米（Ilkka Tuomi）已经做了不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他深挖行业数据，计算实际增长率，跟踪摩尔定律在媒体上的不同表达和他人引用情况。托米的基本结论是什么呢？“严格来说，这一定律并不存在。大多数引用摩尔定律的讨论在历史上不够准确，又极大地扩展了它的实际适用范围。”他写道。此外，托米指出，“在社会学上，摩尔定律是很奇妙的案例，说明现代社会如何制造神话，神话又如何在全世界的科学文章、顶尖企业家的讲演、政府政策报告里迅速传播。”

1965年，英特尔公司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最初提出这一定律，称芯片上每单位制造成本最低的组件之数量，约每12个月翻一倍。10年后，摩尔对自己的估计做了重大修正，将增长速度改为24个月。但他同时还改变了定律所测量的内容。托米写道，摩尔虽然仍然计算了半导体芯片上的元件数量，但不再仅限于成本最优的电路，而是反映现有芯片最大复杂度的演进。1979年，摩尔再一次修正了定律。与此同时，整个行业都开始认为他的定律真是那么一回事，甚至改用了另一个不同的估算时间长度——18个月。大多数媒体报道可以证明，许多人至今仍相信，摩尔说的就是18个月，就连英特尔的网站上都这么说。但摩尔从来没这么说过，他本人通常会第一个指出这一点（“我从没说过18个月。我说的是一年，后来又改成了两年。”）

通过分析实际增长率，托米发现，虽然半导体行业正经历着突出增长，但它完全不像定律里说得那么齐整，且呈指数倍发展。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模式，和80年代完全不同；90年代的发展模式又是另外一套。就连各种微处理器之间的发展也很多元化。故此，对摩尔定律提出怀疑，不是要否认过去

50年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只是为了看清这些变化是否吻合该“定律”所预言的模式。托米指出，摩尔定律是关于未来的，不是关于过去的；历史准确性，从未对半导体行业产生过真正的困扰。

托米的研究有一种耐人寻味的阐释，也即半导体行业极大地受益于围绕摩尔定律衍生的诸多说法，因为它许诺半导体会越来越便宜，帮忙消除了人们对半导体实际使用性的担忧，故此提升了该行业产品一开始本可能薄弱的需求。回想起来，一切本来可以更好些。“半导体行业不断向前倒，指望着摩尔定律始终成立，从经济上拯救世界，证明技术进步的信念。”托米指出。“半导体行业不是努力填补市场需求，而是积极进取地创造市场。”但是，我们不应错误地以为半导体和计算机行业机灵的营销和修辞技巧，就真正是有关未来的金科玉律。

像摩尔定律这样的概念并非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会光因其准确（事实上，它真的并不怎么准确）而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先别以为是技术通过摩尔定律在对我们发声；不妨来研究一下说话的还有可能是什么人——比如，英特尔？这种“技术想要什么”的话语，让科技公司把他们的商业战略表现成历史的自然展开，我们可别对其掉以轻心。技术什么也不想要，“互联网”亦然。

规范和噪音

技术失败主义对抵抗的作用轻描淡写，隐瞒寻求改革和变化的途径。它推崇的世界模型，体现在193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座右铭里：“科学发现，产业应用，人类顺从。”结果，太多的人上当受骗，以为我们只能改变自己的规范，因为我们对技术的自主前进无能为力。对各种技术的关注和焦虑，被

偷梁换柱成了被动的害怕和恐慌，就好像一旦用户们制定了适当的应对策略，更新自己的规范，不相干的道德恐慌立刻烟消云散似的。

这种把焦虑和“技术恐惧症”混为一谈的做法，其实由来已久。历史学家伯纳德·里格（Berhard Rieger）研究了20世纪早期英国对新技术的矛盾反应，他发现，这种矛盾情绪其实很少阻碍创新。相反，他认为，“应当把矛盾情绪理解成英国公众辩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这个部分支持了有益于创新的文化。”事实上，对技术的矛盾情绪或许是一种完全理性、健康的反应，因为新设备的实际运转情况，是超出大多数外行人理解的。出于这个道理，里格写道，“面对创新需要行为理性，而诸多同时代人只能在了解新技术、科学地认识新技术的基础之上才能做出理性行为，”前一需求与后一事实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这种态度，正是我们今天应当竭力找回的东西。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老生常谈的宽慰，“我们只需要等待自己的规范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就行了。”可这里的局面同样非常复杂。技术权威人士经常引用一个故事：19世纪末照相机的迅速传播，造就了整整一代的业余狗仔队（也叫“柯达客”，Kodaker），并引发了有关隐私之死的第一场大辩论。几十年后，争论还在继续，可随着公众学会与这种新设备共存，上述的担忧就退居幕后了。这里逻辑直接来自凯文·凯利：公众注意到了照相机技术的既定发展轨道，并对其假设做了相应的修正。如果我们能对照相机这么做，为什么不能对“互联网”这么做？

但这个公众对技术做出明智反应的故事，有多大的代表性呢？它为什么就该是未来行动的模板呢？调整规范只是我们诸多可能反应中的一种；有时候，这种适应兴许并不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而只是集体行动失败带来的结果。历史上也有许多集体行动发挥作用的例子，依靠明智的政策，再对技术进行各种修改，令得我们无需面对技术改变自身规范。

让我们用20世纪初的消除噪音运动跟柯达客的故事比较一下。随着城市的工业化，噪音似乎变得无处不在：电车发出刺耳的声音，工厂嗡嗡不休，司机按响喇叭（更不用提，还有颓废的中产阶级开始在门外给地毯掸灰，在晚上弹钢琴）。各种社会运动——包括反噪音联盟（AntiNoise League），以及德国防止噪音协会（German Association for Protection from Noise）等——联合起来跟对抗噪音威胁。他们不知疲倦地竞相制定法律，禁止产生某类噪音，同时还向公众介绍多种抗噪创新：无声打字机、悬浮地板、静音电机、静音轧碎机和气动轨道车等。

荷兰历史学家卡林·拜斯特菲尔德（Karin Bijsterveld）指出，在英国，反噪音联盟发起的多种运动令得政府1934年修订了《道路交通法》，规定车辆必须安装消音器以降低排气噪音，禁止销售因年久失修而噪音过大的机动车，晚上11点半到上午7点在市区内禁止鸣笛。在纽约，禁止不必要噪音协会（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Unnecessary Noise）确保医院和学校周围建立静音区，成功地制定了反对航运不必要鸣笛的法律，甚至还减少了国庆日燃放的烟花数量。

维也纳或许是最有趣的例子。反喧闹活动家要求进行的改革（由德国知识分子特奥多尔·莱辛领导），基本上都失败了。可他们的斗争并没有白费，通过公开辩论，他们把安静变成了城市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牢牢地将之变成了市议会要解决的一项挑战。正如历史学家彼得·佩尔（Peter Payer）指出，“通过改变公众对声音环境的认知度，他们的努力不仅影响了城市空间重构的方式，还影响了城市民众对这一空间的感知和使用方式。”尽管莱辛的许多提议听起来很怪诞（他希望在部分地区由专业的、集中的掸地毯服务来帮人们解决家政清洁问题，还要人们关起窗户演奏乐器），但另一些提议，今天看来也相当合理，比如“使用橡胶轮胎和更安静的路面材料，消除车辆

通过时造成的刺耳声音；对要穿过城区的货物仔细包装，减轻货物抖动发出的咔哒声；在公共花园和森林保护区里里修建学校，确保学习所需要的安静氛围。”在具体措施的倡导方面，莱辛或许失败了，但他提供并维持了改革派的想象空间（部分原因在于，他早期的反噪音活动，跟他喜欢的另外两项事业捆绑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

这并不是意味着当时没有技术失败主义者；有许多人就像今天的互联网专家一样，用他们那一套“必然如此”的故事，认为噪音只能留存，维也纳人必须与之共处。如果维也纳人倾听了技术的声音（考虑到周围的噪音，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他们大概会毫无疑虑地接受局面。正如彼得·佩尔的解释，“反噪音运动的批评者们认为莱辛及其支持者是抗拒进步的狂热分子。莱辛们拒绝忍受噪音，被视为软弱、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神经质迹象。据说，只要尝试，人就可以习惯噪音。”换句话说，新规范没影了。

当然，噪音并未从我们的城市中彻底消失，但我们可以想象，倘若反噪音活动家们倡导的措施一项也没有通过，现在会是怎样的情形。诚然，规范是可以改变（被噪音包围也令得人们对噪音更加宽容），但集体行动和明智的政策结合起来要有效得多。为什么这不能是我们关于“互联网”大辩论的模板呢？

如果我们不使用像“技术”、“互联网”这样的大字眼，挑战技术失败主义会更加成功。我们需要把文化、知识和政治上的偏见（比如凯文·凯利）揭示出来，将之从我们的辩论中剔除掉。我们要从硅谷的宏观恋物癖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审查个别的技术。

以自动面部识别这类复杂生物测定技术为例。如果你卡在技术自主、宏观主义的视角里，你有可能无可奈何，接受了之。这是《Slate》杂志科技专栏作家法哈德·曼约奥（Farhad Manjoo）的建议，他写道：“技术迈步前进，

普通人（基于面部识别被跟踪的人，被投入监狱的人，或遭其他方式骚扰的人）会遭到附带损害。”这就是技术自主论的悲观适应论调：前路必然会有血光之灾，但抵抗是徒劳的。但突然之间，曼约奥又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向我们许诺说，规范会再次适应：“不过，我们很快就能学会与它共处了。如果拿摄像机对着人、获取对方姓名没问题，礼仪，甚至相关的规定，都会随之发展起来。”为了确保我们不会为了这一技术发起政治活动，曼约奥再一次提醒我们抵抗徒劳：“回头已经太迟了：要是如今你的面孔、你的名字都上了网，你就已经随处可搜了……不想自己被人搜索？那就下线，或者离开家门时永远带着滑稽的帽子和假鼻子。”

从社会批评的角度看，它实在没什么杀伤力；宏观主义没办法谈论政治（我们只能下线，或者戴上假鼻子），就连冷嘲热讽也毫无作用。作为社会改革的一道处方，曼约奥的宿命论是彻头彻尾的不作为。但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把技术讨论里常见的比喻（自主啦，宏观主义啦，规范适应啦）从曼约奥的言论中拿出去，那他的分析会是什么样子呢？

为了找出答案，让我们把曼约奥横扫一切的宣言，跟凯利·盖茨（Kelly Gates）、索珊娜·艾米丽·玛格内特（Shoshana Amielle Magnet）等学者对面部识别所做的审慎研究比较一下。盖茨在关于自动面部识别的历史研究中指出，和技术权利持有者的说法不一样，这类技术运作得并不完美。企业家一贯爱对技术的作用做误导性的阐述，以便获得更多的政府资金来改善技术。盖茨调查了面部识别行业如何利用9·11事件后的恐慌，更积极地推销自己的解决方案。她研究了公司招募普通用户帮忙锤炼技术（有时候是设计在线游戏，让用户来识别照片）的策略。读了盖茨的书，恐怕没有人会得出结论，把她所描述的趋势概括为“技术在迈步前进”。相反，通过盖茨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批评和抵抗技术的新途径。或许媒体会更重视技术这种无处不在的

失败，而不光是技术无处不在的应用。或许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有必要意识到，寻找更好的软件、管理照片的个人决定，却会让伊朗持不同政见人士的日子更艰难。

索珊娜·玛格内特进行过一项具有同样启发意义的研究：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是怎样失败的。她注意到，行业代表在推广自己创新的时候，总爱使用一个比喻，也即这些技术能够根除歧视，因为算法和人类不同，对种族或肤色的态度是中立的，也看不见种族或肤色（这个故事我们之前就听说过）。与此同时，她发现这些技术的所作所为往往又南辕北辙，“经常定位过度，无法识别，会排除特定的社群。”出于这个原因，生物指纹扫描仪很难扫描亚洲女性的手。虹膜扫描仪排除了使用轮椅的人，有视觉障碍的人。英国生物识别技术工作组发现，对从事“文员、体力劳动、[和]维护”职业的人，扫描指纹很困难；故此，说生物指纹扫描仪没有阶级偏见，恐怕言之过早。这也是需要对算法进行独立审计的另一个原因吧。

无需断然拒绝生物识别技术，人就可以主张，我们需要更好、更具实证性的途径来进行相关探讨；如果说它们必然会按照技术的逻辑来发展（或者，用凯利的说法，按照整个宇宙的逻辑来发展），会让我们放弃许多富有成效的干预措施。技术不是注定的。想想看吧，面部识别技术对情境犯罪预防等技术会有怎样的影响，又会怎样助长保镖权等排除性策略的推广普及呢。要是你只需看一眼对方的脸就能识别出其姓名，连问都不必问，你就可以用更加复杂的方式来微调自己的准入策略。又或者，你可以分析人的面部表情，要是对方看上去是在说谎，那就拒绝其进入。

要发现个别的技术在宏观控制系统中有可能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两者之间又存在怎样的联系，我们需要跳出技术讨论的范畴，从更小、也更稳固、更实证的层面上去思考。一旦我们脱离了“技术”、“互联网”这类宏大辩论

的限制，就有可能找到别的方式来探讨、思考：也即，既了解技术，又关注细节，留心法律和经济环境，且汲取历史的教训。它并不是要拒绝技术解决方案本身；只是希望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要对其适当性进行质疑，从而为社会继续探讨这种适当性设计一种途径，即便是在看似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的技术引出一个支持其自身发展的巨大社会技术系统的时候。

07 高尔顿的苹果手机

"目标模糊、问题定义不精确和政策工具难以驾驭，固然造成了太多麻烦，可若非要用计算器去强加解决，我们就是傻子。"
——德博拉·斯通

"日复一日受管控的生活，让我们所有人都把虚拟物质的世界视为理所当然……在为管理所孕育的幻象命名时，我们所用的语言是变化多端的，故此，不管我们品尝、闻嗅或体验到了什么东西，我们所用的命名中都隐含着自以为傲的启示、社会关注和理性。在这种充满了混乱回声的语义沙漠，我们需要一块莱纳斯之毯[1]，一种威严的崇拜之物，可以拖着到处走，感觉就像是捍卫了神圣价值观。"
——伊凡·伊里奇

未来属于"数据恋"（datasexuals）。2012年4月，倡导知性辩论的网站"大思考"（BigThink）在一篇简短而富有挑衅性的文章里解释说，"时代文化精神赐予我们都市型男[2]（metrosexual），也创造了它在数字领域的代名词：数据恋。""大思考"并没有讽刺的意思；它认为，数据恋是一种真实——而且越来越普遍存在——的典型，也是纽约在文化之战中败给了硅谷的微妙暗示。"数据恋跟你我很像，"文章接着说，"区别在于他们对个人数据的迷恋。他们数字化到了无休止的疯狂境地，痴迷地记录有关自己个人生活的一切，他们认为数据就是性感……至少从数据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生活，修饰得非常完美。"

1 源自花生漫画，小男孩 Linus 总是抱着毛毯，而毛毯也就成了安全感的象征。
2 迷恋梳妆打扮和个人外貌的都市男性。

数据恋之于硅谷，就像潮人之于布鲁克林：两者都无处不在，而且，达到某个程度之后，会惹人生厌。如今，一个非得进行搜索的人会发现，日常活动几乎没有不被跟踪、不被记录的；人人都有智能手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以测量、分析和共享。大把搞发明的创业家甚至开发了能记录、分享我们刷牙习惯方方面面的智能牙刷；它们配备了智能传感器，不光跟踪我们的刷牙行为，还将这些数据分享给牙医，或是设计治疗方案的保健服务供应商——多亏了匹配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面对现实吧，谁不想片刻地回味那些图形图表呢——尤其是显示在我们浴室镜子上的时候？再说，它们比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有关非洲贫困情况的靠不住的图表有趣多了。

一旦你进入了数据恋式思维方式，你就会自我监测个不停，哪怕睡觉也不放过。除了能够监控睡眠周期的全套小工具（当然，睡觉时你得记得把传感器带在头上），新一代的设备还能让我们将睡眠质量和环境联系起来。英特尔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名为“摇篮曲”的系统，整合并处理来自一台红外摄像机、两台被动红外移动探测器，以及光、空气质量、声音和温度传感器输入的数据。所有这些传感器会收集你身边情况的数据，并将之绘测成图（图表，统计、等等），投射到你床头柜的全触摸屏设备上。

为什么你会想要把卧室变成一座监控神庙，在床边摆放一台不断喷涌图表的显示器呢（说到底，临睡前看点刺激的色情片不是最棒的么）？嗯，据研究人员说，“摇篮曲”的设想是，“为确认睡眠干扰因素提供具体建议。”前科学时代的你我，从前是如何知道临睡前要关好窗户、拉上百叶窗呢？完全是个谜。现在，就算环境里没有任何从前打扰过你的东西，你的睡眠也会被焦虑打扰。现在，传感器说你的睡眠充斥着“干扰因素”，你该跟谁去争论呢？要不是下场太过悲惨，解决方案主义倒也算得有趣。

亚历山大·卡迈克尔（Alexander Carmichael）是一名健康行业的创业者，

同时也是一位数据恋生活方式的狂热信徒，她记录一切：睡眠、晨起后的体重、卡路里摄入量、情绪，甚至性、锻炼和经期天数。《华尔街日报》描写过另一位数据恋，纽约平面设计师尼古拉斯·费尔顿（Nicholas Felton），他每年定期公布自己的个人年报（朴实地叫做《费尔顿年报》）。2007年，有关费尔顿，你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如下：他收到了13张明信片，输掉了6局台球，读了4736页书；年报告诉我们，这个幸运的家伙还“跟踪了自己在纽约走过的每一条街道，并将自己所喝的632瓶啤酒按出产国分了类。”2011年，他到健身房打卡45次，只进了9次酒品专卖店。费尔顿的后代对他一定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他当年度的另一些统计资料同样具有说服力：2011年，Facebook聘用了费尔顿（我们可以稳妥地认为，其他的候选人不会有比他更长的简历了）。谁会不喜欢上这种“发自内心的泰勒主义”[3]呢？

在《金融时报》上，我们读到了另一位自我跟踪狂的事迹。此公名叫乔·贝茨-拉克鲁瓦（Joe Betts-LaCroix），他连续3年一丝不苟、无微不至地用图表记录了自己、妻子及两个孩子的体重。乔还一直跟踪妻子的经期，长达10年，只可惜妻子完全不领情。“我正在生孩子，他不来握着我的手，支持我拥抱我，反倒坐在墙角，把我每次宫缩的时间录入电子表格。”她对《金融时报》说（但愿乔使用的是开源软件）。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自我测量壮举来自《大西洋月刊》最近介绍的计算机学家拉里·斯马（Larry Smarr）。斯马是另一流派的自我跟踪人士：他跟踪他们跟踪的一切——但还不止如此。例如，他收集并分析自己的粪便。《大西洋月刊》说，“他深入挖掘自己粪便的生化成分，对其微生物含量绘制详尽的图

3 这里的“泰勒”，指的是20世纪初的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勒，其最著名的事迹是用秒表统计工人的每一项活动，删除劳动中的冗余动作。

表。斯马甚至会从厨房冰箱里拿出仔细封装的样品，给不知情的访客们看。”看起来，数据恋完全不畏惧弄脏自己的手。

但是，别受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愚弄，以为数字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粪便转折。事实上，斯马对粪便内在真相的追求，或许是受了最新技术的教唆，但自我完善项目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技术。来见过维多利亚时代的健康食品狂人霍勒斯·弗莱彻（Horace Fletcher）吧。这人有一个外号，叫“大咀嚼机”，他鼓励追随者们狠嚼食物32次。弗莱彻没有斯马的整套设备，但他也一样收集了自己的粪便，称重，并放到显微镜下分析。此人深信，如果人类遵循正确的咀嚼养生法，排泄物会非常干燥，只有潮湿粘土或热饼干的味道（反正亨利·詹姆斯是信了，他是弗莱彻的狂热信奉者和推动者）。1912年，弗莱彻写了一本书，叫《弗莱彻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我是怎样在60岁变年轻的》（*Fletcherism, What It Is: Or, How I Became Young at Sixty*）。书里附有图表，吹嘘作者大便的光荣事迹。弗莱彻是一位卓越的数据恋（但请别介意，60岁变年轻的弗莱彻68岁时死掉了）。他曾追问，“忠实地为我们神圣效率的祭坛献身，还有什么比这更加神圣的呢？”对像斯马一类的当代数据恋来说，这句口号再恰当不过了。

不算粪便的话，弗莱彻之前已经有过许多类似的实验者了。有人或许会提到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执着地追求“道德完美”，用日记跟踪自己在节俭、克制等13种美德之路上的前进步伐。1880年，统计学先驱、优生学之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展示了所谓的“口袋账簿”。这是一项很聪明的发明，方便他不引人注意地记录人群中不同类型的人。

按传记作者迈克尔·布尔默（Michael Bulmer）的说法，高尔顿也“注意到，用一根细针刺穿纸张，扎在不同的隔间里，就能方便地保存账簿了。”高尔顿用这个巧妙的办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布尔默说，高尔顿用它“构建了

英伦三岛的‘美女地图’，把路上或别处遇到的姑娘们分为漂亮、中等和吓人三类。”伦敦的美女排名最高，阿伯丁最低。同样，他还清点过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议上有多少人在摆弄小玩意儿，以此作为衡量受众无聊程度的迹象。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对测量的痴迷把高尔顿带到了什么地方：优生学。现在，要是他有一台iPhone，更是一切尽在掌握了！尽管历史上不乏类似的例子，但大部分此类尝试，要么是准学术的、小规模的，要么就是由像弗莱彻或者高尔顿这类怪人进行的。今天，人们在更广泛的全球规模上展开了此类活动。如今选择参与此类项目的许多“极客”，都是不折不扣的怪人。但他们仍然有着足够大的接受度，吸引到风险投资家和其他保守企业投资人的关注。资金接连不断地涌入自我跟踪类初创企业。

“自我”的观察

很难想象前一代的自我跟踪人士能形成某种社会运动：有劝导者，有定期会议，有一整套共同的目标和愿景。存在这样的运动，意味着这种跟踪活动里有一些很酷、甚至值得称道的东西，各种跟踪的美学。从社会运动的角度说，跟踪美学推崇的是一种平民的手段，而非共同的目的。

过去5年，在两位联合创始人——就是那位写《科技想要什么》的凯文·凯利，以及前《连线》杂志技术记者的加里·沃尔夫（Gary Wolf）——的带领下，真的出现了这样一场运动，它最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2010年，沃尔夫为这一新兴运动写下了一份类似宣言的东西，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对宣言来说，这结果挺不错），不光在美国，更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量化自我”运动。

沃尔夫在文章中确定了过去几年自我跟踪测量活动崛起的4个因素。首

先，电子传感器体积变得更小，功能却越发强劲。其次，电子传感器植入智能手机之后，就无处不在了。第三，社会化媒体——从Facebook到Twitter——让分享变成了常态。第四，云计算的概念让人可以将数据上传到远程服务器，并与其他用户的数据合并，有望产生更准确的结果。（当然，沃尔夫不是这么说的；他本着《连线》杂志一贯的神秘主义传统，切入了精神的层面。他写道，“名为‘云’的超级智能在全球崛起。”）分享和云计算这两个方面特别重要：透露一个人的自我测量，可以提供额外的动力（比如，许多拼命减肥的极客现在购买了能自动将体重数据发到Twitter上的电子秤——这个例子又一次说明，仅仅10年前，解决方案主义式的干预还根本不可行），同时还鼓励了一种跟“体重监察员”（Weight Watchers）、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等良好项目相同的社群意识。

不过，沃尔夫所列举的4个因素尽管有用（只是有点太过“新纪元主义”），但只解释了造就大规模自我跟踪的技术底层结构。可就因为这样，自我跟踪就变得可取了吗？或者说，我们早就想要自我跟踪，只不过以前没有这些神奇的小工具和“云”？沃尔夫以真正的极客风范强调说，自我跟踪——以及更广泛的量化——的独特方式，能够让我们不受主观性、情绪化的左右，按理说是件好事。“我们容忍量化的病态（干巴巴的抽象、机械式知识），因为结果太强大了。”他指出。“把事情编了号，就能进行测试、比较和实验。数字减少了问题带来的情绪共振，转向了温顺的智力层面。”

自我跟踪的拥护者们并没有自然而然想到：有些对照比较、有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不妨保留原样，不去研究。毕竟，他们认为自己是启蒙时代的捍卫者，正跟迷信与无知的黑暗势力战斗。《大西洋月刊》问斯马，如果他未来要得某种疾病，他会不会宁可不知道的好呢？大便迷斯马皱眉说，他不明白，怎么会有人不想知道呢？一如《大西洋月刊》所说，“他从没考虑过，人有

时候会不想知道某些事情（哪怕是坏消息）。他的一辈子就是用来发现和寻觅的。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科学主义是人类创新的最大推动力。

或许，量化自我活动这么多，是受囤积冲动的驱使。在所有能够收集的东西里，数据有着最为适合的属性——尤其是存储在云端而非私人卧室里电脑硬盘上的数据。它不需要太多空间，便于移动，如果你出牌出得巧妙，甚至还能靠它赚些钱。体积小，可移动，利润丰厚：真是我们超级资本主义时代最完美的囤积目标。它是对我们复杂时代所有谜题和焦虑的完美回应：人们相信，每一个想法之间都彼此相互关联，跟政府有关系，跟企业有关系，而后面两者把真相藏了起来，不让我们其余人等看见。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原因被藏起来了，只能通过艰苦、勤勉的分析来揭穿，所以，定量分析越多越好。只有所有一切都得到了记录和量化，人才能发现共济会、梵蒂冈、常青藤，以及人类自己拼命想要隐藏的东西。一位量化自我运动的正牌成员对《华尔街日报》说，“我想创建连我自己都不知其存在的连接。我是天生的注释狂。”这可真是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阅读小组的绝佳口号呀！[4]

自我跟踪的另一些拥护者强调它改善我们决策的潜力。英国科学家，后成为企业家的斯蒂芬·沃尔夫勒姆[5]（Stephen Wolfram）提倡所谓的“个人分析”（这跟自我跟踪是同义词）。按《纽约时报》的说法，沃尔夫勒姆扫描了23万页纸张资料；他的医疗测试数据，完整的基因组，GPS定位轨迹，室内运动传感器数据，全都随时可供分析。沃尔夫勒姆认为，未来会出现一种“个人分析”应用程序，用来跟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创意的各种因素（他还

4 托马斯·品钦是美国作家，以写晦暗复杂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著称。小说的内容常涉及大量的科学技术，又隐藏着一些历史事件，许多情节之间都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互联系。所以这里作者这么说。

5 他的一大成就是建立了“计算型知识引擎”Wolfram Alpha，一度有人吹捧其为 Google 的竞争对手。

说过一句名言，“以后，人要看自己的健康状况，会类似如今看金融投资组合报表。”）

量化自我运动的成员们或许并不总是说得这么明确，但藏在自我跟踪背后的希望始终是：数字有可能最终发掘出有关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真正想要什么、以及我们真正应该去往何方的深层内在真相。这一运动的根本假设在于：只要我们对技术运用得当，数字便能够解释核心而稳定的自我。因此，沃尔夫写道：“我们的很多问题来自缺乏工具，无从了解我们是谁……我们缺少盘点身体与精神库存的设备。我们需要机器给予的帮助。”但有一点不能忘记：这些设备和机器也可能把我们推向我们原本会避免的方向。

沃尔夫主张的是一套自我双击模式：你点击鼠标或者按下iPad屏幕，立刻就会弹出一张有关真实自我的完整数字可视化图形。对沃尔夫来说，这种固定的、连贯的、超然的自我，有点像他的犯罪同伙凯文·凯利眼中技术的样子：我们的真正自我有声音，它正努力想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我们只需要找到合适的设备去倾听就好。故此，只有记录、可视化我们的所有需要、恐惧和愿望，我们才能倾听到每一声信号，追求理性的行动。而且，不先盘点“自我库存”就付诸行动，恐怕是不负责任的。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对功利主义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他也是尼采的崇拜者。他在最近的一本重要作品中提出，这种看似理性的需求，也即对我们的所有思想、梦想和愿望全面地盘点，来自“彻底明确”这一不健康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又根植于“对个人及政治理性的误解。”“我必须全面地、一次性地考虑我所有的项目、目的和需求”——这样的想法必须抵制；威廉姆斯写道，“我必须从‘我是什么’这一点出发来权衡。”只可惜，对沃尔夫来说，除非使用电子表格，人不可能知道“我是什么”。

我们只能对照当代对特立独行的自恋追求，来理解自我跟踪新近产生的

吸引力。自我跟踪，尤其是在公共场合这么做，往往是炫耀的副产物，意图在一个突然之间人人都有话要说、并且会说些重要事情的世界里大出风头，确保自己独一无二。除了自我跟踪带来的实用利益（不管是真实具有的，还是幻想出来的），它还让信徒们确认（并通过分享手段加以强化）自己个性中最为独特的方面。这里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够独特，是因为你没有测量足够的指标；我们或许全有着同样的想法、看着同样的病毒式视频，但至少，我们的粪便肯定不一样。

如果言语不能，至少数字能向我们（更重要的，向整个世界）保证，我们是自己（或者自己的资料里）自称的那个人。沃尔夫也曾对这个动机做过暗示，他写道："个人数据非常适合分享的社会生活。你不见得随时有话要说，但你随时会有数字可供报告。"所以，自我跟踪就像博客，当然，只适用于害羞人士。2009年，技术作家比尔·瓦希克（Bill Wasik）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社评，认为"互联网"——是的，"互联网"——很像是高度兴奋的纽约：充满创造性的能量；人人都看得见别人在做什么，努力想要跟上。对瓦希克而言，"互联网"就是一座大城市。他或许没错；但在另一个重要的层面上，我们全新的巨型数字新城市，看起来比纽约还要热情：就算你找不到什么话可说，仍然能够分享自己的数据，沉浸在自己很特别的幻觉里。

隐私的"廉航化"

人很容易就能想到自我跟踪带来的更多切实利益，尤其是放在数字背景下。事实上，干脆省掉"自我跟踪"里的"自我"，想想"跟踪"的好处吧。这里有一点务必记住，自我认知绝非最终目标。任何人，哪怕霍勒斯·弗莱彻或拉里·斯马，也不是为了审美的原因研究大便的；人们通常是为了生成

更优质的数据，方便做出健康决策才这么做的。故此，跟踪和自我跟踪许诺的前景是：生成的数据能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例如，Google的论点曾说服了许多人：监控我们的电子邮件和搜索，该公司能够向我们提供更好的，更个性化的，广告。又或者，研究我们在浏览器搜索框里输入的内容，它能帮我们完成查询。所以，《Slate》杂志的法哈德·曼约奥写道，“我不光被即时页面这个功能打动。我也很喜欢它背后的哲学——也就是我的软件分析我在做什么，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为什么其他应用程序不这么做呢？”

在某种程度上，自我追踪的崛起或许会逆转有关隐私的辩论：与其担心企业跟踪我们在网上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不想想完全相反的情况，慨叹为什么我们在网上从事的大部分活动还没得到记录——因此也就没能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或者至少上市交易，为我们赚些钱回来呢？毕竟，一旦用户可以自我跟踪，他们就能够决定用数据来干什么——这样一来，对隐私的担心，就变成了对寻找合适市场、索取合适价格的关注。故此，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已经变成讨论，探索如何将个人数据制成像小麦、零件那样的全新“资产类型”，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一如贝恩咨询公司（Bain & Company）主持达沃斯讨论的高管所说，“我们试图把焦点从纯粹的隐私转向所谓的产权上面。”

《观察家》报上最近有篇专栏文章，说明市场逻辑是如何轻松侵犯隐私讨论的。“窥探我们的寄生公司可以结成共生体，免费交出信息，换取某些切实的东西，比如说花园里摆放的可爱矮人像。又或者，你明白，广告其实真的有用，因为它们向我们提供了想买的东西，以及更廉价的做事方式。”英国演员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写道（虽说他是个喜剧演员，但他在这儿可不是开玩笑）。但是，请注意，这篇专栏文章很快就从纯粹的市场角度重塑了权

利（比如隐私等）的问题——而且，我要提醒你，这可是左倾的《观察家》报呢。“这就是市场和战争之间的区别。在战争中，如果对方想要得到你手里的某样东西，你绝对会想要死死守住它。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市场上，如果你能达成合适的交易，这会是个改善所有人状况的机会。”按照这个逻辑，就连酷刑也没问题——只要囚犯“达成了合适的交易”，并得到了妥当的赔偿。

但是，如果说，量化自我运动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目标是，详尽说明锁定我们的个人数据可能会造成的全部损失；那么，它还有另一个冠冕堂皇的目标，即向我们说明，原则上，隐私也是这样——只要我们愿意出钱。不少自我跟踪社区的运作就是根据这一想法开展的。Daytum.com允许旗下8万多名用户跟踪各种各样的个人数据，从跑了多少英里到喝了多少瓶啤酒。但所有人的数据是自动共享的，除非你愿意每月花4美元购买高级账务，将数据设为私有。

Daytum网站的创始人尼克·费尔顿——就是公布《费尔顿年报》的那位——对《福布斯》说，“如果你想要隐私，就必须付钱。看看人们选择公开哪些数据很有意思。用了多少次浴室，进行了多少次性行为，使用了多少次毒品。”量化自我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凯文·凯利相信，这就是技术一直想要达成的目标。“隐私基本上是一种错觉，但只要你愿意花钱，要多少隐私就能有多少，”他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说。借用政治哲学家格伦·内维（Glen Newey）的一个说法，这种把隐私定义为货币的能力，是“社会生活日益廉航化”的又一个表现。所谓的廉航化，就是指某些廉价航空公司连用户上厕所也要额外收费的做法——将从前免费的服务，分解成若干计费单位。

在这种新制度下，光是出钱私下处理自己的数据还不够，我们还要出钱积极地捍卫自己的在线名声。究竟要捍卫什么呢？比方说，我们过去做的一些傻事（例如在人人都手里拿着智能手机的大学舞会上抽大麻），但也可能是

一些完全超出我们控制能力的事情：想想看，如果社交网络网站泄漏了我们的私人信息，或是黑客攻击了色情网站，匿名曝光了我们的会员身份，又或者，数据挖掘公司从不同数据源做出了精确的推测。这就是Reputation.com等初创公司的切入点，他们承诺帮助清理你的在线声誉（有时靠巧妙操纵搜索结果，有时靠威胁网站所有者打官司，要求其取下破坏性信息），当然了，他们的出色工作，收费是很不便宜的。

买得起的人或许获得了绝佳的服务。2011年4月，《纽约时报》报道，2008年经济崩溃期间，投资银行家开始利用这类在线专家服务，保护自己的声誉。一位纽约形象管理专家说，“这些银行家每月支付多达一万美元的费用，试图将自己的名字在网上隐藏起来，哪怕它们已经见诸媒体报道。”这对银行家是好事一件，对我们其余人却不是。但那些没有做错什么事，可惜出不起钱的人又会怎么样呢？在数据丰富的经济里，如果只有富人才出得起钱捍卫自己的在线声誉，这会造就新形式的数据鸿沟吗？有一点事实很难忽视：大部分声誉顾问都从“让所有人都为自己的声誉感到焦虑”直接获利，因为这是他们业务稳定发展的唯一途径。

硅谷的空想家们喜欢把公民都视为初创公司；这样的话，不断强调一个人的声誉，就成了做生意的正常成本。目的就是让所有人都脱离信息福利，变成信息劳动力，我们需要积极地照料自己的在线形象，必要时向Reputation.com这类创业公司付钱换取额外的保护。这或许会让我们分心，忽视对其他重要个人项目的追求——但这不重要。我们的数字大师们从未体验过过渡到某种信息福利状态所带来的好处：允许公民尝试、发展，又不损害其声誉。

LinkedIn的创始人、自封为数字哲学家的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在名为《至关重要的关系》（*The Start-Up of You: Adapt to the Future, Invest in*

Yourself, and Transform Your Career）的作品里对这种意识形态做了最好的包装。霍夫曼说，“不管你是什么人，是做什么工作的，都可以像创业公司那样思考。”因此，你需要像永远处在测试版（“测试版”是个技术性的说法，也就是说，还没完全开发好的软件）那样去生活；“承认自己有漏洞，自己可以实现新的发展，你需要适应、需要进化……永久测试版，意味着对持续的个人发展给予终生承诺。要么忙着活，要么忙着死。”

他丝毫没有提到，我们的“漏洞”可能源于法律的疏忽、不周全，像LinkedIn这类的公司做了太多的疏通活动，更别提匿名者组织的各种恶作剧。他说，一切的事情完全是你自己行动的结果，和环境毫无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解决我们所有的错误；自我跟踪只是迈向找出各种错误的第一步。当然，永久焦虑从来都是硅谷最心爱的一笔资产；但这里还发生了一些更险恶的事情：面对问题，基于改革的宏观层面的问题解决方案被抛弃了，代之以对微观层面的个人行动不厌其烦的描述。

我们的个人数据（不管它是自我跟踪得来的，还是其他数字中介记录下来的）可以变卖盈利的想法，也给了若干新创公司灵感。这类公司叫“数字储物柜”，它们希望平息公众对数据遗失、意外曝光的焦虑，促成消费者彻底投入声誉市场。于是，名为Personal.com的初创公司提出了这样的创业概念：得到批准的消费者可以决定哪些自身数据能被精选营销商获取，并能为此得到更贴切的广告和更优惠的折扣。这家公司现已筹得760万美元的风险资金。

《圣何塞水星报》2011年的一篇采访中，Personal的首席执行官肖恩·格林（Shane Green）假设有一位消费者，选择将某类数据，比如最喜爱的品牌，提供给广告商。作为回报，消费者的购买价格可打折5%到15%，而Personal也从中抽取一定的比例。人人都是赢家。另一家数字储物柜创业公司Singly的共同创始人贾森·卡夫那（Jason Cavnar）还许诺了许多非关财务的好处。

“试想一下，”他说，“把你在Facebook和Foursquare发布的所有签到信息，跟你刷过信用卡的餐厅结合起来，再加上Yelp发来的用户评论，看看你周围还有哪些评价高的餐厅，你还没去试过。”如果消费者可以自己收集数据，或者授权公司代自己收集，效果再好不过了。

大瓦解

硅谷这一回可没开空头支票：“数字储物柜”最有可能保证我们获得更优惠的折扣。“赋予权利”这种说法并不虚伪，至少并不完全虚伪。但光从它们会带给个人消费者怎样的权利的角度来思考这些变化，会漏掉一些更为宽泛的、出乎意料的后果，也即为自我揭露创造更多的动力。一旦我们带上那顶技术结构派的帽子，跳出个人消费者的视角，研究自我跟踪和数据储物柜会怎样改变此类消费者接触其业务的社会政治环境，我们就能看到一幅非常不同的画面。

披露决定很棘手，因为我决定跟踪、释放一些有关自己的信息，对其他许多兴许从没听说过数据储物柜或自我跟踪的人造成暗示。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选择跟踪、公布自己的健康情况，而你选择不这么做，那么，迟早，你不作为的决定，会被人看作默认自己有所隐瞒。因此，如果一部分社会成员选择自我跟踪和自我披露（想必选择自我披露的人确实不害怕披露），不想自我披露的人（包括那些宁肯自己保留数据的人）就处境艰难了，甚至不可能再选择不自我披露。

不妨这样想：我们所有人都有权不使用手机，不开设Facebook个人主页。但这种权利在一个几乎人人都用手机、都有Facebook账号的社会里几乎毫无意义，因为大家会认为，没有手机、没有Facebook账号的人是不合群的怪

人，他们保持低调是有原因的——而且，那些原因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对吧？执法机构已经把没有手机的人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或毒品贩子了——这就把你远离某种技术的“权利”变成了一个笑话。围绕拒绝开设Facebook账号的数字顽固分子，也出现了类似的阐释。

如果说，仅仅几年前，这些人还被看成是捣毁机器的“卢德分子”，或者，是追求深层灵性、不愿背负社会网络麻烦事的人，那么到了今天，这些人却被描绘成了没有社会生活值得一谈、或是把一些黑暗过往藏起来不给人看的怪人。我们的公共文化，深深浸透着对拒用Facebook人士的怀疑。因此，2012年6月奥罗拉枪击事件发生后，德国《每日镜报》指出，不管是奥罗拉的枪手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还是挪威大屠杀的凶手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都没有Facebook账户，暗示没有Facebook活动本身就可能表明此人有问题。《Slate》的专栏作家法哈德·曼约奥也流露出同样的情绪，他说，“如果你跟某人出去，而他们没有Facebook账户，那可要提高警惕啊。”

在通过自我跟踪实现的信息分享方面，我们也将看到类似的趋势。所有这些共享又会令得隐私瓦解。再多的提高隐私技术，再严格的法律（传统隐私权运动的标志），也发挥不了太大的帮助作用，因为现在有了分享信息的好理由，保护数据变得没什么道理了。如果用户对“保持隐私是重大责任”这一点产生了怀疑，绝对安全的浏览器和智能手机就没有意义了。一旦保持数据隐私的动机消失，所有应对隐私危机的传统反应就都不恰当了。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法学院的法律学者斯科特·佩皮特（Scott Peppet）认为，自我跟踪的激增，会迫使我们创建自己的“个人招股说明书”，也就是各种充斥着自我跟踪得来的校验信息的数字储物柜。之后，我们的数字招股说明书会调解我们与其他市民、企业、公共机构的互动，后者接触到所有的

这些信息，在选择区别策略的时候，继续从排他性氛围过渡到保镖权。佩皮特援引了大量现实例子，说明消费者会感觉个人招股说明书这个概念是多么有力量："想给我的健康保险保费定价？我可以把我FitBit数据给你看。想给我的汽车租赁或保险定价？我给你看看我车上的'黑盒子'数据，证明我是个安全可靠的驾驶员。想要我证明自己是一个勤奋、负责的员工？我给你看看我的实时血液酒精含量，看看我是多么精心地控制着我的糖尿病，我还可以给你看我这辈子的生产力记录。"

换句话说，有着良好的健康、绝佳驾驶习惯、劳动标兵般生产力的人兴奋地跟踪、分享自己的数据，理由很充分。可穷人和病人又怎么办呢？没时间没体力（白天干三份兼职才勉强维生的人很可能没有更多的体力）进行自跟踪的人又怎么办呢？就算穷人和病人进行自我监测又怎么样？他们可能会发现什么？他们吃高热量的食物和饱和脂肪，从来没去当地健身房"签到"，因为会员费太高，或者因为他们干完正经的工作就完全没时间了？这里的危险一眼就看得出来：如果你身体健康，生活优越，自我监测会让事情变得更好。可要是你不是这样，个人招股说明书会叫你的生活加倍困难，因为它会带来更高的保费，更低的折扣，有限的就业前景。

最近出现了一些在不久的将来让个人招股说明书变得更加全面详尽的发展趋势；佩皮特的担忧似乎完全有道理。智能手机已经提供了一整套自我诊断应用程序，就算是间接采用，也能建立起可以善加使用的健康数据宝库（不光是智能手机：新近的一项研究发现，监控健康的消费级设备将在2016年占到所有无线设备的80%以上）。一如克里斯托弗·斯坦纳（Christopher Steiner）在《自动化：算法统治世界》（*Automate This*）中指出，荷兰技术公司飞利浦出品的一款iPhone应用程序已经知道如何测量自己镜头里出现的任何人。这款应用程序能够通过检查用户面部微小的色彩变化，以及靠近检测用

户的胸部运动，以高度的准确性，判断出用户的心跳和呼吸率。斯坦纳指出，“飞利浦和其他高科技公司即将推出的应用程序能够实时测量血压、体温、血氧含量，以及脑震荡迹象。”下一步，就是让保险公司看到这些数据，奖励健康的自我跟踪爱好者，惩罚其他所有人。

汽车保险公司也在探索从自我跟踪热潮中获利的途径。因此，世界第六大保险公司英杰华（Aviva）已经在测试一款名为“RateMyDrive”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它能监控驾驶员在加速、制动和转弯时的表现。驾驶200英里后，司机得到一个个人得分，反过来，这个得分可以判断他们的保险费用；“安全”的驾驶员能够得到高达20%的保费折扣。没有必要为汽车安装“黑盒子”啦，iPhone统统能包办。还有一种新颖的解决办法是把你的汽车变成一座移动的监控城堡，为之配备摄像机和其他传感器，使用所有的数据获得更佳的燃油效率和更低的事故发生率。圣地亚哥的一家初创公司“智能驾驶系统”（SmartDrive Systems Inc.）就正在这么做。急刹车或急转弯能触发传感器，系统随之开始摄像，记录其他数据。该公司利用这种技术评估了440多万起不安全驾驶事故，声称它可以提高燃油效率20%，减少80%的碰撞事故。

最有趣的是，“智能驾驶”公司声称，记录让许多司机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免于承担并非自己引发的事故之责任。在这样一个可以记录一切的世界，哪怕光为了不让人抢先投诉或诬告，你也应该为了安全记录一切。我们的数字梦想家不断赞美积极跟踪、主动分享的美德：不断发布的数据成了捍卫声誉的一种强力形式。一如既往，杰夫·贾维斯声称，“影响你声誉的办法，往往是多分享，而不是少分享。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做你自己。如果这让你感到不安，你要反省一下自己的退缩。更好的做法是，把它写成博客。”但要是你的保险公司开始阅读你事事都谈的博客，你还有退路吗？这，贾维斯就没说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种跟踪-共享心态，拒绝参与这场盛大聚会的人就会承担巨大的社会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上一场关于自我跟踪道德的辩论；跟踪并发布我们日常生活某一方面的决定，并不纯粹地来自改善个人福祉的迫切要求，就像家里要消耗多少水、多少电的决定，并不纯粹地来自我们的经济负担能力，或是我们的物质需求。一旦人们把隐私看成能够推动人类繁荣的促进器（硅谷的许多人当然是为了这个想法而奋斗的），我的自我跟踪决定（不管它能带给我多大的个人利益），就应该服从于更为复杂的道德评判，而不仅仅限于量化自我传道士们现在承认的那个程度。斯科特·佩皮特迎上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故此，如果说，你量化自己的选择（不管是出于个人喜好还是追求利益）必然会让我量化自己的‘选择’承受瓦解的压力，那么，你的选择就具有了深远的影响。要是我就是一个不希望知道自己所有实时数据的人，可我们的社会却演进到了必须进行此种测量的境地，那将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我从审美或是心理结构上就极度讨厌量化；如果它跟我一贯以来的自我认同、自我认知方式存在冲突，那又将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

佩皮特还指出，有必要问一问，“什么样的人——艺术家？学者？作家？——最受这个以量度为基础的世界放逐和排斥呢？”因为，量度的指标似乎有许多。比方说，很难找到一个有完美信用评分的作家；再多来10个诸如此类的指标（绝大多数人都愿意接受的），就没有哪个神志清醒的人还愿意冒险涉足写作行当了。直至现在，我们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完善（虽然原因有很多，但缺乏足够的数据显然属于原因之一），带来了大量很难说得上合理的“自担风险”，而“自担风险”反过来助推了文化和社会的创新。如果个人招股说明书的发明，让人不愿意自担风险了，那会变成真正的损失。不过，隐私瓦解的潜在可能性，并不是我们担心自我跟踪的唯一原因。事实上，对这

一现象次要效应表示担忧，已经是对量化自我爱好者们的大让步了。了解量化计划的结构性限制（它们追求事事披露，但有哪些东西是它们并未披露的呢？不妨放大观察一下），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另一条有力的批判途径。

尼采和孔多塞

弗里德里希·尼采第一个对当时流行的功利主义哲学中的量化热潮表示反对。倡导功利主义哲学观的，是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尼采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此公做了有趣的夸张模仿）等人。尼采在《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一书中哀叹，“认为世界在人类思想和人类评价中存在等同的东西、可度量的指标，借助我们小小的坚定理性，就能彻底、永远地理解‘真理的世界’。”尼采不买账。“什么？难道我们真的希望把‘存在’贬低到像这样的地步：只消数学家在室内用一台计算器就能‘运算’出来？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应该以为自己能理解存在的丰富意味——它需要良好的品味，先生们，那是一种敬畏感，对自己视野尚未看到的一切的敬畏感。”

尼采用他特有的方式，对信息简约主义（information reductionism）做了尖锐的批评。这种天真的信念在硅谷特别流行，人们总以为，信息越多越好。尼采认为，对特定的现象，人能够收集越来越多的指标，可这并不意味着进步，因为，有许多其他更好的探讨该现象的方式，是不容易进行定量测量的。“唯一一种将世界合理化的阐释，应当是一种将你合理化了的阐释，因为人能够不断按你的理解，科学地（其实你是想说，机械性地？）工作、研究。这样一种阐释，包含了计算、度测、称量、观察、触摸，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真是一种残忍又天真的想法，姑且不说它是精神病态的愚蠢行为。”

尼采最为敏锐的一点，是他理解到，量化信息别无所长，只是一种最触手可及、便于采摘的果实，但它往往阻碍了更有远见、更持久的认识努力。“难道这样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吗——恰恰相反，‘存在’最肤浅、最外部的方面，也就是最明显的，它的皮肤、它曝光在外的部分，最容易掌握。甚至，还有可能，这也是它唯一能让人掌握的部分？”尼采问道。

仿佛是为了回应莱布尼茨的说法（莱布尼茨曾写过，音乐是一种“换了件外衣的数学题，演奏者对其间存在计算的因素毫无意识。”），尼采指出，在艺术等领域，定量测量根本就不合适。“倘若人按照一首曲子有多少地方可以计数、计算、用公式表达，这种‘科学’估计会是何等的荒谬啊！人能够理解、认识、把握音乐的什么东西呢？哪儿也懂不了！因为这里面没有半点‘音乐！’”他写道。

尼采对Google的埃里克·施密特会怎么看呢？后者似乎真的沉浸在这个念头里：总有一天，Google能够展现算法的美学。“我们的使命是，找到最佳的答案，”施密特在接受采访提问时说。采访人员当时问他，为什么Google提供答案的时候越来越多，而不是仅仅显示搜索结果。“所以，如果你说，'我想听女神卡卡（Lady Gaga）最棒的音乐，又如果，我们用算法能够运算出答案，我希望立刻把它呈现给你，当然，是在遵守规定、版权等等的前提下。”当然，施密特的话里有不少的“如果”，但听起来，施密特似乎并不认为这份工作完全不可能；只要有合适的算法和足够的计算能力就够了。“女神卡卡的最棒音乐”是一件客观的东西，能用Google找出来的东西。

尼采对计算和测量的结论苦涩而有力：“本质上机械的世界，也就是本质上无意义的世界。”现在，请将这个结论和凯文·凯利的措辞比较一下。凯文·凯利试图将意义的问题排除出去，认为“量化自我”群体根本不必担心它：“（批评我们的人说），只有无形的东西，比如有意义的幸福才重要。可意义

很难测量，这就让它难于优化。到目前为止，凡是我们能够量化的东西，长期而言都变得更好了。”

当然，最后一部分是典型的硅谷式废话：怎么不说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碳排放，还有肥胖率呢？凯利的积极乐观（positivism），连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也要大吃一惊[6]。但凯文的宣告，也跟长久以来的科学传统有关系。历史学家西奥多·波特（Theodore Porter）在《信任数字》（*Trust in Numbers*）里敏锐地记录下了这一点：科学界一贯认为测量是客观性的，纯粹推动性的。可惜，和他们所说的其他事情一样，我们的数字推动力常常对这段历史视而不见。凯利的逻辑来自19世纪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提出的一句著名论断：“无法测量，就无法改进。”开尔文之前一百年，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也吹捧过测量的好处：“如果这些证据无法得到称量和测算，如果这些效应不能进行精确的测量，那么，我们就无法确切地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了多少的好，多少的恶。”在这个意义上说，量化自我延续了一个强大的智性传统，同时也继承了困扰尼采及其追随者的无数弱点：开尔文和孔多塞一样，凯利很少讨论“无形的”东西，包括伦理上的和美学上的。这一点，是担忧量化自我这一新运动的大好理由。

然而，就算说回有形的东西，情况也远远比我们的自我跟踪派哲学家们说得要复杂。加里·沃尔夫曾写道，他对量化自我的主要灵感，来自“宏观镜”（macroscope）概念。这个概念来自企业家吉尔曼·托儿（Gilman Tolle），按照他的定义，“宏观镜”是“一套旨在提高我们收集自然数据、分析其意义能力的技术系统。”“自然”里存在数据，可以简单地进行收集和发现，而无需考虑我们收集数据的工具，这些工具的知识体系，人类阐释的多层次

6 “positivism”既可以表示积极乐观，也是“实证主义”的意思。

性——这个天真的想法，是信息简化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对于有待进行收集的数据，首先要有人来决定（或听从其他人的判断）：以何种方式，使用何种设备，出于什么目的去测量什么东西。我们选择对现实进行怎样的切片、强调哪部分元素、遮挡哪部分元素，将极大地影响我们产生的测量数据种类。

量化自我运动的一大危害是，因为坚信自然里存在数据，信徒们不会怀疑（甚或反思）测量方案本身是否合适。而测量方案，是数据收集工作的基础。在沃尔夫看来，世界是黑白双色的：好人（也就孔多塞和开尔文的继承者）衡量数据，坏人拖后腿，拒绝这么做。你想加入哪个阵营？因为这豪言壮语如此简单，它和凯文·凯利的技术思考很类似：你要么做一个像他那样的技术爱好者，要么做一个“邮包炸弹客”[7]（Unabomber，凯利在书里用了一整章内容和这坏家伙进行假想的对话）。除此之外，对技术再也没有别的思考方式。

出于这个原因，一如凯利热情地捍卫技术，沃尔夫也同样热情地捍卫量化。两人都是在整体层面上做各自的事情，故此都忽视了实践和方法的多元化问题。但针对特定的现象，我们要考虑方方面面的情况，从多种测算和量化途径中做出高度必然性的、痛苦的选择，甚至包括拒绝对其进行量化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对量化道德观详加考量。正如社会学家温迪·伊斯佩兰德（Wendy Nelson Espeland）和米契尔·史蒂文斯（Mitchell L. Stevens）的评论所说，“量化道德观应当研究测量如何塑造了世界，同时坚决拒绝不管是科学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自以为是，也即认为测量独有地、特权地贴近了现实。”量化的尝试往往也是简化的尝试——而简化总是带有政治上的意味，尤其出于可测、可管理的原因而抛弃了其他问题阐释途径的时候。

---

7 指泰德·卡辛斯基。在 1978 到 1995 当中，他为了对抗现代科技而举行了全国性的投放炸弹行动，以邮包或放置炸弹的形式造成三死 23 伤。

让我们把这种对量化道德的关注，跟沃尔夫在宣言里倡导的高度鲁莽的方法比较一下。他写道，“寻找数据是正常的。崇拜数字是现代经理人的决定性特质。为了对付心怀不满的股东，公司高管会在口袋里装满数字。参加竞选活动的政客，向病人提供咨询的医生，在电台谈话节目里痛骂地方球队的球迷，也都是这样。”是的，所有这些人都在寻求数据，但寻求数据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有一些方法更好——还有些时候，不让数字包围自己，说不定会更好。毕竟，安然、安达信和雷曼兄弟公司都有经理人和股东；小布什时代遭人痛恨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把学校的资金跟学生的考试成绩挂钩）里，对数字的崇拜可谓泛滥；为患者提供咨询的医生，就算看着相同的数据，也总是有着不同的意见。

从营养主义到教育主义

脱离应用背景称赞抽象的量化，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做法。难道我们真的希望人们单纯因为“量化”很酷，或是因为几个启蒙思想家说了该这么做，就进行自我跟踪吗？这就像要求人们，在凯文·凯利的领导下，光为了对抗“炸弹杀手”，就总是在抽象意义上投奔新技术的怀抱，不管技术的具体应用会具有多大的破坏性。相反，我们需要确认量化方案在什么时候不合适。它们在什么时候会妨碍对现实进行方方面面的阐释？它们隐藏了哪些东西？我们观察不到这些东西会有什么样的损失呢？看似不相干的政治项目会以怎样的名目调用它们呢？不提出有关意义的尖锐问题，我们就很难做得到——而这，正是量化自我运动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回避了的方面。

《平衡中的世界》（*World in the Balance: The Historic Quest for an Absolute System of Measurement*）一书作者罗伯特·克里斯（Robert Crease）感叹说，“我们的视

线常常偏离太远，全忘了我们测量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测量，而是一味关注测量本身。”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克里斯劝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对测量不满意的方面，也就是它无法带给我们的东西。“要解决这些不满意，”他指出，“不是靠抛弃现有的测量方式，寻找新的、更好的测量方式，因为后者最终也会变成我们不想要的东西，要加以放弃的东西；也不是靠装作我们追求‘测量’之外的东西。”相反，克里斯说，“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最初，人类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创造了‘测量’。而测量，却干扰了这些目的。”我们该怎样才能意识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技术灵感来自让孔多塞兴奋的同一种量化举措，但尽管它略微改善了考试分数，实际上却有可能对教育造成糟糕的影响？我们必须首先问自己，我们最看重教育的什么方面，而这，基本上是一个有关目的恰当性的问题，跟效率没有关系。

可惜的是，在教育这个领域，人很容易听信那些有关量化带来各种好处的浅薄赞美故事。去看看“给教授打分”（Rate My Professors）网站吧。在这个网站上，学生们可以评价自己的班级，以及执教的老师，按众多的标准为其打分排名。姑且不论将消费主义心态引入教育是否恰当，我只问一点：按照预设类别打分的过程，怎么就能让学生相信这些就是评估自己学习体验的标准？它们不光是客观中立衡量教育的方式；同时还塑造了新的规范，所有未来的教学都会据此进行评估。

“给教授打分”网站提供了4项标准：帮助度、清晰度、容易度和火爆度。最后一项标准基本上是为了搞笑，但其他的标准又怎么样呢？评估我们学习得怎么样，跟“容易度”有什么关系吗？外面的世界很复杂，希望“容易”的人，随时可以用TED讲演满足自己的胃口。但“清晰度”也招来了很多人的批评，主要原因在于，它给人留下了一种错误的印象：所有复杂的概念都能够、也应当塞进PowerPoint演示文稿里。正如作家马修·克劳福德（Matthew

Crawford）指出，“当然，清晰在讲座时是可取的，如果欠缺清晰，那就只剩下教授一个人困惑的自言自语，要不，就是他没法把自己从本门学科的激烈争吵和行话里抽离出来。然而，要求清晰，往往也就是要求一击切题，而这就假设能用一句话概括主题。繁忙的高管要求下属提交清晰的报告。大学生们同样很忙。”以为凡是点子都能用一句话归纳概括的学习型企业，能成功地生产出下一代的贝恩[8]咨询师，但它能带来哪怕是一名有才华的散文家吗？

让我们再看看：“Google学术”（Google Scholar）和Mendeley等学术网站促成的量化应用。后者借助180万名学者构建的全球学术社群，跟踪了2.5亿份研究文献，并进而提供“谁以何种频率，引用了谁就某一主题的观点”等额外信息。整体而言，这看起来像是件好事：了解观点如何流通不是件好事吗？更何况，大学早就开始使用诸如影响因子等其他指标了。人们希望，更好的数据，最终能提高效率。按Mendeley的创始人和CEO的说法，他坚信自己公司的“数据正帮主全世界一部分最优秀的大学更有效地研究，更快地获得能改变生活的新发现。”

抽象来看，这一新的知识层面不乏令人钦佩之处。但放在当今学术界其他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它的效果并非一味积极。首先，这样的数据使得固定的出资机构（比如，英国政府）把学术研究资金跟用具体、便于衡量的产出捆绑起来，故此，如果你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就很难获得资金。其次，出版作品、获得他人引用的能力（故此提高当事者的“影响因子排名”），如今已经极大地决定了人在学术界的发展高度；它对学术研究的质量同样有着复杂的影响。《华尔街日报》最近调查了对影响因子的痴迷怎样改变了学术界的风气。调查发现，一些学术期刊的编辑甚至会因为文章没有引用足够多该

8 指贝恩管理咨询公司。

期刊发表的论文，就拒绝发表内容可靠充实的学术文章。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个更离谱的故事。2012年4月，“学术厨房“（The Scholarly Kitchen）博客上贴出了一篇文章，名字很有煽动性，叫“引文卡特尔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a Citation Cartel），恳请人们注意《医疗科学监测》（*Medical Science Monitor*）杂志上2010年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这篇评论文章引用了490篇文献；其中445篇来自另一本杂志《细胞运输》（*Cell Transportation*）。部分因为这篇文章的关系，《细胞运输》的影响因子在2009年到2010年间提高了21%。要不是两家杂志共同点太多的话，这倒也没什么可疑的：编辑《医疗科学监测》上那篇文章的四名编辑里，有三位都是《细胞运输》的编委。这对所有人都是双赢局面，只可惜了学术质量啊。

一旦我们考虑到这些因素（用技术构造主义者的模式工作，对改变我们所选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实践保持敏锐关注），我们很可能会对伴随Mendeley新跟踪系统而来的“效率”多加思量。很有可能，它为一个小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同时却加剧了这一路上的许多更为宏大的问题。

若是以看似普遍、永恒的科学发现为基础，量化方案就变得更棘手了。指引公共政策的知识体系往往不稳定，不完整；它们的结论（尤其是以量化形式表达的时候）大多包含着成百上千的脚注和限制条件，人们可以对它详加研究，以便找回公式和数字处理过程中损失的复杂元素。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我们忽视这些脚注，也能够度日。就算我们完全不知道测量温度的系统是怎么来的，建立在怎样的简化之上，光知道室外温度，基本上就足够我们判断该穿多少衣服了。在这个例子里，输入-输出关系非常简单（温度太低，我们会感冒；温度太高，会热得人难受），所以才能如此大刀阔斧地删减数据。这不是什么太高深的科学。

但靠自我跟踪赋予灵感的解决方案主义新前沿，可绝非什么简单直白的东

西。就拿相对显得比较简单的节食来说吧。吃高卡路里的食物会变胖，吃低卡路里的食物会变苗条。这个理论非常简单，出于这个原因，计算我们饮食中所含卡路里的各种网站和应用程序也就大行其道了。有一款名叫“膳食速拍”（Meal Snap）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能让你把盘子里的食物照下来，并据此估算它所含的卡路里。另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食物扫描器”（FoodScanner），能让您拍摄食品包装上的条形码，进而识别食品，传送它所包含的卡路里数字及其他营养信息。“餐厅卡路里计数器”包含了来自100多家知名连锁餐厅的1.5万个食物项目，方便我们计算外出就餐时摄入的热量。

听起来这些都像是很棒的应用程序——如果拿在合适的人手里的话。聚焦卡路里（仅仅是因为它们最容易计算）从营养学角度来看是有问题的，甚至造成人饮食紊乱。节食社群里对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肥胖从无一致意见。如果是我们吃得太多，那么计算卡路里大概会是个简便的好办法。但如果肥胖跟人饮食的质量也有关系，那么我们就还要看所吃食物的成分，甚至警惕我们所吃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分含量。举例来说，《纽约时报》最近报道了《美国医学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的一份著名研究，该研究发现，“饮食中的营养成分可以触发致胖体质，它跟卡路里消耗量没有关系。”现在，碳水化合物也可以测量了（通过一种名叫“血糖指数”的东西），但这不应该给我们造成太多干扰。

不管量化自我的应用程序跟踪的是卡路里还是碳水化合物，严格地说，它们测量的都不是营养；它们测量的是卡路里和碳水化合物。这些指标怎样转化为增重还是减重（更不必说人从饮食中所获得的乐趣），是一个远为迂回的过程，比根据温度计显示的外面天气来判断该不该多加一件毛衣要复杂得多。当然，对自我跟踪和节食的痴迷，有可能动员一些爱好者去阅读营养学资料，更深刻地认识哪些营养与健康相关。但指望所有的自我跟踪人士都这

么做，那就太不现实了。事实上，绝大多数人恐怕都觉得光用用工具就足够了，并彻底停止研究。

换句话说，倘若人们一开始对营养、矿物质和维生素的认识就不甚清晰，那么在这些看似不成问题的分类里计数的能力就不见得完全是件好事。一些批评者甚至称，饮食教育世界受自身信息还原的意识形态所害。科学社会学家杰尔吉·斯克利尼斯（Gyorgy Scrinis）将这种主要从营养角度看待食物的倾向称之为“营养主义”；凡是只顾着追求食物“低脂”、“减脂”的人，很可能就是受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左右。

在斯克利尼斯看来，获得对营养物质的广泛知识，并在其他碰到食物的模式下使用这些知识，这完全没有什么错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把对营养物质的认识，跟该食物的质量、食物的生产过程、它包含了多少上瘾元素、多种营养物质如何构成了食物的整体营养成分等相加。但人们很少能做到这种知识的互补；大多数时候，因为测量脂肪含量最简单，所以就成了考察的指标。并不奇怪，食品行业欣然接受后一种方法：公司一边卖脱脂牛奶，一边往脱脂牛奶里增加额外的玉米糖浆，这种做法实在不算少见。但当然了，“无脂肪，高糖分”可算不上什么诱人的食物标签。

食品行业会觉得没有理由认为自我跟踪人士会成为威胁：只要这样的方案跟流行指标捆绑在一起，不管是制造还是营销环节都可以据此重新配置。斯克利尼斯甚至认为，“从营养专家的饮食建议，转向了营养层面的语言和有利于食品行业利益的饮食建议。”因此，业界很容易利用对脂肪的关注，因为它可以用营养价值相当可疑的高度加工、再造的成分取代脂肪。斯克利尼斯进一步指出，这“令得普通公众根据这些营养术语阐释自己的消费模式，并进而寻找营养加工替代品，换下自己眼下正在吃的食物。人无需减少肉类和奶制品消耗，而是选择‘精瘦’肉和低脂牛奶，或是将红肉换成白肉。”同样，

它令得公众继续消耗加工和快餐食品（尽管现在采用了稍加修改、对脂肪不友好的形式），而不是减少此类产品的消耗。

在批判营养主义的过程中，斯克利尼斯将营养主义的崛起与量化的简便、魅力挂上了钩。他指出，19世纪末出现了一种趋势，“营养物质、食品成分、生物标记（如饱和脂肪、千焦耳、血糖指数、身体质量指数）被从食物、饮食和身体过程中抽象出来了。它们从更广泛的文化和生态范畴中抽离出来，逐渐代表了食物与身体健康关系的决定性真理。”斯克利尼斯对营养主义的批评，和尼采批评相信能通过数学对音乐排名的天真科学家没有太大不同。不能把营养知识简化成简单的公式；而需要进行批判性思考，可不同的自我跟踪计划，却以一种非常有悖常理的方式，力求让我们彻底放弃对食物的思考。解决方案主义最根本的推动力，就来自这种逃避思考，用由算法创造的永恒真理取代人类判断的冲动。布鲁诺·拉图尔曾对“事实事件”（matters of facts）和“关注事件”（matters of concern）做了区分，前者，以一种不切实际的古老方式，将所有的知识论断表现为稳定的、自然的、非政治化的存在；后者，则是一种更现实的模式，意识到知识论断一般是片面的，只反映了一组特定的问题、利益和议程。在拉图尔看来，对我们政治制度加以改革的方法之一，就是承认知识是由关注事件构成，找出所有受此类事件影响的东西；自我跟踪的扩散，以及用数字取代思考的倾向，有可能让我们永远地陷在事实事件范式中，无法自拔。

一旦我们不再思考优化，不光执行，甚至就连想象对“被测量”、“被跟踪”的制度进行改革，也困难了许多。量化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它鼓励政府不去费功夫进行痛苦的结构改革，而是简单地将所有问题交托给公民去解决。干嘛要规范高度加工的食品，提高农贸市场的准入门槛，禁止快餐连锁店对青少年打广告呢？毕竟，我们可以简单地赋予单个公民力量，让他们自己监

控自己吃掉了多少卡路里，不用再费功夫采取政府级别的行动，假装肥胖是个人意志薄弱、无视自身进食量造成的结果。一旦自我跟踪跟个人责任这一简化政治意识形态联手，就会妨碍人进行不间断地反思，而在约翰·杜威看来，不间断地进行反思，才是民主生活的核心。

量化的这种霸权特征（也即用量化取代思考某一现象的其他有意义的、但可能是无形的探讨途径）非常让人不安。在热情、甚至是用心良苦的自我跟踪人士手里，食物成了最小化生病风险的另一种方式，而不是享受有限人生的方式了。过分强调营养含量信息，会不会最终取代我们对食物的其他判断标准呢？诚然，自我跟踪主义者会安慰我们说，这种新的信息只是对现有信息的补充；但它实际上很可能会取代（而不是补充）其他标准。

事情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并不太难理解。通过量化获得的一大优势是，让手边的问题便于处理；一旦用数字来表示，我们就能讨论它会随着时间发生怎样的改变，衡量其他因素怎样对它造成影响，等等。故此，解决方案主义和量化，是存在内在联系的。政治科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他了不起的作品《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中写道："某些知识和控制形式，需要狭窄的视野……[狭窄的视野]清晰地定焦现实有限的方面，要不然，现实就太复杂、太笨重了。反过来，这种简化，让视野中心的现象变得更清晰，更容易进行精心的测量和计算。"所以，为了限制解决方案主义有可能带来的损害，人必须找到方法，恢复一部分被这种"狭窄的视野"抹杀了的角度。

数字帝国主义

伊凡·伊里奇写作的时候，智能手机尚未发明，但控制论和系统理论的概念已经渗透到公共辩论中了。他注意到，自己同时代人对需求、欲望和必

需品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伊里奇看来，必需品和欲望是固定的：我们必须要做出艰难的道德抉择才能放弃。可需求，却是现代的创造物；我们认为需求是灵活的（或许是受麦迪逊大道上广告公司们的影响？），我们相信，需求是可以识别出来的（通过量化，或者更多的自我反省）。因此，我们不会从道德的角度去看待“满足我们需求”的项目。1987年，伊里奇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BC中说了一番话，预示了未来自我跟踪的一些症状：

> **上个星期，有个学生在这里。我想再给她一杯从附近阿米什人那里买来的苹果酒，之前我们已经喝了一杯。我说，“这苹果酒很好，来点儿吧。”“哦，不行啊，”她说，“今天我的糖摄入量已经够了。我不想摄入太多的糖分。”所有人都有可以指明的需求，这些需求可以识别出来，进行分类，并应该得到满足——这种想法跟此前对人类生存条件的认识非常不同。在传统观念里，有些东西是必需品，不能改变，只能接受。在这一传统观念下，从必需品的角度来看，对欲望的培养和规范是首要个人道德和伦理任务，对每一个人如此，对整个社群也如此。但需求，既不是不能改变的必需品，又不是并非随时随地可得到满足的欲望……当人们把技术视为一种手段，可以改变、取消人类生存条件规定的必需品，需求……就出现了。**

最后一句话，也就是取消人类生存条件所规定的必需品，听起来有点阴暗，有点悲观，但它很适合从更广泛意义上批判本书中提到的解决方案主义：限制——如果没有限制，哪有什么“必需品”——可以是多产的，甚至有利于人类的繁荣。障碍和壁垒为人性的存在创造了条件。一如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说，“做人……是一件你必须精通的事情，

就像弹奏乐器，或是忍受雪利酒会的无聊。”没了无聊，用自我跟踪应用程序换掉乐器，你就缩小了我们人性出没的空间。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需求话语的问题在于，拒绝再喝一杯雪莉酒的年轻女士认为，她那便于量化、测量的需求，耗尽了自己的道德罗盘——也就是说，她每天消耗了多少的糖。她完全没有想到，她恐怕有道义上的责任对教授再礼貌些，顺手接过那杯酒喝掉；或者，她有可能因为喝了那杯雪莉酒而获得极大的感官享受。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量化困境，伊里奇恐怕不会感到惊讶。我们最终会改吃满足所有营养主义需求，但缺乏美感、质感和香味，完全不像一顿精心准备的饭菜的液体糊糊吗？科技记者格雷格·比托（Greg Beato），在自由主义阵营的杂志《理性》（*Reason*）撰文，暗示这就是重度依赖量化的未来有可能招致的结果——不光是从营养的角度而言，其他方面的追求也一样。他写道：“很快，我们就能知道，是‘法国洗衣店’[9]（French Laundry）里卖的海胆奶酪让心跳加速得更快，还是丽思卡尔顿酒店卖的鱼子酱雪松熏鹌鹑蛋。我们会知道，哪一位瑜伽老师的学生晚上睡得最香甜。我们会知道，哪些活动头一次约会就上床的可能性最大，是去艺术画廊的开幕式，还是去保龄球馆消磨一晚上。突然之间，所有从前用来判断价值和满意度的尺度都不再切题了。”

或许，美学就是这样走向终结的：一大群热心投入量化自我运动的人是毕加索还是德加笔下的裸体女人能让男人勃起的时间更长。量化碾磨过的人类体验，简化成了头脑麻木的沉默字节流，以数字的方式不懈地解说着我们对完美基因构成、完美信用评分、完美配偶的永恒追求。正如一些聪明的投资银行家屈从于功能主义的诱惑，购买了几千几万本从没读过的书放在家里，增添自己的“文化气息”（但家里放着一大堆从来没读过的书，“文化气息”

9 美国最高档的法国餐厅。

又何从得来呢？），我们也会靠一些快速的技术补救，让自己显得更健康，更有艺术家气质，对我们理应渴望培养的健康或艺术理想却不闻不问。

技术评论家史蒂文·塔尔博特（Steven Talbott）继承了法国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深刻的精神传统，正确地指出，“我们只把自身智力的某些自动化、机械化和计算化方面，投入到了数字化时代的设备上，而外部的设备，反过来又强化了我们自己的这些方面。换句话说，你在这里会看到工程师所谓的‘正反馈循环’，也就是几乎必然会让我们智力机能单向运作的循环。”我们也不必如此悲观——本书的最后一章将告诉我们，数字技术也能把我们从享受太久的道德、审美沉睡中唤醒——但塔尔博特主张的核心是对的：对正反馈循环，我们必须谨慎看待。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认为世界完全量化这样的愿景引人入胜，甚至堪称解放呢？在《理性》杂志那篇文章的作者格雷格·比托看来，他所看出的这些可怕趋势，仍然指向某种幸福结局：一旦我们知道了有关丽丝卡尔顿酒店的鹌鹑蛋的一切，营销就死了，客观性就胜利了。“品牌、市场营销，甚至定性的顾客评价，都将让位给基于血压、皮肤电反应和定量自尊的报告。我们不再是用自己轻浮、情绪化、易受摆布的大脑去思考，而是用我们理性、便于量化、难于操纵的内心去感受，胜利者得到加冕，失败者遭到谴责，一切都基于真正让我们最为满足的东西。”这看起来就像是最糟糕的奇客怪谈，对权力的运作完全盲目。就算这样的乌托邦真正出现了，所有的营销预算也无非是换个支出方向：辩论是哪一种衡量方式更客观、更真实、更自然。到时候，不再是各品牌向我们倾诉自己培养了创造力；相反，公司会竞相向我们证明，自己的创造力品牌（也就是得了最高分的品牌）最为重要。这只会助长现代社会业已普遍存在的焦虑和不信任感。

让我们假设一下：量化非但未曾破坏营销，反而让企业能够更积极地

推销自己的产品，同时还获得了自我跟踪带来的匿名性好处。雅虎的CEO，Google前高管梅丽莎·梅耶（Marissa Mayer）曾谈及“情境发现”（contextual discovery），也就是搜索引擎可以通过学习用户在网上搜索的信息种类，在用户自己询问之前就主动提供这一信息。同样，梅耶的前东家埃里克·施密特，喜欢谈论自主搜索的概念——也就是我们的智能手机，通过密切监控我们的行为，在后台无声无息地执行相关搜索。施密特给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我走在柏林街头……我希望……我的智能手机不停地搜索。‘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看这儿看这儿，看那儿看那儿。’因为它知道我是谁。它知道我喜欢什么。它知道我的大致位置。所以自主搜索这个概念——告诉我我自己不知道、但可能会很感兴趣的内容——是……搜索的未来阶段。”

好吧，这听起来非常适合旅游，尽管，随着Google成为一切的最终导游，它可能会破坏旅游行业。可让我们想象自主搜索的其他应用吧。假设Google通过它神奇的眼镜知道你正情绪低落，以及为了让你振作起来（或许是为了安抚你刚从前任那儿接到的伤心电话），你需要看一幅雷诺阿的画作。好吧，Google并不确切“知道”，它只知道你目前缺少124个单位的“艺术”，根据Google自己的测量系统，雷诺阿的画作恰好平均为120分上下。你看到了画作！砰！你的心情好起来了！它把你变成了一名艺术爱好者吗？它扩大了你的视野吗？还是，这种对艺术的功利性供应（就仿佛艺术是励志书似的），大大贬低了艺术呢？

这种对自主系统的顺从（说得清楚些吧，既然有自主搜索，也一定会有自主广告的），能改变生活的其他许多领域。技术记者比安卡·博斯克（Bianca Bosker）暗示了这一高度自动化的数字未来。她抱怨说，如今，她已经找不到地方吃饭了，而是吃饭的地方自己来找她。或者，用硅谷的说法，

“发现”取代了“搜索”。她写道：

> **我对新邻里聚会点（“纽约最佳早午餐饭馆”、“东村咖啡馆”）的网页搜索让位给了手机上弹出的“四方”（Foursquare）提醒，告诉我附近有个不错的地方。这款程序有个“清单”功能，我能订阅朋友们和城市指南汇编的“必去”目的地清单，每当来到一家获得朋友好评的餐馆，四方就会告诉我。上网搜寻到哪儿吃下一顿饭（或者逛街，买书，播放列表），变成了坐下来等待点点滴滴的信息弹出来。我不再寻找。我吸收。寻找新信息的过程，不再像是自家做的大杂烩，把从熟食店、农贸市场和冰箱里的残余扔进锅里煮，倒更像是一顿开着车买了就走的快餐。快捷、方便和灵巧，只是带着些工业加工的痕迹。**

博斯克说得没错，从手工搜索转向“自主搜索”或“情境发现”，是技术系统现在可以传递“从歌单到知音等一切事物的个性化选择，无需搜寻者提出明确要求。”技术大师们也认同这一点。微软搜索引擎必应的总监斯特凡·韦茨（Stefan Weitz）告诉博斯克，“代表你进行的隐式搜索（implicit searching），无需通过你的请求来启动，绝对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今天触发事件是‘关键字’加上‘回车’键。但是明天的触发事件可能是你一觉醒来，发现上午八点，你要搭乘的火车无法正常通行。”这或许是绝对革命性的创新，但听起来也像是消费主义的最终胜利。多亏了我们支持创新的倾向，在有关“自主搜索”的辩论当中，很少有人提到消费主义（就连博斯克也没提到这个词，尽管她的确指出，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在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的时候，搜索引擎就会告诉我们想要什么。”伊里奇想必没法同意）。故此，

要评估量化自我及其对公众生活的影响，光是指望跟踪设备有助于解决一些精心勾勒出来的社会问题还不够。这样的问题其实难得存在——而旨在修复它们的计划，做的事情会远远超出发起人最初的期待，与其他的系统、技术和议程交叠在一起。

如果事实透明如水

有些人可能会反驳说，有些与美学没多大关系的活动，肯定更便于量化吧？测量我们消耗了多少水、多少电，似乎不成问题；可我们真应该担心詹姆斯·斯科特说的那种“狭窄的视野”出现吗？每当说到计量，相关的输入和输入似乎就像我们看看温度计，判断是否该穿毛衣一样：如果我们节约用水，对自然就是好的；如果我们不节约用水，对自然就不好。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简单直白吗？

有人或许会举例说，在家里安装水表电表，监控家庭耗水量耗电量的行为变得常见甚至时髦之后，量化自我运动也就随之兴盛了。现在，有些人大概会说，同样的逻辑扩散到了我们的智能手机和浏览器上，而且后两者更为强大。就连水表电表，如今也正为“Wattcher”一类的设备取代。“Wattcher”在荷兰大受欢迎，它不光能显示当前或每日能耗情况，还能将之与日常目标相比较。可就算是在这个领域，也不是凡事都跟它乍看起来似的那么美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讨论对人类繁荣至关重要的能力问题时说，“公民无法很好地用事实性知识将周围的复杂世界联系起来。”因此，她认为，所谓的“叙事想象力”非常重要。尽管努斯鲍姆对“叙事想象力”的定义是，“有能力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立场设想事情的走向，明智地解读别人的故事，”但我们无需将之局限在人际互动当中。叙事想象力，可

能还涉及到人与复杂社会技术和政治体系的互动，以及洞穿自身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能力。

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叙事想象力”跟与之存在一定矛盾的“数字想象力”进行比较，后者可以定义为，一种不尊重人类世界的复杂性，力争寻找定量和线性因果解释的倾向。叙事想象力是自我指涉的，也就是说，它痛苦地意识到，为了叙述世界，就需要对观察者进行叙述。数字想象力则相信，现实存在客观的、可靠的叙述，这些叙述是永恒的，永不过期。早在观察者存在之前，世界就已经存在了，正如观察者安装电表之前，用电量是存在的：这没有太多争辩的余地。

数字想象力的问题在于，它极不擅长用来描述复杂系统，更不可能想象如何对这些系统加以重新安排。它将事实视为永恒，所以基本而言，数字想象力只存在于当下，对任何形式的偶然和历史，都持逃避态度。相比之下，叙事想象力知道目前的大部分做法、规范和承诺都不是永恒的，虽然它们都自称是唯一的做事方式，但往往掩盖了许多其他替代方式。叙事想象力意识到，就算是事实也可以修改；如今我们认为超重对身体健康有害，而等上几年，我们说不定又会发现，额外的体重说不定反而保护你免得许多严重疾病。

当前的量化自我运动，疯狂地致力于阐明事实（这是数字擅长的东西），但仍然没办法从事实中生成叙事。老实说，它甚至有可能妨碍叙事的形成，因为自我跟踪人士对数字看得太重，忘了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讲故事（并从中产生行动）。

因此，说回计量水电的做法，把人监控资源的决定，误解为对水电入户方式的真正改革，这是很容易的。理想而言，怎样对使用水电生成叙事，并将叙事转化为行动，是有很多种做法和尝试的，监控决定应当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补充环节。问题是，不先从宏观上理解水、气和电是怎样进入家庭，

不可能生成相关的叙事；而计量水电也并不能提供这些叙事。

人类学家玛丽亚·凯嘉（Maria Kaika）在《畅流之城》（*The City of Flows*）写道，“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水、电、气和信息的供给，似乎是奇迹般地就进入了家庭领域，不知道具体来自什么地方，又好像来自每一个地方。就算是垃圾处理，也无非是把东西扔进墙上的洞，垃圾和臭味就奇迹般地消失了。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垃圾处理过程的终点，就是把垃圾袋扔进那个洞里。”知道我们的智能垃圾桶里有什么（这是BinCam等项目争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并不等于知道垃圾离开垃圾桶之后会怎样。和前者相比，后者对环保改革重要得多。

我们对垃圾处理知之甚少，我们对云处理也一样；只有很少人知道它具体包括了些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做，以及我们可以怎样改变。监控我们扔掉了多少垃圾、消耗了多少水，从“云端”上传下载了多少信息，并不能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些复杂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数字想象力”让我们用数字来思考，也即，想到我们消耗了多少东西，又可以拔掉哪些东西的插头（这算是最好的情况了），但它永远无法推动我们思考怎样生成一组不同的数字。认为只要每个人都少洗一分钟澡，气候变化问题就能解决，这未免太过天真；真正的解决办法需要更大幅度的牺牲，甚至要跳出洗澡问题，到其他地方去打这一场恶战。

另一位人类学家维罗尼卡·斯特朗（Veronica Strang）在《水的意义》（*The Meaning of Water*）一书中评论道，计量，至少是自来水公司所提倡的计量，嵌入在一套复杂的经济系统当中，该系统本身是建立在有关资源所有权、以及什么是最理想的资源管理手段等特定假设上的。按斯特朗的说法，“水电表具体落实了私人所有权，并赋予了管理者而非全体用户判断何为‘浪费’（政府机构的辞令更具外交色彩，说那叫‘任意’，或‘非必要’）用水的权力。”因

此，她写道，水表“也完美地表达了社会个人化，它让人认为，自己在家这个城堡里使用的资源，脱离开了更广阔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有人或许认为，量化自我运动是分散的，去中心化的，故此无需承受此种压力，但其实不大可能，因为企业既制造用于自我跟踪的设备，也拥有数据分享的网络平台和信息公告板。

像“Wattcher”这种可以直接插入插座的设备，公共事业提供商尚未像对水表电表那样积极推广。但是，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哪怕围绕此类设备展开的争论任务，落到了凯文·凯利和加里·沃尔夫身上。然而，根据我们迄今掌握的证据，这类反馈设备是光把用户锁定在当前消耗模式当中，还是鼓励他们去用创造力和想象力去思考其他使用（以及节约）水和能源的方式，还根本说不清楚。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约兰德·斯特勒齐斯（Yolande Strengers）研究了澳大利亚家庭中各种能源使用消耗信息反馈系统，她指出，她实验的参与者们“基本上并未停下来反思或改变自认为正常和必要的行动。”

与此同时，斯特勒齐斯还指出，人们眼中的正常、不可谈判的东西，本身总在不断变化，而且，是由消费系统及其底层结构提供信息的。如今，人们的衣服穿过一次就洗，可这显然不是50年前的做法，一如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苏维（Elizabeth Shove）在《舒适、清洁和便利》（*Comfort, Cleanliness and Convenience*）一书中指出，如今对舒适和清洁的规范和期待，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同样道理，使用烘干机，以及在相对温和的天气里开空调，也是新近才出现的做法，而不是永恒的规范。自我跟踪能告诉我们空调系统用了多少能量，甚至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将其需求与我们的目标相匹配，但它无法就“一直开着空调是否可取”的做法发表评论。数字想象力或许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更有效的使用空调，但叙事想象力才能告诉我们是否应该使用它。

事实上，反馈系统触发了心理学家所谓的“准许效应”（licensing effect），

也就是说，看到我们的能源消耗一如预期地降低了，我们就有可能彻底不担心它了。约兰德·斯特勒齐斯报告了澳大利亚的一些家庭如何响应一套名为“EcoPioneer”的反馈系统。该系统使用交通信号灯制度来暗示家庭是否消耗了太多的电。比方说，一位参与者发现自己不断看到黄色信号灯，“我总担心自己用烘干机用得太多，但我想，只要它不切换到红色就行了。”可要是人更仔细地考察EcoPioneer系统，就算绿灯也不见得一定是我们想的那个意思。斯特勒齐斯说，该系统的目的是测量实时能量消耗，而不是24小时的累积消耗。因此，为保持绿灯或黄灯，家庭只需要将能源消耗分布到一整天之内就行了。对供电商而言，这或许是好事（因为它带来了错峰，以及更有效的能耗分配），但它不见得能减少需求。但表面上看来，它的确挺好：家庭行使着分内的“公民权”，而供电商实现了更有效的能耗分配。尽管，没有一定的叙事想象力，这套系统实际上可能只是锁定了当前的能源使用习惯。

直觉和骨盆骨折

那么，自我追踪到底打算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嗯，往往很难说。《福布斯》杂志的记者克什米尔·希尔（Kashmir Hill）就量化自我运动及其无数应用程序写过许多文章，在一次自我跟踪实验中，他对该拿所得结果怎么办表达了一种迷惘感。多亏了一些聪明的软件，她发现，“我最幸福的时候是在酒吧喝酒（啊）；最不幸的时候是在飞机上、在工作中（啊哈）；星期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其次是星期三；我一个人时和跟人在一起时一样开心；我跟前男友互动比跟现男友互动更开心。”至于现在怎么做，希尔并不知道。“该拿这些结果怎么办，我有点糊涂了。这是否意味着我应该工作时多去酒吧里待着，优化我的幸福感呢？还有，我应该重新考虑跟男朋友的关系吗？”

问题是，这些结果固然是可靠的科学数据，但却没有立场。就算它们是行动的道德推动力，或是从几个月自我反思中得出的结论，它们仍然没有立场，因为很明显，希尔在使用这些软件的过程中，对自己的饮酒或工作习惯并没有想过太多。它们充其量能算是关联。但这样的关联有什么用处呢？对一些量化自我运动的参与者来说，关联就是一切。塞思·罗伯茨（Seth Roberts）便说，吃黄油让他跑得更快了，至少，他的数据是这么说的（塞思在自己的博客帖子里一开始就说道，“两年前，我发现，黄油，更确切地说，是用黄油代替猪肉脂肪之后，我跑得更快了”）。还有桑吉夫·沙阿（Sanjiv Shah），他认为，上床之前佩戴黄色眼镜，改善了他的睡眠模式（都在数据里哪，傻瓜！）。当然，一些自我跟踪人士知道自己的结论可能并不具备科学有效性；一位热心人士对《经济学人》说，“依靠自我跟踪，你永远不知道，到底是你的实验影响了结果，还是你对实验的期待影响了结果。”在科学上，这是众所周知的安慰剂效应，在学术实验里，人们会尽一切努力减少它的影响力。可就量化自我运动而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不同知识论断在改善健康或性生活上的效用。

最奇怪的是，人们并不需要知道该怎样使用这些知识；大部分无非是生成后就一劳永逸地存储起来。一如沃尔夫向量化自我运动的成员们所说，“尽管他们可能是脑袋里带着具体的某个问题开始跟踪的，但能继续进行下去，是因为他们相信，数字里藏着自己无法视若无睹的秘密，就连自己还没想到要问的问题，答案也在里面。”所以说，自我跟踪者们收集数据、信息或知识，是为了向数十年来主导信息管理文献的那座著名金字塔膜拜吗？信息学者马丁·弗里克（Martin Frické）曾执笔了数据挖掘倡议，他评论说，自我跟踪促成了一种混淆数据和信息的倾向，鼓励“盲目和无意义的收集数据，指望总有一天……数据能上升变成信息——也就是预先采集。”

彼得·奥斯汀（Peter Austin）想取笑一番这种未雨绸缪的尝试，对安大略省近一千万名患者的健康记录做了信息挖掘，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一个令人心碎的革命性发现是，“处女座呕吐的可能性更大，天秤座爱骨盆骨折。”唉，只可惜，奥斯汀和同事们对另一群体检验该假说时，这个结果没站住脚。奥斯汀指出，你只需要“用另一个特点，比如性别、年龄等来替换星座，你的脑袋会立刻开始就观察到的相关性形成解释。然后我们就会跳到结论部分，构建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果。”不过，他认为，“我们找的模式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找到，尤其是一开始我们并未从具体的问题出发。”换句话说，奥斯汀眼里糟糕研究的标记，居然是量化自我运动的一个决定性的、受人喜欢的特征。说句公道话，背离理论，绝对相信大数据的优越性，也是互联网意识形态的一个基础；它并不为自我跟踪人士所独有。《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告诉我们说：“Google搞科学的办法，就是收集详尽的数据，这比从假说出发要好。”哈佛大学的戴维·温伯格向Hunch.com——这家网站现在归eBay所有，会向用户提出上百个问题，以预测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电影和书籍——写了一封长长的情书，信中说：“这是我们眼中的知识形象所发生的重大转变。”

革命性的修辞都是一个样子，到处都是“革命性”活动——但到底革命在哪里？Hunch.com只是应用了统计、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技术（全都是互联网之前就完善建立起来的学科），把关联性转变成书目电影推荐而已。在温伯格眼里，“喜欢《广告狂人》的观众里，75%也喜欢《绝命毒师》，”这个说法充满革命性，是因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同，它“没有理论。”然而，这种“没有理论的知识”（想想人口普查报告、民意调查和营销调查问卷吧），有着很悠久的历史。没错，如今人们在线填写这些表格了，可这是革命性吗？“断裂对话”又一次昂起了它丑陋的脑袋。

这是能帮助我们治愈癌症的知识吗？温伯格说，“它没有假设，故此也就不用猜。它只是统计上的相关性，”他在这一点或许是对的。但我们同样知道，这种功利性的消费映射，对助推亚马逊上无尽的疯狂消费大有好处。未来，它对助推阴谋论也大有好处，一如格伦·贝克、茶党、亚历克斯·琼斯[10]（Alex Jones）以及其他任何拥有大把空闲时间和廉价计算力的人，比方说，他们能从种族和教育绩效、幸福程度、社会福祉之间扯出相关性来。甚至，还会有大量的志愿者渴望提供靠自我跟踪获得的数据。正如温伯格的建议，这群人才不需要假说或猜测呢；只需映射统计相关性就行了。

当然，如果像奥斯汀一类的批评找到了合适的土壤，人们会把这种相关性贬斥成愚蠢的废话。但如果温伯格一类的人，以及其动不动就“革命性”的主张占了上风，我们的体制就需要花费更多的认知资源，跟各种阴谋论带来的挑战对抗了。由于气候变化的争论无休无止，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专家知识的信任近乎荡然无存。再加上些想要用古怪理论挑战专家知识的怪人，事情只会变得更糟糕。

如果“知识”这个词还有任何意义的话，量化自我运动或是像Hunch.com这类能够提出“见解”的数据挖掘企业，并不能，也不应该提升对这类知识地位的见解。Google搞科学的办法，其实完全不是搞科学的办法——它完全是另一种东西，我们不应该把它视为权威、以专业知识为动力的研究。有时候，观念市场或许需要更严格的监管。哲学家菲利普·金切尔（Philip Kitcher）指出，“我们没有人们可以依赖其事实做决定的机构。”金切尔也怀疑，“不受约束的公共讨论是否能够恢复信任……因为一旦信任打破，‘自由表达观点’往往会进一步削弱那些掌握知识者的信誉。”类似地，法律学者罗

10 美国电台主持人，作家，阴谋论者，以危言耸听著称。

伯特·泼斯特（Robert Post）认为，“如果《自然》、《美国经济评论》或者《柳叶刀》等杂志采用观念模型市场的做法，我们很快就会丧失一切有关世界本质的专业知识。”

当然，问题在于，大师们操持的“互联网”概念，再加上维基百科和Google的大获成功，妨碍了人们挺身而出捍卫专业知识，捍卫创造、维系专业知识的实践。相反，维基百科和Google的民粹主义模式，使得大师们宁可去讴歌诸如量化自我这样的运动，以及像Hunch.com一类的初创企业，说它们具有革命性，适合复制从前的知识结构——哪怕它们跟从前的知识结构截然不同。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越早承认这一点，我们的公共辩论就越健康。

08 超人条件

"从凡尘到天堂，一切都将被检测、被联网、被存储。这不是对40年后的疯狂猜测。未来10年肯定是这样。我打赌输的时候可不多。"
——戈登·贝尔[1]
（Gordon Bell）

"以为通信技术能解决沟通的问题，更好的布线技术能消除幽灵，这是个错误。"
——约翰·达伦·彼得斯[2]
（John Durham Peters）

量化自我运动出现很早以前，微软的一位高层工程师戈登·贝尔，就已经开始记录自己人生的每一个细节了。他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持续至今。因为热切地在脖子上戴着一台名为"SenseCam"的设备，贝尔给自己招来了很糟糕的名声。这是一台小型黑色相机，一包香烟的大小，每隔20秒就拍一张照片，如果贝尔每天有16个小时是清醒状态，那么一天就接近要拍下近3000张照片。但贝尔收集的内容不光只是图片。他所有的手写笔记（考虑到他生于1934年，这份存档的规模可很不小）都扫描了，他所有的电子邮件都分类归档了，他所有的GPS坐标都正式报告了。他在微软的网页上吹嘘自己记录了"价值一生的文章、书籍、光盘、信件、备忘录、文件、照片、演示文稿、音乐、家庭电影、录像讲座……有所有电话、即时通讯脚本、历年

1 计算机先驱，小型机之父。
2 美国媒体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

的电子邮件、网页浏览和日常活动记录。”

还有什么项目，能比贝尔对超越人类记忆局限的追求，更象征了解决方案主义呢？对解决方案主义者来说，忘记不可能有助于任何生产性目的；它是漏洞，决不是功能，越快修复越好。对于贝尔来说，遗忘是痛苦的，甚至是肮脏和罪恶的，戴着“SenseCam”则非常具有解放意义和力量感。“它给你一种干净的感觉……如果我现在回忆起了什么事，我会感觉更自由。我得到了可以做这事儿的机器，这个奴隶，“2006年，贝尔告诉一位采访者。他还没有按小时给自己的大脑拍快照；不过，这似乎无非是个时间问题了；Google的智能眼镜大概能让他瞅到脑子里面。

戈登·贝尔成了一座人力博物馆，记录下了一个人一辈子接触到的每一个字节、每一个弥母、每一个像素。真正的戈登·贝尔夸耀“戈登·贝尔博物馆”存在的好处时兴奋地说，“你成了自己生活的图书馆员、档案保管员、制图员和策展人。”有点自恋？或许吧。但既然存储如此廉价，对人类脆弱性的恐惧又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分清自恋和实用主义可不是件轻松事。

有人或许会反对，认为把戈登·贝尔的数字档案称为“一座博物馆”太夸张了。毕竟，博物馆的运作前提是，有些东西很重要，必须加以策划、推广、展出，而另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可以置之不理，或者直接抛弃。推想起来，就算它们有无限的陈列空间，博物馆不会放弃策展理念的。后者是一种有意识的承诺，而不是源自缺乏资源的技术限制。

但戈登·贝尔的单人博物馆，名义上承诺要把它的男主角变成策展人，实际上却拒绝了策展工作精挑细选的精神；就像我们在前一章节看到的自我跟踪人士和数据挖掘工一样，戈登·贝尔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数据收集，指望有一天这些数据不光能带给他正确的答案，甚至还能向他提出正确的问题。但兴许，这些数据只能告诉他汽车钥匙在哪儿——我们中恐怕有不少人都曾

钻在桌子底下大费周章地找过车钥匙吧？但在脖子上戴一台“SenseCam”，也能帮助你找到一把万能钥匙：通往你内在自我的钥匙。因此，贝尔写了足有一本书长度的宣言《全面回忆》（*Total Recall*），鼓吹终身记录的好处。他宽慰我们说，它能“增强自我洞察力，也就是以普鲁斯特般的事无巨细，重温自己人生故事的能力；你可以获得自由，减少死记硬背，更具创造性地思考，因为得到了虚拟空间信息化，你甚至获得了衡量尘世不朽的尺度。”靠着一台“SenseCam”，普鲁斯特肯定会成为Instagram上病毒般的大热门。

贝尔很少使用“自我跟踪”和“量化自我”这样的术语，相反，他说自己的爱好叫“终身记录”（lifelogging）。在他的追求里，数字只是一个小角色；与其说是为了生成统计数据，倒不如说他是为了解决人类记忆的效率低下和不忠实问题。尽管如此，贝尔并不放过任何一个能从积累的数据里做出推论的机会。他在言语中反复强调终身记录带来的各种救命机会；哪怕终身记录会把我们变得永远焦虑，除了跟踪之前看不见也无关紧要方面，几乎别无选择。

突然之间，终身记录从古怪的极客追求，变成了我们对自己、对他人的道德义务；如果你不记录，就危害到了人类。让我们来看看贝尔和微软另一位作者合作执笔为2007年2月号《科学美国人》写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便携式传感器可以测量人类根本感知不到的东西，比如血液中的含氧量，以及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电脑可以扫描这些数据，识别模式：比如，它们或许会判断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会恶化孩子的哮喘病。传感器也可以记录下人一辈子的30亿次左右的心跳，以及其他所有的生理指标，预先警告心脏病发作。”

虽然贝尔的原话并非如此，但他基本上的意思是，凡是能够记录的，就必须记录在案。如果不能记录，那就必然是存在道德和审美缺陷。因此，《快公司》杂志描述贝尔说，“不能塞进硬盘的经历，他总是感到恼火。”这已经

让他对实体书不满意了。“我几乎到了拒绝拥有任何书籍的地步了……我的意思是，我会买书，我会看书，偶尔也读书。但之后我就会把书送人，因为他们不在我的记忆里。对我来说，它们已经没了。”贝尔感叹道，只可惜，他没发现，自己的文学鉴赏力突然成了俘虏，受制于他力图记录鉴赏过程的全面迷信。

我们很容易认为贝尔的项目太怪异，并把他和同时代其他形式的古怪数据囤积项目混为一谈。他在其他很多方面看起来的确像是个怪人。2007年，《纽约客》一篇写他的文章说，贝尔“相信有一天，房子会没有窗户，这样房子修在哪儿都无所谓了——墙上的屏幕能展示我们想要看到的一切东西。”这个人可以让《黑客帝国》里的恐怖未来，听起来就像是到墨西哥海滨城市坎昆去放春假那么惬意。

但如果说贝尔真是个怪人，他也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怪人。他以“电脑界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3]”广为人知，是一位备受敬重的杰出工程师和管理者；20世纪70年代，他是当时风光无限的迪吉多（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公司的一位顶级高管，80年代，他帮忙主持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互联网”进军。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微软的发展之路（比尔·盖茨曾为《全面回忆》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前言；1995年，比尔·盖茨自己写的《未来之路》里，也充斥着贝尔式的言论，比如“总有一天，我们能将自己所见所闻全都记录下来”）。终身记录的设想，为微软的好几种产品都提供了灵感——比如软件项目“MyLifeBits”，就可帮助终身记录者跟踪自己收集的所有信息；其他一些看似无关的网络创新当中，也可看到这个想法的蛛丝马迹[比如Facebook的“无障碍分享”（frictionless sharing）功能，可以跟踪并自动

3 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

发布我们的网络活动；这就是公共的终身记录]。

技术心态的所有缺点和偏见，都巧妙地融合在贝尔的观点里。他对技术自主性及其社会必然性的讨论就是这样——抵挡发展趋势没有意义（“究其整体，社会是走在通往‘全面回忆’技术的大路上的，它将改变你周围的世界”）。对这一技术发展轨迹施以任何政治、社会性的干预，都被说成是“灾难性的反革命”（贝尔的原话如此）的一部分。贝尔写道，“只有法律或政治上进行一场庞大的社会工程，才能阻止[终身记录]对现代生活方式产生的深远改变。那种灾难性的反革命听起来有点勉为其难了。”或许，“法律或政治上的庞大社会工程”（也就是民主决策的基石）不对他的胃口。可以预见的是，贝尔也是“终身记录”技术客观性、中立性的忠诚信徒，在他看来，“数字记忆是客观的，冷静的，平淡的，准确得不容追悔。”

《全面回忆》里还穿插着无处不在的承诺：只要我们等得足够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发明新的社会规范，判断终身记录何时恰当，何时不恰当”）；还有宽慰：个人有能力控制这种技术（“你会实现全面控制，任何时候你都能及时收手”）。在贝尔眼里，就算所有人都掌握了能对一切进行终身记录的技术介质，个人也能享受到充分的自主和独立。他没给信息政治经济学带来任何一个问题。这也就难怪贝尔看到的一切都染着一层玫瑰色的光晕了；他的想法，跟推动我们养成信息分享习惯的趋势并不一致。

因此，他带着自己一贯不加掩饰的热情写道，“如果世界跟随我的引领，‘全面回忆’将成为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加密会很普遍，电子回忆会存储在瑞士的数据银行，分享很谨慎也受限制。”

但世界有多大的可能跟随贝尔的引领呢？或许，贝尔还没看过达沃斯公布的文件，“隐私是一种资产类别”（至于那些达沃斯的人，我听说，对瑞士银行略知一二）。人们恐怕会问，谁会建立贝尔热心提倡的数据银行呢？到目

前为止，建立数据银行的可能会是Personal.com和Singly这一类的企业，它们利用结构性诱因让人们分享所有数据（尽管分享过程是加密的）。如果在贝尔眼里，瑞士银行只是把客户的钱锁在保险柜里就赚到了可观的回报，那他对银行业务的认识可真是错得离谱了。

然而，贝尔最糊涂的地方是对人类生存条件的认识。他一个70多岁的人，写起文章来却像是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仔，全然搞不懂社会互动的多元化，以及由此而来互相拆台、含沙射影和自以为是。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形容理性主义者时说，“就好像一个只懂世界语的人，没办法知道世界不是从20世纪才存在的。”拿这句话来形容贝尔这样的解决方案主义者也合适，只不过，贝尔这类人懂的唯一一门语言是C++。在贝尔眼里，所有这些骗人的做法都是邪恶的，为了让我们进入全面的透明和诚实，必须从社会生活中去除掉。

贝尔讲述了自己的数字档案怎样帮他为朋友的庆生会写出更好的祝酒词。他兴奋地说，“我的生理记忆让我和伊万的关系变得很单调，但我的电子记忆临危受命，恢复了我们友谊历史的意义，让我得以为他的生日写出一份得体的祝酒词。”听起来很了不起，除非人意识到：“终身记录”一旦普及，人就别再想借自己记忆脆弱、不完美来找借口了。在贝尔的未来里，如果你不拟定一份精心撰写、篇幅长达10页的祝酒词给朋友（内中穿插着各种你俩早就遗忘的隐晦笑话和轶事），那就是你干得还不够努力。靠着“终身记录”，你找到车钥匙的平均时间缩短到了：5分钟。因为“终身记录”带来的不必要琐碎事情，你损失的平均时间是：一辈子。

有时，贝尔对真相的执着似乎有点病态。他想记住的一切，什么都不忘记，不管事情有多么黑暗、多么暴力、多么具有破坏性。“决定权在你手里：只要你有胆量，多少真相你都能对付得了。在法庭上，我们只要真相，全部

的真相，毫不欺瞒。这可能很痛苦，但我相信，更好的记忆真的会更好。”贝尔说。在法庭上，我们确实要求真相，但为什么会以为人类的所有社会互动都跟我们的法律制度一样呢？在我们应对他人或自己的过程中，难道就真的就没有欺瞒的空间吗？欺瞒，就不能和遗忘一样，有助于维持（甚至促成）更道德的生活吗？正如哲学家大卫·尼伯格（David Nyberg）所说，“在一个讲述真相的世界里，不光可以容忍因为偶尔失察造成欺瞒；欺瞒本身也是基本的能力元素，帮助我们组织、塑造世界，在不同的人当中解决协调问题，应对不确定和痛苦，在需要的时候讲究礼貌、保持隐私，实现物种的生存和繁荣。”宏伟的解决方案主义式安排常爱追求完美，无从考虑到人类生存条件里的这类棘手微妙之处。

再说，我们的法律制度真的像贝尔形容的那样运作吗？信息学者让·弗朗西斯·布兰切特（Jean-François Blanchette）在一篇有关《全面回忆》的精辟评论中指出，贝尔似乎弄错了。“精心设计的证据接受规则和评估规则控制着法庭诉讼，只要对这些规则稍加审视，便不会忽视一点：多亏了抗辩程序，法庭对证据的技术调解，有着成熟的认识。”布兰切特写道。证据可能是“真实的”（不管它意味着什么），但仍可能遭到驳回。

“问题恐怕在于：你能接受多少真相？”贝尔在一个少见的哲学关头问道。对于这个问题，他给了一个十分油滑的答案：“成功的人从不逃避诚实的记录。”在其他地方，他抱怨说：“有些人向告诉我，他们担心会得知一些自己其实并不想知道的有关自己的事情——令人沮丧的真相冒了出来。”心理专家贝尔是怎么安慰这些可怜虫的呢？“他们可以比铁幕国家还做得更进一步，铁幕国家把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都从历史里抹掉了；而这些人，可以抹掉一切，以免碰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这类的话周而复始，来回循环。举个例子，“终身记录”就是这样把我们

变成更好的人的："假设说，你会发现，你跟女儿实际待在一起的时间比你美好的想象中少。又比如说，你亲眼看到自己跟人交谈时是多么粗鲁。"在贝尔的世界里，没人需要权衡、妥协，做些丑事避免更丑陋的结果；他所主张的自我反省暴政，剥光了人类身上的一切复杂性和偶尔的不理性，把人贬斥成了一套算法，可以从寥寥几条道德规则里推演出来。"

我们同时置身多个道德伦理世界；这些世界可能由不同的承诺和原则支配；指望我们同时在所有这些世界里达成很高的成就恐怕不切实际——这些可能性，贝尔从来没有想过。他认为存在某种通用标准，某种共同基准点，可以比较你做家长时的行为与做朋友、做同事时的行为。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他著名的"复杂的平等"论述中指出：

> **不公正的社会有利于简单化的项目，因为后者认为，成功实现一项社会利益，能转化成普遍的成功……反之，公正的社会，则有利于复杂的人生计划，[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关爱的家长，合格的工人，坚定的公民，聪颖的学生，挑剔的批评家，忠实的教会成员，乐于助人的邻居。毫无疑问，很容易想象人以这样的方式分配自己，赚回各种并非互补关系的形容词……如果我们确信，事情本来就该这样，或者，每一种不同的特质都能实现不同的奖励，没有一种通用奖励可以适用于所有特质，那么，我们就更有可能同时瞄准所有的这些不同特质。**

将一种社会益处（真相）置于最高地位，只对其进行奖励的简单化项目，贝尔就是很合适的例子。他首选的解决方案——充分、全面的数字记忆——有助于推动这一益处，并在此过程中迎来更好的社会。沃尔泽的告诫（也就是"公正

的社会……则有利于复杂的人生计划”）揭示了贝尔解决方案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置身多个领域和环境，并始终处于追求多个不可调和、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目标的过程当中，那么“完美真相”技术的帮助就很有限，因为考虑到我们只能安于次优的结果，自我欺骗说不定算不得糟糕的应对策略。

要同时做好关爱的家长、合格的工人、坚定的公民，这些目标有时彼此存在冲突（因为缺失父母的关爱，名人的孩子什么病也没有，却迟迟不肯停止接受心理治疗），所以，认为简单地计算我们花多少时间陪伴了孩子，多少时间用于研究古希腊历史，又用了多少时间志愿去保护鲸鱼就能调和这些不同的角色，真的相当天真。当然，在硅谷（角色冲突的生活往往是这样构成的：寻找完美的酸奶、从筋疲力尽的瑜伽课里熬下来，又找到一家新的创业公司），这恐怕算不上太大的问题，因为协同无处不有，根本不存在摩擦。唉，世界其他地方的生活并非如此啊——该有人好好向戈登·贝尔提个建议：注意一下这些差异。

玛德琳蛋糕：这儿有一款专门的应用程序！

贝尔不了解人类生存条件的复杂性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他同样没搞清人类记忆和遗忘所扮演的角色——甚至就连这两者的定义没理解。只有在计算机和人类记忆之间划上完美的等号，才能提得出“终身记录”这样一个强烈的解决方案主义式论点。但是，说实话吧：严格地说来，计算机并不是“记忆”信息，而是“存储”信息。对记忆产生困惑信念的，不光只有贝尔——凯文·凯利也存在类似的倾向，他说，“当摄像机无处不在，一切都能随时记录下来。我们拥有了公共意识和记忆”——这是说清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误解的又一个原因。

首先，贝尔提到普鲁斯特的遗产，十分可笑。贝尔说，“以普鲁斯特般的事无巨细，重温自己人生故事，”但这并不等于要知道某一天的具体温度，能回放与事件相关的所有声音，甚至重现所有的气息。普鲁斯特曾相当轻蔑地，对“单纯照相机般的视野”写道，“号称要忠于真相，其实却远离事实。”由数据崇拜推动的“终身记录”，一定会把普鲁斯特吓坏的。他在《追忆似水年华》里写道：

> **如果现实其实是经历体验的报废产品，每个人都差不多一样，因为当我们提到糟糕天气、战争、出租车站、灯火通明的餐厅、鲜花胜放的花园，人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如果现实仅止于此，毫无疑问，用电影胶片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就足够了，而这些简单数据所提供不了的“风格”和“文学”，就成了多余的、造作的东西。但现实真的仅止于此吗？**

在普鲁斯特看来，描述现实（不管是过去的现实还是现在的现实）的关键，不在于寻求更多的数据，而在于将我们的想象力巧妙利用起来，将感觉与记忆联系起来（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普鲁斯特认为，自己的小说比电影或照片更适合完成这一工作）。普鲁斯特对玛德琳小蛋糕的怀念，不是因为他需要烹饪配方，而“互联网”当时还不存在。他的向往更接近于怀旧，更多地是有关无法回到神话般的过去，而不在于回忆起每一个事实的细节；其实，我们可以说，只有填补了叙事里的空白（每次都从头来过），叙事者普鲁斯特才能理解玛德琳小蛋糕。普鲁斯特支持叙事（不是数字）想象力，而要想象力蓬勃发展，空白和矛盾必不可少。

俄裔美国学者斯韦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写到怀旧的未来时，

得出了正确的理解："怀旧用它根本上的矛盾逗引着我们；它是要重复无法重复的，物化非物质的。"去掉这样的矛盾，重复了不可重复的东西（通过终身记录、自我跟踪，或者其他现代技术），制造"怀旧情绪"的一整套产业就崩溃了。博伊姆认为数字技术保存一切的心态和倾向怀旧的意识状态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紧张关系。戈登·贝尔或许也知道这些，因此他断定，终身记忆"必将让我们做了什么、周围发生了什么真实情况更触手可及，更清晰，少受怀旧回忆制造的模糊。"可他不曾想到，若没有"怀旧回忆"，他推崇的普鲁斯特式的事无巨细根本不可能存在；细节显然全保留了，可那完全有违普鲁斯特的精神。

法籍保加利亚哲学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著作，能为贝尔和凯利这种不理解记忆的极客带去点启发。托多罗夫指出，记忆不是遗忘的反义词。相反，它是消失（或健忘）和保存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这两股力量不停地朝着不同方向拉扯我们的意识。因此，没有了选择，记忆不可想象；我们"记住了"一件事，意味着我们保存下了它的部分特点，而抛弃了其他的许多特点。这个过程，有些部分我们马上就做，有些部分，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地做。因此，托多罗夫指出，"把计算机保存信息的能力称之为'memory'[4]令人费解，因为计算机缺乏记忆的基本特点，也就是选择的能力。"换句话说，不加选择的保留或储存信息，不是记忆——至少不是我们说到人类时用这个词的意思。或者，引用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热（Marc Auge）一句令人难忘的说法，"遗忘雕琢着记忆，就像大海塑造着海岸线。"

一旦确认了保存与记忆之间的区别，人就可以明白前者会怎样削弱后者。这可能是因为，随着保存的东西越来越多，记住的东西就越来越少。如果一

4 英文可做"记忆"解，但中文中一般翻译成"存储"。

个人用录像拍下了在西班牙过暑假的每一分钟，有一种体验想必他并不陌生：有时候，3张照片唤起的回忆，反倒比200个小时的录像要更强烈。哲学家比约恩·克朗多夫（Bjorn Krondorfer）指出，“在这样一个内存通胀的年代，归档和存储本身就可以看做是遗忘的许可证。”存储成本下降，智能手机的拍照和拍摄视频能力，只会加剧这种通胀。

不反思应该保存什么，记录（不管多么全面）都可能让人忘记琢磨所记录事件的相对重要性；庞大的存档，反倒可能隐瞒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随着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组织着手处理庞大的幸存者证词档案，他们已经碰到了这个问题。克朗多夫估计，6大收集证词的主要机构，累积收集了长达17.75万小时的证词。这大概要持续观看20年时间——比希特勒的统治期还长8年。对研究人员而言这可能是一座宝库，但要把它变成纪念大屠杀事件的有效途径，却还存在极大的挑战。

正如保留并不意味着记忆，删除也并不意味着遗忘。让计算机擦除事情很轻松：按下“删除”键就完了。但人类的意识可没有故意遗忘这个功能；告诉自己别去想，你是忘不掉那件事的。你可以从硬盘上删除文件，但对文件的记忆（以及对你抹除了该文件这一事实的记忆）或许会永远伴着你。贝尔抱怨居然有人不愿记住某件事的“真相”，可这些人并不是在问他脑叶切断手术或生理诱发的健忘症。他们刚刚只是得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对过去的某些事情，他们宁肯不去想。他们有信心成功完成这一任务吗？当然没有。但人选择不去接触能唤醒可怕回忆的事情（比如童年时受到虐待、强奸，或是跟另一半经历了可怕的分手），这又何错之有呢？

我们有义务永远记得做错的事和承受过的痛苦——这莫名其妙的刑罚是建立在一个可疑的道德基础上的。神学家米罗斯拉夫·沃尔夫（Miroslav Volf）曾在《记忆的终结》（*The End of Memory*）一书里对此直接做过批评。沃尔夫

认为，我们不必以为“记住”永远能带来比“遗忘”更有道德的结果。他写道，“记忆不光是单纯地保护一个人，也可能会伤害到另一个人。它不见得能团结受害者，更可能孕育了冷漠，强化了暴力的循环。它不见得是如实地承认错误，也可能助长受害者的虚假自我认知和不公正需求。它不见得能愈合伤口，更可能往伤口上撒盐。”当然，记忆也不见得会做所有的这一切——这种可能性，沃尔夫同样敏锐地意识到了。关键在于，怀着对贝尔的敬意，我们不应以为记忆随时随地都是正确的事情。解决方案主义不能取代道德推理；我们不应该光因为它容易做，就默认由此而来的解决方案是正确的。

但对于遗忘，我们也不应该草率地投入便利的补丁和解决方案里。如果说，像贝尔和凯利这样的极客信奉能让我们摆脱遗忘选项的技术补丁，也有些极客希望使用快速的技术补丁促成遗忘。例如，网络法律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oenberger）认为，我们需要开发技术，让我们能为私人和公共文件设定保质期，好让尴尬的图片或其他让我们感觉不适、或导致社会冲突的文件能到期自毁。

这或许是一个简洁的解决方案，但它同样忽视了遗忘什么时候是恰当的，什么时候是不恰当的。姑且不提前文已经提到的删除文件不等于遗忘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记住，在某些环境下，宽恕或许比遗忘在道义上更可取。一旦用技术形式表现出来，解决方案主义就剥夺了我们对各种情况恰当性的讨论与思考；它从上至下强加了道德，却不给我们质疑（以及在必要的时候，修改附着在技术里的简化道德真理）的渠道。

哲学家阿维塞·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对宽恕做了有益的区分：一种，是作为删除的过程，他称之为“抹杀”，一种，是作为掩盖的过程，他称之为“划掉”。如果你想擦除你写的东西，有两种方式。你可以把它删掉，让它没了影，按马格利特的说法，就是把它“抹”掉；你也可以把它划掉，

在原稿上留下痕迹，也就是说，你把它“划掉”，你在掩盖它。对马格利特来说，掩盖的画面是“在概念、心理、道德上比‘抹杀’更可取，[因为]划掉比把记忆当成一桩罪行彻底删除更好。”马格利特的论点很复杂，它建立在政治哲学和历史之上，认为真正的宽恕不是要忘掉罪过，而是要无视它。

虽然技术能够（靠篡改事实证据轻微地）帮助我们遗忘，但对宽恕却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即便宽恕，也不见得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取；它同样需要进行调查，不能想当然。解决方案主义没法减少我们做决策的杂乱无章，原因很简单：技术不能为该记住什么、该遗忘什么的道德困境提供便利的答案，因为并不存在这种便利的答案——尤其当问题以抽象形式提出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看到技术补丁便利可用，就认为它们在道德上可取；后者绝非板上钉钉的事情；终身记录和文件过期技术看似有着无可争议的道德真相基础，可这种基础并非理所当然。我们要意识到，贝尔等技术至上主义者兜售的廉价、人工人类记忆替代品到底是什么——无非是更廉价、更快速的存储数据方式罢了。

杰里·斯普林格（Jerry Springer）的营养观

当像戈登·贝尔等终身记录人士尝试唤起我们对记忆的公民责任来招募新信徒，另一场新生的极客运动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有责任审慎地消耗信息，思考它的营养价值。这是量化自我运动的外延产物，只是走到了不同寻常的岔路上。它希望自我跟踪和终身记录能让我们对自己每天阅读的内容更有觉悟，对自己的消费习惯进行相应的调整，而技术公司越来越置身我们和公布的资料之间，应当积极参与进来。

乍看起来，这个想法似乎很有吸引力，不存在争议。如果你花了太多的

时间浏览FoxNews.com，为什么不看看《纽约时报》的网站呢？如果你只看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的消息，干嘛不去跟进一下歌剧歌手安娜·奈瑞贝科（Anna Netrebko）的最新消息呢？如果你迷恋最新款iPhone，为什么去探索一下最高法院最近论辩的官司呢？过去，大家都使用纸张，很难衡量每个人的阅读内容；诚然，也有些市场调查，一部分人也有借阅证，但基本上，监控我们阅读习惯的唯一方式，就是在日记里进行记录。

多亏了数字中介的蔓延滋生，缺乏阅读统计数据早就不成问题。我们的iPhone、iPad、Kindle电子书阅读器，以及不久以后的Google Glass：所有这些设备都能跟踪我们阅读的内容，甚至我们对每篇文章给予了多少关注度。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屏幕会配备前置摄像头，很容易用它研究我们的眼球运动，甚至据此调整内容。苹果公司已经申请了三维眼动跟踪用户界面的专利。来自丹麦“The Eye Tribe”的眼动跟踪软件，也将冲击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让我们光靠视线就能对其进行管理；公司网站上的原型视频向我们展示，不靠手，也能容易地玩《水果忍者》等流行游戏。

但更有趣的应用程序还不在于更好地管理小设备，而在于重新评估有关用户的信息。根据洛杉矶加州大学工程学教授约翰·比利亚塞尼奥尔（John Villasenor）的说法，眼动跟踪能让营销和出版公司提出一整套有趣的问题：“我们的眼睛在广告上停留几秒就能判断不去点击？我们的眼睛获取页面内容时是怎么运动的？是否有某些单词、短语或主题，我们倾向于回避？”

在这一语境下，解决方案主义者的冲动似乎显得很自然了：既然现在技术允许我们监控自己的阅读内容和阅读方式，那么，不妨设计一种度量标准，量化我们消耗的信息是否含有营养，并据此重新设计我们的信息习惯。前阳光基金会（Sunlight Foundation）的克莱·约翰逊（Clay Johnson）在《信息饮食》（*The Information Diet*）对这种方法做了最有力的论证，在饮食世界与信息

消耗的世界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关联。故此，约翰逊的主题就显得相对直接了："一如不良的饮食习惯带给我们各种疾病，不良的信息饮食则带给我们新形式的无知——不是源自缺乏信息的无知，而是来自过度消耗信息的无知，这种疾病和妄想，不会影响信息不足的人，反而会影响受过良好教育、热衷获取信息的人。"

一旦我们确定，我们确实患上了信息肥胖症，约翰逊就希望我们把局面的控制权抓到自己手里，开始监控自己日常信息习惯。和食物一样，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自己消耗了些什么。"第一步是要意识到，这里涉及到选择的问题。"约翰逊写道。"为了健康地生活，我们必须将信息消费习惯从后台的被动频道冲浪（channel surfing，指手拿遥控器在多个频道中频繁切换），转入前台的自觉选择。"故此，监测和自我跟踪成了这一努力中的有力工具。

正如先前所述，我们的疾病通常源自多种因素的组合，营养只是其中之一。许多研究都证明，主动运动和超重降低疾病风险概率，远远大于过分单薄和被动运动。但就算人只看营养这一个因素，也不难看出：如果前往最近的农民市集需要一辆车和大量汽油，那么，这就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的——尽管人人都有保持健康的愿望。

作家克莱·约翰逊（Greg Critser）在《肥胖国》（*Fat Land: How Americans Became the Fattest People in the World*）里指出，阶层和收入往往决定了吃健康食品的便利性。他指出，"穷人……过着比富裕人口更松散的生活。他们更有可能出现医保中断，收入中断。食物，以及购买食物的能力，也存在类似的松散状态：有时候觉得富足，有时候却挣扎在储藏柜空空如也的边缘。于是，人们有冲动今天能吃就赶紧吃，总觉得明天有没有下一顿可吃还是个问题呢。"一旦我们考虑到贫穷和收入不平等这些结构性因素，那么肥胖就需要完全不同的解决途径了，不能简单地将之定义为缺乏个人责任感，缺乏有关营

养的知识。

同样，摄入轻质而富含营养的信息饮食，看起来容易，但不是人人都负担得起。这样的饮食习惯会带来什么？也许你需要用几个星期跟踪推特上最有趣的人，用Flipboard或Zite这样的智能程序，在平板电脑上订阅各种消息源（feed）。也许你需要订购《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数十种出版物的Kindle版。购买一些专用软件，向你推荐你自己没发现的链接，同时删除已经看过的消息链接，这也挺有用的。这方面的手段难以尽述，但大部分都要求两件事：时间或金钱。如果你两者都没有，就很可能摄入以Gawker[5]、TMZ[6]、《赫芬顿邮报》等聚合软件为首的高脂信息饮食。光是知道《华尔街日报》比TMZ营养更丰富，不会神奇地让你每个月从口袋里掏出21.62美元，支付Kindle上的订阅费。如果你买不起iPad，就不会用到Flipboard，尽管它同样很有用。

和营养一样，从富裕、和结构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信息肥胖症的问题，我们可能会优先考虑一套极为不同的解决方案。也许，我们要花费更多的资源进行媒体改革，确保民众能够通过公共图书馆访问数字资源，而不是让人们监控自己的阅读内容。当然，在理想的世界里，我们应该采用上述所有方法，但在现实世界，我们的资源有限，需要做出选择和取舍。

在约翰逊看来，通过集体行动追求媒体改革的项目，似乎跟通过自我跟踪更好地理解我们消费行为愉快共存；两者似乎没有太多交叠地运行在两条独立的轨道上。“企业应该构建包括突变在内的个性化算法打破读者的过滤膜吗？……绝对应该。但读者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付出努力，摄入负责任、非同质性[原文]的饮食，”约翰逊认为。也许，这种对个人责任和个

5 指gawker.com，八卦网站。
6 指TMZ.com，名人八卦网站。

人拯救的普遍强调，就是克里斯·科尔蒂（Chris Kelty）所说加尔文派极客心态造就的结果。

“信息饮食”说法的问题在于，它将公民重构为被动的消费者，不可能指望他们参与媒体改革和政府政策等复杂事务。因此，他不鼓励推动更强有力的公共广播或禁止负面广告的活动，而是要求消费者采用更符合逻辑的选项：如果现在的网站营养太低，不妨换上另一个。如果克莱·约翰逊是讨厌大政府的右翼分子，持有这种情绪或许可以理解（但还说不上谅解）。可约翰逊是实实在在的铁杆左翼，他是蓝州数码公司（Blue State Digital）的创办人之一，该公司是2008年帮助奥巴马当选的咨询巨头。

诚然，约翰逊可以反驳说，这种饮食监控不会取代政策和公共参与，而只是附加措施。或许确然如此。但身为典型的极客理论家，约翰逊不曾努力改变我们在当前媒体环境所处的位置，以及它现行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经济。从饮食的角度重新评估媒体环境——什么样的媒体和科技公司会接受这样的设想呢？哪些企业不会这么做呢？ Facebook和Google是会喜欢这套计划（因为它提供了另一条证据，证明这两家公司对用户现在已经过多的监控有道理）？还是讨厌它（因为“社会媒体”的营养分数比传统报纸要少）？《华尔街日报》的读者来信页面，“营养卡路里”跟新闻页面一样吗？格伦·贝克（Glenn Beck，保守派政治评论家）的关注者从电视上消费他，比从网络上消费他，所得信息卡路里更少吗？

观点和蔬菜不一样。凡是吃过一根黄瓜的人，都可以合理地认为，下一次吃黄瓜不会给自己带来健康威胁；人不需要再吃一根黄瓜，就能得出这一结论。可包裹在TED讲演里的观点（推想起来，约翰逊大概会认为TED讲演是富含营养、卡路里低的信息摄入源），不见得就是好的观点；人没听过讲演，没把这个观点放在大量其他观点构成的宽广语境之下，就无法判断其营

养价值。根据信息的来源估算信息卡路里，有可能妨碍同等重要但立场相悖的观点（并来自边缘、劣势的源头），以有力的姿态进入公共辩论。

观点不像黄瓜，观点只有在跟其他观点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而意义本身又随时在变化，从远处是无法理解它的，甚至连浮光掠影地一瞥也办不到。照理说，如果人把观点视为弥母（许多极客都习惯这么做），就有可能跟踪其谱系，在了解弥母的内容之前，发现还有谁喜欢过它们。但是，这样的背书代表不了什么：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赞许多许多了不起的观点，但同时也是一名坚定的纳粹主义者。

如前所述，在饮食里引入卡路里或血糖指数等定量指标，很容易就能导致营养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是一个人忽视了构成食物体验的丰富和美味，那就尤其如此。但信息消耗是否经受得起这种指标的检验，还很成问题。那些约翰逊认为消耗着等同于垃圾食品的信息的人，大概会觉得约翰逊消耗的信息同样跟垃圾食品相当。杰里·斯普林格[7]（Jerry Springer）是垃圾食品；猫咪视频是垃圾食品；亚历克斯·琼斯的阴谋论广播，估计也是垃圾食品——但这些节目的受众不会这么认为，约翰逊的阵营也没法轻易对科学和医学界权威施加修辞影响力。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杰里·斯普林格的节目，就一定比《60分钟》的“智力营养少”。

约翰逊一类的人认为杰里·斯普林格和亚历克斯·琼斯是垃圾食品，原因不在于后者的消耗方式，而在于消耗后者的人群，消耗的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有关最高法院或者乌干达军阀约瑟夫·科尼（Joseph Kony）一类的新闻。虽然形式上有点激进，但其实这是对公众新闻关注方式的一种很传统的批评。简单地说，这种意见认为公民应该无所不知，应该对

7 电视节目主持人，主要是档次较低的脱口秀节目。

太阳底下的一切事情都有所涉猎。唉，公民到底应该把哪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放在首要地位，标准从未具体过；他们最好事事关心，注意一切。

当然，这并不是公民参与唯一的模型，除了无所不知，还有其他方式来思考负责任的公民意识——但包裹在量化、自我跟踪和个人责任的语言里，“无所不知”把自己打扮成了唯一客观的、绝对的真相。我们再一次碰到了解决方案主义造成的最为严重的公民危险之一：社会工程师，沉迷于“互联网”带来的诸多可能性，不再认为他们着手的问题存在若干互相竞争、互存争议的解决办法和改革。他们为互联网中心主义所蒙蔽，只要找到跟“互联网精神”（哪怕这种精神本身的定义就有欠清晰）相呼应的解决方案，他们就心安理得。

幻影和背包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他的代表作《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勾勒了一种非常不同的、也更为现实的公众参与模型——尽管很多人都污蔑李普曼是个独断专行的技术统治论者，但这个模型直至今天仍很有潜力。李普曼理论的前提很简单：，公民不可能无所不知，更不可能无所不能。没有任何技术或政府政策能改变这一事实（至少民主政权里不可能）。李普曼认为，“（公民）不可能知道任何时间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关注一件事的时候，其他的事情早已千变万化。”他说：“除非他能找到一些理性根基，把注意力放在最有益处的地方，与他固有的业余方式相适合，要不然，（公民）就会像同时想舔三块骨头的小狗一般不得要领。”按李普曼的说法，理论家们很少拿得出合适的标准，解释为什么要支持一桩事业胜过另一桩——而倘若没有这样的标准，普通公民很难看得出，为什么朝鲜应该比伊

朗更重要，砍伐森林应该比水资源枯竭更重要。当然，面对有一些问题，公民确实提高了声音，走到了一起，而这就是公众形成的时候。李普曼认为，把“公众”看成是永恒的整体，有着界定清晰的固定利益，这没什么作用。只有当争议闪现，一群公民围绕一定的问题凝聚在一起，才是最合适的时机思考怎样从公民参与中获益——哪怕只是因为解决问题旧有的制度化方式不够用了（如果制度化方式还够用，那么一开始就不会出现紧张局面，公众也没有形成的理由）。

李普曼关注公众的形成，而不认为存在某种业已形成的、固定的、特定的公众。这种认识有一个好处：它允许我们关注公众形成的物质（放到今天，也包括了虚拟）条件。引用前一章出现的例子，推特挑选给哪些主题加上“趋势”标签，就能创造非常不同的公众。也就是说，公司是单纯地靠数量、或者通过参与辩论的多元化集群的数量，还是通过每一集群内部辩论的激烈程度来定义流行性，会影响到形成什么样的公众、公众如何维持、有什么样的共同点。简而言之，李普曼的目标是表明公众是流动的、动态的、本质上脆弱的实体，公众不是“凭空”找出关心的议题，而是探讨如何界定、如何阐述这类议题；公众创造议题，议题也创造了公众（故此，我们又有了一个原因要更密切地关注他们所使用的沟通底层结构）。

不过，最重要的是，李普曼认为，这种认识公众的方式，能带来更有效的行动，因为它“节省了人作为公众成员的注意力，要他们对无能为力的事情尽量少花精力。这样，当他们成为公众……构成在社会动荡中声张自己最大利益的一部分，也即，参与可能有助于消除动荡的干涉，他们的活动是有限的，故此方便他们回到自己的事情上。”简单地说，他宁愿公民只做一件事，做得很好；也不愿他们事事都做，事事烂污。

说李普曼推崇某种狭隘的政治失败主义很容易，事实上，有些人也正是

这么做的。的确，就算关心气候变化的人很少，鼓励他们关心，理由也很充分。但更仔细地看，这种抱怨是离题的：公众形成和公民教育项目可以同时进行。公民可以逐渐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同时形成力争改革现行气候变化教育体系的公众；而另一些人则结成主张气候变化不如金融危机重要的公众，等等。从这个角度解读，李普曼决不是什么技术统治论者：是的，他承认将专业工作委托专家解决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委托的具体条件，能够、也应当不断进行再评估。

媒体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从当代媒体语境中还原了李普曼的部分主题，他对所谓的“政治背包族”做了有趣的批评。我们许多人都喜欢上山露营，自力更生地过上几天。可等假期一结束，大家就开开心心地回到家，打开炉子，买一份包装好的肌肉，喝起了巴氏杀菌奶。我们不再自己净化饮用水，而是信任城市供水系统。我们把任务委托给了技术。“那么，在公共生活中，为什么我们期待人会去当政治背包族呢？”舒德森问道。为什么我们期待公民对阳光底下的每一件事都关心备至，做出一副“委托会毁掉我们民主制度”的样子？

在舒德森看来，这样的要求不切实际。“就像人们喜欢掌握野外生活技能一样，人们也可能满喜欢了解政治信息的奥妙。”舒德森写道。“这么做会很有乐趣，会获得社会优势，人比同一社交圈里的其他人知道更多事情，能获得更多社会尊重……但大多数人没这种倾向……我们不能，不应该是政治背包族。”他得出结论，并呼吁“把自治的认知需求，分给不同的人，不同的议题。”

但舒德森的说法，并未完全给李普曼和他的老对手约翰·杜威（杜威其实在很多问题上都赞同李普曼的观点）找回公道。李普曼和杜威都更关注物质世界的局限条件和机会（炉子，烤鸡架，牛奶罐），认为应当对日常生活的这些物质基础设施给予修订、审视，以及杜威所说的“探究”。气候变化或许是

我们长久以来理所当然地使用炉子所付出的代价；背包没问题，只要我们仍然掌握着改变它的选择权。“无审议，不委托”——这是杜威和李普曼会振臂高呼的口号。在政治语境下，公民确实应该将大多数议题委托给民选代表和媒体守门人，而数字基础设施也很重要，在现有机制无法应对某一问题时，它能将公民变成公众。可我们也不能把这一基础设施视为理所当然。一如我们所见，只要改变设计决定，就可以带给我们非常不同的推特，以及由此而来的非常不同的公众。

这看起来可能像是一场高度理论性的晦涩辩论，和当今的数字文化没多大关系。不是这样的。在李普曼写出《幻影公众》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的技术大师们（以及我们的民主理论家）仍然忽视他的思想，把公民想象成无所不知，需要学习太阳底下的一切事情。当然，这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悲剧，但值得担心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它跟解决方案主义的回潮有关，而解决方案主义提供的又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选项：一劳永逸地修复公民。如前所述，新的数字中介实现了干涉我们消耗信息方式的可能性，藉此干涉，提倡更好、更健康、更多元化的信息饮食。这样的修修补补本来难以撼动电视和报纸的地位，因为这两者是以大众为目标的；有了Google Glass和最新的电子阅读器，外加其高度个性化的做法，一切有了可能。依靠推搡和其他类似的招数，让人们关心非洲和朝鲜，突然有了可能。

起初，这样的建议在增多“意外发现”（据信，“意外发现”会受数字技术的持续攻击）的语境中蓬勃发展起来。因此，伊莱·帕里泽（Eli Pariser）在《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一书中写道，“工程师通过设计过滤系统，可以解决‘意外发现’……让人们看到日常经历之外话题。”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帕里瑟希望互联网公司积极地提供消费者尚未消耗，但认为你应当消耗的内容。“如果亚马逊预感到你是犯罪小说的读者，”他写道，“它能够主动向你推

荐来自其他流派的作品。”

请注意这一技术修复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要把它做糟糕很简单——随机挑选项目，推荐给用户就行了。但没人会这么做；用户很可能会把它看成另一种形式的垃圾邮件。可要把它做好，就要求公司比现在更详尽地收集客户数据，追求工程式的“意外发现”，就成了Facebook和亚马逊收集更多信息、磨炼其算法的另一个借口。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也意味着，在一个技术公司尚未表现出应有责任感的时代，让它们在公民生活中扮演更重大的角色。指望硅谷以负责任的态度，采用如此高程度的文化家长式做派，似乎太草率了。

虚假和虚构的世界主义

说到国际新闻，这股受解决方案主义驱动的、对技术干预的向往就更加明显了。在这一领域，技术干预的目标不是带动更多的“意外发现”，而是把每一名公民都变成跟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一模一样的复制品，而且，都穿着他那忧国忧民的多元化病号服。创办博客网站“全球之声”的伊桑·朱克曼（Ethan Zuckerman）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主义”的时代，虽然人人都认为“互联网”把国家和人民拉得更靠近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互联网工具的建筑师们应当[承担]这份事业，帮助拓展人们的世界视野。”

要怎么做呢？朱克曼在一篇充满挑衅意味的文章里举了几个例子，发表在2012年4月号的《威尔逊季刊》（*Wilson Quarterly*）上。“Facebook已经注意到，你没把一位试图联系你的高中同学加为‘好友’。它可以寻找来自非洲或印度、又跟你有共同兴趣的陌生人，并为你们牵线介绍。”搜索引擎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朱克曼指出，“Google跟踪你进行的每一次搜索，让广告更有

效地瞄准你。它也可以使用这些信息，帮助你发现以前从没探讨的有趣话题，为它强大的搜索功能，增加一个‘意外发现’引擎。”朱克曼奇怪工程师怎么还没开发这样的工具，指出：“他们或许在等待能说明用户期待这种工具、也做好使用准备的指标。”从这个角度来看，李普曼错了：我们已经长出了无所不知的世界主义苗头；我们只是还没有能充分开发这类倾向的工具。现在我们有了工具，可以指望硅谷帮助我们尽情发泄内心的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了。

唉，朱克曼啊，没什么证据表明我们真的想跟非洲或印度的陌生人讨论共同兴趣。如今，有关“互联网”，以及它建立跨国桥梁和联系的能力，吹嘘的话已经写得够多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朱克曼没错：周遭“虚构的世界主义”太多了。但想到来自爱荷华州的人为什么还没跟来自印度的人聊上天（除非是接了一通来自班加罗尔呼叫中心的电话），他自己也受了一连串的神话迷惑：技术能发挥作用。其他技术权威的幻觉，来自对“互联网”的世界主义性质，朱克曼的幻觉，来自对人类的世界主义性质（包括其可行性和可取性）。他的这种幻觉，其实是一种更具破坏性的虚构世界主义，因为它假设“互联网”把我们变成天下大同的速度还不够快。故此，只有通过调整“互联网”的运作方式，才加快让这一被迫天下大同的进程。

互联网公司都认同这种天下大同的观点吗？ Google的埃里克·施密特相信，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后世界主义的世界了。他在Google了解到的一点关键就是，“哪里的人都一样。”所以，施密特接着说，“意识到其他民族、其他种族、其他文化、操持不同语言的人，大致上都关心着跟你一样的事，这就是经营世界最简单的办法了。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可以加以证明。”尽管他们能够证明，但别费功夫去打听，这种全球同质化到底是Google的功劳呢（施密特认为是自然的原因），还是说，另有其他表达文化多元性的途径，只是很难为Google搜索所把握。不过，既然我们都一样（世界都是平的，我

们又怎能不一样呢？），那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形式的世界主义干预。看起来，朱克曼的论点，不见得能打动埃里克·施密特。

不过，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可能会对这类建议更开放。扎克伯格曾发表过一次很不寻常的公开声明，说中东地区的敌意“不是来自任何人的深刻仇恨，”而是来自“缺乏联系和沟通，缺乏同情和理解。”扎克伯格相信，只要我们彼此连接，只要Facebook随处可上、人人都有账户，所有的误解就能消失，所有的战争就会停止。Facebook的新闻稿全是这种伪人道主义：“让来自多元背景的人便于联系、分享观点，我们能够减少长期和短期的世界冲突。”按照这套逻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终会在Facebook上达成和平协议——公司也并不反对向两者发起“虚拟和平”的倡议。

朱克曼和扎克伯格尽管在方法上存在明显分歧，但两人都相信，更好的技术能够，也应当根除人类的误解，消除来自人际沟通的重大缺陷。这种观点并不新，而是有着长久的历史。媒体历史学家约翰·达勒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论述沟通史的《交流的无奈》（*Speaking into Air*）一书中，提出了最有说服力的批评。彼得斯和其他许多历史学家早就指出，人们几乎对每一项新发明都给予过极大的期待，希望它们促进人与人的相互谅解。举几个例子好了：1852年，散文家迈克尔·安吉罗·加维（Michael Angelo Garvey）预测，有了公路运输，国家之间的分裂很快会消失，所有人都会说同一种语言。1889年，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认为，电报“几乎在同一时刻就结合在一起……来自整个智力世界的、对任何事情的意见，立刻就能传达到全球。”1865年，国际电报联盟成立之时，法国外长提出了一个十分扎克伯格的主题：“如果说，战争……真的源自误解，那么，促进人与人之间思想的交流，把这套惊人的传输系统交给他们……让人类大家庭的散落成员们迅速而不中断地进行对话，我们不就能消除战争的一项成因了吗？”

伴随着新技术的涌现，20世纪这样的宣告更多。1913年，一封写给《科学美国人》编辑的信里说，马可尼的发现可以无需任何技术设备，就让“相距遥远的人类之间的……沟通……随心所欲，随时可及。”不到10年，《科利尔杂志》(*Collier*)上又有一篇文章赞美无线电是“巨大的文明推进器，”能够“向各处传播文化”，带来“全国各地区的相互理解，团结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目的，让我们成为强大而严谨的人。”而且，既然它能够在一个国家之内做到这一点，它恐怕也能在世界范围内这么做。1915年，杰克·伦敦在论及“图像的时代”时，宣称“神奇的胶片彻底消灭了时间和距离，把世界各地的人带到一起来。”

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计其数(热烈地赞美电视机、核能和传真机无尽的世界主义潜力)，延续至今。所以，看到“互联网”有望把我们团结成世界村而大感兴奋，这很容易理解。但我们这里的辩论，不应该在可行性上就吵个筋疲力尽；我们还应当讨论一下可取性。

彼得斯指出，以为更好、更快速、更廉价的通信能解决沟通的问题，可能是个错误，因为误解或许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个永恒特点，而何以如此，原因也很充分。“发送明确的信息，”彼得斯写道，“可能不会创造更好的关系；我们越是彼此理解，说不定越不喜欢对方……‘沟通’把自己打扮成解决人类固有烦恼——语言，限制条件，多元化——的简便办法。”但这些都是错觉；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快速补丁，因为它们的根源不在于传输系统出现了故障，而在于人们有着多种多样的目标、价值观和利益。有时候，光是对话，不能在这些东西之间建立桥梁；还需要采取一定的政治行动。说回本章开头所附的彼得斯的警句，解决方案主义者认为更好的通信就能解决沟通的问题；而反解决方案主义者则意识到，我们所以为的“沟通的问题”，恐怕从来就不是问题。

当然，现代技术可以方便陌生人之间跨越大陆进行会面。自我跟踪加上搜索引擎及社会网站里内嵌的微妙（或者不那么微妙）推搡，足以完成这份任务——哪怕以为流行网站会傻到这等地步：明知贾斯汀·比伯的照片能带来更大的流量，更多的现金，却反其道而行之，插入有关南非艾滋病形势的深奥文章。但即便我们抛开金钱上的考量，也看不出Google和Facebook这样的网站干嘛该决定要向用户曝光哪一类的主题。为什么要向你介绍非洲和印度的陌生人，而不是拉美或中国的陌生人呢？为什么该推动你去了解更多有关南苏丹的信息，而不是南奥塞梯的信息呢？为什么要向你发送一个有关哥斯达黎加的网站，而不是有关布拉瓦约的网站呢？更广泛地说，为什么一定要从国家和地域上做选择呢？谁说马达加斯加的政治局势，就一定比克隆的伦理问题更重要？或者，匈牙利政府的未来，就比体育界愈发依赖类固醇更重要？

朱克曼认为，科技公司能够（借用沃尔特·李普曼的名句）带着公民“展开一趟世界问题观光之旅，”但他从没说清楚确切的行程该怎么安排决定。不过，这里又扯出李普曼，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本质上，朱克曼希望数字平台（退居到了此前的基础设施的角色上）不仅仅用推特的方式塑造公众，更要吸引人们关注平台认为重要的主题，主动地创造公众。

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推搡尝试（不光指国际新闻语境），意味着劝说和审议在激发改革与行动方面走向了失败。一方面，人可能会顺着李普曼的思路认为，不应该干涉公民做这做那，除非公民自己发现了关心的事务，反过来说，这种方法也并不否认记者、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支持各项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一群公民每天用30分钟跟进遥远非洲发生的危机（哪怕读了《纽约时报》的社论之后，就把注意力突然切换到了东南亚），这没什么错。我们确然希望公民了解自己的局限性，也了解集体行动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能自己思考，经过一番思量过后，明智地分配自己的关注度。

能创造公众的问题，背后一定有合理的原因，而不是从上面发出了无形的最后通牒（并使用算法进行编码）。就算报纸有诸多不足，但全国性大报的社论版，确实令得各方利益代表阐明自己的原因，努力为自己的事业招募支持者；我们公共领域的底层结构意识到，特定的议题可能有多重阐释方法，每一种阐释背后对应着不同的公众。为什么要把我们现在的系统报废掉呢（尽管它并不完美），换上朱克曼的系统，让Google和Facebook单方面决定哪些问题重要，以及该采取何种运动方式呢？我看到的唯一解释，跟互联网中心主义和解决方案主义有关系："互联网"意味着我们生活在独特的时代，我们掌握了工具能做成上面所有的事，如果有问题能够解决，那就必须解决。

我们真的想要换用一种通过推搡和其他数字把戏（Google和Facebook可以用我们根本注意不到的方式耍这些把戏）劫持公民关注度的系统吗？当然，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麦迪逊大道和企业美国基本上就是这么运作的；在一些观察家眼里，大部分风头最健的成功非政府组织也是这么运作的。也许如此。但我们总犯不着以为营销和背景操纵这一套手法的胜利是件好事。我们希望公民关心叙利亚战争，是因为他们对中东和平、人类未来命运或者其他类似的事业看得很重，而不是因为Google和Facebook暗中摆布他们去投入这样的事业。

当然，如果公民们欣然地找到互联网公司，要求后者在算法里加入一些"意外发现"和全球关怀，自己也欣然地使用这些服务，因为他们就是想要"意外发现"和全球关怀，那么，给这类干预之举找些正当理由就说得过去了。按李普曼的说法，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但如果公民关心波斯尼亚、卢旺达或者叙利亚，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人道主义干预是重要的，他们也不是故意要寻找有关这些地方的新闻，而是因为一些推搡和算法的组合令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给予关注，那么，这看起来就像是心照不宣地承认：在我们的

政治生活里，审议和道德不再值得尊重，如今，一切都可以归结成一场斯金纳式的实验，用组合刺激（而不是论证）促成想要的行为。

不游戏，毋宁死

为了理解怎样借助推搡和刺激工具箱改变人们的政治参与现状，让我们来看看Google公司旗舰新闻聚合器“Google新闻”（Google News）最近推出的一项功能。从2011年7月中旬开始，“Google新闻”开始根据用户阅读了多少篇与特定主题相关的文章，授予专注度勋章。如此一来，如果你喜欢篮球或哈利·波特，你两样都能赚到勋章——每一类别下都有多种类型的勋章。你可以一路从铜勋章升到银勋章再升金勋章、白金勋章，最后，获得终极篮球勋章——一切取决于你跟进篮球新闻的积极度。

按默认设置，勋章是私人可见，但用户可以选择公开。Google在推出这一新闻系统的同时，还发布了一篇博客文章。文章说，你可以告诉朋友“你的新闻兴趣，展示你的专业知识，发起对话，或者单纯地炫耀你有多么热爱阅读。”按照Google的逻辑，推出这一功能，把新闻阅读变成一场游戏，能让阅读新闻更有趣，甚至能引诱人阅读更多的新闻消息，最终，让公司获得更多有关用户的数据。

Google承认，“这只是Google新闻勋章迈出的第一步——如果你愿意，叫它‘青铜新闻’也行。等我们看到用户会怎样使用、分享勋章，我们会将这一功能提升到新的水平。”新的水平会是什么样子？好吧，我们可以想象，新闻勋章系统能用来促进朱克曼青睐的各种目标：如果你阅读了更多有关非洲（主流媒体一贯忽视的地区）的新闻，会比阅读有关华盛顿的新闻获得更多的点数。一旦虚拟点数和奖励捆绑上切实的好处（比如在Google服务器上得

到更多的免费空间），那就能变成强大的动力。

Google投入勋章的怀抱，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从属于一种更广泛趋势。智能手机的普及，再加上智能手机能够记录GPS坐标，轻松地他人分享，还有社会网络的流行（能让解决方案主义者搭建起朋友社交层，覆盖到人几乎所有的活动上面），带给社会工程师一个令人兴奋的选项：把重要的问题变成游戏来解决掉。多亏了智能手机，游戏可以跟实体环境绑定到一起；得益于社会网络，这些游戏可以和朋友们一起玩。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俄罗斯方块”。

这种往多种社会实践里引入所谓游戏机制（使用勋章、积分、登记、奖励和虚拟货币等）的趋势，叫做“游戏化”。《家务争霸》（ChoreWars）这款游戏（如果玩家跟家人或朋友住在一起，那么，完成现实世界里的家务劳动，就能在游戏里积累点数、发现财宝）就是该逻辑付诸实践的很好例子。另一个例子是，“Recyclebank”公司利用积分和奖励，推搡消费者采用更环保的行动。一旦你为自己的绿色行动积累了足够的积分，Recyclebank就让你把它们转换成折扣、优惠和礼品券。一开始，它送给玩家的礼物是什么？好乐门蛋黄酱折扣券。显然，这家公司是要利用游戏奖励，让你变得更环保，吃更多的蛋黄酱。真是太有意义了：之后会有其他人加入，把你的就餐体验游戏化，并因为你没吃蛋黄酱而给你分数奖励。

听起来虽然很够呛，但营销人员却热情地接受了游戏化趋势——最近有调查显示，虽然2/3的营销从业者不明白“游戏化”是什么意思，但78%的人相信，顾客会更容易响应游戏奖励。高德纳调研公司（Gartner）进行的一项调查呼应了这些发现，并预测，到2015年，50%管理创新流程的组织，都会将之游戏化，顾客和员工提出建议，会加以游戏奖励。一些信徒认为，游戏化甚至可以解决诸如全球变暖等问题：2011年，在西南偏南大会上，游戏化创业公司SCVNG的赛斯·普瑞巴什（Seth Priebatsch）是这么预测的。

游戏化和游戏之间有什么联系呢？一些批评游戏化的观点认为，最优秀的视频游戏，不是因为奖励机制而叫人玩得罢不了受的。游戏理论家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说，虚拟积分不会产生“兴趣、启迪、恐怖、魅力、愿望，或其他任何感觉”的体验，相反，这些体验来自游戏的内容，以及游戏设计师采用的各种叙事策略。换句话说，痛恨游戏化的人，不见得痛恨游戏；严格地说，这个过程并不是把一切都变成游戏，而是把一切都变成我们时常与游戏关联起来的有限因素（而且还经常是些不重要的因素）。加拿大媒介理论家艾伦·乔尼（Alan Chorney）道出了两者之间一种非常有益的区别：“游戏机制的使用，不一定能让产品变成视频游戏。为了说明这种区别，我们不妨用电影来比喻。导演可以使用不同的镜头、剪切和特效来影响观众，但最终的结果不见得总能创造出一部电影来。事实上，它可能是一段广告。电影的身份和其内容直接挂钩，而不是和电影的机制挂钩。”

不足为奇，游戏化已经成了解决方案专家们工具箱里的心爱伎俩。凡事都能够游戏化，不意味着凡事都应该游戏化。《连线》杂志报道了游戏理论家杰西·谢尔（Jesse Schell）的一次会议讲演。当时，他正尝试说明游戏化的局限性，他说，“在那个世界里，人的每一个动作，刷牙、按时上班、在胳膊上纹了一个蛋挞广告，都能赚到积分。”唉，谢尔本来是要鼓励对从业者们对游戏化展开更多批判性思考，结果却事与愿违。谢尔告诉《连线》，“已经有好几十号人来找我说，‘你的讲演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开了一家公司……’我只能想，唉，上帝啊，别为这怪我。”

这一切看起来非常吸引人，尤其是对生厌而疲惫的公民。Zynga公司为我们带来了《开心农场》（FarmVille）和《好友填字》（Words with Friends）这两款拯救世界的Facebook大热门游戏，按CEO马克·平卡斯（Mark Pincus）的说法，“游戏应该为善。我们希望一边完成日常工作，一边帮助世界。”游

戏化也跟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兼艺人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描述的善人心态有异曲同工之妙。齐泽克在好些慈善项目上认出了这种心态，这些项目鼓励公民在星巴克买一杯更贵的咖啡，支持非洲抗击饥荒。说到底，如果我们如常地做着平时的工作，能以“星冰乐”[8]为动力继续进行深刻的灵魂反思，为什么不帮忙拯救世界呢？至于说Zynga，它向游戏化的进军似乎相当具有预言性质。比如说，它和7-11便利店达成了一项协议，通过一些天才的营销，顾客用真金白银购买饮料思乐冰（Slurpee），换取《开心农场》里的点数。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讽刺味儿：为了赚取游戏所需的虚拟点数，你要买一杯真正的思乐冰饮料，而且，你在游戏里扮演的还是个农民！一位游戏化爱好者解释了两者之间的绑定，“全都是赚钱，没有花钱！”诚然。购买思乐冰帮忙拯救世界——谁曾想到过这个好点子呢？

当然，游戏化爱好者会反驳说，“Wii Sports”这类的游戏能让我们锻炼身体，并希望我们通过玩电脑游戏来减肥；在游戏化语境里，这些事情是常被人提及的。这些游戏当然很有趣，只可惜，最近的几项研究证实，预期中的减肥效果并非现实，而是神话。《儿科学》（*Pediatrics*）上发表的一份研究发现，玩“Wii Sports”的孩子坚信自己在减肥，结果减少了真正的体育锻炼，反倒增了肥。

有时候，很难截然区分量化自我运动的追随者和游戏化的拥护者。两项活动都由同一群人赞助资金，这拨人充当着不同社群的桥梁，自我跟踪人士提供量化掩护，可若不加上游戏化，意义就少了许多（毕竟，人需要清点所有的虚拟积分呀）。例如，可敬的创投公司梅菲尔德基金的执行董事蒂姆·张（Tim Chang），支持了多项自我跟踪的早期实验，如今也开始探索游戏化，

8 星巴克售卖的一种咖啡。

并以保健领域为侧重点。

张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修复我们烂得可怕的医疗系统的唯一途径，就是让消费者思考健康，而非医保。如果采用游戏化形式，（健康）会更吸引人，更容易行动……衡量每天的行动和决策，向用户提供即时反馈和数据，围绕这一数据增加互动性、如游戏般的机制，让用户能够‘玩’上健康。”这一番话，说得就好像制药行业造就的两大问题（对新疾病的过度诊断，以及不断发明、营销与实际症状无关的新病）从来没困扰过美国医疗保健系统似的。

发给用户虚拟积分，让他们对自己进行更多的检查，获得更多的诊断，这么做的问题有可能出在哪儿呢？接下来是，奖励患者尝试新药，又有什么问题呢？也难怪风险投资家喜欢游戏化了：它是那种加剧现有医疗保健问题，但同时却能带来极丰厚利润的解决方案哪。至少，张对事实并未隐瞒：游戏化类似催眠，它让我们绕过常规的审议和政策渠道，获得“正确的”结果。他在同一次采访中说，“你差不多是要‘哄着’大众保持健康，游戏化是个很棒的方法。”

要是政治家们纷纷跳上游戏化的大马车，就像他们几年前踊跃跳上“推搡”的大马车那样，你可别惊讶：既然其他所有政治手段都试过了，游戏化总算是带来了便利甚至愉快修复的前景（且不论它的道德问题）。而且，游戏化的支持者把公民改头换面，说成了消费者和玩家，希望一切事情都有趣味，以奖励计划为基础，所以，政治家们甚至根本没有选择。看看游戏化创业家盖比·兹柯曼（Gabe Zichermann）是怎么描绘未来的：“在游戏化的未来里，我认为许多公司，包括政府，都无法避免成为这股趋势的一环……我想，消费者会愈发期待、要求该体验变得更生动有趣。我们没办法往后退。人们的期待已经重设了。游戏化会是新的常态。”游戏化的议程似乎根本没想过，政府不是公司，公民也不是消费者。人们的期待也许重设了的，但在政治上，

人们有的可不光是期待——他们还有责任和义务，而责任和义务，有时是高于一切乐趣的。

“未成品”斯金纳

Google推出勋章的决定引来网上不少批评，回想起来，不难看出原因出在什么地方。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互联网及美国生活项目做了一项调查，发现69%的受访者跟进新闻，都是因为感觉“公民有知情的义务。”既然人们认为阅读新闻是认为自己的公民义务，为什么要给予奖励呢？通过在线游戏，要公民到投票站去“签到”，投票后可获积分——听到这样的点子，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会感到迟疑。这样的安排有助于提高投票率吗？当然能，但我们认为，游戏奖励应用到公民义务领域，似乎太贬低公民这个词的意义了。这样的安排发送出误导的政治信息，认为公民每当要做什么不好玩的事情，就会感到失望。政治学家约翰·希宾（John Hibbing）和伊丽莎白·蒂萨莫尔斯（Elizabeth Theiss-Morse）认为，“提高公民生活意义的路线，不是软磨硬泡地对人们说，政治有趣又轻松，所以不妨参与；相反，它是要求人们参与，因为政治枯燥又棘手。”

鼓励公民提升参与意识，不仅仅是让人们做正确的事，更是要求人们出于正确的理由去做正确的事。好吧，理查德·塞勒（就是那个提出“推搡”话题的理查德）不这么看，他在2012年《纽约时报》的社论里说，“如果政府希望鼓励良好的公民意识，应该尽量让可取的行为变得更有趣。”（在这个意义上，主张“推搡”的人跟支持游戏化的人很类似；游戏创业家盖比·兹柯曼同样言之凿凿地说，“什么事情都可以有趣……我们可以让政府有趣。”）解决方案主义的老前辈塞勒指出：“政府通常使用两种工具来鼓励公民投身纳税、

安全驾驶、回收垃圾等公民行为：劝诫和罚款。”各种提高趣味的花招，比如Google新闻勋章，或者参与回收计划赚取常客飞行里程，能带来第三种刺激。

各种提高趣味的花招，比如Google新闻勋章，或者参与回收计划赚取常客飞行里程，能带来第三种刺激。可惜，塞勒说不明白他所谓的“公民行为”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把这个词跟“劝诫”（也呼吁各方投身共同利益）扯到一起，表明他是按传统意义来使用这个词的，也就是“履行与城镇、城市或地区有关的义务，或参与相关活动。”但如果公民从事“可取的行为”，是因为该行为有意思，那么他们的行为就跟义务毫无关系了。这样一来，这里的“公民”就只能是另一个意思：“投身城市或城镇，尤其是其管理工作；市政。”把依靠劝诫的计划，与依靠乐趣和游戏奖励的计划混为一谈，忽视了如下事实：由于这两种计划是以不同的动机为基础的，最终也恐怕会带给我们两种截然不同的公民。

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一类的人通常把所有的人类动机分成两大类：外在动机（也即你做某事是因为有人给你钱、勋章或者常飞里程）和内在动机（也即你做某事是因为你真的想这么做，也可能是因为你觉得这是正确的事情应该做）。前者理所当然地让我们想起B · F · 斯金纳（B. F. Skinner）或弗雷德里克 · 泰勒（Frederic Taylor）摆弄实验室老鼠和工人（给这些动物或人展示食物、许诺奖金），诱使老鼠在踏步机、工人在厂房里发挥最大绩效的画面。做这个，就有那个；输入A，输出B。

如果你认为人类像老鼠，或者如果你是个思想狭隘的经济学家，认为所有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机器人，那么，你或许想把外在动机应用到所有地方。（如果有人信奉供需法则，付钱，也就是现金、或者象征性的货币，大多数时候都管用。）同样，强迫人们掏钱（以罚款的形式），也提供了有力的外在动机。让我们来最近的一些社会实验：付钱给学校的孩子，让他们考试考

出好成绩；付钱给贫困的母亲，让他们送孩子上学校，或是接种疫苗；在旧金山，司机要是不违反交通规则，就能抽签赢取奖金。

问题是，经济规律不见得总适合解释人类复杂的行为。因此，一旦用外在动机换下了内在动机，人类就会做出奇怪的回应。数十年来的著名社会学研究证实了这一点。用现金奖励公民献血的话，献血的人反而少了。如果要在公民隔壁修建核废料储存设施，并给予现金补偿的话，他们往往更不赞成这个项目；但如果呼吁他们发扬公民责任感，赞成的人反倒更多。如果住在养老院的老人被迫把人际关系换成市场关系（比如用代金券让人来替自己整理床铺），那么，很快，不先索取报酬的话，他们就不愿帮室友做事情了。如果家长到托儿所接孩子迟到会挨罚款，日后迟到的家长反而越来越多；显然，托儿所员工恼火的表情，外加他们认为自己没义务晚下班的信念，比罚款管用。

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家长来接孩子晚了，是因为罚款还不够高；公民突然不愿意有核废料囤积站出现在附近，理应获得更高的赔偿金。因此，按照这种逻辑，只要有合适的胡萝卜加大棒，或者代币加勋章组合，就一定能出现可取的行为。但有一点，在寻找最有效激励措施的时候可别忘了：以前是完全不需要这些外在动机的。

这里出现了一套很能“自圆其说”的预言：如果政策制定者相信个人利益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他们会据此设计社会和法律制度。他们甚至有可能征募可取的行为，由此获得急需的肯定：世界真的就像他们想的那样运作。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说过，“西方社会热情地投入了‘自利就是人类行为的动机’这一观点，造就了助长自利的社会结构。”但它不见得反映了任何深刻、永恒的人性真相；它只反映了功利主义和斯金纳式思维在过去100多年来变得多么普及。施瓦茨指出，“在后斯金纳时代里，家长、教

师、牧师、医生和执法人员都习惯性地操纵奖励。人在这样的世界里长大，肯定相信，靠这类奖励控制人类行为是普遍的、必然的。”“这样的看法，说对了它的普遍性，但弄错了它的必然性。”

施瓦茨收集了一整套例子说明自利的邪教怎样导致了心理学家所谓的“过当效应”（overjustification effect），也就是说，对本来无需外在奖励的任务引入了奖励，改变了人追求这一任务的方式和原因。施瓦茨援引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用非常规方式促使参与者想到金钱；比方说，让参与者看到屏幕保护程序是各种面额的纸币漂浮在水中。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诱使参与者减少帮助他人的意愿，宁肯独立工作，而不愿团队合作。

另一项研究测试参与者会怎样分配团队合作工作所得的报酬。事实证明，如果把有着明确货币价值、但本身不是交换载体的商品（比如糖果）支付给参与者，参与者会采用平均分配，人人都得到相同的份额。可要是用金钱补偿参与者，他们会根据每个人承担了多少工作份额，等比例地进行分配。施瓦茨指出，“人类是‘未成品’；我们有理由认为，人要靠社会制度来最终‘完工’。”如果我们采用外在激励，一些类似的计划或许能发挥作用，但我们不能光因为它们有效果，就忽视了它们的代价。要让人做正确的事，激励并非唯一方式。

政治理论家露丝·格兰特（Ruth Grant）在新书《附带条件》（*Strings Attached*）里对当代社会朝外在激励转向提出了最尖锐的批评。格兰特回应了施瓦茨的一些结论，认为激励往往会让人过分狭隘地阐释自己的责任；在对各种胡萝卜和大棒做出响应的过程中，公民失去了对共同事业的崇高目标和价值观。格兰特认为，激励存在三方面的问题。首先，看似聪明的奖励计划，往往事与愿违，产生与预期相反的效果。第二，激励措施（尤其是货币类）往往排挤了人不那么唯利是图的动机，对人的性格产生了不利影响。最后，激

励机制会自我强化，如果人们习惯了因为好好开车、分类垃圾获得报酬，一旦奖励消失，就有可能放弃先前的做法。因此，格兰特写道，“奖励是一种存在先天局限性的工具……一旦取消，作用就结束了。奖励治病不除根；它们只是表面修复。因为它们不能解决成因，如果不采取其他手段，那就永远都需要它们辅助。”

为理解奖励的限制，我们需要放弃干巴巴的经济学术语，以及它简化的经济人假设，建立更复杂的人类行为观。格兰特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奖励不一定比强迫更可取；奖励有时会用来代替劝说过程，而这种代替，是民主社会要付出的真正代价；奖励是自愿交易，但这一点并不能平复它们带来的道德问题。”奖励机制和技术系统类似的地方就在这里：一旦扎下根来，就很难重做思考，取消它们；它们不容易融入杜威的探究过程，而且，由于太过有效，哪怕面临排山倒海的批评，也能轻易延续下来。

猴子、性和可预见的威胁

可惜啊，游戏化的顶尖倡导者们，只在功利主义的版图里上下求索，对将游戏奖励构建到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有可能为公民产生怎样的影响，从来不曾考虑。也许，他们认为，为了让人遵守交通规则、分类垃圾，给予游戏积分和奖励，跟直接给钞票是不同的。但真有多大的区别吗？或许真的没有现金转手，但很明显，人做事的动机改变了：此前，你遵守交通规则，是因为你在乎自己的安全，也在乎其他司机的安全；你分类垃圾，是因为你关心环境，而现在你这么做，却是因为好玩。大多数针对奖励计划的批评都站得住脚：一旦取消了游戏奖励，你不容易回到原来的习惯上。同样，奖励计划对人的性格有腐蚀性影响这一点同样说得通：有时候，我们希望公民出于正确的理由做正确的

事，而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比玩《愤怒的小鸟》游戏还有趣。

稍微读一下游戏化方面的作品，既具有启发意义，也不免叫人沮丧，因为它表现了游戏化热心人士为推广自己计划所采用的修辞技巧，同时暴露了他们思维方式上的固有局限性。以游戏设计师盖比·兹柯曼和克里斯托弗·坎宁安（Christopher Cunningham）所著的《游戏化设计》（Gamification by Design[斜体]）为例。这本书（游戏化的入门读本）对自己斯金纳式的哲学观毫不遮掩，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封面上画着五只顽皮的猴子，大概正走在游戏化的道路上。

和大多数游戏化论述一样，这本书也从一开始就模糊了游戏和玩耍之间的区别，认为两者都是自然的，必然的。“玩耍和游戏扎根在我们的文化记录里，它跟文化同时诞生，也随时交织在一起。我们现在逐渐明白，我们天生就具备玩耍的机制，研究人员发现，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和游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两位作者称。或许如此，但把游戏当成玩耍，和把游戏当成奖励，两者难道不存在巨大的差异吗？难道我们真的想相信，用环保行为换取飞行常客里程，跟下象棋是一回事？

此外，某样东西是天然的或者有利的，并不会自动成为在各种情况下使用它的理由。法律同样自古就有，同样扎根在我们的文化记录里，但没人会呼吁说，不给奶奶打电话就该送进监狱去。原因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依赖法律，十足荒谬。技术同样很古老，也肯定影响着我们的大脑，但没理由把数字预防手段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虽说情境犯罪预防理论家可能并不这么想。我们很多人喜欢踢足球，打起比赛来经常忘我，但这个事实，并不自动授权社会工程师把游戏奖励植入一切。

《游戏化设计》具备了极客式思考所有常见的误区。兹柯曼和坎宁安甚至懒得掩饰自己著作的斯金纳式基调。“游戏，”他们写道，“是性冲动与可预见

胁迫的合体，只不过，这里没有外力威胁，而且，一旦合体成功，就完全受享乐驱使了。”可预见的胁迫就像性一样享受，而且还不包括高压强制：劝诫怎么比得过这个？应该把B · F · 斯金纳看成网络的守护神才对（麦克卢汉靠边站吧）。

兹柯曼和坎宁安最感兴趣的是游戏化的商业应用（让人们点击东西），所以他们对游戏化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未作太多讨论（当然，只有一句简短的话：“有趣是新的‘负责’；理查德 · 塞勒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得换一本书来看，也就是游戏化运动的真正圣经，简 · 麦戈尼格尔（Jane McGonigal）的《游戏改变世界》（*Reality Is Broken*）。简 · 麦戈尼格尔是硅谷的大师，流行游戏设计师，还是“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Future，这是帕洛阿尔托第一家生产动听未来主义说辞的机构）的研究员。

麦戈尼格尔已经成了鼓吹应用游戏化逻辑解决世界重大问题的头号拉拉队长；如果解决方案主义有一位亲善大使，非她莫属。她认为，游戏可以“帮助普通人实现全世界最紧迫的目标：治愈癌症，阻止气候变化，传播和平，消除贫困。”给联合国外交官配备上Wii游戏机，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作家兼游戏审美家史蒂芬 · 普尔（Steven Poole）评论《游戏改变世界》时说，“如果有一种新的时尚草药或者治疗技术声称自己有望治愈一切，从害羞到秃头到癌症，你一定知道：这是狗屎。”

麦戈尼格尔同样有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可讲：几年前，她偶然在橱柜门上撞到了头，患上了脑震荡，令得她度过了漫长而又孤独的一个月。但多亏她设计了一个聪明的游戏，她设法让亲人定期给她打电话，跟进她的病况。进步的味道闻起来可真香甜啊。在游戏化降临之前，谁想到过要打电话问候生病的妹妹、孩子或伴侣呢？没有勋章没有反馈循环，我们是怎么设法做到这一切的？还有，勋章上到底得怎么说才合适呢——“50点敬畏：我今天给生

病的孩子打了电话”？

麦戈尼格尔支持游戏化的主张，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现实世界不如虚拟世界，正是因为它缺乏游戏机制。她对现实的感叹洋洋洒洒写了数百页，但这里只选极具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好了：“现实世界未能不能轻松地提供精心设计的愉悦……现实没办法同样高效地激励我们。现实的设计，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发挥我们的潜力。现实不可能从头到尾都让我们兴高采烈。”反过来说，游戏则具有现实不具备的一切：“电脑和视频游戏满足了现实世界当前无法满足的真正人类需求。游戏提供现实里没有的奖励。游戏用不同于现实的方式教育我们、鼓励我们、打动我们。游戏用不同于现实的方式将我们团结到一起。”因此，麦戈尼格尔能从这一套里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现实应当更像游戏：“如果我们决定运用从游戏设计中了解到的一切，来弥补现实里的不足，那会怎么样？如果我们像玩家一样来过现实生活，像游戏设计师那样引领我们的企业和社群，像电脑和视频游戏理论家那样思考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那会怎么样？”很好，把“游戏设计师和理论家”换成“B·F·斯金纳”，所有这些“会怎么样”的答案恐怕就非常不一样了。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麦格尼格尔的项目，还有她“未来25年看到游戏开发人员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个人愿景”呢？她似乎完全搞不明白人类的体验（这大概要怪帕洛阿尔托的邮政编码吧），叫人简直忍不住想把这本书解读为对整个游戏化产业，以及西方消费至上主义洋洋自得的尖刻反讽。人究竟如何评价这样的宣言呢：“和游戏相比，现实太容易了。游戏用自愿承担的障碍向我们发起挑战，帮助我们更好地发挥个人优势”？

对未来研究所的研究员而言，现实或许太容易了，但人只要离开帕洛阿尔托的大学大道，开车往东帕洛阿尔托或者奥克兰走上几英里，一幅全然不同于“太容易”的现实就会展现出来。俄罗斯方块和高尔夫通过内置的障碍

让游戏更有趣，但抱怨现实缺乏这样的挑战，未免太过荒谬。歧视性法律，结构性收入不平等，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态度，我们的生活满是障碍——哪怕在硅谷看不见。而且，有些现实障碍也是人自愿承担的：要是我们能随心所欲地偷窃和杀人，生活的游戏就真的太容易了。

对麦戈尼格尔这本书读得越多，你就越发难以打消这个印象：这位作者，这辈子就没工作过一天。她就是对米特·罗姆尼[9]（Mitt Romney）的蹩脚戏仿一样。“与游戏相比，现实生产力低下。游戏给了我们明确的任务，以及更令人满意的趁手工作。满意的工作总是从两件事情开始：明确的目标，以及通往实现这一目标的可操作下一步。明确的目标，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我们知道该做些什么。可操作的下一步，确保我们能够立即朝着目标取得进展。”对弗雷德里克·泰勒来说，这看起来像是“满意的工作”，可对工人来说恰好相反，他们可不仅仅是工厂流水线上的齿轮。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可操作的下一步，有什么糟糕的呢？工人就不该获得些自主权，自己确定前进的道路，甚或质疑当前道路是否合适吗？

麦戈尼格尔的整体方法，慢慢变得清晰起来：从一些对现实的浅薄且欠完善的定义着手，剥夺人类互动的复杂性，把游戏化打扮成终极救世主，闭口不谈游戏其实并非完成工作的中立工具，而是通过操纵玩家的动机和态度、进而改造社会及政治社群的奖励机制。和大多数极客一样，麦戈尼格尔沦入了宏观主义的陷阱；她忽视地方社群，而更愿意从星球、星系和纵横数百年的角度去思考。“对今天和本世纪剩下的年头，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她在书中总结说，“就是将游戏更紧密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把游戏当作携手解决整个地球最重要任务的平台。”她丝毫也不曾想过：这种对星际幸福的追求，很有可能造就一群不提供现金奖励、游戏勋章就懒得动一动手指的公民。

9 美国共和党政客，曾作为共和党候选人与奥巴马竞选过总统。

蛋白质折叠——别在家干

游戏也有很大的空间施展人道主义关怀。PS游戏机上的Folding@Home（麦戈尼格尔做过讨论）允许玩家登入并接受研究任务，分析特定蛋白质如何折叠与误折（稍后展开这一点），贡献游戏机的运算能力以完成任务。蛋白质有一种最终的结构（也就是生物化学家所谓的“原生状态”），但科学家们尚未完全理解蛋白质通过怎样的机制来达到这一状态，以及蛋白质与其他分子的互动会对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如果能理解这一点，有助于进一步揭示阿尔茨海默氏症、亨廷顿氏病和各种癌症的成因。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找到了一种方法，让玩家捐出自家游戏机的多余运算时间，帮助分析蛋白质折叠——诸如“PS3玩家尝试拯救世界”这样的媒体头条，就是这么来的。

或者来看看一款名为《免费稻米》（*FreeRice*）的简单游戏：玩家一边学习花哨的英语单词，一边接受在线广告的曝光，帮忙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筹集资金购买稻米。不过，用这样的游戏来论证其他游戏化干预的正当性，实在太过虚伪（麦戈尼格尔从来没在自己的书里提过“游戏化”这个丑陋的字眼，就足以说明问题了）。Folding@Home并未实际取代任何东西；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来使用计算机运算能力处理蛋白质折叠罢了。它也确实衍生了一款名为《折叠》（*FoldIt*）的游戏，玩家在游戏里要解谜（类似高级版的俄罗斯方块），这些谜题或可帮助科学家预测蛋白质的折叠形态。这很了不起——但它跟前文讨论的那种“游戏化”毫无共同之处，因为这款游戏创造的是全新的行为，而不是提供新的动机动员人参与。如果这需要一群极客纯手工地用笔来完成运算，《折叠》这款游戏大概算提出了一道难题；但即便如此，考虑到更快找出科学新发现有助于挽救生命，把这项任务外包给电脑看起来也算合适。

同样，《免费稻米》所做的，似乎早有其他许多网站在做了（也就是帮你学外语），只不过，网站的创办人承诺说，要把从广告上赚到的钱，捐献给一项慈善事业。即便如此，挤出效应仍然可能会出现，比方说，一部分学习语言的人因为觉得自己已经通过在线广告给了钱，就不再向慈善事业捐赠。不过，这兴许算是一项值得一试的风险，因为使用《免费稻米》的大多数用户并不是为了慈善而使用该网站的，而是为了学习外语。简单地说，人们玩《免费稻米》游戏，不是因为想玩游戏；该网站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游戏机制。从学习语言的途径来看，《免费稻米》说不定算是道德正确的选择，因为从理论上说，它不光能做其他网站所做的一切，还能做更多。

但大多数游戏化项目并不像Folding@Home和《免费稻米》，所以，游戏化大师援引这些项目来证明自己的公民意识很强，未免过分虚伪。游戏化的设计者们不是创先新颖的做事方式，或是为原有的做事方式增加一层人性化层面。相反，他们是要结合使用反馈循环、勋章和奖励，用愉悦取代责任，让你做去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你因为想要帮助科学折叠蛋白，和因为想要赚取积分而折叠蛋白，两者之间的差异极为重要；游戏拯救世界的理论模糊了这一区别。

游戏化的热心推广人士很少强调这两种同时存在的情况，但游戏机制侵入我们的生活并大规模扩散，正好反映了市场逻辑蔓延进了我们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内部。用游戏让人们服用药物、戒烟或上学，和付钱给人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没有太大不同：这两种情况都优先考虑了效率，而忽视了影响。拿了钱才肯读书的的孩子，对阅读的看法，肯定跟因为喜欢才读书的孩子有所不同，这么想没什么不合理的吧？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金钱买不到的东西》（*What Money Can't Buy*）一书中指出，“当市场机制开始变成市场常态，”我们对商品（教育或者

健康）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而这种改变，不见得是好的改变。

游戏化没有什么不同；依靠游戏机制（而不是依靠唤起更高的价值观）招募公民帮助科学的项目，最终会改变公民与科学的关系。因此，游戏机制承载的规范性影响，远远比相关支持者们公开承认的要深远；如果游戏机制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被游戏化的东西，我们最好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真心想要这样的改变——别管它多么实用，多么有效。桑德尔描写的市场和游戏是一样的："要判断市场属于什么领域，应该跟什么领域保持距离，我们必须判断如何评价所议事物——健康、教育、家庭生活、自然、艺术、公民责任等等。这些都是道德和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展开一例一例地辩论这些事物的道德意义，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评价它们才合适。"

游戏化和自我跟踪一样，能很轻松地让公民对周遭杂乱的现实丧失敏感。量化复杂社会技术系统的输出，提高我们自身实践的有效性，减少浪费，但同时也有可能让我们无法想象怎样取消、替代这样一种系统。游戏化同样如此，它承诺让每一种活动都更享受，令得我们对现行的做事方式永远满意。

"Chromaroma"是一款针对伦敦通勤人士的游戏，能将行程数据存储进公交卡里。它有花哨的可视化路线和公交站台；玩家可以加入团队，发现新线路、在车站为对手设置陷阱均可赚取奖励。《卫报》甚至称赞这款游戏"是伦敦通勤一直在等待的改造。"一如作家史蒂芬·普尔所说，"实际上，伦敦通勤一直在等待的改造，是创造更可靠的服务，地铁线路周末不关门，列车能容纳17人以上。为系统的现状添加一重游戏，不叫改造；而是在溃烂的伤口上贴了一贴狗皮膏药。"

如今，有可能每一个玩"Chromaroma"的人都意识到伦敦的交通系统存在多么大的麻烦，所以他们会建立一个活动组织，要求获得更好的服务。这

是乐观的假设情况。但也有可能发生与此相反的情况：分散的乘客们并未对服务产生最终的失望，进而采取了集体行动，而是因为“Chromaroma”，找到了一种更好的方式来享受糟糕的服务。也就是说，靠着修修补补，人们能够从最恶劣的环境中找到满足甚至享受——老实说，用这样的理由对游戏化大加赞美，可站不住脚。

说到底，苏联的规划人员也是游戏化的热心支持者，尽管他们从来没用过这个词；他们喜欢的标签是“社会主义竞赛”，意思是让所有工人和整个工厂，全部投入到竞争当中，争取最大的奖励：一枚红色劳动勋章。游戏研究员马克·尼尔森（Mark Nelson）注意到了苏联游戏化的经验与游戏化，“工厂竞争模糊地融合进了体育比赛的内容：工厂不光在生产上互相竞争，也可以像足球联赛里的各球队那样竞争。利用真正的游戏竞争，再加上城市自豪感和体育狂迷等文化因素，构成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在工业生产中全面游戏化。”当然，工人也许很喜欢竞争的方面，但我们不应该罔顾事实：这种乐趣，有可能让他们忘了注意自己的工作条件是多么艰苦和可怕。

游戏理论家伊恩·博格斯特，对游戏化提出了最为激烈的批评，并在一篇言辞挑衅的文章（文章的名字叫“去他妈的蜡笔”，含义不言自明）中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尼日利亚诗人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后获诺贝尔文学奖）曾利用找得到的一切书写材料，在狱中岁月曾写出过好多动人的诗歌。在博格斯特看来，像《开心农场》这样的游戏，并未带给玩家行使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余地，比尼日利亚监狱的条件好不了多少；你能做的无非是点击鼠标，幸运的话，能把东西搬来搬去（博格斯特设计了一款游戏，玩家除了在一头丑陋的奶牛上点鼠标，什么也不能做。他的本意是想讽刺，却不料游戏在网上大获成功。他写文章就是针对这一现象给予回应）。数字囚犯们能像索因卡一样，想出办法规避控制，保持创造力，但他们没有理由忘记

自己仍然置身牢房。引用博格斯特的话来说，“魔术师用帽子变出了专制，人们绝望地进行了适应，可这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呢。”伦敦地铁仍然可怕，哪怕旅程的可容忍度更高了些。

狂人，褪色的牛仔裤和真实的虚伪

所有这些试图修复人类生存条件的尝试（量化一切；记录一切以规避人类记忆的弱点；让技术公司为我们提供更具营养信息的饮食，摆脱人对美食卑微低下的品位；把生活里的一切都变成游戏，让我们做正确的事情），都代表了硅谷对人类缺陷的不安，以及它对自己掌握的强大工具的贴金赞美。我们的极客王没有意识到，效率低下其实是我们的庇护所，保护我们不受非人道的泰勒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所蹂躏。如果效率低下是民主社会商议后得出的结果，那么，就没有必要消除它，哪怕最新的技术可以瞬间完成。

不过，硅谷最大的野心还在于，让人类所有的社会互动，甚至人类自己，都带上真实性这道枷锁。害怕显得不真实，显得像是假货，这种情绪对技术创新的推动力，几乎跟色情冲动一样大。如前所述，自我跟踪人士的量化冲动，尤其是他们公布这些数字的欲望，就应当看成这种追求的一部分：一劳永逸地保证自己不光正宗可靠，而且还独门所创。也许，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想法，用着同样的应用程序，穿着同样的T恤，但至少我们的DNA、我们每天的卡路里摄入量、睡眠模式不一样——知道这一点，足可令人心安了。

但是，如果你跟踪这些物理数据足够长的时间，你会发现一些更深层的数值模式，进而发现自己真正是谁（这也是自我跟踪的隐含承诺）。正如加里·沃尔夫指出，“量化自我的魅力背后，是一个猜测：我们的许多问题都来自缺乏理解我们是谁的工具。我们的记忆糟糕；我们受制于一系列的偏见；

我们一次只能对一两件事集中注意力。”需要什么才能发现“我们是谁”呢？嗯，沃尔夫说，一大堆自我跟踪的小工具（向医疗保健行业或麦迪逊大街的营销人员报告）能完成这一任务。“我们的脚里不会长出计步器、肺里不会长出呼吸测醉仪、血管里不会安装血糖监视器。我们缺少盘点自我库存的身体与精神设备。我们需要机器给予帮助。”如果弗洛伊德活得足够长，他或许会被一台计步器给取代：在这个勇敢新世界里，算法看起来如此诱人，谁还需要精神分析（过时的叙事想象力）来盘点自己呢？

如果量化自我运动让我们通过数字建立真实性，那么，社会网络就是让我们以更微妙、看似更具创意的方式来完成自我量化：策展生活时间线，上传自己最喜欢的照片，使用最酷的应用程序，维持独特的社交图谱（Facebook上的人际关系图，每个用户都有）。只有仔细观察，人才能辨别虚假和真实的主题是怎样塑造着Facebook本身的自我展示。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扎克伯格宣称，“除非你的真实自我上了线，社会网络无法存在。”Facebook最初的投资人彼得·泰尔将Facebook提供的可靠性（不允许用户使用假名）与前任竞争MySpace对手做了比较。“MySpace是要你在互联网上做个假人，人人都能在网上假冒电影明星。真人胜过假人，[这]很健康。”他说。

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Facebook的董事兼首席营运官，进一步强调真实性对公司的活动有多么关键。“表达我们的真实身份，明年会变得更深入人心，”她在《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里谈到2012年时说。“个人资料（profile）不再是概要的，而会详细地刻画出我们真正是什么人，包括我们读过什么书、听过什么样的音乐、能跑多长距离、到过什么地方、支持什么事业、喜欢什么样的宠物搞笑视频、我们的喜好和链接。是的，人们会习惯这种向可靠性的转变，同时，这种做法也会招来人们对失去隐私的担忧。”

一家靠着广告（《广告狂人》里像唐·德拉普这样的骗子手对广告这个行业可是如鱼得水呢）赚钱的公司发动了一场追求可靠性的现代十字军东征，不免太过讽刺。文学批评家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诚与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中指出，这场东征其实并不新鲜，可追溯回莎士比亚时代。但特里林还有一点说得很对：真实可靠或许有好处，但故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真诚的人，这种做法没什么好钦佩的。对可靠性（证明自己不光善良，而且还真诚，对自己真诚，对自己的本性真诚，甚至，对人类应该是怎么样的概念真诚）的简单冲动，是完全失真的。

特里林警告，我们不应当把真实性误以为是“某一种衣服，退色的牛仔裤，或者一种脚踏实地的外貌，”因为“一旦你开始重视时尚或者时尚符号的道德意义，一旦这种意义……成了某种人要求得到尊重的标志，”那么真实性立刻就失去价值了。当然，我们也不必把谴责提升到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那个地步。阿多诺在《真实性的隐语》（*Jargon of Authenticity*）抱怨说，“打着当代真实性的名号，哪怕是施加酷刑的拷打者也穿上一层美妙的外衣：只需要说他是个真正的拷打者就够了。”但是阿多诺确实说对了一点：真实的东西不一定就是道义上的好，道义上的好，也不一定需要真实。我们的真实，和具体的事情也有关系。哲学家查尔斯·吉尼翁（Charles Guignon）说得好，“真实性的关键不光在于承诺的强度，表达承诺的热情度，更在于承诺内容的性质。”

此外，在Facebook手里，真实性成了一种修辞武器，助长用户的焦虑，并进而向该网站上传更多的数据。谢丽尔·桑德伯格说Facebook的个人资料如今是“表达我们真实身份”的“详尽个人肖像”，其实也是在指出：只有上传、分享更多的细节，才能让这样的肖像更真实。但要是Facebook不暗中对用户动手脚的话，它也就不是Facebook了。故此，它信奉“无障碍分享”

的意识形态，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默认都是分享状态，我们必须要主动选择，才能不分享——这就导致：不光我们的“自画像”人人都看得见，其他用户还能发现、关注了我们喜欢的歌曲和书籍。但如果其他用户跟你喜欢完全相同的事情，那么或许你就是个假货——所以，你必须发现、上传和分享一些独特的东西。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在Facebook实现真正的“真实性”。桑德伯格所谓的“真实身份”梦想，无非是个巧妙的营销口号罢了。

从这个角度看，Facebook的真实性修辞，和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场公共辩论惊人地类似：后者探讨的是，划一性（uniformity，也即大众社会里的每一个人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是不是比随大流（conformity，也即为了合群而接受观点、习惯和信念）罪过更大。人们把随大流的后者，看成是选择做个“其他人”的骗子；而前者，是天生就同质化的，是真正的骗子——因为人们认为，做选择的是自己，要成就独特的自我，可事实上，人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历史学家阿比盖尔·奇弗（Abigail Cheever）认为，这种对划一性的担心（她指出，有这样的可能性，也即“独特的美国个体，也许不仅仅是藏在虚假的面具之下，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远远大于对随大流的担心，塞林格（J. D. Salinger）和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美国社会学家）的作品里就弥漫着这种情绪。

奇弗认为，这种担忧可能已经随着上个世纪的终结而有所缓解。可惜，它们不大可能彻底消失。Facebook和量化自我运动承诺给我们具体的、甚至数字的证据，证明我们拥有尚待发掘的深刻、真实身份，我们需要带着这一身份登入Facebook，用沃尔夫的话来说，我们“盘点了自己的库存”之后，就会出现某种切实而独特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甚至势不可挡的主张，正好切中人们长久以来的担忧。社会网络和自我跟踪不大可能让我们保

证自己的独特性，哪怕只出于一个原因：不管是Facebook还是自我跟踪设备制造商，都不希望破坏自己的生意。但还有可能，我们需要控制一下自己对真实性的欲望，接受“不真实并不总意味着不好”这一观点，因为，若没有些许的欺骗和虚假，根本无法建立社交关系。

09 智能的工具，愚蠢的人类

“道德法律在我们心中，也在我们的设备中。”
——布鲁诺·拉图尔

2012年5月8日，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网站上发表了一份看似无伤大雅的新闻稿。文章名为“本市扩大停车收费表传感器使用范围”，看起来平凡无奇，无关轻重，就像那一天美国官方公布的数百万份其他文件一样。

圣莫尼卡市宣布扩展新的智能停车方案，同时也吹嘘这套方案独具创新意义。为什么“智能”呢？新的停车计时表会使用嵌入式传感器，当局可跟踪汽车平均停留时间（不管车主是否支付了停车费）。有了这一新的数据，圣莫尼卡市希望调整停车点的数量，以及停车时间限制，找到一套适合所有人的安排。

整个方案似乎完全可以接受，只是新闻稿里还宣布了另外两项“创新”。首先，每当汽车离开停车点，传感器就会自动把计价表复位，不管计价表里还剩余多少预付时间。其次，如果司机逾期停留，没有办法通过多次付费延长时间；传感器会辨识每一辆车，一旦许可的时间用光，计价器就不再接受付款了。

许多人甚至挺欢迎这两项变化。干嘛不阻止那些想要欺骗系统、逾期停车的人呢？毕竟，免费停车场其实并不免费呀。洛杉矶加州大学城市规划教授唐纳德·舒普（Donald Shoup）在《免费停车的高昂代价》（*The High Cost of Free Parking*）中指出，如果人们按照公平市场价格支付停车费，有可能会减少开车，而始终处于缺少经费状态的城市则可以筹集更多的现金。看起来就像是双赢啊。

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圣莫尼卡市举措的其他方面吗？回到阿尔伯特·赫希曼的“无用、悖谬及危害”理论上，第一点似乎不成为问题。除非司机能找到一种方式轻松地规避智能计费系统，要不然，他们一般会遵照执行；说这个方案徒劳无益，并没有很好的理由——至少眼下没有。至于说悖谬，也很难证实：以智能传感器为基础的计价应该无法恶化停车局面。

那么危害这一点呢？用赫希曼的话来说，智能计价系统危及到了“从前某项珍贵的成就”吗？当然，这里可以套用与情境犯罪预防相关的标准批评，第六章我们已经详尽介绍过。也许，如果我们将这套方案推而广之，禁止公民到处违反法律，反而会损害公民的道德感，不用技术性的基础设施明确地剥夺他们做错误事情的机会，他们就不会去做正确的事情。

有没有可能，自动复位的计价器破坏了司机们之间的团结纽带，剥夺了一些人施展善行的机会，同时让另一些人确信：世界是一个彻底分裂化的世界，没有利他行为的存在空间？这种担忧乍看起来颇有道理，但似乎建立在错误的逻辑上，因为表面上的“善行”（在计价器里留下预付时段，方便下一个人停车）其实主要是出于利己的原因，尤其是离开的司机先前以为自己会待得更久。有人会得益于前一位司机的慷慨，主要是系统设计部完善所致——而并不是要离开停车位的这名司机，故意要让随便哪一位使用同一台计价器的陌生人受惠。

但在我们接受圣莫尼卡停车系统非常好这一点之前，不妨想想另一种系统。现在的做法是，传感器识别出车辆正在离开，计价器就自动重置；假设系统不这么做，而是向司机提供选项，是把钱留在计价器里（好像需要停车的其他司机使用），还是重置计价器（免得有人故意蹭停车位，同时为城市预算做些贡献）。而且，为了让“智能”系统真正名副其实，假设它还可以告诉司机通常在这一地区停车的车辆统计信息。是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豪华新车吗？还是研究生、非法移民开得起的破烂老车？

按照这项新方案，司机要自己做出权衡，判断哪种做法更重要：是跟拥堵做斗争，帮助城市；还是做个好心人，帮助需要停车费的其他市民呢？猛然之间，司机必须思考停车问题的严重性，直面造就停车问题的各种因素了——说不定，这足够打动他，让他去买一本唐纳德·舒普的书呢。原先的系统无法让司机表现出善（“善意”只是系统设计不完美的偶然结果），可这一下，司机被迫要自己斟酌哪一种行为更善良了。这样一比较，现行停车计价方案（代表司机做决定）就显得束缚重重，过分霸道了。

因此，哪怕是对停车系统这样平凡东西的内部运作稍加调整，就能造就极为不同的公民。在前一种完全自动化的情况下，我们得到了一套完全有效的系统，和不太愿意多花时间思考停车哲学的公民：为什么要这样运营停车场，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导致了拥堵，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等等。在第二种情况下，司机被迫要进行选择，判断自己更重视哪一种价值观，对至少一部分司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思考与停车场运作方式相关的复杂大问题。

第一套方案以实现停车系统绩效最大化为目的；第二套方案以从整体上实现民主制度审议效率最大化为目的。第一套方案不能很好地扩展开来：要在其他环境下发挥最大效率，需要新的传感器和智能技术。第二套方案却可

以漂亮地推广开来：公民习惯了对周围无形基础设施的隐性成本进行批判性思考，就更有可能用同一种批判性态度去对待生活其他方面。第二套方案筹集的资金可能不如第一套多，但前者筹集的是公民的觉悟，故此，哪怕它并非有形的东西，长期而言也远为重要。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假设，改革（而非保留）现行停车系统是公共政策的目标，那么，一群热切的公民就非常重要：他们要能够反思改革如何进行，整个过程中以哪种价值观为重。故此，赫希曼的头两条（无用与悖谬）或许是适合圣莫尼卡市停车系统方案的。

如果我们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维持目前的系统，找到更有效的执法机制，那么圣莫尼卡的系统运作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拿出对停车场生态甚至整个交通管理更好、更可持续、更友好的方式，那么，圣莫尼卡的方案就是失败的，因为它只优化了系统局部（而非全局）的效率。也就是说，如果它带给我们的是很少思考停车和驾驶习惯的公民，那么这套方案就仍然应该视为失败之举，哪怕它更有效地收取了停车费。这种对交通欠缺反思的态度，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城市的衰败和气候的变化。我们只能暂时地回避思考看似无关紧要的日常问题，因为总有一天，它们会回过头来折磨我们的。

维多利亚的火车和蒙大拿的小屋

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圣莫尼卡市采用的各种智能系统，都存在着跟自我跟踪同样的问题：如果量化给了我们节约用水的机会，但却不让我们去思考水一开始是怎么进入我们浴室的，那么，我们所节约下来的水，可能就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多，甚至，这些举措反而会妨碍我们思考怎样寻找更创新的途径去改革用水系统。在这个意义上说，圣莫尼卡的方案是无用的（按赫希

曼所说的意思），因为它并未真正改变公民和司机对停车与拥堵问题的看法。从潜在意义上看，该方案甚至是悖谬的，尤其是如果一旦取消智能计价表或其他政策手段，我们的公民就不再认为有必要关心其他的司机、关心城市或环境。

这样的方案扼杀了我们前文所述的“叙事想象力”，也有一些设计理论家称之为“系统思维”——这是一种智性上的方法，在考虑问题的成因和后果时都想到复杂性，而不是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若干容易辨识、可以控制的因素，争取用关系、结构和过程的语言对其重新进行描述。事实上，研究表明，学习设计的学生，如果接受过非设计学科（如心理学、人类学、发展学和生态学）的额外训练，更容易从系统的角度思考，并想出创新且可持续化的解决办法。反之，如果学生像追求最大效率的工程师那样思考，视野会愈发狭隘。

若是设计得当，技术方案也可能扩展（而不是像技术恐惧派分子说的那样缩小）我们思考共同问题的审议空间，以及彰显美德和公民意识的具体途径。圣莫尼卡方案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它不智能，而恰恰在于它不够智能：真正智能的系统，应该找到方法把我们变成更热爱思考、更关心、更为人性化的生物。技术当然可以协助达成这一使命，只不过，指导它们的技术专家和社会工程师需要具备非常不同的思维方式。

西班牙作家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Gasset）曾写道，“要当工程师……仅仅做个工程师还不够。”这是一个比乍看起来远为深刻的见解。如果工程师充分意识到，在道德社会里生活，与其他人交融又纠结，是这么巨大的挑战，那么，他就不太可能光从效率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一如圣莫尼卡的例子所示，我们没有必要完全放弃技术化的解决方案；相反，我们需要的一种更为开放的设计，既能实现类似结果，又能让人做出具有挑战性的艰难选择，人

和机器的区别，就在于这类的选择，机器只知道盲目、无情地残忍推进自己的议程。

过去几十年的一个最大误解是，认为技术不应该干扰道德问题，技术应该顺着精心划定的路线前进，跟人类及其他政治项目（如自由主义）区别开来。道德在这里，技术在那里：两者应当绝不重合。按照这一观点（法国神学家雅克·埃吕尔对这一观点做过最为雄辩的表达，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埃吕尔的无数美国和加拿大追随者又对其做了热切地推动），技术穿着它一贯的狡黠和自治的外衣，只会拉道德的后腿。若是任其发展，技术会发展成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说的“技术垄断”：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寻求技术的准许，讨技术的欢心，听技术的吩咐”。

这样激发准宗教狂热的高谈阔论，早就过了适用期了。是时候放弃这种带着大写字母“T”的“技术”讨论了，而是该弄清楚技术会怎样推动或危害人类的生存条件。从分析的范围来看，“技术”和“互联网”做出了同样多的承诺：由于这类术语带来的文化偏见实在太多，很难进行准确的分析。可倘若我们降低分析的层面，也就是进入更详细、更实证、更准确的层面，就有可能注意到法国神学家们忽视了的东西。

举个例子，我们可能发现，像自由主义这样的东西，没有一系列技术给予支持，根本无法想象。最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者从不回避技术工具集。奥斯卡·王尔德说得没错：机器奴隶制推动了人类的解放。用他的原话来说是，“除非有奴隶来做那些丑陋、可怕、无趣的工作，否则，就无从发展文化，深入思考。人类奴隶制是错误的，不安全的，让人失望的。世界的未来，依靠的是机器奴隶制，也就是对机器施以奴役。”

专攻维多利亚时代技术和科学史的学者克里斯·奥特（Chris Otter）令人信服地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如守时、整洁和专注，都有赖于可靠

的时钟、自来水和眼镜的出现，没有后者，前者根本不会形成。奥特进而主张，“自由主义主体性的许多特点，不靠相应的技术，是根本实现不了的。迁徙主体，没有了火车，就什么也不是；关注主体，没了眼镜、没了汽灯，也就迷茫了；整洁主体，要不是靠浴缸和马桶，立刻就污秽了；实业家没了蒸汽发动机，没了通往证券交易所的电报，经济上就破产了。”

当然，不是所有问题都适合技术修复——一如我们在第六章有关情境犯罪预防中的讨论中所见，我们应该让它保持原样。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比技术更可取，或者法律更适合，因为它引发了更多就有关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机会。

但很明显，并非所有问题都如此：政治和法律没法把你从纽约弄到洛杉矶，没法清洁你的公寓——除非你当上独裁者，逼别人替你干。不行的话，去买台真空吸尘器！所以说，在许多情况下，技术修复不可避免，而且也没理由哀嚎：“啊，技术垄断啦！”然后隐居到蒙大拿州的山间小屋去。

但承认技术修复不可避免，并不等于承认技术要么都好要么都坏——哪怕它们都能把事情办成。“技术性”手段没什么意义，因为“技术”本身和道德不相关；如果我们真的认同“技术性”并不自动意味着“不道德”、“不人性化”、“反民主”，我们就必须逐一研究每一项技术系统，设想有没有不同的技术系统可以通过更有利于辩论、改革和审议的方式，达成同样的目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设计更好的方法来对不同的技术修复进行评估、比较和鉴别；而不是一味重复同一套听得人生厌的信息：用技术修复社会总是好的。在我们判断最佳技术修复的时候，请记得奥尔特加的劝诫：要当工程师，仅仅做个工程师还不够——设计圣莫尼卡的停车场系统并不存在“正确”的途径，我们切莫假装它有。

收音机、毛毛虫和灯

我们人类并非过着设计优雅的生活，并根据技术试验消除瑕疵，完美制模，进行调整。相反，我们有着互相冲突的义务和复杂的生活安排。我们经常出于自豪感、利他主义或爱国精神，做一些不符合自己最佳利益的事情。我们有可能不按激励做出回应，也有可能因为太爱激励，不再回应其他任何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看似固定持久的世界，但后来才发现并非如此——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许多做法，有害地球、有害邻居、有害柬埔寨的童工、有害塔吉克斯坦的松鼠、有害一些现在才开始对自己不同生活方式进行阐述与无名社群。

我们的世界充满着冲突和对立——大多数时候，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一来，特定的族群才无法长久把持霸主地位。我们的法律在设计上就不完美，需要不断修订，不断加以重新阐释。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具有不可预知的后果，但我们不能回避这种困境，而是应该尽量据此重建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我们贪得无厌地追求各种技术（哪怕是无关紧要的技术），但我们很少意识到，只有依靠庞大的社会技术系统（比如供水或如今的云计算），我们才能使用它们。而这些社会技术系统，又基本上是无形的，同时还有比我们单纯使用技术更为深远的重大后果。

这种对人类生存条件的认识，本身可以应用各种不同的技术修复。瑞典互动技术学院（Interactive Institute）的设计师，首创了一种名为“不稳定电器”的方法，和我们通常所用的电力计量不同。这些瑞典设计师不是一开始就假设我们的各种设备应该完美运作，退居后台，不会威胁到我们对资源用之不竭的信心，相反，他们决定设计一种家用设备，随着消耗的能源增加，就表现不稳定。这种“表现不稳定”是经过仔细考虑的：目的是让人们在使

用这些设备的时候，意识到其存在风险和不确定的方面。比方说，一台烤面包机的行为，会取决于公寓的整体用电量；用户必须做出有意识地选择，因为一直开着电水壶，有可能对面包机、搅拌机或咖啡机造成干扰。瑞典人承认，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有点幽默的。但幽默提出了重要的问题。

还有一台不稳定设备的原型机是收音机，一旦家庭的能耗上升到目标阈值，它就跳到另一个不同的频率。为做到这一点，瑞典设计师破解了一台普通收音机，安装了传感器（不是所有的传感器都要奴役我们！）来测量收音机周围的电场。想象一下，饥肠滚滚的用户带着收音机进了厨房，一边找吃的，一边又不想错过自己最心爱的节目。随着他们在厨房里四处走动，节目变得越来越难听清，因为收音机的声音反映了当前位置电磁场的强度。设计师们说，“这就像拿着盖革计数器在核污染区域走动一样。”

它是世界上功能最完备的收音机吗？当然不是——可功能完备并不是设计师们的着眼点；他们的目标是向用户说明收音机对能源的依赖性有多强，而这恰好是传统设计师们尽力要遮掩的东西。这种从易用性上的转变是故意为之，瑞典人写道，“我们试着把能源和技术从属于背景的传统概念变得复杂起来。”不过，他们也注意到，这无需彻底去掉可用性；更好的平衡应该是可以找到的——让用户对能源消耗更有觉悟，又不打断他们喜欢的节目。然而，瑞典设计师靠着鼓励所谓的“对用户不友好”和“超越功能性”，力争“劝阻不假思索的思想同化，通过拉大人与产品的诗意距离，倡导怀疑主义。”他们“拉大诗意距离”的项目，正吻合前文讨论的扩大人们叙事想象力这一目标。

同样，德国福克旺艺术大学的三名设计师，着手开发所谓的“转型产品”，有意鼓励用户参与“无言的对话”。一种产品名为“毛毛虫”（Caterpillar），它是外形酷似毛毛虫的延长线，旨在让使用者思考设备在待机模式下浪费的能源。“毛毛虫”有三种模式：当插入式设备（如电视机）开

机的时候，“毛毛虫”会缓慢、悄悄地呼吸；如果设备关机，“毛毛虫”什么也不做；可如果设备进入待机模式，“毛毛虫”就扭动，翻滚，显得很痛苦的样子。用户会把它当成活的物体来满足其需求吗？或许不会，但只要这种延长线增加了我们使用体验的深度和内涵，任务就完成了。

设计师刻意地希望用户参与，虽然他们本来可以很轻松地达到节约用电的目的：“毛毛虫”可以直接检测连接设备，只要处于后者处于待机状态，就自动关机。和圣莫尼卡的智能停车系统一样，这能让局部绩效最大化，但却是以减少全局审视效率为代价的。一如我们所见，在一种情况下自动执行美德，有可能要求在所有地方都自动执行——更何况，在能源这一语境下，它有可能导致人们整体上更肆无忌惮地消耗。

“毛毛虫”的设计师们认为摩擦（而不是效率或易用性）是生产性资源，只要妥善部署，就能突显出无摩擦世界里很难看到的复杂问题。

还有一款转型产品叫做“勿忘我”阅读灯。打开之后，“勿忘我”就会像一朵花逐渐合上那样，光线逐渐变得暗淡，模糊起来。要让灯重新打开，再次发光，用户需要去触摸它的花瓣。这样一来，用户与灯不断地进行对话，由此意识到恰当使用能源的责任。

“毛毛虫”和“忘记我”算不上技术性修复吗？还是说，它们更像是“技术性不修复”，强迫我们怀疑一般情况下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很可能，它们属于后一种情况——正如设计师们的希望。他们说，“‘毛毛虫’和‘勿忘我’……不是解决问题的，而是专门增添麻烦的。人们通常把技术看成是解决问题的途径，精心设计的技术应当遵循相应的效率、易用和自动化美学。‘转型产品’尝试打破这一惯例，而不是去遵守它。它们故意造成摩擦。”换言之，最现代的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没有麻烦的存在（用苹果的在广告宣传时所说的话，那就是“自动、不费力、无缝”的体验），“这些制造麻烦的设备需要

加以驯服，而要驯服它们，只能靠彻底思考它们怎样运作、又怎样配合。”

所有这些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让我们对“技术无意识”变得更敏感，发现早就我们技术狂欢的底层设施，超越数字化简主义、“推搡”的霸道作风、游戏化的简单粗暴，鼓励用户成为公民，而不是只懂得价格和百分点的消费者，不是信不过、做不了正确事情的孩子，更不是斯金纳实验里不给奖励就做不了正确事情的老鼠。所有这些项目都认为用户有能力思考、审议、清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关切；它们把用户设想成复杂的人类，在使用这些设备的过程中，要根据自己珍视的价值观，做出不可避免的痛苦权衡，并在与设备进行对话期间，逐渐修正自己的价值观。这些用户决不是理性选择理论或古典经济学里的自动机器，用固定的、明确的原则对待每一个问题，对自己的效用曲线有着完美的认识。

大自然保险丝及其对抗性

没有一套考虑周到的理论脚手架，所有这些“不稳定电器”和“技术捣蛋鬼”都会遭到嗤笑，以为是后现代花哨设计的怪脾气。功能主义趋势（从广义上说，也就是认为我们使用的技术都有清晰的预设功能和目的，设计师们应该尽全力让自己设计的设备完整一致地将这些功能和目的表现出来）妨碍了设计师履行另一种责任：将自己设计的物体用于启动对话。

但只有当我们放弃原先的看法，也即“审视我们所使用的技术，审视其底层的广泛社会技术系统”本身并非重要功能，功能主义主张才能站得住脚。如果我们改变了最初指引功能主义的假设（也即对设备应该做什么、怎样去做存在普遍共识），支持更类似杜威的立场，认为共识只是暂时性的、事出偶然的，应当通过辩论和审议对其不断修订，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番情形呢？

在这一新系统下，设计的目标不仅仅是让人造物品满足“外面”真正存在的某种社会需求，也是要让我们思考，这一需求是怎么出现的，它怎样变成了一项值得追求的项目，甚至，全盘考虑的话，它说不定并不真的值得追求。设计师不应当把答案强加给用户，而是要便利用户提出有可能得出这类答案的问题。“毛毛虫”和“勿忘我”阅读灯做到了这一点；和它们功能相当的普通设备则做不到。

这两个项目都属于“对抗性设计”的范畴，这是一种思考技术与政治的新颖方法，由媒体和设计理论家卡尔·迪萨尔沃（Carl DiSalvo）提出。迪萨尔沃的思想值得深入研究，哪怕是仅仅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迫切需要的理论脚手架，把“不稳定电器”和“技术捣蛋鬼”的零散见解，变成一套可视为范例的设计方案和理念。

迪萨尔沃借鉴了政治理论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和查特尔·穆芙（Chantal Mouffe）的论述，阐明了一种新的设计方式，它不以促进共识和效率为目标，相反，却从社会政治规范及安排方面无尽的对立和争论中汲取灵感。“如果我们不再认为，有哪一种设计能彻底、恰当地解决我们的社会关注或社会问题，”他写道，“那么，对抗性设计就能以产品、服务、事件或流程的形式，为对抗提供空间，藉此表达或参与政治议题。”

迪萨尔沃收集了大量例子来说明对抗性设计在实践中会像是怎样：犯罪地图不再像现在这样，在城市地图上标示犯罪分布情况，而是标示城市哪个地区的居民进监狱的最多；浏览器扩展新增有关军队资助大学网站的信息，或是把亚马逊等网站上的所有价格，都换算成石油桶数（按市价换算）；在雨伞上加装电子灯，阻挡监控摄像头的识别算法。不过，迪萨尔沃笔下的例子，有两个特别值得深入探讨。一个是马特·肯扬（Matt Kenyon）和道格·伊斯特利（Doug Easterly）设计的“孢子1.1”项目，项目的出发点是家得宝（Home

Depot）零售店买来的橡胶树，家得宝无条件担保说，如果种下第一年就死了，可以更换新的植物。这株植物会跟一套运作有点怪异的自动洒水系统连接到一起：每个星期五，它会去核实家得宝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表现如何。如果股票的表现太糟糕，就不会有水输送到橡胶树上；如果表现很好，洒水器就浇水。如果橡胶树因此而死，它就去家得宝换一株新的，从头开始。肯扬和伊斯特利在一篇简短论文中提到这个项目时说，橡胶树已经死了五次——因为浇水过多。这一艺术项目的目的是希望让观察家们反思经济过分发展有可能带来高昂但无形的成本：很奇怪的，橡胶树原产于东南亚，是“生活与生态的象征”，却“受制于人造生态系统，等着纽约证交所发来的晦涩结果。”

迪萨尔沃提到的另一个难忘例子是“大自然保险丝”（Natural Fuse），是伦敦建筑师乌斯曼·哈克（Usman Haque）设计的艺术项目。为理解哈克的创意干预，我们有必要稍微了解一下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当代有许多努力都围绕碳补偿这一概念展开，也就是国家或企业分配到一定的额度，决定了它们能往大气里排放多少的碳。一旦超过额度，就必须再购买更多的额度，所得的资金通常用来创造、维持所谓的“碳汇”、能够吸收二氧化碳的天然或人工水库。

碳补偿的逻辑（以及“通过市场观念可以买到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已经从国家和企业层面渗透到了个人层面。因此，有人要求我们购买更能效更高的产品或是使用更环保的运输方式，监控自己的碳足迹，尽量减少谈排放量（这是自我跟踪的另一个例子）。但即便我们能够监控自己的碳足迹，我们就真的明白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吗？抑或只是用这样的测量方法，为自己的牺牲感觉良好，又无需对整个系统做出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微不足道贡献的相对意义所在吗？如果人人都做出同等微不足道的努力，能够逆转眼下

棘手的趋势吗？还是需要另一些更严苛的措施？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或许也宁肯不知道，只要我们能为自己在碳友好的网络商店（网络商店背后一般都要靠服务器来提供动力，而服务器所消耗的碳，比我们靠购买“可持续产品”所节省的碳要多得多）里疯狂购物的行为做出补偿，那就够了。

大自然保险丝旨在超越数字化简主义，让公民更好地了解碳补偿的逻辑和伦理。换句话说，它旨在推动叙事想象力，让我们从结构、关系和系统等方面思考碳，而不光是从数字的角度思考。它的运作方式如下：想象有一片家庭植物接入传感器，与计算机网络相连，插入家庭里的电源插座，并充当所有从该插座取电的电器的网关。这样一来，如果你想使用一盏灯，你必须把它插入与该植物连接的插座上。这些植物就成为碳汇；只要这些植物能吸收电器排放出来的碳，你的灯就能一直亮着；正常而言，这一时间为几秒钟到几分钟不等。类似的植物可以分发给你的街区，或任何与该计算机网络相连的人。

每株植物还带着一个标有“关/无私/自私”字样的开关。每当灯渐渐熄灭，你就要面对一个两难境地：你可以打开自私模式，从网络里的其他植物借调能源配额（当然，要它们处在无私模式才行）。所有植物里内嵌的传感器构成了复杂的系统，该系统与中央服务器通信，根据每一株植物的能量水平和碳补偿情况，藉此进行分配。如果你为自己植物供电的自私欲望，从其他植物吸引了太多的电力，那么，另一株植物也会“熄火”——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人，都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告知该植物的“过世”。如果植物达到了三次“死亡”上限，就会有一坛子醋自动倒进土里，让该植物真正死掉。

在大自然保险丝项目下，碳汇不再发生在远离用户的某块偏僻土地；它就发生在用户的桌子上，故此，我们处在消费者身份时从来无需做出的痛苦决定，一下子就涌现出来，因为这时候我们切入了公民模式。我们可以继续

沉迷于个人的欲望（并损害其他所有人），我们也可以着手研究如何才能为共同的福祉做出贡献。

“大自然保险丝”设计得最有趣、也最具对抗性的地方是，它绕开了均衡和共识的保证（多为奥普拉式的“只要我们努力干，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一般情况下，参与节能行动，人们总会这样对你说。迪萨尔沃指出，冲突构建在“大自然保险丝”的整个系统运作里。“按照设计，该系统能够甚至必然要求用户投入与其他用户的竞赛。事实上，‘大自然保险丝’是否真能实现大多数碳汇和碳补偿计划争取的平衡，完全说不准。”

事实上，“大自然保险丝”并未做出标准的、预设的承诺（如何使用它，是没有特定的“正确”方法的）。这是它的特色，而非漏洞。它并不惩罚过度消费的用户，也不奖励那些与他人分享的用户，它只是向我们揭示了界定我们消费习惯的物质关系，强调了相关的道德伦理问题。它的目的不是要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是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协商效率，强迫用户去面对自己宁肯无视的问题。和所有希望打开对话，而非提供直白解决方案的的转型产品一样，按迪萨尔沃的说法，“大自然保险丝”“不把设计视为提供解决方案的途径……而是利用设计，为当前局面平添更多的问题。”

“大自然保险丝”让碳补偿的问题更明显了，但这种明显，跟网上众多碳补偿计算器带来的“明显”很不一样。它带来的是更高层次的明显：我们不光要知道自己需存储多少的碳才能补偿所用的电力，更要知道（我们和其他人）牺牲多少才能存储这么多的碳。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实用”和“探讨”意识做了区分。前者以日常和习惯性互动为特点，指的是我们对如何做事的日常知识；后者，以更深入地反省自己的行动为特点，指的是我们做事情所处的社会条件。

因此，实用意识帮我们在离开房间时按下灯的开关；探讨意识解释了我

们为什么会关灯。我们的能源消费习惯在实用意识层面上运作的（这部分解释了气候变化的问题）；“大自然保险丝”这样的项目则让人切换到探讨意识层面。因此，虽然对常规活动进行自我跟踪和终身记录，带给了我们一定的“可见性”，但却并未超出实用意识层面；“大自然保险丝”这样的项目却不光让我们自己的行为变得“可见了”，还突出了这些行为发生时的社会关系，故此也让人更容易施展叙事想象力。

请注意，“大自然保险丝”绝不反对技术。事实上，没有现代传感器，以及通过计算机网络将用户彼此相连的能力，它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它并不反对数字；恰恰相反，量化我们使用的能源，量化每一株植物的碳补偿能力，是它的核心。但“大自然保险丝”并不是要利用所有的这些工具、网络和技术，给我们营造一种控制、并最终掌握周遭世界的虚假印象，而是努力向我们揭示，我们所仰赖的系统，不仅仅可以进行优化，甚至可以彻底颠覆。它促动我们采用别的方式去思考当前困境，而不仅仅是设计出在困境之内修修补补的能力。传感器、网络和数字不是敌人；可一旦纳入某种狭隘、单向度、考虑不周的意识形态，它们确实会变成敌人。

本着对抗性设计的思路，游戏也可以改造。不是说游戏不能用来表达政治关注，强迫公民去正视宁可看不见、宁可不面对的问题；只不过，各种游戏元素的配备方式要改一改：既要寻求乐趣，同时又不能把公民驯化得不会质疑（除非许诺以金勋章）。游戏理论家伊恩·博格斯特在《劝诱的游戏》（*Persuasive Games*）指出，如果游戏不让玩家有意识地思考就说服他们，那这就只是另一种胁迫（只是比较软性）罢了，而不是说服。

“但如果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谁还在乎审议呢？如果以实现可取结果为目的的结构能让孩子们去刷牙，让大人们去锻炼，人最初的动机又有什么重要呢？”博格斯特沉吟道。他的答案，很难让人说出“不”来：“因为，要兴旺

发展，文化需要审议和理由。”如果，经过广泛的审议，我们找不到理由，那么，或许我们最初就不该去从事该活动。可最糟糕的游戏化案例，没有留下审议的空间，在类似自动导航的系统中放置了大量社会和政治进程，公民投入该活动，不是因为那是正确的事情，而是因为游戏给了他们各种勋章。

让我们来比较两款游戏，它们都说自己具备社会优势，能让玩家对肥胖症问题更有觉悟。“Zamzee”这款游戏由eBay创办人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赞助的非营利机构“HopeLab”开发。游戏背后的想法很简单：孩子们戴着真正的监视器，跟踪自己的肢体活动，靠运动多少赚取积分。CNN最近报道了一名14岁的孩子，遛狗赚到了200分，跑步1英里赚到了500分。在积累了总计47074分之后，他用这些分数换了乐高积木，以及价值150美元的百思买礼品卡。这种用分数交换真实商品的做法，资金来源是什么人呢？当然是他的父母：多亏有了监视器，父母们看到了孩子的锻炼量，并设定了目标值，只要达到了目标值，他们就用礼品卡这一类的东西奖励孩子。

“Zamzee”是否有效，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怀疑；过去的研究显示，许多青少年很快就会失去兴趣，父母也迅速发现孩子干什么都想要得到报酬。不过，我们暂时别这么先入为主好了。更有趣的地方在于“Zamzee”这类游戏触发玩家对肥胖和健康问题的思考方式。很有可能，表面叙事会像这样：只要我努力，我会成功的。于是，苗条和健康都成了良好个人行为带来的自然结果；它们跟家庭收入、是否有能力负担健康食品、在附近街区慢跑是否存在危险等结构性因素没有太大关系。

现在，让我们用伊恩·博格斯特开发的一款名为“Fatworld”跟“Zamzee”来比较一下。和完全发生在现实世界的“Zamzee”不同，“Fatworld”是一款传统游戏，故事完全发生在卡通人物的虚拟世界。但在传

达肥胖问题复杂性方面，“Fatworld”比“Zamzee”好得多。在“Fatworld”里，你要先为你的任务选择体重和健康状况，还包括一些容易患病（比如糖尿病、心脏疾病、暴饮暴食等）的体质情况。接着，你来判断自己想吃什么，进行多少锻炼——同时确保预算平衡。你还会受邀去看看替别人进行营养选择（在自己的餐厅设计菜单）会是怎样一种情况。这里的现实主义风格是无可挑剔的：你可以通过向政府官员行贿来影响公共政策，如果你有钱，还可以到健康局去检查身体。一如博格斯特所说，“这款游戏的目的不是告诉人们吃什么，怎样锻炼，而是向人们展示，营养、预算、现实世界、补助、法律法规等之间的关系交织得有多么复杂。”

“Fatworld”是对抗性设计一个很适合的例子，它将肥胖描绘成一个极其复杂、多维度的问题，无法光靠个人责任感来解决；这款游戏诱导玩家思考改革，而不光是个人牺牲。它鼓励玩家锻炼身体吗？不，但它让玩家思考。像“Zamzee”这样的游戏，使用强制性的自我跟踪、家长监护和货币奖励，或许能帮助用户瘦掉几磅肉，但却不太可能推搡我们朝着好的方向前进，解决肥胖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内容农场”可以有机吗？

我们怎样才能将对抗性设计的经验应用到信息消费方面呢？毕竟，这是一种跟能源消耗（能源消耗是迄今大部分此类项目的焦点）很不一样的消费。首先，能源使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似乎是直接的：你越是消耗得少，对其他人就更好。（当然，现实并非如此简单。素食而开车对肉食而骑车，哪样对环境更好？你真的知道？）信息消费就很不一样了：再多的猫咪图片，或者再多的诗歌，都不一定能让你变得更好或者更坏。但一旦我们放弃对特定信

息内容的执着，转而关注信息的生产方式，一旦我们理解了信息的分配和消费中存在着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我们就能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和权衡。最起码，我们可以对这些关系展开辩论。

猫咪的图片可能跟诗歌一样好——但一张从另一网站“借用”来的猫咪图片，可能就不如自己拍的、从出版商那儿买的猫咪图片。也可能并非如此，那么我们的版权法就过时了，需要修订。一篇关于本地市政会议的文章，可能不如一篇关于中东和平进程的文章。但要是人更愿意阅读本地市政会议的文章，并为之实际做点事情，那就比对中东局势表示绝望，什么也不做要强，这种时候，前一篇文章就更好。Google的个性化算法或许不如非个性化的搜索。但如果算法能产生更有趣的链接，那么个性化算法同样有可能更好。

所有这些都是开放式的问题，不能轻易地给予推搡、自我跟踪和游戏化。要是我们根本说不准中东新闻是不是一定比本地市政厅会议的新闻更重要，为什么还要费力衡量文章的卡路里数字呢？为什么我们要推动Google和Facebook替我们介绍非洲的陌生人，而不是住在隔壁的陌生人呢？为什么我们在并没有正确答案的时候自以为有呢？为什么非得用户按照设计师和社会建筑师的想法去做正确的事，而不是采用不同的策略，让用户自己得出结论，什么才是“正确”的事？

我们需要更加不稳定的设备，扰乱我们的信息消费习惯，让我们跳出既定的习惯性做法。如果我们开了太多窗口，浏览器为什么不能暂时关闭，或者变成黑色？（好吧，浏览器的确经常关闭，但那只是因为微软或者火狐的某个家伙没能预料到我们对信息的好胃口。）为什么不把《纽约时报》网站上展示的文章，跟母公司的股价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如果股票表现不佳，一篇文章里每隔五个单词就掉一个字，或者图片变得模糊（至少针对未支付网上订阅费的用户这么做）？为什么不对各种允许Google个性化我们搜索结果

的信息突出显示，从而让我们对个性化的实际隐私代价有更明确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大自然保险丝”，为什么不能设计“大自然过滤器”，也就是说，为了得到更好的搜索结果，用户得透露一些有关自己或朋友的秘事（比如他们最喜欢的颜色或鸡尾酒）？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反驳说，这些建议不切实际，不像消费型公用事业，倒更像是艺术项目。但如果用户认为自己愿意像成年人那样做事，不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视而不见，那么，说不稳定收音机或者“毛毛虫”延长线一定无法投入批量生产是没有道理的。布鲁诺·拉图尔曾写道：“（出现了）难以预料的后果，是地球上最意料之中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信息习惯跟我们的能源习惯没有太大不同：你花太多时间从各种新闻聚合器和内容农场获取所有信息，而新闻聚合器和内容农场只不过是把别人生产的昂贵内容重新加以包装而已。这样一来，你就是在扼杀新闻行业，就像是总让电器保持待机状态，有可能无声无息、又毫无必要地害死别人的碳补偿。

有些新闻聚合器也可能有着巨大的价值（比如《赫芬顿邮报》同样为许多专业记者提供了工作），所以，无法提前确定“正确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浏览器窗口里展示新闻消费经济学，使之更明显可见——哪怕一切只是为了让我们判断什么才是正确的事。可我们也不能把这种对“正确的事”的追求，贬低到这般田地：单纯计算信息卡路里，或者通过“游戏机制”让我们受高质量网站的吸引，或者让技术公司引导我们走向具体的行动路线。追求“正确的事”的项目，应该始终留有余地，让人们可以挑战、颠覆“正确的事”的定义。有时候，用户找到办法“黑”了自己的设备，确确实实挑战、颠覆了“正确的事”的定义。但这还不够，设计师和技术人员应当时刻谨记：自己的目标不是让用户只知道使用设备；更是要让人们利用设备展开思考。

意志力的危险

冒着过度简单化这极大的风险，我们可以这样说：让设计更自觉、对解决方案主义的批评更为敏感，方法之一是用对道德政治哲学的迷恋取代解决方案主义对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的迷恋。担心可用性（这是当今许多设计师的首要关注点），就像是在沉没中的泰坦尼克号上计算卡路里。这种对可用性的痴迷，以及让技术隐形、不显眼的痴迷，造就了一个我们很难弄清家庭到底消耗了多少能源的世界。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智能手机在对可用性的追求中，也隐藏着同样令人不安的现实：大量有毒电子废物往往会倾泻到短缺现金的发展中国家去。

心理学战胜哲学，不仅限于工业设计领域；政策设计者和社会工程师也屈服于了这一趋势；因为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属于“科学”范畴，要进行试验和测试，显得比哲学更“科学”。但道德问题不见得总是便于测量，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打消此类关注，用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属于对其进行改造。在意志力的讨论中，这一倾向最为明显。从前极为复杂和痛苦的对错决定，如今被改造成了意志力强弱的例子——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谨慎管理意志力资源（就像管理银行账户那样）来解决这种决策难题。

意志力的概念，在心理学系得到了复兴，也部分地揭示了近年来对“推搡”和游戏化的迷恋。基本思路是这样：我们用在决策上的意志力，数量是固定的；故此，把意志力用在了这项行动上，那项行动再想动用意志力就很困难了。这也就是说，要是我们约束自己现在别吃这种美味的高脂肪小饼干，那么，1个小时之后，恐怕就没有足够的意志力选择走路不开车了。我们无法同时拒绝饼干和汽车。

约翰·蒂尔尼（John Tierney）和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在自己

最近论述意志力的书里断言，“做决定会消耗你的意志力，而一旦意识力耗尽，就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决定了。”有一个常见的意志力实验是这样：找来两群饥肠辘辘的学生。一组学生供给部分食物（萝卜、饼干和糖果），但要求他们尽量别吃后两种，多吃萝卜。另一组学生完全不提供任何食物。接着让这两组学生解谜题，时间约为20分钟。受过饼干和糖果引诱的学生解题不到8分钟就放弃了，比另一组快得多。故此，意志力就像是“肌肉，会因为使用而感到疲劳。”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对利他主义的论述。20世纪70年代，辛格批评了一些经济学家，后者认为利他主义是和石油一样的资源，“用得越多，留下的就越少。”辛格却唱起了反调，他问：“为什么我们不该以为利他精神就跟性能力一样呢：用得多，它也就能不断自我更新；但如果很少动用，它就开始萎缩，到了需要用的时候完全用不了？”同样，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也呼应了辛格的看法，他写道，“利他主义、慷慨、团结和公民精神，和会用完的商品不一样。它们更像是肌肉，能锻炼通过锻炼来发展、变强。”

当然，上面的饼干一例，并不涉及为他人做牺牲，但想象一下也很容易：毕竟，无法和他人合作（如分享饼干），很可能会被归咎于意志力储备量低。用伊万·伊里奇的话来说，意志力是一种感觉完全自然的需求，可以用生理学来解释；利他主义和桑德尔用“公民精神”来概括的所有其他美德，则更类似道德要求，需要我们学会欣赏和实践。两种范式都可以解释相同的行为，但这两种范式，存在一点关键的区别：意志力的讨论和对错讨论无关；超出个人层面的行为是否值得做，还没有成熟的办法进行区分。但可以肯定的是，判断是否从事某一行动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不仅仅是它对我们的意志力储备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用意志力是来干嘛的呢？关于这一点，心理学家默然不语。

蒂尔尼和鲍迈斯特是自我跟踪的热情爱好者，他们写道："现在计算机越来越智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计算机在看着我们，可它们并未发展出自我意识（至少眼下还没有），也并未跟我们抢夺权力。相反，它们通过增强我们的自我意识，提高了我们的力量。"在赞赏意志力的人眼里，自我意识是改变行为的关键。但请注意，他们主张的是个人主义的消费者自我意识，而不是公民的自我意识，公民的着眼点是对公共福祉，以及便利追求公共福祉的法律和技术基础结构。他们想要的自我意识，跟"大自然保险丝"、"毛毛虫"延长线、电脑游戏"Fatworld"所培育的那种诗意的自我意识很不一样。

蒂尔尼和鲍迈斯特的承诺听起来很甜蜜："不用再付钱给医生和医院去修补身体，你可以监控自我，避免疾病。不必再听从营销人员提供的快餐食品和及时享乐，你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让自己沉浸在有利于健康和自觉性的信息里。"这里的思路是：分散的消费者对医疗改革无动于衷，只一心想着最大化自己的福祉。推想起来，买不起自我跟踪设备、因为关心隐私不愿自我跟踪的人，一定会被斥为不成熟的反技术顽固分子。这不禁让人想起博格斯特所说的"去他妈的蜡笔"：没错，我们有些人或许能够找到巧妙的工程解决方案，抵挡阴险的营销，但在一片对现代技术的赞美当中，我们难道不应该对营销本身做点什么吗？如果我们能让食品公司难于向目标儿童兜售不健康食品，为什么非得要消费者自我监督，磨炼自己的意志力呢？政治行动彻底消失了；我们不是去改造系统，而是修补自己，像瑞士银行家对待金库那样，对待自己的意识力金库。

凯特·麦戈尼格尔（Kate McGonigal）所著的《自控力》（*The Willpower Instinct*），是近来面世的另一本讨论意志力的书。这本书进一步扩展了个人主义逻辑。凯特·麦戈尼格尔（她就是前一章我们提到的简·麦戈尼格尔的孪生姐妹）指出，既然我们的意志力和自控力储备都有限，那么，我们不能把

它们浪费在宏大而重要的全国性项目上；相反，我们应当把它们留下来，用于节食这样的重要个人追求。“与其指望我们整个国家发展出更多的意志力，去满足我们最大的挑战，倒不如只要有可能，就把自控力从这个方程里给拿出来——至少，减少‘做正确的事’所需要的自控力。”她写道。她赞同卡斯·桑斯坦和理查德·塞勒的“推搡”，因为他们“让人们更容易做出符合自己价值观和目标的良好决定。”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麦戈尼格尔不愿意我们面对诸如“毛毛虫”延长线、“勿忘我”台灯等强迫我们注意到自己消费习惯的开放式设备，而是希望我们转向全自动系统，无需任何人工干预，就把待机设备或阅读灯帮我们关掉。就算人类从来没有意识到什么是正确的事，这类新系统也会做“正确”的事。注意到两者之间（也即不允许酒驾的汽车，不容忍待机状态的延长线）的区别很重要。如前所述，只要用户在知情的条件下，决定将部分决定外包给机器，这种做法也未尝不可——至少，用户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认知偏差。

然而，在社会关系系统中，对抗酒驾的技术，其言外之意不如使用消费电子产品的技术那么复杂。有可能，在车里使用了防酒驾技术，能让你减少对酒后驾驶问题的关注，甚至可以说，一旦所有的汽车都配备了这一技术，酒驾问题也就随之消失了。然而，就算所有的延长线都会自动关闭待机模式下的电器，恐怕仍无法解决能源问题。事实上，后者恐怕只让用户产生了一切尽在掌握的自大错觉，令得能耗反而更高。我们的确存在认知偏差，但这并不是我们不去思考调节人行为的复杂系统的借口；把人的所有决定都外包给智能延长线，或许能够纠正一项具体的认知偏差，但有可能让其他认知偏差变得更加严重。并非所有心理学都没用。

麦戈尼格尔对意志力的分析，和她的双胞胎姊妹对游戏化的分析很类似，两人都彻底回避了道德问题，认为它无关紧要。凯特·麦戈尼格尔认为，我们

不必再用着“美德”一类的字眼，从道德的角度谈论行为，而应当专注于个人的行为带给我们自己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理想化了自己渴望善良的欲望，许多人相信，自己最大的动力来自内疚和羞耻。但我们想骗谁呀？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回避不想要的东西，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把一种行为上升到道德层面，只会让我们感到更加矛盾。”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说法：它认为公民除了大吃巧克力棒、开SUV之外什么也不做；其他类型的行为概无可能。我们在之前章节看到的那些瑞士公民（允许在自己的村庄附近兴建废物倾倒站），难道是以自利为动机的吗？要是当真如此，他们肯定愿意拿现金。在公园里，人们把别人扔下的垃圾捡起来，处理到，难道只是出于自利吗？

为什么我们不应当再从道德的角度出发做事，麦戈尼格尔提出的唯一论点是“准许效应”频繁出现，也就是个人认为自己（通过在“全食”有机超市购物）已经做了足够多的好事了，不需要再担心气候变化。“如果你感觉像个圣人，就不会为自我放纵的想法感觉不安。而是感觉很对。如果激励你自控力的唯一东西，就是渴望做个足够好的人，那么，每当你自我感觉良好，你就会放弃。”麦戈尼格尔写道。但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出，麦戈尼格尔想象中的公民，享有大量的权利，却几乎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只是在不同品牌的肥皂和寿司里挑挑选选，抵挡不健康或者太贵的东西。至于说，做正确的事情需要为共同利益做出一定牺牲，或是有些时候，什么才算是“正确的事”，并不那么明显——这一类的情况，她几乎未曾提及。她的沉默不难解释：面对这些牺牲，她宁肯选择桑斯坦和塞勒的“推搡”方式，这样，就不用把自己的意志力浪费于此了。

自我跟踪、“推搡”、游戏化，甚至情境犯罪预防、数字技术先发制人日渐高涨的吸引力，只能从过去十多年更广泛的知识语境中去理解。如前所述，现实很可悲，哲学，以及其对美德、良好生活的关注，完全被心理学、神经

科学、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支）及其各类组合，如行为经济学等给打败了。因此，政策制定者们不再调查和审议我们行动的动机，努力分清好坏，而是着迷于给我们提供合适的奖励，或是彻底消除做错事的选项。俗话说得好，小心总比后悔好。

当然，即使在哲学里，也不再流行讨论美德和良好生活了；非要谈这些，人就会给看成铁杆保守派。的确也还有迈克尔·桑德尔和玛莎·努斯鲍姆等极少数人例外；但他们的存在，恰好证明了规则：政治正确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了我们的公共和学术辩论，判断良好生活的问题，只需要个人就可以了。因此，我们的哲学家提出了众多如何最佳分配商品的理论，却很少谈到如何评估商品。不过，迈克尔·桑德尔对市场的言论，也完全适用于技术："我们不愿意把良好生活的不同观念带入政治辩论，这不光让我们的公共话语变得贫瘠，也让我们装备不良，市场日益插足我们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却无从与之抗争。"

不是说，自我跟踪和游戏化会有损我们生活的愉悦——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总是很享受的；而是说，它们会减损我们生活的意义，不再容忍人类生存条件的种种怪癖和需求。这样的安排还可能阻碍我们个人和政治的发展，哪怕它们能让食品公司推出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全新营养补剂，技术公司则用新的应用程序挑战我们的手指头。除了跟踪营养补剂的效率，测试游戏软件的性能，生活还应当有更多的内容吧——这么想难道太天真了吗？

无障碍的陷阱

除非（社会及技术领域的各种）设计师、建筑师和工程师放弃"做人是怎么一回事"的简化模型，要不然，技术至上主义就始终会保持至高无上的地

位。虽说Facebook的谢丽尔·桑德伯格有这个想法，但我们不会为了10年后完好无损地进行恢复，就把稳定、真实的自我交给技术。技术积极地塑造着我们的自我概念，甚至可以界定着我们对“自我”的看法和认识。技术塑造了我们的认知轮廓，告诉我们哪些东西可以妥协，哪些东西不能；技术定义了我们自我实验的结构和进度。

如果我们的整个生活都按照情境犯罪预防方案进行了优化，如果所有的诱惑都被消除了，如果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做正确的事，那么，我们用来培育自我的精神牧场，也就大大缩水了。如果我们采用用动态的观点看待人格，把它当成是一种只能缓慢而逐渐浮现出来的东西（在个人自我发展语境下，以及更广阔的数代人发展的历史语境下），那么，我们就可能不光看到自己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更关注自己是怎么做（和没做）的。换言之，如果把自我本身看成是偶然事件，永远都在流动，那么，自我浮现的过程也就跟自我带来的行为同样重要了。按照这种看法，我们行动的过程和程序，跟行动的结果同样重要，因为只有通过相互欣赏和两者之间的张力，我们才能成为自己这个人。

如果一套方案想通过奖励孩子勋章和游戏积分来动员他们帮助老人，另一套方案则通过动员孩子们的公民责任意识来这么做，那么，哪怕两者实现了完全相同的结果，造就出来的孩子也完全不同。使用来自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过度简化模型，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每当它们面对一种全新的情况，就必须设想出一套抽象的、独立的、与历史脱节的全新公民设定。故此，如果想动员孩子去做不同的任务（比方抗拒小饼干的诱惑去解数学题），就立刻忘了先前通过玩游戏鼓励帮助老人的那种孩子——许多软件和项目就是这么干的。但孩子们显然不能像计算机那样重新启动；我们需要孩子两者都做，我们需要他们一点一滴地积累经验，而不是让经验互相抵消。构建一个只有

最有效结果（而非实现这些结果的过程）的世界，不太可能让孩子们意识到人类激情、尊严和尊重的深度。收集勋章带不来尊严；在本可以别有选择的情况下以高贵的态度做事，才能带来尊严。修补了这块精神牧场，其他的选择说不定就消失了——体现尊严的可能性也就随之泯灭。

另一些思想家同样认识到了流程、框架和程序在促进人类繁荣、便利民主辩论方面的重要性。伊恩·博格斯特在论述视频游戏的时候指出，视频游戏最有利于审议的地方不是内容，而是所谓的“过程逻辑”（procedural logic）。“视频游戏等过程性媒体通过加载有关事物内在流程的争论，切中核心。”博格斯特写道。“我们创建视频游戏的时候，就是在对这些过程发表主张，哪些过程我们赞扬，哪些我们忽略，哪些我们想要质疑。等玩这些游戏时，我们会对这些主张提出询问，进行思考，将之整合进我们的生活，并将之付诸未来的人生经历。”

博格斯特举了《霍华德· 迪恩角逐爱荷华》（Howard Dean for Iowa Game）的例子，这是2004年，在霍华德·迪恩参加总统竞选时推出的一款游戏。游戏的目标是为迪恩阵营招募尽量多的志愿者；招募就是它关键的过程。玩游戏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得出结论，游戏仅仅是一个数字游戏，而无关候选人在论辩议题上的立场：你招募的志愿者越多，筹集的资金越多，你获胜的概率就越大。这款游戏成功吗？好吧，如果它没有为迪恩的竞选活动拉到更多的实际资金或支持，那么它恐怕算不上成功。但博格斯特认为，这样的标杆说不定是错的。“游戏不是要拉人赞同，这一点可以用是或否来衡量，而是想要带来思量和审议，这意味着不立刻赞同，也不立刻反对。”这款游戏本身对政治和民主辩论进行了批判。而一款让你点击新闻标题、获取勋章的游戏却做不到。

同样，法律理论家朱莉·科恩（Julie Cohen）也强调，在版权政策和隐私

语境下，流程和结构非常重要。一些结构会变成壁垒和边界，但对自我的浮现同样重要（尽管许多极客并不这么看）。“计算机科学家和技术设计师总是倾向于认为，互动操作性上的技术障碍，是需要克服的人为限制。”科恩写道。她认为，这种信念部分地源于极客们“在智性和美学上都推崇无缝的互动操作设计，而这种推崇深深地扎根在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的技术性文化当中。”若是考虑到Facebook对“无障碍分享”的迷恋（以及，早在20年前，微软就对“无障碍资本主义”产生了迷恋），还有苹果公司“无缝”计算的承诺，科恩恐怕是对的。但她立刻又指出，“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存在限制，而在于采用怎样的方式找到限制，能够最有效地促进人类方方面面的繁荣。找到限制之后，我们可以质疑它们，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限制一定都是不合理的。”

在隐私的帮助下，我们获得了一种能力，可以在自我成形的空间周围设置、维持此类限制，可因为自我跟踪、终身记录的增多，外加无处不在的计算，隐私不断受到侵犯。这些限制画出了我们精神牧场的场界，便利了我们个性的浮现——没有个性，我们就只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员。隐私的目标不是要保护自我免受侵蚀，而是要创造边界，让自我浮现、变异，并逐渐稳定下来。这里，重要的是框架（或过程），而不是结果或内容。换句话说，限制和约束，也可能有正面作用——哪怕整个“互联网”历史都持相反的主张。

真实性问题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我们不是通过表达有关自我的某些内在真相来实现真实（早在18世纪，卢梭就曾揭穿过这种关于真实性的说法），而是靠在传统和惯例（由我们所从属的群体里的其他成员设置）的约束之下行为自主且一致来表现真实。一如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在《真理和真实性》（*Truth and Truthfulness*）一书中指出，只有在此类社会限制之下，我们才能理解真实性项目；没了社会限制，真实性项目就丧失了一

切意义。从表达真实性是一种自由选择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人在荒岛上孤独出生、长大，是无所谓真实性的。

因此，和谢丽尔·桑德伯格的主张相反，我们不应当以为Facebook只是在便利我们表达真实的自我，而是应当问清楚Facebook是怎样居间调解真实性这一条件的（它有时候靠的是树立新障碍和新限制条件，但更多的时候，则是靠摧毁障碍和限制）。

数字技术极大地扩展了我们进行自我实验的小房间的门与窗，我们如今已经来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些房间马上就要变成玻璃房子了。科学史学家彼得·盖里森（Peter Galison）和法律学者玛莎·米诺（Martha Minow）甚至警告我们，有可能出现一种在技术和法律推动下的“下行螺旋”，影响人的自我感觉——也就是自我表达、自我试验的空间感，尊严和沉着感，无需当众陈述的轻松和宽慰感。”

所有这些概念都有历史，故此不应当看成是不可改变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偏离眼下最紧迫的任务，也即识别出它们在我们生活中所发挥的促进作用，并争取捍卫它们。或许，现在是时候考虑这样的可能性了：如果人们放弃隐私（换取优惠券或者更个性化、更高效的搜索），那么，他们放弃的东西可能远超自己的想象，他们交出了属于自己、且不应当变卖的东西。在隐私和尊严领域，我们需要类似“大自然保险丝”式的项目：我们有这么多人乐于用隐私交换更好的搜索，因为这么做的后果，我们尚未完全看清。我们并不知道，公布自己健康信息的决定，是否会对某个患病的人造成影响。除非我们意识到自己应该替别人承担起这样的考量，要不然，我们是不太可能在做决定的时候想到他们的。

不足为奇，由于自我显现的过程仍然很难追溯，很多人仍然相信，自己有着稳定、完全自主、永不改变的自我。但在我们等待此类项目出现的时候，

不妨听听盖里森和米诺的意见，放弃过度简化的功利主义理论，为自我显现和繁荣保留一定的空间。盖里奇和米诺写道，“考虑到自我的复杂性，将隐私概念简化成纯功利性的框架，就像是把一尊雕像压扁，在二维空间理解其本质一样。这种扁平化举动，或许会让安全及隐私看起来像是简单的平衡动作（在天平的左右两边各放上12盎司的砝码），但它无助于承认人们所需的审议空间，无助于尝试新的行为方式或不同的讨论方式。”

更深刻地认识到自我的动态和突变性质，还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评估各种新兴技术。举例来说，“自动勾勒”（automated profiling）指的是依靠数据挖掘技术，预测我们的某些特点，并将此类知识用来对我们浏览的网站、接收的在线广告进行更好的个性化定制。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名作《作为他者的自我》（*Oneself as Another*）中提出，我们自我意识，是通过站在别人的角度，远距离观察自我这种方式来部分构建的。要有所行动，我们首先要预计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并尝试预测他们会对我们的行为赋予什么样的意义。随着我们拒绝或自觉地投入我们认为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身份也就形成了。但比利时法律哲学家米雷·希尔德布兰特（Mireille Hildebrandt）在利科之后指出，要是我们的个人轮廓由计算机而非真人构建，“我们就再也无法访问这些轮廓了。我们无法质疑它们，抗议它们的使用，修改其内容——而面对替我们做侧写的真实的人，我们可以这么做。”

当然，我们会竭尽全力通过Facebook呈现最好的自我肖像（讽刺的是，这或许只是因为我们担心，要是不自己上传资料，别人会误解我们），但我们或许再也不具备预见他人对我们期待的能力了，因为我们不光不知道网络上到底流传什么样的有关自己的数据，也不知道不同的算法会从这些数据里得出怎样的见解。这似乎是我们身份构建方式上的重大转变——没有理由认为，这种不确定性会造就更好的人类。

同样，如果我们承认如下前提：操控自己这艘船，是为人的基本条件，那么，在线勾勒很成问题就又有一个原因了。希尔德布兰特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假设你正在打算素食，也浏览了几个相关的网站。分析软件（可能属于Facebook、Google或者其他网络中介）正确地推断出了你的愿望，并估计下一个月你有83%的可能性会放弃吃肉。

运营这一软件的机构，把这些信息卖给了肉类生产商的行业协会。突然之间，你开始收到上好肉类的样品，不管你走到互联网的哪个角落，总有宣传吃肉好处的广告跟着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分析软件计算出，用肉食信息对你持续曝光，将你停止吃肉的概率减少23%，甚至（神奇地！），最终你还放弃了吃素的打算。

当然，你并不知道自己吃素的愿望和冰箱里的免费肉类样品竟然存在这样的联系。你似乎仍然履行着自主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你相信自己在做有意识的选择，可那些你并未意识到其存在的利益相关者，却在对你施加着无形的影响。而互联网公司，从不耻于承认自己在这一切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FetchBack公司就尝试用顾客曾在网上表示过兴趣的产品广告轰炸消费者，它这样说道：”潜在客户离开[一家公司的]网站，浏览互联网，[前述公司的]广告会显示在他们浏览的其他网站上，让[先前的]网站始终显示在他们的视野里，让潜在客户始终记得它。”如果有东西蓄意地出现在你周边视野，你自己又未曾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这时候就真的该好好反省一下自主权了。

如果说，让你按照社会工程师期待的方式行事（不管是停止浪费能源，还是吃健康食品、照顾老人）是唯一重要的事情，那么，就没必要担心此类自主权损失了。只要能获得正确的响应，那么干预措施就可以算作成功。但这种做法最恶心的地方，倒不光在于它玩弄我们去做正确的事情，更在于它给了我们一种虚假的“一切尽在自己掌握”的感觉。反过来说，这种错觉让

我们无从怀疑社会工程师所追求的目的（不管他们的本意是多么善良）。

这一切不是要否认（从传感器到游戏等各种）技术可以用来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一如我们所见，它只是想唤起争论，让我们去对主导的社会和政治惯例进行质疑。但只有极客、设计师和社会工程师们肯花时间研究到底是什么最初造就了我们人类，前述探讨才可能出现。为了改善人类生存条件而假设人就跟机器人一样——这样的方式走不了太远。

技术与真理

一旦爱上了互联网中心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技术失败主义，设计师和政策工程师们会冒出更古怪的念头来。有人担心发布在网上的数据经久不灭（按一些批评家的说法，这并不吻合人类的记忆模式），听听Google的隐私顾问彼得·弗莱舍（Peter Fleischer）是怎么反驳的。“互联网应该重新调整，让它变得更像人类的大脑？……我猜，这是说，互联网应该划分记忆的层次，有些记忆要朦朦胧胧，有些不妨遗忘。这么说吧，计算机不是这么运作的。这场辩论，部分属于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但照我看来，在计算机的世界里，找不到地方安放它。”弗莱舍写道。

但是谁说计算机不是这么运作的呢？的确，计算机现在有可能不是这么运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永远不会。有一个有趣的项目，名叫“最近的大事”（Last Great Thing），它请人们在20天里分享自己在网上发现的趣事。每个链接只保存一天，过后就彻底消失；没有存档，所以，要每天关注该网站（实验结束之后，该团队还是把整个存档放了出来）。没有办法链接到任何东西。没错，这个项目的构建逻辑，和Google的“保存一切”心态不同。但“最近的大事”不见得就比Google要糟糕，尤其是，它说不定能让人们留意本可能遭

到忽视的重要文章。

我们的数字技术未来将如何发展，不是“互联网”如何运作、计算机如何运作的因素，而是我们选择怎样让它们运作的因素。有些技术需要公开和透明的伦理；有些技术需要保密和藏匿的道德。有些技术会促进合作，另一些技术会助长个性和独立。“互联网”没有伟大的逻辑；和凯文·凯利及其追随者的看法不同，“互联网”什么也没告诉我们。若放在50年或20年前的宏大尺度上，我们正在经历的重大变革（自我跟踪、终身记录、“推搡”、游戏化和数字先发制人）压根就不可能。但是，体制和政治逻辑们（我在这里故意用了复数，因为怪罪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或者全球主义都不对）悄悄把这些方法插入了制定政策的工具包，而制定政策的工具包本来不是什么新鲜东西，跟“互联网”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跟互联网中心主义一些最忠心的信徒一样，坚信史蒂夫·乔布斯是自由或创造力的最大敌人，我们有可能误解甚至低估了敌人。不讨论B·F·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就谈游戏化，不讨论理性选择论、芝加哥经济学派就谈数字技术先发制人，这似乎就是误导；对“互联网”、手机和维基百科的普遍兴奋，会让我们忘了关注很多并不新奇的潜在现象。我是苏联最后岁月里成长起来的人，还记得苏联管理者的游戏化爱好：把孩子们送到地里去收割小麦或土豆，因为孩子们缺乏动机，就给他们分配积分或勋章。今天通过手机来分配积分（也不强迫人下田干活）的做法，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旧现象装在了新瓶子里，我们不应该受新瓶子的愚弄，忘了自己应该等一等，看看它们会怎么往下发展：我们已经等了颇长时间——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如今展现出来的画面是很不好看的。

人们往往认为极客和工程师是保守派，至少，不愿意变革：他们只是遵照吩咐，按需开发。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判断，因为工程师绝非如此。工程

意味着拒绝接受现状是唯一可行方式，往往会引入革命性的维度。历史学家肯·阿德勒（Ken Adler）曾说过，“工程是在一个简单而激进的假设上开展的：眼下的一切，只是一堆原材料，要靠这些原材料来建设美好的未来。在这个过程中，无需把任何现有安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每一件事都有待根据当前愿望加以检验，所有的实践都可按照理性的要求重新设计。”工程师的问题不在于他们保守；而是他们不够保守。对他们来说，凡事都可以商榷——包括尊严和自主权。

让我们再次引述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的话：“对既定真理的厌倦，乃是自由人的大敌。”让我们新近获取力量的极客和工程师们意识到以下事实，或许不是坏事：别把政治当成创业公司来经营；政治家们面对着各种互相竞争的需求；立志消除谎言和虚伪，说不定弊大于利；重视主观但高质量的批评很有道理，哪怕它并非出自“群氓的智慧”；完美的跨国沟通说不定不光无法实现，也不可取；人类是复杂的动物，是偶尔不理性的动物，对做事理由的关心不亚于要做的这件事；数字道明的真相，比我们想象中要少，量化说不定有碍改革。

但就算是既定的真理，最终也会被推翻。理想而言，这种情况出现在广泛的辩论和审议之后。设计师和社会工程师无需变成害怕创新、不思进取的官僚，但不妨用另一种方式来实践创新。他们对产品和政策的干预目标，不应该仅仅是提供答案，更好让人们便于提出问题。如果技术修复不可避免，如果这样那样的解决方案主义无法回避，我们至少要确保这种解决方案主义会自我反思，甚至有点神经过敏。只有通过激进的自我怀疑，解决方案主义才能超越它固有的局限性。

后记

我在动手写这本书的时候，认为有两条真理不言而喻。首先，我认为，对“互联网”的良好批判性阐述，不能（也不应该）拿“互联网”本身来进行解释，而只能把它视为有待解释的事物。简单地说也就是，不能用“互联网”去解释其他事情，因为它本身就需要给予解释。第二，我以为，一本书的可读性，跟它提出的各种奇怪“主义”的数量成反比。等到我对最终成品进行检验，我感到有些失望。虽然我一板一眼地忠于了前者的精神，第二条却做得很蹩脚。好吧，或许这也可以用某种“主义”来形容？

虽然近年来大多数有关互联网的书籍都追求展现某种“宏大理念”，我却逆势而动，着眼于两个中等规模的概念，也即互联网中心主义和解决方案主义，这两者以很难预测的复杂方式彼此反馈。我但愿自己可以说，找到了一套魔法公式（至少也有一部炫目的PowerPoint幻灯片）来准确描述它们的关系。唉，我还没找到，也不相信存在这样的东西。这些概念在不同的语境

（预防犯罪、改善政治、对抗肥胖，甚或拯救地球）中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为实时观察它们，我尝试尽我所能地窥视尽量多的领域，但我知道，我的研究远远不够彻底；光是解决方案主义和互联网中心主义在网络教育、经济发展，或者我们所观察的每一个领域里的相互作用，就足够写一整本书了。

我在上一本书《网络错觉》里总结并详细探讨了没有干净、精确解决办法的所谓“邪恶问题”。（“邪恶”问题到底有多糟糕呢？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定义它们；解决它们的时候却不曾识别出它们。）在我看来，现代威权主义（也就是那么多“互联网自由”运动的目标）就是这样一个真正困难、无从管教的问题。指望“互联网自由”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能帮忙颠覆高度复杂的独裁政权，似乎太过天真，甚至绝对危险。

2010年，我写完第一本书时，颠覆独裁者的挑战之巨大（我来自中欧宽容的绿洲之国白俄罗斯，这一点或许有些帮助），华盛顿和部分欧洲国家在追求这一项目时所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和乌托邦主义，都叫我深感震撼。回想起来，我意识到，我正要指出的问题，没人——哪怕像我这样来自东欧坏脾气——胆敢否认，这可真幸运；不论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我们似乎都同意，外面可怕的独裁者太多了，没有他们的话，这个世界肯定会更好。我们如何意识到这些真相，不妨尽情辩论（当然了，最好是99%的博客辩论加1%的炸弹消灭；比例反过来就大大不妙）；但很少有人会不同意这一项目的基本前提：独裁真实存在，任何人置身独裁之下都不会太享受。

只可惜，在这一本书里，我要面对的不是这样一个清晰的问题了（我提出的观点是，有许多解决方案主义这和互联网中心主义者认为是问题的情况，或许并不是问题）；从道德上看，不再像“对抗威权”那么简单。这本书里，真正邪恶的不是问题（因为问题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而是提出来解决问题的方案。太多人说我们的文化生活效率低下，我们的政客两面三刀，我们的

两党政治放缓了政治进程，我们的犯罪率还没有降低至零——所有这些事情，在有限的意义上可能的确很成问题，但它们并不必然构成了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就类似，一场足球比赛要22号人踢上整整90分钟，可它不是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场足球比赛让体育馆里的所有人都大打出手，打得无休无止，这才是问题）。我提出，我们认为它们是问题，主要是出于数字工具的绝对威力，而非我们真的需要摆脱这些不连贯、不完美的公共生活。一言以蔽之，这本书认为“完美”（perfect）是“挺好”（good）的敌人；有时候，挺好就足够好了；不管我们手里握着什么样的工具，这两点说法都成立。

我毫不怀疑，在当前对“互联网”的兴奋当中，解决方案专家的冲动（以及其各种突变形式）会持续下去，并对未来的一些意识形态或政治项目造成持久的影响。我虽然能写下些不值一提的观点，但我想，我恐怕对解决方案主义出不了太多力，就像我对乌托邦主义或者浪漫主义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一样。有时候，它们大概也自有用处，但上述三者都有过遭到滥用的漫长历史。

总有人想要“修复”政治，这一点无法改变；但至少，我们可以嘲笑那些想通过让政治从“维基百科”、从整个“互联网”里学习经验教训来修复政治的人。尽管我们摆脱不了解决方案主义，我们至少可以试着摆脱互联网中心主义，好让解决方案主义者提出的某些方案无法打动人心，进而不可能推广执行。

如果这本书能侥幸成功，它对公共辩论的最大贡献，或许在于它为数字技术智性论战重划了战线。战线左右站着两拨人：一边，是大量的互联网思想家，相信“互联网”是一个有用的分析范畴，能告诉我们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重要真相；另一边，是一群后互联网思想家，认为“互联网”虽然有着无可否认的实体性质，同时也是一个可供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的社会建构概念（就跟他们研究“科学”、“阶级”和“达尔文主义”等公

共生活概念一样），但“互联网”并未告诉我们世界如何运作，更不可能告诉我们世界应该如何运作。前一群思想家认为，“互联网”是解决当今政治乱局的一大关键；后一群思想家认为，“互联网”只会把政策制定者们越弄越糊涂；数字活动家们越早弄明白怎样脱离“互联网”来阐明论点越好。

因为我的理论倾向现在应该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好吧，我是支持后一个阵营的——但愿你没看着书就睡着了），我不想再详细地说明我是怎么认为前一个阵营会撞南墙的。相反，我更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宽泛地概述第二种后互联网态度，看看它是怎样对待技术的，它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首先，就“网络”、“社会媒体”对我们的大脑、自由和独裁者有些什么影响一事，它会放弃高度情绪化的争吵式辩论。这种后互联网态度对平凡生活中的垃圾桶、停车计费表的世界更感兴趣，对推特在阿拉伯之春里扮演的角色不大上心——原因不在于它视野狭窄，而在于它不相信这种雄心勃勃却模棱两可的问题有什么力量。另一方面，推特的算法凸显了“Jan25”这个#标签（Hashtag），让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了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上的示威者，则成了它嘲笑的对象。这第二种方法能弄出病毒式传播的TED讲座吗？恐怕不会；它的发现不怎么迷人，它也不认为存在一些关于“民主”或“中东”的烂俗抽象真理。不过，就整体而言，这种高度实证性、小规模的方法，恐怕更能说明数字技术的机会在哪里、局限在哪里。比较起来，2011年初的整场“社会媒体引发了革命吗”大辩论，浪费了大家太多的时间，也包括我的。

那些采用后互联网态度的人，对一切有关数字技术的因果主张都极为谨慎，甚至可以说心存怀疑。他们认识到，这些技术大多不是造就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成因，而是这个世界带来的结果。后互联网态度不认为这些数字技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不应当怀疑它们的起源，只研究影响就好。相反，

采用后互联网态度的人会追踪这些技术的产生过程，在其产生和传播过程中，什么样的声音和意识形态保持了沉默；围绕这些技术的营销论述怎样融入时代精神，把它们打扮成一副“注定如此”的样子。

举个例子，互联网理论家看到MP3技术，会想起软件“Napster”（典型的“互联网技术”），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叙述；但后互联网理论家看到MP3技术会想到声音压缩的历史，于是从1910年前后开始进行叙述——乔纳森·斯特恩（Jonathan Sterne）在近作《MP3：格式的意义》（MP3: The Meaning of a Format[斜体]）中就是这么做的。研究搜索引擎的互联网理论家可能会从斯坦福和Google开始，并约略提及范内瓦·布什[1]（Vannevar Bush）的memex[2]；后互联网理论家则会进一步向前追溯，挖掘出类似阿尔伯特·卡恩[3]（Albert Kahn）这类不起眼的人物，还有保罗·奥特勒（Paul Otlet）和亨利·拉封丹（Henri La Fontaine）试图收集全世界所有知识的“世界馆”（Mundaneum）。这个清单可以无穷无尽地列下去，但趋势很清楚：后互联网态度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们大多数的技术辩论，都由对历史无知的浅薄叙述占主导地位，后互联网态度驳斥了它们，并带来了更多元、更丰富、更强调历史的经验。

一旦我们认识到，过去100多年，几乎每一代人都觉得来到了技术革命的最前沿（不管是电报时代、无线电时代、塑料时代、核子时代，还是电视时代），要维持“我们的时代很独特”这样的神话就困难多了。或许，这样一来，解决方案主义者就再也无法用革命化的修辞来证明自己激进公共方案的正当性。一旦我们进入后互联网世界，技术大师们（甚至一部分学者）就很难

1 杰出的美国工程师和科学管理者，是发展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主要组织者。
2 范内瓦提出的一个概念，类似互联网的前身。
3 法国银行家，20世纪最初10年，他曾通过照片创建“地球档案”。

再空口断言某样东西具有革命性，却拿不出良好的实证证据——就好像革命不言而喻，无需进一步提供证据。

2005年到2007年的某个时候，我也曾经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尽管时间不太长。我完全记得，想到能够也应该将维基百科、对等网络、Friendster、Skype等带来的经验应用到所有地方，我是何等的兴奋。那是一把非常厉害的大锤，不管你看到什么，大把大把的人（许多都来自硅谷）都迫不及待地想听到你大叫一声“那儿有钉子！”我诚然，想到自己正经历着一场革命，自己手里又握着关系到这场革命要害的钥匙，感觉相当让人陶醉。所以，对那些安于辩论现状的互联网思想家，我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我恐怕不会原谅他们）。

我希望，这本书能说明，大部分互联网理论家崇拜的是一尊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伪神，他们在自欺欺人。迄今为止，技术知识分子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将技术辩论复归平凡，扫清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流毒。如果这种平凡化运动真的出现，那么，其他的一切（尤其是具体政策），都有赖于平凡化的进展。且让我从以前最喜欢的一个领域举个例子：如果“互联网”这个概念本身就充满争议，模糊不清，那么，把玩“互联网自由”这样的说法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呢？在我看来，不解决“互联网自由议程”最初构成中的诸多矛盾，就开始讨论其细节，似乎适得其反，尽管它有可能让这个概念进一步地站稳脚跟。

一旦我们的辩论进入后互联网的版图，许多对技术恐惧的、违背历史的叙述，也就很难暗中捣鬼了。如果我们不再把“互联网”视为一股对我们头脑、对我们文化起作用的整体性力量，那么，一切论述数字技术会影响我们神经元、影响我们书籍的说法，就必须拿出证据，从个别的技术、个别的实践逐一谈起，兴许，还要对这种实践过去的演进、应对方式加以肯定。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得到这样的讨论：人们只是告诉我们，“网络”在对我们

的大脑重新接线，这可不是什么适合辩论的出发点。毕竟，如果它都在对我们的大脑“重新接线”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又能拿“网络”怎么办呢？它很能激起恐惧情绪，但却不是建设性的讨论方式。

技术不是敌人；我们的敌人是寄居在技术里的浪漫又革命的“解决问题兽”。对这个小生物，我们无法驯服，但我们可以采取很多办法驯服它最心爱的武器：“互联网”。趁着我们还力所能及，赶紧做吧——要是“解决问题兽”在把人类运输到“无故障”世界的过程中搞死了人类，那可就太讽刺了。

译后记

对技术的哲学批判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当科学家们爬上一个又一个的山顶的时候，总发现哲学家们早就在那里等着了。这本书的内容就是用哲学的观点去批判如今盛行的技术至上思潮和倾向。

作者提出，虽然技术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便利，它也同时也使我们形成了一种错觉：认为一切“问题”都应该有“解决方案”。可技术所关注的“解决方案”，失之于过分关注细节，忽视宏观背景。他在书里举了一个例子：肥胖症问题。技术解决方案主义认为肥胖症是个人的事情，所以设计了各种软件、各种新奇的小玩意来帮助人控制自己的体重、饮食量、提醒人锻炼身体等。但作者说，肥胖症不光是个人的事，也是整个社会造成的：连锁餐馆不懈推广垃圾食品，社会收入不平等，穷苦大众迫于生计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保持良好的身形等等。

作者对如今国内非常火的TED演讲也颇有怨言，他认为系统化的知识不可能包装在十来分钟的一段短短视频或讲演里。TED营造出了一种“我们正

在学习”的错觉，非但什么也没有教给我们，反而让我们产生了“知识就应该言简意赅”的误解，不利于深入学习。

作者还把我之前翻译的《游戏改变世界》批评了个够呛：怎么可能通过把生活变成一场游戏，就消除生活里真正存在的问题呢？通过游戏，让人们更能容忍问题，这难道能算一件好事？作者甚至痛斥了通过技术改良政治的设想，这一部分的批判非常精彩。可谓全书最精华、最犀利的部分。

乍看起来，作者是个大嘴“喷子”。近几年流行的技术类作者，无论立场左右，也无论是支持技术派还是反对技术派，没有不被他狠狠挖苦一口的。远至麦克卢汉，近至凯文·凯利，从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LinkedIn创始人雷德·霍夫曼、Google的埃里克·施密特、微软工程师戈登·贝尔，到网络理论家克莱·舍基，统统躺着中枪，而且是被机枪扫中的。

如果你是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读者，伴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进入成年，亲身体验到技术带给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变化，你也许很难接受作者的一些观点。甚至，你有可能给予尖锐的反驳：批判了这么多，他拿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吗？老实说，没有。但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提出更好的办法，相反，从哲学上来说，有一些问题并不存在“最优解答”，它们根植于人类的本性，根植于人类生活的大环境，既无法解决，也无需解决。

莫罗佐夫认为最重要的是，人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用批判性的眼光去接受、采用技术，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阅读这本书的乐趣之源：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技术，学习作者的批判性眼光，同时保持独立思考能力，科学和技术并不是、也不应该是另一种形式的宗教。

闾佳

2013年11月21日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5oqA5pyv6Iez5q27IOaVsOWtl+WMlueUn+WtmOeahOmYtOaal+mdol8xMzUxOTY5Ni56aXA=",
  "filename_decoded": "\u6280\u672f\u81f3\u6b7b \u6570\u5b57\u5316\u751f\u5b58\u7684\u9634\u6697\u9762_13519696.zip",
  "filesize": 65610153,
  "md5": "d02946d8d95e206d05f7eea3f3e11603",
  "header_md5": "ef1b32b18b32a72b3e869d0fd924c1e3",
  "sha1": "dd2c15cc839522b61a32f5002f37bd680270e600",
  "sha256": "1033ae1d9d00a9b3dcb9a87f9f807f1bf8f6b2cd46a4f4b8d31c5118338b3fc3",
  "crc32": 1585274527,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82452176,
  "pdg_dir_name": "\u255d\u255d\u2569\u2321\u2553\u2534\u2566\u2514 \u2569\u00b2\u256b\u2553\u2557\u00bb\u2554\u00b7\u2524\u00b5\u2561\u2500\u2565\u2321\u2591\u2561\u251c\u00b5_13519696",
  "pdg_main_pages_found": 380,
  "pdg_main_pages_max": 380,
  "total_pages": 395,
  "total_pixels": 207361728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